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英国汉学史

熊文华 著

學苑出版社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英国汉学史

印章篆刻：郑怀宝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ISBN 978-7-5077-2910-8

9 787507 729108 >

定价：42.00元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英国汉学史

熊文华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汉学史/熊文华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8

(列国汉学史书系)

ISBN 978-7-5077-2910-8

Ⅰ.英… Ⅱ.熊… Ⅲ.汉学—历史—英国 Ⅳ.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4313 号

责任编辑: 杨 雷

封面设计: 徐道会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yg@sina.com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4055、67675512、67678944

印 刷 厂: 河北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5×960 16

印　　张: 20.12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25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前　言

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部《英国汉学史》，是关于过去三个多世纪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国情和文化的简史。

本书的编撰以汉学家为经线，以历史事件为纬线，其间穿插了专题探讨和评析。应该说明的是，国际汉学界是个流动的大舞台，书中所介绍的一些汉学家并非始终都是英国护照的持有者。有些在英国汉学界工作数十年的外籍学者并没有加入英国国籍，据说荷兰籍汉学家龙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位；有些则在退休之年才落户英伦，如美籍汉学家马士。鉴于以上情况，本书把那些为英国汉学做过贡献的外籍学者和英籍汉学家放在一起加以评介。

为便于陈述，本书把英国汉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前汉学时期（17 世纪至 18 世纪），传教时期（19 世纪初至 19 世纪 70 年代），后传教时期（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上半叶）和当代（20 世纪下半叶至现在）。分期的主要依据是各个时期的主流研究思想、组织规模、人员状况、专业水平、方法手段、成果应用、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学术活动、国际交流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其中一些是构成英国各个时期的汉学研究特点的标志性因素，例如正式专业出版物的出现、汉学学会的建立、旷世之作的问世、研究方式的转型、专业化、团队化和国际化格局的形成。现将这四个时期的英国汉学研究特点概括如下：

前汉学时期：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是英国汉学的奠基阶段。当时关心中国事情的人大多为学者、自然神论者和启蒙主义者，他们多数人不懂汉语，也没有来过中国。研究是自发和分散的，灵感和素材主要来自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传教报告和信件以及从拉丁文、法文和西班牙文转译的中国典籍。《学术著作》和《哲学汇刊》开始刊登中国消息。

传教时期：从事汉学研究的人员主要是非专业的传教士、外交官和儒商，偏重于对中国宗教、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多数人通晓汉语并且来过中国。他们遵循欧洲学术传统，试图用所熟悉的方式来诠释中国历史和

社会现象。方法上仅限于个案和微观研究,服务主要面对传教和贸易市场。

后传教时期:汉语和中国国情研究逐渐成为英国高等院校的独立学科,直接受制于宗教机构的选题和培训项目日益减少。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历史、政治、社会、外交、贸易、语言、文学、考古和疆域。著作特色表现在用西方传统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来分析史料,注重文献解读、逻辑推理、倾向论证和实质揭示,风格多样,成果丰富。研究开始采用双向模式,部分研究成果还被直接应用于本国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政策的制订。

现代:汉学研究从书斋和研究室扩展到大学殿堂。随着西方汉学研究中心由欧洲转到美国,英国汉学实现了从欧洲古典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型。成立了英国汉学学会,出版了《亚非学院院刊》和《中国季刊》等汉学研究核心刊物。研究重点被定位于中国近现代的人文学科,区域研究、实证主义、问题史学、学科联姻、田野调查和量化分析等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专业化、团队化和国际化的汉学研究格局在英国形成。中英两国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访增加,英国汉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注意吸纳中国学者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在评价历史事件和问题时普遍采取了较为客观的态度。许多英国汉学家还借助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统计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等综合手段,从解读已掌握的史料入手,试图超越传统规范寻求某些突破,甚至重建原有的学术架构。

国际汉学史编修中经常碰到如何评价某些有争议的汉学家的问题,这也是我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有些汉学家涉及到诸如探险调查中的文化掠夺、在重大教案中助桀为虐或在“传教”外衣掩盖下窃取情报等问题,至于他们在不同场合中发表有关把本国价值普世化、本国利益神圣化、本国宗教国际化的言论则俯拾皆是。在国运昌隆的年代国人往往对他们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而在艰难岁月则无不嫉恶如仇,然而学术批判的尺度并非感情尺度,应该保持其理性。本书在评价这些人物(例如斯坦因和郭实腊)时坚持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没有必要涂脂抹粉,也没有必要夸大其词。个别汉学家的问题和污点,如果必须涉及的话,只着重介绍与本学科研究或者存在争论的部分,盖棺论定的工作留待有关学科的专家一起来做。尽力避免陷入这样的误区:谁在汉学方面的成就越大,

谁的缺点和错误就越多。

如何看待民族文化是国际汉学研究中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许多英国汉学家经过多年的考证和研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和创举做出了积极的评价，但是一些人却以“对中国人的迎合”为口实把它贬低了。又如中外宇航员就能否在太空中用肉眼看到长城的问题曾经在报刊撰文谈到各自不同的体验，有些读者却说什么“看到了又怎样？看不到又怎样？”诚然，学术和技术问题完全可以进行探讨，也应该允许争论，但是汉学研究中的文化虚无主义很可能影响对国外汉学家研究成果的正确评价。

本书的撰写几经寒暑，曾调用个人在英国留学和任教七年期间所积累的大量国际汉学素材。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不敢妄自铺陈，唯求通过充分提供事实和信息的方式对英国有关汉学发展阶段和人物进行客观公允的描述，对于有争议和不同版本的事件也无不经过考察才提出自己的看法。

几年前海外友人曾建议用白话《聊斋》或者通俗演义的方式讲述这几百年的英国汉学史，为对汉学感兴趣的不同专业读者提供一个励志平台。当时不知道娱乐化的学术讲座和文化快餐也可以产生怡悦性情和陶冶心智的功效，只是尝试用轻松的笔调写了几章，但是后来计划因为非典而改变。在写作过程中深感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回忆近代中西交往史无法排解伤感情结者感触尤多，为此在沉重的叙述之余也力图向读者展示其中的积极元素，并期待着可能伴随多元文化的国际新环境而来的美好明天。

在研究方法上，考虑到国际汉学的跨时代、跨文化、跨学科特点，本书采用静态与动态结合、微观与宏观结合、史实与论证结合等方式。在考察各个时期英国汉学的发展和特点的同时，也充分注意欧美各国的汉学成果和主张对于英国同行的影响。为照顾不同读者的阅读习惯，作者尽量把理论分析淡化到史论允许的范围，书后并设附录汉英人名和术语对照表，但是不曾奢望以大篇幅专业陈述或者提供新的史学模式来张扬个人风格。

英国汉学史具有特别重要的研究价值。英国是欧洲汉学大国之一，英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深度上看都可与西欧其他汉学研究大国的成果相媲美。虽然英国汉学史只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它所承载的知识和养分却是一笔巨大财富。对它的研究有利于我们

对历史和现状的审视，也有助于促进中英两国学术界之间的了解和交流。仅仅从英国圈地运动、宗教改革和产业革命背景下出现的“中国热”一个专题中，我们就可以获得许多极富启迪意义的信息，诸如民族自强之路如何走，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及今后的责任。这类含金量高的专题比比皆是，亟待我们去探讨。

序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

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序　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从历史上看，尽管 Sinology 和 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 Sinology 最好，因为，Sinology 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 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 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 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

① 严绍璗：《我对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载 2006 年《世界汉学》第四期。

② ［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迂回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1998 年。

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汉学研究系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① 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 ~ 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 ~ 1978),他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

① 季羡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中华书局,2003年。

词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 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认识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 1921 年 10 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① 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他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掏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之前，本质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 19 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

① 《章太炎全集·〈訄书·序〉·〈种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土原始论〉》。

物。

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 和 Serice 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 Serikon、Sericum 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 139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 10 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 522 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三页,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版。

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 7 次，历经 28 年，到过 30 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汉学”。这些人的东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 851 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意大利的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1684）、费尔南—门德斯—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

和《中华帝国全志》(《中国通志》)等,以及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等名士的著作,还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记述,都成为日后汉学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类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物质文明,较多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也涉及到一些中国的观念文化。这些"旅游汉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唯一的文明国家"——"神秘中国"——的方方面面。在此后的许多世纪里,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神秘感就从那时开始。

这些包罗万象的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作为文献,这些游记、日记、札记、通信和报告,有赞美,有误读,也有批评,但因为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科举等多方面的文化记载,而成为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

汉学的发生、发展与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阶段。但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互动之中。

从16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在数以千计的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成为名载史册的汉学先驱,他们为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1540年罗耀拉(S. Ignatins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等著名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将利玛窦神甫(Matteo Ricci)带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8年问世,这部世界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名副其实地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

等做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以七种文字印行，风靡欧洲。以利玛窦为核心的耶稣会士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开垦”，不仅著书立说，还把《四书》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不仅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位思想家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与其先后到达中国的著名的传教士，都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对推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做出了贡献。在世界汉学史上，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许多汉学家的名字十分响亮，诸如曾德照、柏应理、卫匡国、殷铎泽、南怀仁、汤若望、龙华民、金尼阁、罗如望、熊三拔、李明、张诚、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翟理斯、安特生、雷慕沙、儒莲、德理文、安东尼·巴赞、蒙田、冯秉正、尼·雅·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斯文赫定、马礼逊、斯坦因、理雅各、翟里斯、李约瑟、韦利、霍克斯、卫礼贤、福兰阁、孔拉迪、高本汉、卫三畏、费正清、戴密微、石泰安、谢和耐、欧文等和东方日本、朝鲜半岛的富有建树的汉学家等，以及当今散布在各国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铸造成汉学史上的思想学术之碑，开垦了汉学成长的沃土。

“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在欧洲全面研究中国文明的问题上，“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①] 戴密微把以上三个国家誉为汉学的先锋，“他们于16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而法国的汉学家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真正建立起作为学术的汉学传统。就传统汉学而言，法国是汉学家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汉学界的学术巨擘，不断为汉学的崇高而添砖加瓦。

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外化”的传播，也意味着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内化”的接受。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也是人类和谐与进步的推动者。

汉学诞生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交流和相互浸淫之中。这个结果无异于一枚果子的成熟，只有“风调雨顺”才生长得好。和谐、宽容、理解与尊重，是异质文化彼此借鉴的保证。作为文化形态的汉学，其成长和生存离不开

---

①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良好的国际语境。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凡是开放的时代,文化交流多,汉学就发展;反之,汉学就停滞,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

作为学术公器的汉学,文化上有其自己的成长过程。汉学是发展的,这一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生存于异国他乡的文化,同样深受不同时代语境的极大影响。这里所说的语境,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演变,也包括异国和世界的历史变化。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汉学的发展方向和内容;换句话说,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制于中国历史的更迭,也受制于他者社会的变化。这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汉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而现代汉学兴显于美国,20 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很繁荣。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现代汉学在世界有了显著的发展。

虽然 20 世纪的后 50 多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接触开始多了起来,但就整体而言,1949 年后约有 30 多年是一个相对"闭关锁国"的时期。公正地讲,这道意识形态的"长城"也并非就是中国的政策,是那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我国全面封锁的结果。这个时期的"汉学"涂满了政治色彩,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较多地保持着传统汉学的学术精神,而美国的"中国学"却成了充满政治意识的现代汉学的代表。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这种政治特征,是那个时期美国汉学的基础,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他国家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由于中国与世界的隔离,由于西方与中国少有交流,因此汉学家不了解中国最新的文化进展(比如新的考古发现),致使汉学处于断炊或"无米之炊"的状态,没有中国文化的支持,西方汉学要想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也很困难。陌生感和神秘感困扰着汉学家,这不仅是文化的尴尬,也是汉学家的难堪。

人类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等。物质文化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方面,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又极易变化的"具象"文化,即如饮食、服

饰、住房、音乐、舞蹈等;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表现在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宗教观等诸多方面,以及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经过高度抽象后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它通过文化灵魂——哲学、文学、语言、宗教、历史等来表达。[①] 观念文化,一俟进入外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他们的研究也就进入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深层研究。

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其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现在,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nology (汉学)和 Chinese Studies (中国学),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

时至今日,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这两种汉学形态不仅同时存在着、共荣着,而且还互相浸透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汉学悄然嬗变为中国学,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特点和极强的生命力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汉学始自 1830 年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建立,这个学会虽然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文学的兴趣,但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②] 这个特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一致。可见,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和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8 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就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点,与欧洲具有人文科学特征的汉学颇有差异,但它依然属于 Sinology 的范畴。

美国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走向强大,加入强国之列。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是列强联合的第一次尝试。从那时起,承担着相当"政治"角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真正美国式"汉学"——中国学,就从那时开始,而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之后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对其他国家

---

① 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载《中华读书报》2001 年 9 月 19 日。

②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的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都有强烈的影响。

在西方,费正清的魅力在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以更清晰、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来表述中国。"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安的近代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他那样大。"费正清等一批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都参与过战时情报工作,在战后作为美国政府的智囊而直接为制定对华政策服务。费正清的研究虽然充满了实用和功利色彩,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辉。美国学者从事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蔑视学问,更为强调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①] 这就是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心态,他们讲究功利和实用,不理会学术上的理智倾向,这与法国汉学家的学术心态、学术个性与学术传统几乎大相径庭。

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但是,汉学发展到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特点。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可以说世界各国汉学家的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

汉学(Sinology)对中国研究者来说,被尘封得太久,所以它的空白很多,浩如烟海的资源还有待于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不仅可以收获汉学,还可以无意中发现被历史"放逐"和"遗失"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文化。编撰"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目的和宗旨,不仅是为了梳理已有的汉学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追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历史状况、经验及影响,同时探究汉学的产生、成长、发展与繁荣,还要尽可能厘清这块"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文化的作用。当然,"列国汉学史书系"还期望对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有所裨益。

---

① [美]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比拟。严绍璗教授谈到 Sinology 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一、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二、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三、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四、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

写作“列国汉学史”艰难，而出版可谓难上加难。1995 年曾经“落实”的出版经费，因故而一风吹。人间的事好像天上的云地上的风，飘忽不定没有根，铁板钉钉是没有的，因为钉子可以用“权力”拔出来，一切承诺和协议，都可以化为乌有。虽然“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生长不断受到寒风的袭击，但它终没有自毙于摇篮之中，冬天之后是春天，接着便是收获的季节。这套富有创意和价值的书系，将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的发展及其比较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说到这里，“书系”编辑委员会同仁和作者，要感谢学苑出版社所给与的支持，尤其要感谢社长兼总编孟白先生和不久前病逝的总编辑助理郭强副编审，由于他们慧眼识金才使这一书系得以面世。

有人认为“汉学史中国人写不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立论”。日本人石田幹之助写了《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莫东寅写了《汉学发达史》（1949），接下来又有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1991），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1994），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1995），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2002），刘正的《图说汉学史》（2005）和李庆的《日本汉学史》（2005）相继面世。在人类的文化长廊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各种史书琳琅满目，这其中有外国人写中国的各类历史，也有中国人写外国的各类历史。历史，是往事，是记录，是选择，并有相对独立的评论和褒贬。但是，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不是最后的历史，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演进，修史很难一步到位，它需要一代代学者“积跬步”才能“至千里”，只有“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方能“风雨兴”、“蛟龙生”。学问之事非一夕之功，非得有前赴后继者敢于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才会达至光明顶峰。

开拓者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将自己的真诚劳作化为欢乐，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定会有人踏着自己的肩膀或是踩着自己的鼻子和头顶攀上高峰，

以鸟瞰美丽风光。21 世纪是经济的大空间，对汉学来说也是一个“大空间”。但是，要探索这个“大空间”，需要有个和谐的“太空站”，需要大家联袂共建；当然世界上需要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历史语境，共同创造彼此接近、认识、理解、尊重、沟通、借鉴与融合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汉学研究发展的机会。

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没有最后的历史。汉学有历史，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汉学及其研究将以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在人类文化的世界里放出异彩。

阎纯德

2006 年 12 月 5 日于北京半亩春

熊文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英语沙龙》顾问、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1961年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作为国家第一批“出国储备汉语师资”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进修三年，1973年至1975年留学英国。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英语言文化对比和翻译理论研究以及国际汉学研究。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四十余年，曾执教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四年，先后还在约旦哈希姆王国约旦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和新加坡迈新机构讲学多年。译著和著作有《实用汉语参考语法》、《汉英应用对比概论》、《英汉翻译教程——理论与实践》等，翻译对外汉语教材六十多部，发表论文、小说、散文和影视作品百余篇，合译文学作品、撰写对比理论和编译的工具书有《他们》、《实用汉英小词典》、《传传神的一举一动》、《汉英对比语法论集》等。

目　录

前　言……（1）

第一章　前汉学时期的英国汉学……（1）
一、跨世纪的英国汉学历程……（1）
二、安东尼·科林斯和马修·廷德尔……（7）
三、哈切特和墨菲与《赵氏孤儿》……（12）
四、珀西与《好逑传》……（14）
五、哥尔斯密与《中国人信札》……（16）
六、罗伯特·博伊尔、托马斯·海德和威廉·琼斯……（18）

第二章　传教时期的英国汉学……（21）
一、早期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代表人物……（22）
二、传教士家庭出身的汉学人才……（32）
三、外交人员出身的汉学研究代表……（34）
四、筚路蓝缕的汉学研究者……（38）
五、悬壶济世的传教士……（50）

第三章　后传教时期的英国汉学……（52）
一、汉籍翻译大师理雅各……（53）
二、汉语拼读方案设计者威妥玛……（70）
三、伦敦大学汉学教授道格思……（72）
四、科技翻译家和教育家傅兰雅……（76）
五、剑桥大学汉文教授翟理斯……（94）

六、西法西学的倡导者李提摩太 …… (100)
七、职业外交家兼汉学家庄延龄 …… (101)
八、多次前往新疆和甘肃探险考古的斯坦因 …… (102)
九、紫禁城中的洋太傅庄士敦 …… (106)
十、潜心研究中国民俗和方言的麦嘉温 …… (110)
十一、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汉学家慕阿德 …… (111)

第四章　国际化、专业化和团队化的现代英国汉学 …… (112)
一、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现代英国汉学界 …… (114)
二、韦利:出类拔萃的翻译家和汉学家 …… (116)
三、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 (126)
四、葛瑞汉与中国程朱理学 …… (139)
五、中国隋唐史专家杜希德 …… (143)
六、英国学术院中国组主席杜德桥 …… (144)
七、一流学府栽培出来的英国汉学大家 …… (147)
八、国际精英会聚的汉学大舞台 …… (154)

第五章　从史论和实践角度看英国汉学 …… (161)
一、世俗化与英国汉学的发展 …… (161)
二、史学倾向与汉学家的责任 …… (165)
三、微观汉学、实证主义与区域研究 …… (172)
四、汉学大国面对的现实 …… (177)
五、瀚海阑干百丈冰 …… (189)
六、昔日的荣光与来日的辉煌 …… (193)

附录一　专业与非专业的汉学刊物 …… (207)

附录二　汉学书局和机构 …… (224)

附录三　从事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院校 …… (242)

参考文献 …… (265)

汉英人名对照表 …… (268)

汉英术语对照表 …… (290)

第一章
前汉学时期的英国汉学

一、跨世纪的英国汉学历程

英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最初了解主要是通过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的进口、水手和商人来华之所见所闻、欧洲大陆传教士寄回国内的书信和报告，以及从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转译的汉籍名著等渠道。到了17世纪中叶之后便有《学术著作》、《哲学汇刊》和《绅士杂志》等刊物转载中国消息，或者刊登介绍中华文明成就的文章。英国传教士、学者和外交官对于汉语、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古代科技成就的早期探讨都是出于自发、分散和随感的方式，但是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却极富远见卓识。鲁惟一说："英国的早期汉学研究和发展是一些开拓者个人自发进行的，当时不可能有任何学术机构对他们持续施压，让他们对中国人的宗教、文学、哲学或者历史进行研究。荣誉永远属于那些不可能全职领薪的工作者。他们没有或者几乎很少有可分享其知识或者在学术上可与之切磋的同事，公共图书馆的设备极差，不如自己的藏书多。他们所做的一切与20世纪末的标准相去甚远，这原也是预料中的事。但是没有他们的激励和奉献，今天就不可能有任何学者在学习汉语读和说方面迈出第一步。可以说亚瑟·韦利和李约瑟两位学者曾经极尽全力向知识界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成就，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位能在英国大学中担任汉学研究的职务。"①

从17世纪末的"中国人事件"（所谓的"礼仪之争"）到威廉·坦布尔

① Michael Loewe, 1998.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Chinese Studies* in Bulletin of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1998 ~ 1999.

发表预示着"中国热"到来的《关于园林》,正是英国汉学家在母腹中的躁动时期。"中国热"不仅出现在英国,也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然而就英国而言,教皇流亡亚威农时期英国国会正式立法禁止向他请示报告,14 世纪牛津大学的神学家约翰·威克利夫开始对天主教的批判,自然神论者对于"原罪"和"逐出教门"解释的质疑,以及 16 世纪 30 年代教皇不允许英王亨利八世离婚等事情,都是推动"中国热"发展的原因。人们需要借助体现东方理性道德教化的儒家学说来对抗教廷,从道家观念和科举制度中寻找改变现状的理论依据。1583 年约翰·纽伯里访华之后,英国散商开始大批进入广州市场,英国知识界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了解中国历史、哲学、社会、传统和制度。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开办汉语学习班,以便增加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为驻华使团和商会培训口笔译人员,扩大传教士在华的福音传播渠道。英国一些报刊还邀请在华的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为他们撰写报道中国消息的稿件。

几年时间过去了,由于经费、管理体制和对于东方价值的肤浅认识等原因,竟没有一所英国大学在自己的人文学科中安排汉语证书或者学位课程。虽然在 17 ~ 18 世纪有一些中国古籍和文献已被波德雷安图书馆、牛津图书馆和不列颠博物馆所收藏,但是没有一个读经通史的英国人告诉读者如何使用那些典籍,于是只能由东印度公司和伦敦会承担起这个责任。侨舒亚·马什曼去孟加拉的福特·威廉学院、罗伯特·马礼逊到伦敦会分别接受这方面的培训,就是其中两个例子。

"第一个去中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是 19 世纪英国汉学家中的先锋人物,1825 年,他在英国与一个推进汉语研究委员会取得了联系,汉语学者多马·斯当东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倡议把汉语引入到剑桥和牛津大学的教学中去,尽管这个组织没有能够实现它的主要目标,但是在伦敦却组织了语言学会(Language Institute)。在那里,马礼逊向三十几个学生讲授了几个月的汉语课程。"①

从 1837 年起,伦敦的大学学院在得到了马礼逊遗赠的一批中文典籍之后,同意设立一个为期五年的汉学教授席位。1904 年有关方面正式达成协议,分别在伦敦设立两名汉学教授席位,在牛津、剑桥和曼彻斯特各设一名汉学教授席位,但是在 1939 年之前曼城的教席因没有称职的人选而

① M. G. 马森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第 24 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年。

长期空缺。已经开设汉语课的大学，采用的基本上是英国教授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传统模式，侧重于呆板的书面语的教学，很少让学生学习现代汉语和普通话，直接与华人进行交流。

第二次大战前后英国大学汉学教学和研究体制的缺点日渐暴露出来。1935 年至 1936 年由皇家学会举办的一次中国展览会和韦利翻译的中国诗词散文的出版，激发了英国知识界对于中华文明的兴趣。那些曾使清代文物收藏增色的玉佩、青铜器、瓷器和绘画，送到伦敦展览后使观众眼界大开，他们惊奇地发现原来中国历史上还有汉朝、唐朝和宋朝的存在；汉语原版的《诗经》和《论语》文字如此优美，读者无不产生一种置身名流的感觉。1939 年之后英国军情和翻译部门的人手奇缺，不得不动用像韦利这样赫赫有名的汉学家去检查中国记者的新闻稿件。随着战事的终结，欧洲大陆和美国大学的设置都有所改变，汉学研究不再是单一的语言专业，而开始跟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等学科融为一体。大学正式设立汉语课程在英国汉学研究史中原本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基础之上把汉语教学与有关中国的社会学科结合起来，进一步为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雷伊勋爵主持的咨询委员会是第一个关注英国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的官方机构。该委员会 1909 年发表的报告在 1916 年东方研究学院（后改名为“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称为“亚非学院”）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此伦敦成为英国的汉学研究中心。1931 年英国成立了庚款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庚子赔款的使用审批。虽然比起美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同类委员会来这算是较晚成立的一个，但是开设汉学研究专业的英国各大学从此可以就与中国交换学者和购买中文书刊的经费问题向该会提出申请，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1945 年由斯卡伯勒伯爵领导的另一个委员会鼓励英国学生学习亚洲、非洲、东欧和斯拉夫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当时日语翻译的缺乏比起汉语翻译的不足有过之而无不及，几年后韩国语和越南语的情况也是如此。1947 年该委员会报告发表后，从事汉学研究的青年英国学者可以获得资助前往日本、香港、澳门和台湾见习数月甚至一年。英国汉学界还认识到，在开设汉学专业的人文学科的同时还需要设置中国历史、中国考古、中国法律和中国文学等课程。为适应这一情况，各大学增聘了许多汉学讲师和助教，直接用汉语授课。学习汉学专业的学生人数和图书资料都增加了，

先后跟中国大陆和北美的一些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48 年在剑桥召开了首届英国青年汉学家大会,1968 年创建了欧洲汉学家学会(会址在英国),1976 年又组建了英国汉学学会,这些都为英国与中国的信息和图书资料交换,以及各国汉学家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1961 年以威廉·海特爵士为首的另一个关心英国汉学研究的委员会成立了。当时英国大学的变化和中国的政治局势,不得不使人们对于汉学研究的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一部分人认为应该把中国情况纳入政治学和社科学学位课程的选修内容,应该予以加倍关注;另一部分人则怀疑汉学没有充分理由单独成为一门学科,可以与中国经济学、地理学和现代史学合并成为一个系。学者们的最后共识是学生正式学习那些学科之前必须进行高级语言培训。1968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和 1980 年牛津大学的当代中国中心的相继设立,以及 1960 年《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出版,都是海特报告发表后所取得的成果。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除了利兹大学外都不尽如人意。于是有些汉语教师因为学校经费不足而提前退休,有些中文系教席自然空缺后不予补充。1986 年帕克爵士发表的《为未来呐喊》(Speaking for the Future)帮助扭转了这一局面。他领导的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根据当时外交和国际贸易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1997 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和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联合调查发现,为了满足外交和工商不断增长的需要,英国应该加强汉语教学,保持汉学研究的学科意识,尽可能满足语言培训、地区研究和学科业务等方面的要求。同年部分英国著名大学教师访华回国后建议重新调整英国大学现行的汉学研究方针,把重点从传统领域、语言和文学方面转向纯语言习得以及社会学科中的当代中国研究。

现代英国汉学水平跟前汉学时期和后传教时期的汉学水平相比较,无论在研究人员数量、学科分工、选题范围,还是论证方法和成果价值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别。现代著名英国汉学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受传教士家庭的影响,出生或者受教育于中国,熟悉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对于汉学研究热情而执着,并青出于蓝胜于蓝者,例如:翟林奈、苏柯仁和叶女士等。二、原来并非从事汉学研究,但是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他们创造了发挥个人才能的条件,一经牛刀初试就益发专业化,并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无

法克服的困难，做出了非凡的成绩者，例如：韦利和李约瑟。三、经过牛津、剑桥、伦敦或者爱丁堡等一流学府的环境熏陶和名师栽培，系统地掌握了汉学研究的知识和手段，取得了累累硕果者，例如：鲁惟一、巴雷特、古克礼、霍克斯和霍布恩。四、汉学大发展迎来汉学大交流，英国为国际汉学界培养了白之和韩南等一代新秀，国际汉学界也先后给英国送来了哈龙（奥地利）、德效骞（美国）、鲁桂珍（中国）、龙彼得（荷兰）和蒲立本（加拿大）等学者。英国汉学界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际精英荟萃的论坛。第二类和第四类汉学家的大批涌现，形成了英国前汉学时期和后传教时期与现代汉学之间的分水岭，预示着现代英国汉学的大发展和人才辈出的汉学新时代的到来。

阙维民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的《〈汉学文献目录〉索引》统计，从16世纪到1924年西方研究汉学的学者共有7737人，曾经发表或出版20篇/部以上著述者113人，其中英国汉学家37人①。

198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浤源曾与牛津大学的高级讲师伊懋可（曾任密执安大学社会学教授兼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对英国汉学研究情况进行了联合问卷调查时估计英国国内有中国通160人，在国外访问和研究的英国汉学家约40人②。

根据1987年英国汉学学会印发的会员通讯录，该会交纳会费的个人会员为129人，从名单来看其中在学术界声望较高并出版过两部以上有分量汉学专著者大约只有50多人。

巴雷特在《不思进取，不可思议》论文中估计，英国的中国通大约有40～50位从事中文教学，大约还有50位在与各自专业有关的汉学研究岗位上工作。

据1997年12月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和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的《汉学研究回顾》的报告，在英国高校57000位活跃的研究人员中，有400位曾经引用过与中国有关的著作，涉及医药和工程等学术领域，但是主要集中于亚洲研究、地理、经济、政治与国际研究、贸易和管理、会计以及历

---

① 阙维民：《剑桥汉学的形成与发展》，载《汉学研究通讯》总81期，2002年2月。

② James H. Y. Chu（朱浤源），1986. *Chinese Studies in Britain: A Survey Report on Behavioural and Academic Preferences*，载《社会科学论丛》，第229～255页。中文译稿题为《英国的中国通：量的观察》，分载1986～1987《近代中国史研究》。

史。又据欧洲汉学家学会的一份调查,在英国六所大学中有46位正式编制的教师懂汉语,其中三人还能讲广东话。

2004年5月,21所大学协会应邀参与投标英格兰高教基金会承办的一项"汉学研究和少数民族课程初步行动计划"。该计划认为,中国的发展对于英国的商业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今后对于精通汉语和了解中国贸易、经济、政治和文化人才必然有一个不断增长的需求,为满足这一需求,应该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稳定现有几所大学的汉学研究中心并增设相关课程。英格兰高教基金会为此制定的计划,经过竞价,决定5年内为7所大学每年拨款15万英镑,外加图书建设基金。这7所大学是:剑桥大学、杜伦大学、利兹大学、纽斯卡尔大学、牛津大学、设菲尔德大学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从耶稣会士、东正教传道团和新教传教士的来华时间以及欧洲各国汉学研究的起点、规模和成果排列比较来看,英国的汉学研究当晚于俄罗斯、法国和德国,但是英国也是欧洲的一个汉学研究大国。

本章要讨论的是17世纪至18世纪末英国前汉学时期(奠基时期)的情况。

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暴露了替代封建制度的新秩序的弊端,使部分英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基督教文明是否始终处于最先进的地位。17世纪,特别是"光荣革命"后,英国的政治、科学、文化和宗教处于大发展前的躁动时期。1707年签署的联合法令使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在"大不列颠"的旗帜下结合成为一个雄厚的政治实体,为王国政府提供了海外扩张的社会条件,预示着市场开拓、资源争夺和国与国文化交流时期的到来。18世纪60年代始于纺织业的英国产业革命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

英国哲学家和宗教改革鼓吹者从当年传教士的报告、中国古籍的译本、来华的外交官、商人、水手和游客的见闻随想录,以及《哲学汇刊》、《绅士杂志》和《学术著作》等刊物刊登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评论中了解到体现东方道德教化的儒家学说,意欲把它作为对抗罗马教廷的武器,自然神论者和启蒙主义者也从中找到了符合他们主张的教义新论和人文主义精神。由于历史和交通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关心中国情况的英国学者多半没有来过中国。随着"中国热"的到来,前汉学时期的探索在不断地升温。虽然那些学者们的贡献只是开创性的,但是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却极富启

迪性和思辨性，为后来英国的汉学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文环境和条件，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安东尼·科林斯、马修·廷德尔、安德鲁·迈克尔·拉姆奇、阿瑟·墨菲、托马斯·珀西、奥利维尔·哥尔斯密、罗伯特·博伊尔、托马斯·海德和威廉·琼斯等人，都属于当时可圈可点的人物。

二、安东尼·科林斯和马修·廷德尔

“罗马天主教”是明末西方耶稣会士对“Roman Catholic Church”的汉译，对于世俗的中国人来说，有时容易与泛指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相混淆。自从4世纪得到罗马帝国正式承认后天主教教会不断扩大其影响，成为包括英国在内的多数欧洲国家的国教。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在威登堡教堂演说中提出个人依靠信德即可成义得救的主张，反对那些华而不实的宗教仪式，创立了路德教派。与此同时，法国约翰·加尔文也提出个人是否成义得救由天主裁定的理论，认为应该清洗自己，放弃贪欲，于是创立了加尔文教派。两个教派的出现遭到罗马教皇的谴责和镇压，新旧教派开始了残酷的斗争。路德教派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建立了自己的地盘，而加尔文教派除了在法国发展自己的力量外，还把影响扩大到英国和西班牙。1529年德国教会作出恢复天主教的决定，遭到了马丁·路德教派的抵制，于是后来人们便用“新教”来泛指那些基督教徒。

在国王亨利八世执政期间英国基督教分裂成为圣公会、天主和清教加尔文派三派鼎立的局面。英国皇室与罗马教廷决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教皇不批准亨利八世与王后凯瑟琳离婚而迎娶宫女波丽安。根据剑桥大学教授克兰默的建议，国王在神学家中广泛征求意见，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决定不再向教皇纳税和申诉，任命克兰默为英国新主教，在国会通过了《最高权威法》(Supremacy Act)，宣布自己为国教教主。教皇得悉后宣布开除亨利教籍，亨利也下令在英国教会祈祷手册中删除教皇的名字。英国与教廷的这一紧张关系以及英国各教派内部之间的斗争，在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执政时期始终都存在着，君主对教会的权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要求改革圣礼仪式、信徒平等、政教分离和放弃教主制度的清教徒受到了沉重打击。1607年一批英国清教徒乘“五月花号”前

往新大陆寻找宗教自由。1620 年侨居荷兰的 101 名清教徒再次搭乘“五月花号”前往新大陆。数年后,英国国教又进一步分裂为圣公会、自由教会、牛津教会等派别。

17 世纪英国有一些牧师和基督教学者对于《旧约全书》的《创始纪》中所说的“原罪”等基本教义提出了大胆的质疑,掀起了旷日持久的自然神思潮。“原罪”是三位一体神学理论的基础。天主教认为罪可以分为该死的罪和可饶恕的罪,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不可以救赎,后者可以救赎。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如果能经常参加弥撒,向教会捐钱,就可以缩短或者免去死后炼狱之苦。而新教则认为一切罪行都是可以救赎的,炼狱和功德库是原始迷信,教会声称掌握了通往天堂和地狱的钥匙,是为了聚敛钱财。

实际上,自然神思想早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恶劣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贫困、疾病和战争使黎民百姓生活饥寒交迫。“来世”美好生活的许诺和拒绝教会拯救将被判罚入狱的威胁,使教会获得对芸芸众生的绝对控制权,“逐出教门”则是教会操纵政府官员的紧箍咒,结果使教会在土地和财产方面的权力日渐膨胀。后来西欧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经济发达的国家面临着如何摆脱教会对于政治和知识的控制,然而教会却坚持认为他们的《新约》和《旧约》译本是解决宗教和科学等一切问题的至高无上权威。发端于 14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于包括文学、法律、建筑、哲学和艺术在内的古代罗马和希腊文化的兴趣。学术界兴起的考证古代罗马和希腊文献之风导致了文献批评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对圣经译本的批评。学者们对公元 4 世纪以后罗马天主教会所使用的圣经译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罗马和希腊的典籍对于人的本性和潜能本来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同时还强调了世界的善良和美好以及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责任,然而圣经的“原罪”说却是对人性的极大压制和摧残。随着欧洲与中国和日本贸易的发展,西方人还发现了据说已经被洪水彻底摧毁了的诺亚方舟时代之前的旧世界竟然还一直存在着灿烂的东方文化,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震撼,于是争相对圣经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当时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曾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天文学的进步使人们不再相信教会所固执坚持的伪科学地球中心说。

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推动了英国的医学、化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发展。牛顿的宇宙理论和地球引力定律给人们展示了观察世界的新方法。唯唯诺诺的教徒们开始认识到世界之外还存在新世界的可能,禁锢思维的

陈规旧矩必须推翻。

17 世纪下半叶英格兰教会的部分牧师和学者提出了“三位一体说违背人性和理性”的观点。他们发表的文章被冠以“自然神论”的总名，争辩的时间从 17 世纪一直持续到 18 世纪，这正是“中国热”在英国和欧洲形成高潮的时期。然而英国的自然神论思潮并非有组织的宗教运动，只不过是一些学者认为在肃清神学中某些违背基督教诲的教条所必须做的努力。他们反对原罪说，不赞同基督的神性和以捐躯代世人赎罪的观点，拒绝所谓的“神灵启示”，也批驳加尔文教派认为每个人在出生之前都有过被拯救或者曾下地狱的遭遇的说法，因为自然神论者认为这些模糊不清的教义无疑把上帝描绘成了一个残酷和专断的暴君。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在所发表的文章中谈到的主要观点是：上帝可以通过人性和理性被人们所感知，人们有责任拥戴上帝并爱护世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悔改是求得上帝宽恕的一种手段。爱德华·赫伯特勋爵是最早倡导建立符合人性自然原则的世界教人物之一。他虽然不是自然神论者，但是他的一些观点后来被许多英国自然神论者所广泛采纳。查尔斯·布朗特根据赫伯特的理论，于 1683 年撰写了一本名为《世俗教》(Religio Laici)的书，1693 年又出版了名为《理性之预测》(Oracles of Reason)的书，书中的一篇文章对当时已经发表的自然神论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归纳。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不是自然神论者圈中的人物，但是他在一本专著《论基督教之理性》(On 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中谈到“上帝之子”基督奉派向世人传递的圣言也可为人的理性所感知，这实际上是对基督教自然神论者的一种理论支持。

英国自然神论者中的知名代表人物大约有 20 多人，其中安东尼·科林斯(Antony Collins, 1676 ~ 1729)和马修·廷德尔(Mathew Tindal, 1657 ~ 1733)最受学术界关注。

安东尼·科林斯读过李明、鲁德昭和柏应理等许多来华耶稣会士的著作和从中国发回的报告。他在著述中经常谈到中国人的信仰和东方的佛教，以此作为对基督教和圣经的权威性提出质疑时的事实依据。他在 1713 年出版的《从自由思想派的出现和发展论思想自由》(Discourse of Freethinking, occasioned by the Rise and Growth of a Sect call'd Freethinkers)一书中从人的理性角度提出重新检验并解释“神灵启示”问题，试图证明预言和《新约》记录的不确定性。他说，基督教是以犹太教为依托的，对它的

验证要看《旧约》中的预言是否得到了实现,但是从本质上看那些预言都是寓言式的表述,根本无法为事件的真实性提供可靠的证明。他进一步指出,犹太人所熟知的"弥赛亚"是基督纪元前的事,他们可能通过与埃及和迦勒底等民族的接触吸取了许多神学理念。东方人信仰佛教,有自己的佛经,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经典。1724 年科林斯的另一篇文章《论基督教的依据和理性》(Discourse on the Grounds and Reason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遭到了许多教会学者的攻击,促使他更加立场鲜明地对《预言书》(Book of Daniel)的经典性和权威性进行了批判。在科林斯引述的大量资料和观点中也包括了德国自然科学家莱布尼兹的《中国近闻》(Novissima Sinica)。

马修·廷德尔 1657 年出生于英国德文郡,父亲比尔·费里斯是一位教区长。廷德尔在牛津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1676 年获得学士学位后成为圣心学院法学研究员,大约在 1685 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时皈依了天主教,但是 1687 年又回归基督教。他曾因为持极端的宗教怀疑论而受神学界的谴责,但是他并没有脱离教会成为无神论者。1730 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创立于创始纪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As Old As the Creation),被誉为"自然神论者的圣经",对于教会和圣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如果基督教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应该与所有可被理性感知的真理共存;如果说一个宗教来自于无穷智慧和完美的存在,那么绝对的完美到底是什么?自然宗教应该为开天辟地以来的人类所共有。但是神灵启示并不能赋予绝对完美的宗教任何东西,因此,如果说基督教是完美的宗教,那么它应该是创始纪以来就存在的宗教。廷德尔曾经读过许多介绍中国情况的书籍,常以儒家学说与基督教教义进行比较。他曾经说过:"我认为孔子的格言与耶稣基督的格言没有任何不同,我倒觉得前者明了简洁的格言有助于说明后者较为模糊但是符合当时表达方式的教诲。"①为了压倒辩论的对手,廷德尔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过这样的话:"一位赞同莱布尼兹观点的中国传教士纳瓦雷特说,不让中国人了解基督教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实属神佑,一旦有所了解,那么他们当中就永远不会出现了不起的人,就会冲着我们的脸啐唾沫。"②

---

① William W. Appleton, *A Cycle of Cathay: The Chinese Vogue in England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 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② 同上, pp. 50 ~ 51.

另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物是安德鲁·迈克尔·拉姆奇，法文名舍瓦利耶·德拉姆奇。他出生于苏格兰艾尔，曾先后在爱丁堡研修哲学，在格拉斯哥研修神学。年轻时由于对加尔文教派僵化的经院哲学和宿命论教条持有异议，一度皈依了以否认基督神性和世人原罪说为教义的苏塞纳斯教，对抗基督教的一切传统。1707 年他在伦敦师从牛顿弟子法蒂奥·德杜利尔斯研习数学，并通过他结识了因反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而隐居赛文山的几位法国新教教徒，但是他们的狂热和盲从使他难以接受，于是便前往荷兰莱顿。1708 年拉姆奇移居法国，任蒂雷纳王子太傅，一度同时为夏尔·爱德华·斯图尔特和亨利·本尼迪克特·斯图尔特授课，法国国王因此授予他拉扎勒斯骑士勋章。晚年他对自己的宗教观有所修正，认为各国宗教教义都有相通之处。虽然他在自己的著述中极力推崇并阐述包括中国偶像崇拜在内的非基督教文化，但是都为了证明基督教义的真谛和普遍性。他去世后出版的《自然和启迪教的哲学原理》(The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一书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超自然的立场。他熟读《礼记》、《老子》、《易经》和《淮南子》等典籍，曾多次引用其中概念来说明“天”与“上帝”以及“三位一体”的普遍性原则。1872～1873年，一位叫特德库姆的牧师在《学报》(Journal of Transaction)上发表的《旧约全书前五卷之伦理证明》(Ethnic Testimonies To The Pentateuch)中，曾经引用拉姆奇的话：“中国古代的宇宙起源说教导我们，太极之初，纯乐清澈，无役无痛无忧，心为真善喜，不知欺诈为何物。忽一日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和世界，复归混沌。《礼记》曰，此等邪恶皆因世人不敬天主而生，真伪俱辩，则永失理性。”他曾经引用中国的《易经》和印度的《吠陀》中的故事，告诉爱德华王子英雄人物如何通过自己经受的苦难来赎罪。他认为中国文化比任何文化都凝聚更多的宗教真谛，他坚信《易经》、《老子》和《论语》都预示了弥赛亚(基督)的降临，看到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光。他甚至告诉他的弟子中国人以秘传形式掌握着新教的全部真谛，这些皆得自于诺亚的真传。他把《淮南子》和《老子》的一些观念作为古代神秘哲学来传播，对于 18 世纪法国和瑞典的共济会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三、哈切特和墨菲与《赵氏孤儿》

1731 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翻译成了法文，收录在杜赫德 1735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中，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该剧的原始素材源于《左传》鲁成公八年、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刘向的《节士》和《说苑》中所记载的史实，写的是春秋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为报私仇残酷杀害文臣赵盾全家 300 余人，为了搜捕赵家仅存的孤儿赵武，下令杀光晋国一月至半岁的所有婴儿的悲剧。后来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挺身而出，在设法救出了赵武的同时也救出了晋国无数的婴儿。屠岸贾麾下的将军韩厥勇于分辨忠孝与奸佞，放走程婴和孤儿。程婴决心把自己的孩子假扮成赵武，要求公孙杵臼出首告官，以他父子之死来保全赵家血脉。而年过七旬的义士公孙杵臼宁愿牺牲自己也要让比自己年轻的程婴来抚养赵家孤儿，故事十分感人。

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随着《中华帝国全志》被英国、德国和俄国出版社译成不同语言出版而广为流传。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把它改编为剧本，名为《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81 年德国诗人歌德根据德文译本把它改编为悲剧《埃尔朋诺》(Elpenor)。《中华帝国全志》法文版面世之后，英国有两家出版机构争相抢译。1736 年由理查德·布鲁克斯节译，约翰·瓦特书局出版，1738 年爱德华·凯夫又翻译了全文，但是两个版本都收录了马若瑟《赵氏孤儿》以说白为主的译本。1762 年诗人托马斯·珀西根据 1738 年的版本又另外编译了一本《赵氏孤儿》。

在中国热风靡欧洲的时代，英国除了园林设计和民用建筑所体现出的中国情调外，中国人的形象、服饰和布景也不断出现在英国化装舞会和戏剧舞台上。“在英国就如同在法国一样，当时的中国时髦如此来势凶猛，使人难以抵挡和难以摆脱其影响，就如同是若没有必不可缺的中国人就再没有戏剧或抒情的娱乐活动了。”①《赵氏孤儿》在英国引起了戏剧家、翻译家、评论家和学者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适合中国风格的作品存在。

---

① (法国)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 56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

1741 年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 1701 ~ 1749)在《赵氏孤儿》的基础上推出了名为《中国孤儿》(The Orphan of China)的改编本,使好评如潮的中国戏剧推向了又一个高潮。在剧情方面哈切特基本上保持了马若瑟译本的结构,对于唱段他似乎也无法根据元曲的原本进行加工,最大的败笔是剧中的人名被随意摘取的中国历史人名和地名所取代。例如屠岸贾名为"萧何",程婴名为"己方",公孙杵臼名为"老子",赵武名为"康熙",还增加了纪君祥杂剧中没有出现的程婴妻子丽萍。应该说,这种命名法跟普通英国人取名为"威廉"、"詹姆斯"、"查尔斯"或者"伊丽莎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专业读者和观众不能不对哈切特的中文修养和中国文化知识提出怀疑。

大约在 1759 年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 1727 ~ 1805)发表了另一个改编的《中国孤儿》。墨菲 1727 年生于爱尔兰罗斯康芒郡的克隆昆,是演员和剧作家,其父曾经商于都柏林。墨菲原名阿瑟·弗伦奇(Arthur French),曾就读于奥姆英语学院。1747 年他的叔叔推荐他去公司的账房任职,因为谢绝前往牙买加供职,父亲去世后被叔父剥夺了财产继承权,不得不去伦敦求职。投身舞台演出后一度改学律师专业,但是他的愿望因为演出经历而受挫。两年后在亨利·福克斯帮助下他开始编写剧本,在林肯剧场演出。《学徒》是他创作的第一个喜剧,1756 年初在德鲁里剧院上演获得成功。此后在那儿相继上演的剧本还有《家具商》(The Upholsterer)、《中国孤儿》、《如此挽留》(The Way to Keep Him)、《一无是处》(All in the Wrong)、《希腊女儿》(Grecian Daughter)、《人贵有自知之明》(Know Your Own Mind)等,都是从法语改编的剧本。他还办过一份名为《实验》的政治期刊以示对恩师亨利·福克斯的支持,此外他还有若干篇论文和译著。

与其他英国编剧不同的是墨菲有丰富的演出经验,编剧前认真对比了当时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几个《中国孤儿》的本子,分析了评论家的意见,对剧情做了必要的修改,在道具、布景和舞台调度方面又得到了各方的配合,因此演出成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些评论家认为,墨菲改编的《中国孤儿》在很多方面借鉴了伏尔泰的版本,但是却把赵武的名字改为"扎菲姆利",淡化了道德宣扬成分,表现出对于复仇的赞扬。1759 年 5 月的《评论杂志》(The Critical Review)刊登了哥尔斯密撰写的文章说:"在第一次上演该剧的晚上,所有的观众们都似乎感到满意,高度满意,而且也是理由充

分的满意……强烈的感情、光彩夺目的背景和巧妙的导演都成了那欢乐的根本原因。"①

关于《中国孤儿》在英国的改编并获得成功的原因，范存忠作过以下精辟的分析：

"必须指出，这本戏的政治意义远超过了它的戏剧意义。这是一本采取戏剧形式的政治讽刺作品。"②

"谋飞（墨菲）的《中国孤儿》里演的是中国抵抗鞑靼侵略的故事，也就是一个民族抵抗另一个民族的侵略的故事。这里，一方面是残暴的侵略者，另一方面是向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人物：英勇的孤儿以及扶持王室、不惜生命来争取自由的忠臣、义士、爱国者。因此，在七年战争的紧张的年代，这出戏曾被认为宣扬爱自由、爱祖国的作品，而作者谋飞曾被认为爱国主义者的导师。"③

四、珀西与《好逑传》

大约在1761年一本译自中文的小说《好逑传》在英国问世，编译者为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81）。前面说过，1762年这位珀西先生编译过新版本的《赵氏孤儿》，声称尽力保持了原著的特色，但是马若瑟漏译元曲原著中的内容珀西没有补出，原来他虽然精通冰岛语和希伯来语，但是并不懂得汉语。

珀西生于什罗普郡的布里奇诺斯一个杂货商家庭，早年在牛津接受过教育，学习冰岛语，是一位牧师、诗人兼古董收藏家。1782年由教区长晋升为德罗莫尔主教。他出版过几本有关文物的著作，但是主要致力于收集编辑古代歌谣。他曾经收集英格兰和苏格兰民谣176首，也收集十四行诗、政治抒情诗和叙事诗，1765年以《古英诗集》书名结集发表，共三卷，重新焕发了人们对英国古代文学的兴趣，迎来了浪漫主义的复苏。其中许多歌谣源于他偶然发现的珀西家族遗稿。他编译的另一本书《中国杂文汇

① （法国）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6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②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第124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③ 同②，第141～142页。

编》(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共两卷,内容包括汉语、戏剧、园林和教会。他出版的第三本书为《庄子休妻》(The Matrons,译自《中华帝国全志》)。此外他还有五篇译自冰岛文的北欧古诗、译自希伯来文的《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整理编辑的1512年诺森伯兰伯爵家族文存、《〈新约〉答疑》(Key to the New Testament)以及《沃克沃思隐士》(The Hermit of Warkworth)等。既然珀西是一位关注中国但是又不懂汉语的英国学者,那么他跟《好逑传》是什么关系?《好逑传》的音译"Hau Kiou Choaan"显然是根据广东话所作的标注,那么这部小说与广东之间又有什么联系?《诗经》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逑传》的"好逑"与"君子好逑"的"好逑"意思一样吗?

原来,1719年一位长期侨居广东名为詹姆斯·威尔金森的东印度公司英国商人从中国带回了一部译稿,其中内容他的家人并不知晓。珀西在威尔金森去世后从他的卷宗里偶然发现了四册手稿,一至三册用英文书写,第四册用葡萄牙文记录。珀西对译稿很感兴趣,于是对它进行了整理加工,还把葡文的内容译出,1761年以The Pleasing Story的书名出版。除正文外,还包括故事概要,汉语成语辑录,中国诗词片断和注释共四卷。因为汉语不是珀西熟悉的语言,于是引起了读者对该书真实性的种种怀疑。

《好逑传》确有其书,当年广东书肆的市井读物,又名《侠义风月传》,成书于康熙初年,著者自署"名教中人"。故事讲的是御史铁英之子铁中玉,一表人才,侠肝义胆,若他人有难,不论贤愚贵贱,都慨然相济。兵部侍郎水居一的千金水冰心有倾城倾国之貌,学识超群,不料水居一失职被遣戍边。城中大学士过隆栋之子过其祖托水冰心的叔叔水运说媒,水冰心故意在庚贴上写上水运爱女的生辰八字,最后他弄巧成拙只好把自己女儿许配过家公子。过公子变本加厉,假托圣旨到水家内室逼婚,万难之中为见义勇为的铁中玉所救。不幸铁郎遭害,水小姐将他迎至家中延医调养,日久情生,愿结连理。但是直到铁郎高中翰林光宗耀祖之日他们才成婚,可谓恪守祖训,名教生辉。故事中所说的"风月"二字,并非花前月下的情天恨海,而是与"侠义"和"功名"相联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俗韵。该书曾被列入"淫书"之列,屡遭禁毁。也许因为标榜风化,也许因为遭禁厄运,竟然使18世纪的西方读者受到感动。英译本面世后很快被法国、德国和荷兰出版社转译,有些欧洲人还把它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使用,威尔金森就是其中一人。西方读者从该小说对男女青年的描述中可以看到更浪

漫,但又更纯洁更合乎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看到维系数千年中国社会的文化精神,可以说大俗大雅兼备。水冰心媚恩而不辱体,铁中玉重侠而多情,两人曾夜间隔帘对饮无一字及于私情。虽然歌德曾说过中国人在行为感情方面几乎与欧洲有教养者无异,但是水冰心与铁中玉的爱情故事对于启蒙时期的西方读者来说毕竟不易理解。难怪伏尔泰曾感慨地说过欧洲商人一味在东方追求财富,唯有欧洲哲人才在那儿发现了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

也许这就是《好逑传》在英国市场热销的价值所在。这一汉学史前的插曲,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中英两国人民之间交往的片断,恰似涓涓溪流预示着日后澎湃的汉学大潮。

五、哥尔斯密与《中国人信札》

1721 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出版《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一书,这种新颖的文体形式及其直抒作者胸臆的效果,引起了英国学者们的关注,同年该书的英译本便在伦敦面世。1739 年法国阿尔更斯侯爵出版了《中国人信札》(Letters Chinoisess)一书,在英国也广为流传,1741 年便推出了英译本。借虚构的外国人书信评论本国社会和政治现象,在 18 世纪的欧洲逐渐成了一种文体形式和文坛时尚。1760 年至 1761 年英国作家奥利维尔·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28 ~ 1774)发表的《中国人信札》(Chinese Letters)也采用了相同的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阿尔更斯的《中国人信札》的一种仿制本。

一般认为,对于高尔斯密创作《中国人信札》产生更直接影响的还是霍勒斯·沃波尔 1757 年 5 月在伦敦发表的《叔和通信》(A Letter from Xo Ho) ①。沃波尔出生于伦敦,是 18 世纪 20 至 40 年代大名鼎鼎的辉格党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幼子,一位多产的杂文作家,出版过一些重要著作,其中包括《叔和跟北京友人李安济的通信》(Letter from Xo Ho to his Friend

① 按照英语姓名的顺序"Xo Ho"也可译为"贺叔"。但是在霍勒斯·沃波尔的书中它是假托的中国人名,故采用范存忠著《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的译名(第 185 页"引文注释"⑧)。

Lien Chi at Pekin,简称《叔和通信》)[①]。该书发表时英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政坛动荡的局面,作者通过假想人物之口,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对比,批判英国政坛的丑陋现象,表达了对英国社会的担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随后还出现了许多模仿文章。

1760 年至 1761 年哥尔斯密的《中国人信札》发表在约翰·纽伯里主编的《公簿报》(Public Leager)上,1762 年结集发表时书名为《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哥尔斯密出生在爱尔兰帕勒斯村一个穷教士家庭,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小时候得过天花。虽然他与同伴欢聚畅饮时也算快乐活跃,但是平时总是与人落落寡合,郁郁寡欢。大约还不到 16 岁时他进入了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后来他的姐姐与一个富家少爷订了婚,父亲许诺为她准备体面的陪嫁,几乎耗尽家中积蓄。为了获得三一学院的免费食宿,他不得不穿上杂役的衣裳在校内干活。经过几年的苦读他终于在 1749 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虽然他研修神学、法律和医学每门都花了一二年时间,但是他更喜欢的却是钓鱼和笛子演奏。他自称在国外拿过医学学位,人们都管他叫"大夫",可是从来没有人找他看病,于是从 1757 年起他开始文艺创作。写作给高尔斯密带来意外丰厚的报酬,尽管如此他仍然每每挣扎于负债的困境中。1774 年 4 月因肾衰高烧不退,他试图凭自己的医学知识把自己从垂危中挽救出来,不幸的是贫困使他回天无术,最终死于天命之年。

他的《中国人信札》共 123 封,主人公属于最严格意义上的阅历丰富的"世界公民",在一些出版公司的书目中被列入"小说类"。第一封信描写了中国哲人李安济,祖籍河南,通过跟广州的英国商人和英国侨民接触学习英语,慢慢发现自己"与他们的待人接物方式和风俗习惯完全格格不入"。第二封是李安济从伦敦寄给北京典礼院高官冯贺安的信,"正式调查财富、建筑、科学、艺术、制造",以便揭露英国可笑的风俗习惯及其性质。比如,英国依赖于海上贸易,李安济说:"据我所知中国有些省份根本就没有'海洋'的名称。所以我现在正置身于多么古怪的人们之中,他们把帝国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把城市建筑在比迪帕它拉山还高的浪尖上,

① 叔和友人"Lien Chi Altangi"采用范存忠的译名。当时在西欧和东南亚的多数华人祖籍为福建和广东,"Altangi"可能是"阿堂仔"的不规范译音,也可能是原作者随意编造的名字,待考。

把大海变得比狂飙还难驾驭。"[①]这显然是对英国现状的批评。该书赢得了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的好评,夸奖哥尔斯密"文笔清丽典雅"。

高尔斯密在说明李安济与英国人的不同之处的同时,把中国看作为一个文明之邦,具有调查英国习俗的权威。他在《世界公民》的"前言"中写道:"事实上中国人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文雅程度的不同而不是距离的差异使人类相互区别。决然相反的社会风气的肆虐除了使人变得奢侈贪婪外没有其他;而有教养的民族,无论相距多么遥远,都会以同样的方法得到文雅的享受。"[②]

六、罗伯特·博伊尔、托马斯·海德和威廉·琼斯

17 世纪中叶英国有几种杂志刊经常刊登有关中国历史、社会、科技和宗教方面的文章,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三种是《学术著作》、《绅士杂志》和《哲学汇刊》。

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 1627 ~ 1691)是 1662 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建人之一。他出生于爱尔兰沃特福德郡,八岁就上了伊顿公学,后来先后前往法国、瑞典和意大利学习,对伽利略的学说特别感兴趣。1644 年返英学习自然科学,但是因为父亲去世他必须回爱尔兰继承产业。从 1655 年至 1668 年他住在牛津药商约翰·克罗斯家从事研究工作,在机械师罗伯特·胡克的帮助下他发现了真空泵的原理并成功地制作了第一台泵,还验证了石蕊用于测试酸碱度的作用。他发表的论文主要是关于实验科学的条件、设备、原理以及物质与气压和水温的关系等内容。被当时英国科学界广泛引用的博伊尔法则使他声名远播。博伊尔关心中国的事情,读过来华传教士发表的许多文章,对于中医脉诊、中国的天象观测、占星术和温度测量非常感兴趣。1671 年他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一本明万历二十五年大统历,后来赠给了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他曾经担任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主任,工作一段时间后因为某种原因辞去了职务。早在

---

①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1760 ~ 1761) fro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② Ros Ballaster, *Fabulous Orients: Fictions of the East in England* (1662 ~ 1785), PP. 252 ~ 253.

1654 年博伊尔就加入了一个由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组成的小组。该小组成员自 1645 年起每周在牛津聚会一次，1662 年改名为“皇家学会”，一直延续至今，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学会之一。该学会的座右铭是“无需自白”。1680 年博伊尔被选推为皇家学会主席，但是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认为规定表述的誓言有悖于他所遵循的宗教原则。

博伊尔的一位好友是牛津大学东方学家兼阿拉伯语教授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 1636 ~ 1703)。海德出生于英国什罗普郡的比灵斯利，曾经跟身为教区长的父亲学习过几种东方语言。16 岁时他进入了剑桥国王学院，在阿拉伯语教授惠洛克的悉心教诲下进步很快，一年后便被邀请到伦敦参加多语言版的圣经编辑工作。1658 年他被女王学院聘为希伯来语高级讲师，1659 年被授予硕士学位，同年被聘任为波德雷安图书馆副主任，1665 年晋升为总馆长。在查尔斯二世、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掌政时期他辞去了皇室东语通事的职务，1701 年因不堪烦杂公务又辞去了馆长职务。他除了通晓汉语外，还精通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和马来语。

大约在 17 世纪 80 年代海德认识了一位来自中国南京的天主教徒沈福宗。他的教名是米歇尔·阿方萨斯，父母都接受过澳门耶稣会士的洗礼，他本人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学识渊博，23 岁时就被选派陪同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返回教廷述职。1684 年他们到达凡尔赛，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接见，后来又去了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和耶稣会总会长也同时接见了他们。因葡国国王与罗马教皇在对华传教的问题上意见相左，他们的行程一再被耽误，1687 年至 1698 年一直住在英国。海德博士便请沈福宗协助编辑波德雷安图书馆的中文书目。该馆建于 1602 年，文艺复兴之后英国学术界特别注意收藏他国图书，馆中所藏的中文图书多半是儒家典籍、明万历年间南京金陵书林和福建建阳书林刊刻的中医药书，还有一本 1596 年在南京刊刻 1607 年购得的中文古书，无人能认读。馆中 1686 至 1687 年的购书账目中还有一条记录：“请一位中国人编写中文书目支付他的食宿六镑”，他想不起当时的情况，因此便想借此机会向沈福宗求教。沈福宗帮助海德编写图书馆馆藏中文书目，几个星期时间他们经常用拉丁文交谈，话题包括中国的度量衡制度、中国的地理位置、汉语的语法要点、围棋和升官图等。

据说海德编写过一本名为《中国杂录》(Varia Chinesia)的书。此事在

欧洲汉学界广为传诵，认为海德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虽属尝试性的，但视之为英国汉学研究之滥觞并不为过。

另一位英国汉学前期的知名人物是比较语言学家、梵文学家和诗人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他出生于伦敦，三岁时父亲就去世，是母亲一手把他培养成人。他有非凡的语言学习天才，二十多岁时除了英语外他还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希伯来语。1722年他成为皇家学会研究员，第二年加入了约翰逊博士文学会。1783年9月他被派到印度加尔各答担任最高法院法官。1784年在查尔斯·威尔金斯的帮助下创建了孟加拉亚洲学会，创办了《亚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杂志，这是当时文坛中的重大事件，为"印度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认为东方隐藏着人类历史和文明的秘密，只有了解东方才能撰写人类的历史。他是研究印度古典音乐并撰写这方面论文的第一位西方学者，也是第一位制定印度动植物分类计划的学者，曾大力帮助过他人编写生物学、动物学、天文学和哲学著作。

因为他曾经读过耶稣会士柏应理和段铎泽用拉丁文合译的《大学》和《中庸》等书，对儒家学说和《诗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67年冬天他开始自学汉语，抄写了一些有关汉字偏旁部首的说明和常用词语，几年后他居然靠字典的帮助阅读起《诗经》的原文来，并且费时多日试图翻译其中几首。琼斯曾跟一名叫黄阿东的广东人学过汉语，练习汉字书写，他认为汉语并不像一般欧洲人所说的那么难学。他曾打算把《诗经》和《论语》全部英译出来，还要翻译中国民法和刑法。他曾在一篇讲话中引用了孔子有关"诗、书、礼、乐、射"的主张和他自己翻译的《淇奥》、《桃夭》和《节南山》。1792年他把珍藏多年的书籍捐赠给伦敦皇家学会图书馆，其中有《大学》、《论语》、《孟子》、《诗经》、《中国文法》和《汉语—拉丁语词典》等九种中国书籍。大约在他去世前一年，他打算取道中国返英，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琼斯是从真正意义上对汉学进行研究的第一位英国学者。虽然成就不如他在其他方面突出，但他是中英语言文化交流史上早期的开拓者之一。

第二章
传教时期的英国汉学

19 世纪初至该世纪 70 年代为英国汉学史中的传教时期研究阶段。

鸦片战争前英国有各类新教徒海外传教宗派，如：公理宗（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长老宗（The Presbyterian Church）、信义宗（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浸礼宗（The Baptist Church）、圣公宗（The Holy Catholic Church）和内地会（教士自由组织传道团体）。由公理宗信徒组成的海外传道会又进一步分为：1795 年成立的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6 年成立的苏格兰（传道）会（The Scottish and Glasgow Missionary Society）、1799 年成立的教会（传道）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和 1804 年成立的大英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南京条约之后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了中国各条约口岸，仅新教就有 130 多个在华传道会，长老会有英、美、加宗派之分，监理会则有美以美、循理、美道会之别。这一切客观上对于英国宗教界、商业界、外交界和军事部门研究中国语言、政治、文化、社会和历史，为本国培育这方面的人才，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在英国国内，1823 年成立了由国王乔治四世赞助的不列颠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宗旨为研究科学、文学和艺术与亚洲的关系。1834 年创办的该会定期刊物连载了北宋王黼（1079 ~ 1126）的《宣和博古图》的英译本，1836 年刊登了清代马辅的《绎史》，标志着该学会与汉学研究的密切关系。

早期的英国汉学代表人物多半为传教士、外交官或者从教（会）从商从政后转入书斋和课堂的复合式文人学士。有些人最先学习的是汉语方言和官话，受过神学院教育，具有较好人文学科素养，在礼拜之余学习汉籍，利用自己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翻译或写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一些人的研究范围逐渐从传教经验、神学理论应用扩展到中国文

化、社会和历史的各个方面。他们所撰写的有关中国文化的著述既有表现基督教普遍关怀心态的,有单纯追求对于中国文化典籍的解读、鉴赏、翻译和引介的,也有对重要汉籍的意义进行阐述的,其中一些人还长期致力于汉语语音、语法、词典和其他参考书的编写。由于历史原因许多神职人员不得不担任一些世俗职务,这一现实使英国新教徒身上少了许多神秘色彩,多了一些人间烟火味。一些因病或退休回国的传教士被英国大学请上了汉学教席。尽管他们头上的光环掩饰了非专业和非正规给最初的汉学讲座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早期汉学研究所缺乏的严密科学作风和系统的理论知识,然而他们在英国汉学研究中的贡献颇具历史意义,就在他们当中出现了几位汉学开拓人物。1840 年伦敦大学创办为期五年的汉学讲座,基德牧师(The Reverend Samuel Kidd, 1799 ~ 1843)被聘任为首任汉学教授,标志着英国汉学新阶段的到来。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礼逊、德庇时、伟烈亚力、艾约瑟和湛约翰等人。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英国汉学人物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服务于英国宗教、外交和政治,宣扬西方社会道德模式。正如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弗兰克(Gauting Herbert Franke)所说:"大英帝国在 19 世纪吾人见到(他们的汉学研究)有三种密不可分的动机:贸易、外交及新教的传教活动。"

一、早期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代表人物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 ~ 1834)是早期来华的英国新教徒中最具影响的人物。他出生于英国诺森伯兰郡莫佩斯一个农民家庭,家境清贫。后来全家搬到了纽斯卡尔,父亲从事鞋坯制作。

马礼逊从小勤奋好学,十二岁时就能背诵诗歌 190 多篇,曾听过从非洲和亚洲返英的传教士介绍在国外传教的情况,立志到外国去传教。1803 年他考取了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学习过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神学、医学和天文学,来华前曾经跟一个名叫容三德(又译"杨善达")的广东人学习过汉语。他还从不列颠博物馆借阅过巴黎外方传教会巴设(Jean Basset)翻译的《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使徒书》和耶稣会士贺清泰选译的《新约全书》,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练习抄写经文,同时让容三德也帮他一起抄写《希伯来书》。

1807 年 1 月马礼逊从神学院毕业后向东印度公司订购来中国的船

票，因当时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不允许传教士乘船前往中国内地，未能成行。马礼逊便乘船前往纽约，受到当地基督教人士的热情接待，美国国务卿麦迪逊还接见了他。同年5月12日他在纽约乘货船三叉戟号启程经太平洋抵广州，在米尔纳和布尔的纽约商馆暂住。

马礼逊来华前，伦敦会曾请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巴克斯给在澳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多马·斯当东写了一封信，请他关照马礼逊。斯当东便求助于商馆馆督罗伯茨(Mr. Robarts)。馆督得悉马礼逊通晓汉语，就建议他把翻译圣经作为济世救民的善举来完成。

1808年由于中英贸易方面出现了摩擦，马礼逊和其他英国人被迫离开广州去澳门。他不想引起葡萄牙神职人员的注意，情愿小心谨慎地蛰居岛上。他每日学习汉语，找了罗祥等数名中国人为他们讲读经书。1809年2月他与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莫顿的女儿玛丽·莫顿小姐(Miss Mary Morton)组成家庭。他除了在教会学校学生和商馆雇员中发展教徒外其他方面的业绩平平，后来被东印度公司聘为翻译，年薪500镑，两年多后年薪增至1000镑。他在该公司一直工作至1834年，其间他还担任过英国特使阿美士德的通译。1833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成立，马礼逊被贸易监督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聘为汉文正使兼通译，年薪高达1300镑。

他牢记伦敦会总监来华前对他的指示："你此行广州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汉语，然后用你所学专长做些使世界广泛受益的事，如果有好运气也许你可以编写一本汉语辞典，比过去同类辞典容量更大、释义更为准确的辞典，运气更好的话或者把圣经译成人类第三大种族的语言。我们认为在你居留广州期间不会让你再承担其他任务了。"① 1808年他开始翻译《新约全书》，1810年他刊刻了《使徒行传》，1811年他又发表了《路加福音》的译稿。两年后他译完了《新约全书》的一半，其余部分则根据不列颠博物馆1739年收藏的中文译稿进行修订，第二年耗资近3818西班牙银元雇工刻印2000册。1814年他开始与米怜合译《旧约全书》，1818年11月他完成了《创世纪》等26章的翻译，米怜完成了13章经文的翻译，1923年他在马六甲以《神天圣书》的书名把《新约》和《旧约》合集出版，共装订成21卷线装书。

在那些年他还发表了一本有关赎罪的小册子，翻译了英格兰教会礼拜

① Eli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PP. 95 ~ 97.

仪式的教义问答手册、旧约史要略、赞美诗和《环球旅行》各一本，总共印刷并散发3万多份。虽然翻译圣经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他仍然不忘传教布道和讲经，星期日他把佣人和朋友召集到自己的寓所做礼拜。1814年7月16日他在澳门海滨一座小山的泉水旁为一个叫蔡高（又名蔡阿国，Tsai A-ko）的工人洗礼，这是他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教徒。蔡高是东印度公司印刷厂的雕版工人，他还有一个哥哥叫蔡兴，一个弟弟叫蔡三，先后也都受影响入了基督教。该厂还有一个雕版工人名叫梁发，在南洋受雇刻印圣经时接受过英国传教士米怜的洗礼，到马礼逊的印刷厂后与蔡氏兄弟一起帮助英国牧师宣传教义，秘密在广州向参加乡试的举子散发传单。1823年马礼逊回国前为梁发举行了按手圣礼，发展他为第一个中国籍牧师，责成他在自己离华期间负责广州和澳门传教工作。

马礼逊在翻译《新约全书》的同时也着手编译一本巨型《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使用的中文参考书达万卷之多。18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埃尔芬斯通（Mr. Elphinstone）和斯当东爵士等头面人物表示对那本字典感兴趣，于是公司理事会慷慨地给马礼逊运去一批印刷设备并派遣汤姆斯做他的专职印刷工人。1817年《华英字典》第一册问世。至1823年他的字典共出版了六卷，计4595页，收入汉字4万余个，耗资12000英镑，以百科全书形式收录了清代大量的文献和文化资料，规模相当可观。该字典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汉字字典，共三卷，以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为蓝本，汉英对照，按汉字笔划分240个部首编排，书后附字母索引。第二部分为《五车韵府》，共两卷，参照《康熙字典》的格式，按音序编排，并附汉字字体简介和索引，1820年修订时增加汉字书写体，按拼音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列出。第三部分为《英华字典》，1822年出版，以英汉对照方式解释单词、成语和句子，例句都附汉译。该项编写工程巨大，因为字典内容庞杂，多处重复，1854年第二部分重印时略去了附加语料部分。

1812年他还编写了一本以英语语法系统为构架的《汉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全书280页，1815年在印度的塞兰布尔（Serampore）印行。从目录看内容相当完整，虽然牵强附会处在所难免，但是在当时算是一项很有开创性的研究，对西方人学习汉语很有帮助。目前在北京只有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该书。1828年马氏还编译过一本《广东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共3册，637页。第一册按

英汉对照编排,第二册按汉英对照编排,第三册为广东话的词语。1815 年他还编写过一本名为《华文初阶》的汉语教科书,又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 创刊,1821 年终刊,共 7 卷),刊登圣经故事,介绍世界各国风俗人情。最初印行 500 册,销售量最大时印行 2000 册,在南洋、广州和澳门广为散发。1818 年他编译了第一本圣诗集《养心神诗》,共 27 页。此外,他还出版过一本《从语文学角度看中国》(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内容包括对有关中国朝代、节日、地理和宗教等情况的介绍,共 141 页。他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对于圣经翻译、汉英词典和语法著作的编写作出了杰出贡献,此外他还向中国人传授英语知识,介绍欧洲政府的体制、欧洲的科技、教育、文学、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情况。

马礼逊是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办事处的汉文翻译,曾多次参与重要谈判,会见中国大臣。他主张东印度公司大班兼任英国司法长官,受权与中国民政官员进行商业以外的民事交涉。1816 年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英国外交大臣罗加事里训令他向清廷提出保护英国商人的要求,在广州以北开辟通商口岸,在北京设立英国驻华使节机构,减少清政府对广州英商的限制。马礼逊当时任使团汉文正使,曾以"夷商"身份赶赴天津帮助安排英国使团进京事宜,了解商业和政治情况。后来因为叩首问题未能得到嘉庆皇帝接见,但他鞍前马后十分尽力。

他一生阅历丰富,既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传教士,又从商从政,迈出的世俗化步子之大几乎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西方传教士,成了当时宗教界和翻译界中一位知名人物。他在华 27 年中编写出版的宗教和汉语方面的著述、译作、字典等共 31 种,其中 19 种是用英语撰写的,每一部书都是他的学识和虔诚的见证。1817 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1821 年马礼逊的妻子去世。8 个月后他去马六甲和新加坡,巡视米怜等人于 1818 年创办的英华书院。该书院是根据他 1817 年向伦敦会提出的"恒河外方传教计划"(The Ultra-Ganges Mission Plan)创办的,目的是为帮助欧洲人学习汉语帮助华人接受基督教和西方科学教育,1843 年后迁往香港。1824 年他带了万余册中国古籍回国,向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进献他翻译的汉语圣经《神天圣书》和一幅北京地图,受到了国王的接见,也受到学术界和宗教界人士的欢迎。他被伦敦会选为委员,请他报告在华传教的情况,还被英国皇家学会聘为院士。在伦敦短暂逗留期间,与伊丽莎

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结了婚,并且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的书,共125页,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马礼逊在汉语研究、辞书编写和圣经翻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有独特的建树,是一位有影响的翻译家。他在谈到圣经翻译时曾经说过:"在我的译本中,我力求忠实、明达和简易。我宁愿采用常用字而舍弃罕见的经典字。我努力避免使用异教哲理和异教经籍中的术语,我宁愿被人视为俚俗不雅而不愿有令人难以理解、难懂的段落,我用能达到的最优雅、最忠实、最不古怪的词给出教义的通俗表达。"①

马礼逊是一位虔诚的新教传教士,但也是一位不反对家室之情的世俗社会成员,他曾为"中华归主"的目标毕生呕心沥血、疲于奔命,也曾为英王臣民的霸业私利抛头露面远走他乡。弥撒圣坛前庄严肃穆的马礼逊,外交谈判桌边满腹经纶的汉文通事马礼逊,和在摆满汉籍书房中伏案终日的马礼逊,只不过是在不同场合操不同语言的马礼逊罢了。许多人认为,他为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华夏大地宣扬罗马天主教一样都创下了世人皆知的业绩。他们都是西儒汉学家,在汉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也是同样突出的。他曾规劝阿美士德按照清廷大礼晋见乾隆皇帝,他也多次建议英国政府在华自设法庭,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汉语教席——他所处的时代和身份赋予了他多重人格。从不同角度上对马礼逊在英国汉学方面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评价,也许是一种不失得当的方法。

1834年7月5日,英国驻华首任商务监督律劳卑宣读国王命令,任命马礼逊为秘书兼通事,享受副领事穿戴,年俸1100镑。但是他因积劳成疾,8月1日猝死于澳门,终年52岁。现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收藏着他遗赠的大批中国书籍。其中有中国明代《华夷译语》十三卷抄本和近百部明版典籍,甚至还有中医和科学古籍,弥足珍贵。

侨舒亚·马什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是早期英国新教海外传教士中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生于英格兰威尔特郡,1794年前从事纺织业,后来为了学习搬至布里斯托尔负责一所学校的管理工作。

1799年马什曼奉英国浸礼教会派遣到原为丹麦教会控制的印度塞兰

① 海恩波著、简又文译:《传教伟人马礼逊》,第122页。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

布尔传教。在英国势力向海外扩张的当时印度曾被东印度公司视为对抗在中国的英国新教传教运动的一个基地，1800 年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61～1834）和威廉·沃德（William Ward，1769～1823）也加入了塞兰布尔的传教活动，组成了著名的“塞兰布尔三信徒”小组（The Serampore Trio）。马什曼平日布道礼拜之余刻苦学习孟加拉文和梵文，1805 年跟一位澳门出生的亚美尼亚人学习中文。几年后他开始把圣经译成当地的几种语言，在他儿子的协助下创办报纸。为了解决传教的经费问题，他和妻子在印度开办了三所学校，两所以西侨子弟为招生对象，一所从印度儿童中招生，收入所得用于日常传教开支。马什曼根据拉丁文版的圣经并参照巴设的中文译本翻译了《创始纪》（The Genesis）、《福音书》（The Gospels）和《保罗使徒书》（The Epistles of Paul），后来相继用了大约 16 年时间把圣经全部译成了中文，1811 年在印度出版了《新约》的中文译本和英汉对照的《论语》，1814 年出版了附有汉字和白话文简介的《汉语语法要略》（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22 年又出版了《新旧遗诏全书》中文译本。

关于马什曼是否抄袭马礼逊的《汉语语法》的问题曾经在英国传教士中间引发了广泛的议论。但是从成书时间上看，马什曼的《汉语语法要略》出版于 1814 年，而马礼逊的《汉语语法》却出版于 1815 年，指责并无确凿的事实根据。马什曼还先后和其他传教士把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向西方读者介绍。他是在中国境外从事圣经汉译、研究汉语并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籍方面成就卓著的英国传教士。1810 年马什曼获得美国布朗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837 年 12 月病逝于塞兰布尔。

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笔名“博爱者”），出生于苏格兰，1813 年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到达澳门，协助马礼逊翻译圣经。由于葡萄牙天主教势力的压迫无法长期居留澳门，他只好以马礼逊同事的身份只身到广州，帮助马礼逊散发福音书，学习中文。因为广督府不允许西方传教士传教，1814 年他带着 17000 册圣经和教义小册子前往东印度群岛，途中经邦卡到爪哇，受到斯坦福·莱福士爵士（Sir Stanford Raffles）接待。他走遍全岛把所带圣经都散发给当地群众。在荷兰殖民者占领马六甲期间曾一度回到广州，在那儿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因为当时华南反对外国传教士不轨行为的浪潮不断高涨，东印度公司又不再支持他的传教活动，

1815 年他再度回到马六甲，根据马礼逊的指示建立一家印刷所，刊发汉语圣经和教义宣传品，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帮助马礼逊刻版印书，将一部分在南洋华人中散发，一部分运到广州。这种中文教会刊物在教徒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视为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1818 年他在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的帮助下在马六甲创办了一所西式英华书院，奠基仪式由英军司令福尔克哈上校主持，培训的对象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和学习汉语的欧美学生，以及部分愿意到中国传教的华人学生，课程包括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以中英文授课，米怜任校长。第三任校长柯大卫（David Collie，？～1828），第四任校长基德，第七任校长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后来都成为汉学界的知名人物。从 1820 年到 1834 年该校共培养学生 40 余名，其中包括马儒翰、亨德（William C. Hunter，1812～1891）和墨尔（Mor）。1814 年米怜协助马礼逊翻译《旧约全书》，1819 年在马氏的指导下翻译尚未完成的 13 章。1819 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张远两友论》的小册子，在西方传教士中广为传阅。米怜去世那年还在马六甲出版了他编译的《全地万国纪略》（Sketch of the World）单行本（原文曾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分期连载）。米怜是马礼逊关系最密切的合作者，1822 年 37 岁时因肺病死于马六甲。

1852 年毕尔（Samuel Beal，1825～1889）以海军牧师身份来华，曾任汉文通事。1837 年伦敦大学学院首次设立汉学教席，毕尔于 1877 年至 1889 年被聘任为该院汉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范围为中国佛教，著作有：《法显宋云游记》（The Travel of Fah-Hsien and Sung-Yun，1869 年）、《汉文佛典纪要》（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1871 年）、《中国佛教》（Budddhism in China，1884 年）等。英国的佛典是 160 年前由新教传教士带回国的，但是对于佛教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却始于 19 世纪末。毕尔牧师是英国早期研究佛教的少数先行者之一。到目前为止英国学术界对于佛教的研究范围涉及南传佛教、印度佛教和藏传佛教，同时也兼顾对大乘空宗的研究，有 400 多个佛教组织和佛教中心。现在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佛学教学和研究在英国高校中首屈一指，汉文、藏文和巴利文的佛典翻译和藏书兼备。该院学者谈到佛学研究的成果时，每每念及毕尔牧师所作出的奠基贡献。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 ~ 1890)生于苏格兰的福尔柯克(Falkirk),受教育于格拉斯哥。1855 年奉伦敦会派遣来华,在上海传教,两年后因病回国。1863 年他以苏格兰圣经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代理人身份再次来华,兼负苏格兰联合长老会(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of Scotland)的传教使命。在烟台期间他常到中朝边界向当地居民出售圣经。1877 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又名"学校教科书编撰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负责编写教科书,供各地教会学校使用,韦廉臣被选为该会秘书。1884 年,他为筹款购买印刷机在上海印刷书籍,成立了苏格兰同文书会(The Chinese Book and Track Society in Glasgow)。后来该会因故解散,资产和印刷设备由他管理。1887 年欧美新教传教士、驻沪领事馆和商务机构把他创办的苏格兰圣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改组为上海同文书会,不久又更名为广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成为当时上海实力雄厚的出版机构。他联合赫德(Sir Robert Hart, 1835 ~ 1911)、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 ~ 1907)和慕维廉等人合办《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翻译和编写政治、史地和科技书籍。他的主要著述有《华北、满洲、东蒙和朝鲜旅行记》(Journeys in North China, Manchuria and Eastern Mongolia with Some Account of Corea, 1870 年)。他还与李善兰合译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Elements of Botany by John Lindley)前七章,回国后由艾约瑟与李善兰续译,1859 年由墨海书馆出版,附插图约 200 幅,书名改为《植物学》,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专著。1890 年韦廉臣在上海逝世。

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 1810 ~ 1888)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1838 年由英国伦敦会派往新加坡,1844 年与他哥哥施敦力(亚历山大)(Alexander Stronach, 1801 ~ 1878)到厦门传教。1847 年至 1853 年在上海传教期间曾自设小教堂,用闽南话向上海的福建籍居民传教。施敦力多次积极参加圣经中文版的翻译工作,表现出他的深厚中文和中国文化学养。

1843 年 8 月部分来华欧美传教士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如何适应时局需要把圣经由文理译本修改成白话版的问题。施敦力(约翰)与麦都思、美魏茶和合信都参加了那次会议,上海的墨海书馆成为后来的译经中

心。在重译的过程中传教士就“God”的中文译名究竟是“神”还是“上帝”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主张称“上帝”的一派于1852年至1854年先后出版了《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由大英圣书公会发行,史称“委办译本”。主张称“神”的一派也于1863年出版了圣经全译本,史称“裨治文译本”。1890年来华新教传教士再次在上海举行会议,决定出版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圣经译本。这期间麦都思和施敦力曾根据“委办译本”修订出《新约全书》,后来艾约瑟和丁韪良等传教士又以麦都思和施敦力的官话译本为蓝本推出《北京官话新约全书》。

1852年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奉派前往香港,接替理雅各主持伦敦会香港分会教务,在理雅各离任前曾协助他翻译过儒家经典。1872年他在《中国评论》第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道家学说》的文章,后来又把《老子》译成英文,以《对老子思辨哲学、国家说、道德论的考察》为书名在伦敦出版,是英国新教传教士介绍道家学说较早的一本专著。他还和艾约瑟等人费时十六年推出了文理和合译本《新约》,于1906年出版。

他编著的书籍和词典还有:《中国人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1865年)、《康熙字典撮要》(The Concise Kanghsi Dictionary, 1877年)、《粤语袖珍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1872年)等。

湛约翰除了参与儒家典籍、圣经和道家著作的翻译外,对于中国文化史也曾进行过广泛和深入研究。他曾经关注二十八宿起源国的文化悬案并积极参与了讨论。二十八宿是中国、印度、巴比伦和阿拉伯古人观测天象时对东南西北七宿的命名和总称。虽然其意义不尽相同,但是都属于为观测星象而设立的参照点。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中东西方学者就二十八宿理论是源于中国、印度还是巴比伦的问题展开了长期争论。湛约翰对中国岁星周的制度、岁阳和岁名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虽然这一观点尚未成为广泛认可的结论,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浓郁兴趣和深厚学养。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30~1877)在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奉英国长老会(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派遣于1855年与宾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1815~1868)到厦门传教。1863年又到泉州,几

年后在新花山建立了泉州第一座教堂泉南堂。该教堂至今已有139年历史,在海内外久负盛名。传教过程中他刻苦学习闽南话,经常把学到的词汇记录下来,反复琢磨研究。1873年他根据自己平日积累的语料编撰成《厦门话-英语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由英国特鲁伯公司(Truber and Co.)出版。这是西方传教士编撰的第一部厦门方言辞典,不仅为当时的传教工作提供了方便,对于闽南语音史的研究也提供了宝贵资料,他因此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了博士学位。40年后英国长老会传教士甘为霖(William Campbell,1841~1921)也编辑出版了一本《厦门音新字典》(A Dictionary of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 1913年)。50年后另一位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的来华传教士巴克礼(Thomas Barclay,1849~1935)对杜嘉德的字典进行了增补修订,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使之成为在台外国人和研究闽南语的研究人员必备工具书。杜嘉德的《厦门话-英语大辞典》独具特色,对于各个时期开展的识字运动、方言研究和文字改革都起了一定作用。1860年杜嘉德前往台湾了解民情后,建议英国长老会派教士去台传教,不久长老会传教医生马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7~1951)便被派往台南。虽然马医生生于台湾,熟悉当地情况,他父亲也是当地的传教士,但是他所碰到的困难仍然使他感到力不从心。杜嘉德便留下一段时间帮助他开展工作。1877年5月,来华的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福音会议,杜嘉德被推选为英方代表主席,美国传教士孙罗伯(Robert Nelson,1818-1886)为美方代表主席,两人轮流主持大会。杜嘉德在大会中宣读的论文题目是《当前在华传播福音方式不当,教会间宜更努力全面合作以使福音遍播此间》(The Inadequacy of the Present Means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China, and the necessity for greater effort and more systematic cooper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ifferent societies, so as to occupy the Whole field)。他在发言中强调中国是一个具有四亿人口和古老文化传统的大国,应该把全国划分为三个传教区,以十字军东征的精神传教,传教士的素质必须是第一流的,否则无法胜任在这个教化最深、能力最强的民族中开展教务工作。杜嘉德在闽南居住22年,除了布道讲经外还十分重视学习中国文化和方言,他在研究中表现出的深厚学养和执着精神,对于早期英国汉学的贡献是突出的。1877年7月他因患霍乱去世。

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3 ~ 1922)是英国内地会传教士,1875 年在陕西兴安传教,几年后又去烟台开堂礼拜。他对于汉语有较深入研究,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汉学家。他的主要译著有《汉英分析字典》(An Analytical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1900 年)、《好逑传》(1904 年)、《戴德生生平》(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白话基础课本》(Lessons in Elementary Wen-li,1912 年)、《英华合璧》(A Mandarin Primer,第 14 版由上海 Morgan & Scott 出版,1926 年)等。

二、传教士家庭出身的汉学人才

英国传教时期的汉学研究阶段许多传教士的子女出生在中国,或者从小跟父母生活在中国,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方言或者普通话,熟悉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有一部分人的传教士父母没有来过中国,但是他们受父母的影响,把传教和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部分。后来在他们当中出现了许多外交家、知名的汉学学者和翻译家。

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 ~ 1843)是马礼逊长子,生于澳门,7 岁时被送回英国上学,1826 年就读于马六甲英华书院。1829 年到广州被英商聘为汉文翻译,1834 年继其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兼翻译,曾和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帮助被通缉的梁发乘船逃往新加坡。1840 年 7 月随英国水师提督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到大沽口与直隶总督琦善会谈,参加过 1841 年 1 月的中英《穿鼻草约》谈判,1842 年 8 月又随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璞鼎查与耆英和伊里布就签订南京条约问题进行谈判。战后他被任命为香港议政局和定例局委员兼港督府秘书。除了参加政治外交活动外,他还与一些传教士合作修改圣经中文译本。1804 年他曾与麦都思、裨治文、郭实腊合作修订中文版圣经的译文,推出了“郭实腊译本”。1835 年,他又与麦都思、郭实腊和裨治文组成四人小组,以马礼逊译本为蓝本修订圣经。1835 年完成了《新约全书》的修订,1837 年以《新遗诏书》为书名在巴达维亚印行。马儒翰的编著还有《英华行名录》(Companion to the Anglo-Chinese Calendar, 1832)和《对华商务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 1834)等。1843 年 8 月 29 日他患急性疟疾在澳门去世。

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 ~ 1863),米怜之子,生于从广州到马六甲的客轮上。回国后就读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1839 年被伦敦会立为牧师,后派到澳门、香港、定海和宁波等地传教。1846 年 11 月他到了上海,在墨海书馆与麦都思、艾约瑟、施敦力(约翰)等人共事,合译旧约。译经工作枯燥,每日上午 10 点至下午 2 点,教士们先读一段圣经和祈祷文,然后逐字逐句地翻译,再对译文进行反复推敲,提出修改意见。他们身边除了备用的字典和其他工具书外,有的传教士还带着自己的汉文导师或助手参译。1854 年美魏茶返英后退出了伦敦会。1858 年他被聘任为英国驻福州领事馆通事,1861 年任英国驻北京使馆汉文副使,负责英国翻译实习生教习,1863 年卒于北京。主要著作有《在华生活》(Life in China, 1857 年)等。他根据自己在澳门、香港、广州、舟山、宁波、上海、福州和北京传教和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在该书中详细可信地记述了西方人的在华生活,以及他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评价,意欲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和不真实印象,使传教工作能更顺利地在中国展开。

杨格非(John Griffith, 1831 ~ 1912)出身于威尔士斯旺西一个清贫新教徒家庭,1850 年在大学学习神学,1855 年以伦敦会传教士身份与韦廉臣一起来华。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许多条约口岸,他可以不受限制到各地传教,先后在上海、汉口、陕西、湖南、四川传经布道,开堂礼拜,雅号为"街头传教士"。与早期天主教传教士不同的是,他主张自下而上宣传教义,尽量多办传教点和教会学校,而不是首先接近上层。他创办福音堂 100 多所,1899 年在汉口开设的博学书院(London Mission College)便是其中之一。为了深入民间他努力学习汉语,晚年时笔译和口语表达达到俱佳水平。他到过太平天国控制区,数次前往南京。1888 年因为在华业绩而被推选为英国公理会全国总会主席。1912 年老迈离华,病故于英国。他在中国传教时间长达 50 年之久,主要译著有:《中国的希望》(Hope for China, 1872 年)、《有关鸦片贸易的直接了当问答》(Plain Questions and Straight forward Answers about the Opium Trade, 1882 年)、《新约》(浅文理译本,1885 年)、《新约》(苏格兰圣经公会官话版,1889 年)、与包约翰和白汉理合译《新约全书》(官话译本)、《旧约》(译至《雅歌》,浅文理译本,1905 年)、《中国的呼声》(A Voice from China, 1907 年)以及其他教义宣传品。

三、外交人员出身的汉学研究代表

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 ~ 1801)是早年英国外交家,是英国传教时期汉学史中少数跟来华传教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物之一。1792 年曾作为马戛尔尼伯爵率领的英国使团副使来华。为了准备这次建立更密切经贸关系的中国之行,他不辞劳苦带着儿子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为使团物色汉语通事,终于在那里找到了两位学习神学课程的中国留学生来为使团服务。后来斯当东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英国使团觐见中国皇帝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1797 年)一书出版。那次英国使团的随行人员有关访华见闻的日志和报告数量不少,先后出版的书大约有五种之多,但是斯当东的行程纪实影响面最广,为英国和欧洲读者提供了传教士渠道之外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不断被翻译、重印和引用,深刻影响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印象,加速了中国热在出版、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增强了中国在西方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他去世 22 年后名为《已故斯当东爵士生平及家史回忆录》(Memoir of the Life and Family of the Late 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Bart. 1823 年)一书问世。斯当东一生对于中国事物有独到的了解和兴趣。

多马·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 ~ 1858)是斯当东爵士之子,在汉学史上常被称为"小斯当东"或"多马·斯当东",是一位有名的旅行家和东方学家,出生于英格兰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附近的一个小镇。1792 年他的父亲作为副使陪同英国专使马戛尔尼来华,途中他跟老师赫脱南先生(Mr. Huntner)和通事柏仓白先生(Mr. Plumb)学习汉语,日有长进,后来在热河居然能用汉语与乾隆皇帝进行简单对话,是英国使团中唯一会说汉语的英国人,博得龙颜大喜。在安德逊的《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1793 年 9 月 14 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纪事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据说,皇帝是用最庄重的仪式接受大使的国书的。可是其中我们所能知道的一件确凿无疑的事是皇帝高兴见到斯当东爵士的令郎斯当东公子。他表示对这青年人的富有生气和优秀的风采深有所感。他对这青年人能说六国语言表示赞美。这位皇帝为了表达他当时的嘉许,不但亲手赠送给

他一把很美丽的扇子和几个小的绣花荷包，而且命令翻译员表示他对他的才能和仪容甚为赏识。”①

返英后多马·斯当东继续学习汉语，同时在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方面进一步深造。1798 年他被聘任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记官，几年后任总管，常年活动于两广一带。1805 年他把乔治·皮尔逊（Dr. George Pearson）的一本著作译成了汉语，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接种疫苗的方法。

1816 年英国国王第二次派遣以阿美士德为团长、多马·斯当东为副使的英国访华团，目的是再次提出扩大贸易的要求。因为使团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遗憾地离境。一年后多马·斯当东返回英国南汉普郡，先后代表几个选区任下院议员，经常发表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对英国政府对华决策产生过一定影响。1823 年他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创建皇家亚洲学会。

他的主要著作有《中英商业往来札记》（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 1822 年）、《1816 年英国使团访京纪实》（Notes of Proceedings and Occurrences during the British Embassy to Peking in 1816, 1824 年）、《论英中关系及其改善之进言》（Remarks on the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Proposed Plan for Improving them, 1836 年）、《英中商务考察》（Observations on Our Chinese Commerce, 1850 年）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大清律例》（The Penal Code of China, 1810 年）和图理琛的《异域录》（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Khan of the Tourgouth Tartars in the Years 1712, 1713, 1714 and 1715, 1821 年）。他对于中国科举和司法制度以及中英之间的外交和贸易问题均有深入研究，在《中英商业往来札记》中曾提出注重知识和道德使中国超越于其他国家之上的见解，他翻译的《大清律例》出版两年后就被译成法文，他的著作曾被广泛引用。他还为哈克卢特学会（The Hakluyt Society）编撰过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晚年出版了《多马·斯当东爵士公共生活大事回忆》（Memoirs of 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Public Life of the 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Bart., 1856 年）一书。

---

① 爱尼斯·安德逊著，费振东译：《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第 121 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 年。

多马·斯当东平生喜爱中国事物。他的古亭莱园(The Beacon Leigh Park)距英格兰哈文特以北1.5英里处。园内有一处斯当东的书房遗址,当年曾珍藏大批中国书籍,1853年他捐赠出其中的74套,其余部分后来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图书馆收藏。景色秀丽的园内有一处灯塔状古亭,小圆顶,大约20英尺高,8根陶立克式圆柱,是摄政王时期颇为流行的中国式园林小品。斯当东碑亭是一座六角形神龛式建筑,里面有斯氏家族祖先石刻牌位,虽然如今已是满目苍凉,但是英国汉学界的新人仍常常前往凭吊。

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又译戴维斯、德俾士、迪孛士、爹必时),1813年任职于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委会,1816年8月以汉文正使身份随英国特使阿美士德来京,1832年担任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特派委员会主席。1834年任东印度公司总监和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翌年任英驻华公使、商务正监督,后调香港第二任总督兼驻军总司令等职。1848年因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政见辞去了港督职务返回英国,蛰居英格兰南部的布里斯托尔。他的兴趣广泛,知识渊博,曾潜心研究中国文学,1876年获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是一位外交官出身的英国著名汉学家,也是19世纪向英国读者引介中国文学成果卓著的硕儒大家。

德庇时翻译过元代剧作家马致远的《汉宫秋》等中国戏剧和小说,此外还有《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1829年)、《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1836年)、《中国概况:从北京到南京和广州的中国内地之行随想以及对目前战局的观察》(Sketches of China, Partly during an Inland Journey of Peking, Nanking and Canton with Notices and Observations relative to the Present War, 1841年)、《中国杂录》(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1865年)等专著。《汉文诗解》是英国早期汉学家所写的第一部论述中国古诗的专著,原载《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议录》第二卷。全书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谈中国古诗的写法,语音、语调、节奏、韵律和对仗的规则;第二部分中西诗歌比较。该书出版后受到欢迎,曾多次再版。

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外交官出身,他的妻子是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殉职的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

~1805)的侄女。他曾经当过家庭教师,学习过医学,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1825年他以自然科学家身份随一支环太平洋地区探险队第一次来华,1836年以英国圣书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代理人的身份再次来华。先后担任过英国首任驻华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1789~1856)的翻译、英国驻广州、福州和厦门领事等职。他的长子李泰国(Horation Nelson Lay, 1832~1898)曾在广州学习汉语,1851年至1852年在港英政府中担任粤语翻译,此后任英国驻沪副领事、统军指挥额尔金(Elgin and Kincardine, 1811~1863,1857年英国统军代表)使团副使、中国海关首任总税务司等职,1859年被清政府免职。次子李蔚海(William Hyde Lay, 1836~1876),1853年以翻译生身份来华,先后任英国驻上海和九江副领事,天津和烟台领事。幼子李华达(Walter Thurlow Lay, 1840~1917),1861年任英驻华使馆翻译生,后任中国海关帮办、副税务司和税务司等职。这是一个有着丰富中国阅历的外交官家庭,为英国汉学界所熟悉。

19世纪20年代李太郭曾在广州和澳门等地大量采集华南植物标本。中国热在欧洲兴起的年代中国植物引起了欧洲人的关注。一些实力雄厚的苗圃和植物园曾雇人搜集中国植物。李太郭就是在那个背景下从事中国植物的采集和研究的。他曾经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上发表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专著有《真实的中国人:他们的道德、社会和人文品质》(The Chinese as they are: their Moral, Social and Literary Character)等。

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 Mayers, 1831~1878)出生于澳洲塔斯马尼亚的一个英国驻澳总督私人秘书家庭,11岁返回英国上学,后来以记者身份在美国工作。1860年为英国驻华使馆汉文翻译生,1871年晋升为汉务参赞,1878年病逝于上海。他的主要著述有:与人合编的《中日条约口岸指南:北京、江户、香港和澳门》(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s of Those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Peking, Yedo, Hongkong and Macao, 1867年)、《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上的探险》、《酒友》(《聊斋志异》中的故事,载1867年香港《中日问题解答》Notes and QCJ杂志第一期)、《中国棉花引进》(Introduction of Cotton into China, 1868年)、《汉文读者手册》(Chinese Reader's Manual, 1874年)、《中华帝国与

列强诸国条约集》(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 1877 年)和《中国政府手册:官衔、级别及释要》(The Chinese Government: A Manual of Chinese Titles, Categorically Arranged and Explained, 1878 年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社出版)等。

四、筚路蓝缕的汉学研究者

伟烈亚力(又名卫礼,Alexander Wylie, 1815 ~ 1887)的祖籍苏格兰,其父 1791 年迁居伦敦,从事油彩买卖。伟氏生于 1815 年 4 月 6 日,在兄弟姐妹中行四,是伟家的幼子。因为体弱多病,周岁时送回老家由亲戚抚养,后来启蒙于当地的一所文法学校。几年后父亲把他接回伦敦,结束了畸零无侣的童年,读完中学后跟一木匠当学徒。

他从小就向往中国,曾买过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 1831 年编写的一本《中国语文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一边自学拉丁文一边学习汉语。几年后他又从英国圣书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得到一本《新约全书》,更加发奋学习汉语,还把所学单词自编成册。1846 年翟理斯从香港返英时正欲为上海伦敦会圣经印刷所物色监管人选,当他发现仅自学过《中国语文札记》的伟烈亚力虽然汉语发音不甚准确,却能把《新约全书》的基本内容译成汉语,感到十分惊讶。翟理斯把他送到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ed)处学习印刷技术,自己亲自教他汉语。1847 年他被派到中国,8 月 26 日乘船抵沪。伟烈亚力在上海伦敦会圣经印刷所担任印刷业务,还帮助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1851 ~ 1865)和上海小刀会起义(1853 ~ 1855)。西方新教传教士对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十分关注,圣书会计划募集巨款,购买一百万册《新约全书》在中国散发。《新约》翻译代表借时造势聚会于沪,拟对其汉译本进行修订。当时伟烈亚力的汉语水平虽然已经相当不错,却未获准进入修委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积极参与圣经修订工作。平时除出版事务外,他常和其他传教士一起到中国各地去宣讲福音,有一次他曾假扮成中国人的模样去了苏州,另一次与雒魏林深夜潜入小刀会占领的上海市区劝说义军领袖归顺清廷。他走访了中国的 14 个省份(清朝一度沿袭明制,内地置省 18),还以修委会代理人的身份陪同额尔金巡游长江,对于中国的地理和风俗人情近乎了如指掌。虽然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传教士,不过却有许多罗马天主教

各教派的朋友，在当时的西方外交和宗教界人士中口碑甚佳。

1848年他跟一个曾在西南非洲霍屯督人中传教7年的英国修女在沪结婚，翌年喜得千金，不幸妻子病故。此后伟氏未再续弦，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圣经出版印刷中去，屡屡推出精品，获得宗教界人士的好评。教务之余他不知疲倦地自学法语、俄语、德语、希腊语、梵文、满语、蒙语、维吾尔语，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亚洲的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著作。他博览群书，记忆超常，文思敏捷，治学有方，每日睡眠不超过6小时。他在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的帮助下研究过宋代算法，经过数年的钻研发现，1819年霍纳发表的各类方程解题办法中国数学家早在14世纪就提出来了。据《清史稿·畸人传》记载：他与李善兰合作译完《续几何原本》后曾感慨万分地表示"西土他日欲得善本，当求诸中国也！"艾约瑟说："这一奇才使他成为把微积分著作翻译成汉语的最佳人选。伟烈亚力告诉人们中国人的能力跟欧洲的天才青年一样，足以成为一个最高数学奖项的获得者。"①他对文献学有深刻研究，在编写中国文献和新教传教士回忆录等方面表现了他的广博知识和才能。他帮助过《锡兰史》编者埃默森·坦南特(Emerson Tennent)、《中国及前往中国之路》的编撰者亨利·裕尔、法国汉学家亨利·高第(M. H. Henri Cordier)、《蒙古史》的编者亨利·豪沃思(Henry Howorth)等学者。他在语言和中国文化方面的学养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英国基督徒，成了马礼逊之后的知名学者，与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艾约瑟、道格思、翟理斯等人齐名的英国汉学大家。威托玛说过："我觉得，无论是在他要做的或已经做过的事情方面，我从来都没有见到比他更好的人了。他在汉学领域，特别是文献学和考古学方面，备受推崇，我曾听一些知名学者说过对他表示赞赏的话。"②

1860年11月伟烈亚力返英述职，1863年经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到达北京，辞去了伦敦会职务，被聘为英国圣书会上海分会代理人。在这期间他遍游中国各省，推销宗教书刊，还陪同外号为"街头传教士"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到过成都和武汉。他雇佣了许多外国宗教书刊商，以售代赠方式到中国城镇推销教义宣传品，组织圣经藏书协会，为修订

① J. Edkins, 1897. *The Value of Mr. Wylie's Chinese Researches.*

② J. Thomas, 1897. *Biographical Sketch of Alexander Wylie.*

版汉译《新约全书》制作盲文印版。他还在江南制造局翻译科技著作多年。1877 年因年事渐高,积劳成疾,眼疾使他无法视事,不得不返回英伦。6 月 30 日《申报》刊登了沈毓桂为他写的赠别诗四首,诗中写道:"抱道来华三十年,书成微积与谈天。重洋跋涉休嫌远,赢得才名到处传。阅遍山川眼界开,校书终岁又敲推。胸罗星宿谁能试,格致探源众妙该。仁爱谦和迥出群,情深古道重斯文。樗材不意蒙陶铸,攻玉他山重赖君。屈指归途几万程,赋诗草草送君行。殷勤珍别无多语,早盼征轺返沪城。"①回国后他居住在汉姆斯特德,乡间的空气清新,景色宜人,虽然晚年生活清苦,但他仍笔耕不辍,每日伏案翻译《后汉书》,帮助友人艾约瑟校改《中国佛教》等文稿。6 年后他失去了视力,病卧在床。1887 年 2 月 6 日凄然辞世。

托马斯(James Thomas,1862 ~ 1940)从伟烈亚力生前撰写的有关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科学和文献学的论文中选出数十篇,编辑成《中国之研究》(Chinese Researches)一书。因为印刷技术方面的原因不能在伦敦排版,1897 年由慕维廉带到上海出版。全书 271 页,由托马斯作序,共包括四部分:

一、人文:关于普雷斯特(Prester John),鞑靼地区和中国的景教传播;佛牙、舍利子、释迦牟尼的头骨、头发、指甲,佛教圣物;儒家学说,墨家博爱,孟子,道家;圣经的第一个译本;马礼逊;汉译圣经,圣书会圣经,圣经的传播;中国的秘密结社。

二、历史:中国的犹太人,祆教即犹太教,开封府的犹太教堂,来华的罗马天主教徒,中国的犹太人视天为神,中国药典中有关祆教的记述,摩尼教、拜火教与叙利亚基督徒,马可·波罗,伦敦会对在犹太人中宣讲福音的调查;西安府的景教碑,对其真实性的怀疑,碑记新译文,中国政府有关碑文的观点,碑记中的历史和地理名词释义,5 世纪景教教会的分立,中国的景教教堂,大秦国即叙利亚,中国发现的叙利亚圣经残本;中国大将出使里海,朝鲜的归顺,中国人对安息日的理解,福建历书中的"密"字。

三、科学:元代北京的天象观测仪,耶稣会士研制的仪器,1279 年建成的观象台,研制出 17 种天象仪的郭守敬及其生平,南京和平阳的观测仪器,中国典籍中有关日食和月食的记载,星宿表;中国的石棉,中国的指南针;中国算经札记:公元前 2300 年中国的算书研究,公元前 1100 年的《周

① 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第 525 页。

髀》,《周礼》中的古代算式,公元3世纪的《算经》,印度和阿拉伯数学,古代的竹筹和1350年后算盘的使用,公元前500年的数码,11至12世纪中国数学的快速发展,数论分析,1856年李善兰发表的《对数探源》。

四、语文学:肃慎与勿吉,辽代与金代,女真与女直,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的兴起,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与明的关系,满族皇室太祖努尔哈赫赤,大清帝国;满文溯源,明代的女直文,回鹘文满文探源,叙利亚文与回鹘文字母比较,蒙文与阿拉伯文比较,八思巴字,1599年满文的创制,满文草书。

伟烈亚力笔耕毕生,著作等身,主要中文著述有:《数学启蒙》(A Compendium of Arithmetic, 二卷,1853年)、《满蒙语法》(Manchou-Tartar Grammar, 1855年)、《续几何原本》(Supplementary Elements of Geometry,与李善兰合译,七卷,1857年)、《机械通论》(Popular Treatise on Mechanics, 1858年)、《代数学》(与李善兰合译英国棣么甘(Augustus de Morgan, 1806~1871)的Elements of Algebra,十三卷,1859年)、《代微积拾级》(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与李善兰合译,18卷,1859年)、《谈天》(Outlines of Astronomy, 与李善兰合译,1859年)、《汉籍解显》(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1867年)、《海轮引擎要略》(Main and Brown on the Marine Steam Engine,四卷,1871年)、《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The Gospels of St. Mathew and St. Mark,满语和汉语译本)、《汉匈关系史》(History of the Heung-noo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China, 1874年)、《中国之研究》(Chinese Researches,1897年)。英语方面的主要著述有:《上海文集——有关中国宗教、文献和科学论文以及赴华新教教徒回忆录》(The Shanghai Serial, Articles on Chinese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Scienc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1867年)、《英译前汉书》(Translations from the Tseen Han-Shu; or Ethnography of the Han)等。他还在《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ese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和《中国纪事》以及其他杂志上发表过大量文章,编辑过有关中国佛教的书籍。他曾为上海亚洲学会发起人之一,担任《教务杂志》编辑工作多年,是东方学会的活跃会员,出席过意大利东方学家大会。

英商奚安门(Henry Shearman, ? ~1856)1850年曾在上海创办《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后改名为《字林周报》)。那时中国与欧洲之间尚未建立电讯联系,外界新闻极少,为填补空白,奚氏常组织科技文史稿件覆盖版面。伟烈亚力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之一,他的两篇文章引起了读者

的极大兴趣:一是有关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景教碑的文章,二是有关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文章。

1625年西安近郊农民在建房时发现一块石碑,1628年经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认读,发现为781年景教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因为该碑碑文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重要历史文献,曾氏有关该碑的译文和记述引起了西方宗教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曾氏并非解读景教碑的第一位西方传教士,早在1627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就读过此碑碑文并将它译成了拉丁文,1672年德国东方学家米勒(Andreas Muler)以及以后的一些来华传教士也就此写过文章。伟烈亚力在《西安府景教碑》(The Nestorian Tablet in Singan Foo)等文中提供了新的信息。他重译碑文,详加考证,旁征博引,解惑释疑,对中国典籍和历史的熟悉以及在汉学领域驰骋的老练,俨然已是一位出道多年的汉学家,令西方汉学界的众多学者折服。

明清来华的耶稣会士在译介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历法和算书成就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伟烈亚力便是其中一人。明代采用的历法是沿用数百年的大统历和回回历,前者主要沿用元代郭守敬授时历体系,后者是13世纪从阿拉伯国家传入的穆斯林历法,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水平两者在计算公式和数据处理方面均有差错。1629年徐光启(1562-1633)奉命督修历法,举荐李之藻、耶稣会士龙华民和邓玉函共事,邓氏病故后又聘任汤若望和罗雅各(Jacobus Rho, 1593~1638)译书演算。徐光启熟悉西历原理,精通算法、火攻和水攻理论,主张推广度数之学。1634年他与耶稣会士编译出130余卷的《崇祯历书》,打算通过修正历法发展中国的气象学、水利学、会计学、建筑学、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学、武器和钟表制造等学科理论。至于中国的数学理论,由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影响,明代以后备受冷落,许多著作失散。有鉴于此,早在1607年徐光启就与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学者就把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30-公元前275)的《几何原本》译成了汉语。他们采用的《几何原本》是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1537-1612)的注释本,共13卷,1至6卷为平面几何,7至10卷为数论,11至13卷为立体几何。也许因为当时利玛窦几经磨难后第二次进京,凡事谨言慎行,也许他对中国学人缺乏了解,不能预测《几何原本》出版后的社会效果,虽然与徐光启意见相左仍说服他译平面几何部分6卷。

伟烈亚力撰写的有关中国数学和天文学成就的多篇论文就是在这样

的历史背景下发表的。其中一篇研究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长篇发表后很快就被译成德文，引起了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院秘书长的关注，被认为是欧洲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和其他学科成就的起点。1753 年伟烈亚力出版了《数学启蒙》并附对数表。1752 年他开始与当年同文馆算学馆总教习李善兰合译欧几里得的另外 7 本著作，1857 年以《续几何原本》(Supplementary Elements of Geometry)的总书名出版。不过他们采用的是 1660 年的英译本，由伟烈亚力口述，李善兰记录润色，日译一题，历时四载。当年主张把全套书译出的徐光启曾经感叹："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他岂能料到 250 年后续译此书者竟是一位英国新教传教士和一位中国数学家。1863 年因太平军攻陷吴越，李善兰投靠曾国藩军，备受赏识，两年后曾氏在南京刊校《几何原本》和《续几何原本》两套译本，并嘱其子以他的名义作序。从此该书更广为传播，读者无数。

当然，作为一名传教士，伟烈亚力在向中国人译介西方科学著作，撰写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时一刻都没有忘记他的宗教使命。他在《〈谈天〉序》中曾写道："夫造物主之全智巨力，大至无外，小至无内，罔不莅临，罔不鉴察，故人虽至微，无时不蒙其恩泽……余与李君同译是书，欲令人知造物主之大能，尤欲令人远察天空，因之近察已躬，谨谨焉修身事天，无失秉彝，以上答宏恩，则善矣。"①这种观点立场的表露可以理解，但是却给他的译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由于伟烈亚力来华后刻苦钻研，结交了许多中国学人，在中国文献学方面的知识日渐丰富。据说当年他负责的上海伦敦会图书馆的编目独具特色，不仅仅按音序编排书名索引，而且还附有作者和著作内容简介。这是他在汉学领域的才华的初次展露。他的《中国文献记略》发表于 1867 年，以我国乾隆时期编纂存放于宫内文渊阁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为蓝本，按照"经、史、子、集"的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法全面向中国境外读者推荐中国古代重要文献，对 2000 多部典籍进行了介绍，冠以"序言"和"前言"，并把目录译成几种欧洲文字，文后还附藏书总目，因而成为研究中国古籍的西方学者案头必备之书。

虽然《中国之研究》收录的都是伟烈亚力生前的代表力作，但是从历

---

① *Life and Labours of Alexander Wylie* by H. Cordier, *Chinese Researches*, P. 12，译文转引自马祖毅著《中国翻译简史》("五四"运动以前部分)，第 237 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

史学、翻译学和语言学的角度看其中疏漏和谬误仍多处可见。例如他经常把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说成境外部落与中国人的关系,把中国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关系说成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大秦"就是叙利亚,认为认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第一个外国人是曾德昭,把"白云宗"译为"White cloud institution",把"景教"译为"Illustrious Religion",把"四库全书提要"译为"Important selections from the books in the imperial library",把"金紫光禄大夫"译为"Titular Great statesman of the Banqueting house",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他未曾受过高等教育,未受过严格的治学训练,作为一位自学成才的英国传教士,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如此深刻独到的了解,已属不易,能在中国学者帮助下翻译天文学和数学著作,更是难能可贵,比起同时代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来,他是庸中佼佼,也是传教时期西方汉学家中当之无愧的楷模。

现在在国内看到的《中国之研究》有两个出版社和出版年份相同的版本。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第四部分"语文学"中的《汉语和中国文献》(195页至241页)。该文排版后发现原作者可能是法国文献学家亨利·高第,因此编辑在文后特别说明:"上文原载《新美百科全书》,存于伟烈亚力遗稿中。从行文看作者应为高第,但是因为引用了伟烈亚力《中国文献记略》中的相当多的内容,弥足珍贵,故予以保留。"另一版本删去了"说明",但是在目录中直接写明作者为高第。也许后者不算一个新版本,而是在原版本基础上挖补而成的,因为第四部分页码239至241页与后文页码重叠。在该文的第五部分"汉学"中作者写道:"欧人对汉语和中国文献的研究始于本世纪,此前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对此知之甚少。吾人所知第一本汉语官话语法系万济国神甫于1703年在广州刊行的《官话术》。1730年拜尔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博物馆》,内附官话语法和福建泉州话简介和汉语词汇表。研究亲缘关系的法国人富尔蒙1742年出版过一本关于汉语语法的书,后来证实系万济国的官话语法的节译本。五年后他发表了有关汉字的论文,通篇错误百出。上一世纪有关汉语语文学性质的其他文字寥若晨星。当1815年雷暮沙被任命为巴黎汉语教授时可能引起对汉语产生兴趣的事已每况愈下。这位知名的汉学家的讲座和著作开始引起欧人对中国的巨大关注,并对该国文献倾注了新的热情。他的继任儒莲充

分保持了该教席的美名。”[①]接着，作者综述了欧洲汉学界用拉丁文、葡萄牙文、法文、俄文、英文、德文在编写汉语辞典和语法教材方面的一些有影响的成果。不管该文的作者是伟烈亚力还是高第，其中的资料和论述对于研究19世纪的欧洲汉学史都是十分珍贵的。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笔名“尚德者”），出生于伦敦，幼年就读于圣保罗学校，来华前曾在一家印刷所跟伍德学艺。1816年他前往马六甲伦敦会办的印刷馆，每天除了负责印刷业务外还协助米怜工作，并利用当地华人环境学习中文，曾先后到槟城和巴达维亚等地传教、办学、开办印刷分所。1818年他负责编辑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1823年在巴达维亚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中文月刊，共出4卷。由于他的努力，巴达维亚印刷所的业务日增，成为印刷宗教宣传品的一个重要基地。

1835年他由英国伦敦会派遣到广州，多次进入中国近海测绘地形并了解中国经济商业情况，还到山东、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活动。1835年麦都思和郭实腊、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eidgman，1801～1861）、马儒翰根据马礼逊的翻译修订《新约》中文译本，最后由麦都思校核润色，1837年以《新遗诏书》为书名在巴达维亚石版印行。以后的十几年间许多在华的新教徒都使用过这个译本。

1839年麦都思再次来华，在广州编印《各国消息》中文月刊，石印发行。1841年他被聘任为英军通事乘坐军舰进入定海，后来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对华人开放的基督教医院。1843年他到上海传教，圈买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片土地，大兴土木，盖了一座名叫天安堂的教堂。1844年至1846年他将定海医院和巴达维亚印刷所迁至上海，还创建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自任监督。1847年6月麦都思邀请裨治文、美魏茶、施敦力（约翰）等人组成圣经编译委员会，历时六年，完成了《新约全书》的重译工作，就是后来所说的“代表译本”（delegates' version）。1850年墨海书馆开始译印西方科技图书和他自己的著作，先后出版西方科技图书20余种。他曾聘任一些上海文人协助译书和编书，洪仁玕（1822～1864）、王韬（1828～1897）、李善兰（1811～1882）、管嗣复（？～1860）、张福僖（？～1862）和蒋敦复（1808～1867）都曾在该馆供过

①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w*, *Chinese Researches*, PP. 238～239.

职。1845 年他化装成中国人潜入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调查，后来将所见所闻写成《中国内地一瞥——丝茶产区旅行记》一书，交付墨海书馆出版。1848 年他与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 ~ 1896）和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 ~ 1900）等人进入沪郊青浦传教，不循民俗，与漕运工人发生肢体冲撞，引起公愤，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青浦教案”。1852 年麦都思在沪创办《六合丛谈》月刊。一年后将太平天国文件英译在《北华捷报》上发表，主张英国对太平军实行中立政策，以图日后有所作为。

麦都思用汉语、英语和马来语撰写过近百部著作，是神职人员中笔耕不辍者之一，在上海文人中享有较高知名度。他编译的两本词典长期为读者所使用。麦都思曾对太平天国文献有所研究，对小刀会持客观态度，许多英国人是通过他的译文介绍才了解到洪秀全的事迹、其政见及其领导的天平天国起义的。他的著作有中文 59 种、英文 27 种、马来文 6 种，其中包括：《地理便童略传》（Geographical Catechism，1819 年）、《中国的现状和前途——与福音传播相关的中国悠久历史、幅员、人口、文明、文学和宗教介绍》（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Containing Allusions to the Antiquity，Extent，Population，Civilization，Literature and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1838 年）、《神学总论》、《汉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两卷，1842 年）、《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两卷，1848 年）、《书经：历史经典——中华帝国最古老和真实记录》（The Shoo King，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be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illustrated by later commentators，1846 年）、《上海及其郊区情况介绍——据当局资料摘编》（General Description of Shanghai and its Environments，Extracted from Native Authorities，1850 年）和《新约全书》（与施敦力（约翰）合译的南京官话版，1852 年）、《道德经：比较宗教浅谈》（The Tao The King：A short study in comparative religion，1905 年）等。1843 年美国纽约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954 年上海英租界成立工部局，麦都思被推选为该局董事会第一届董事。1856 年 9 月他因病离开上海回国，返回伦敦两天后去世。

罗伯聃（Robert Thom，1807 ~ 1846）出生于苏格兰，1834 年来华学习汉语，先后在镇海、舟山、厦门和广州英国领事馆任通事。1841 年任镇海民政长官，1843 年任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第一领事。据说罗伯聃在当时的英

国驻华外交官中是汉语口语说得较好的一个，虽然主要经历在中国南方，但是发音特别标准。1842 年 8 月黄恩彤、咸龄和颜崇礼与英国麻恭在南京仪凤门外的静海寺和英舰皋华丽号上进行关于中英和约条款的谈判都是由罗伯聃和马儒翰等人翻译的。罗伯聃的主要著作有《汉英字汇》(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1842 年)和《汉英会话》(The Chinese Speaker, 1845 年)。

《汉英会话》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外国来华传教士、商人、学生的口语提高都有帮助。素材选自于私塾教材或者相声，每课有课文、拼音、英译和注释，20 课后附"见面常谈"和"短篇对话"。没有语法讲解，英译多采用直译。这是距今 140 年的一册西方外交官编写的汉语口语教材，是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史和汉学史的一份重要史料，弥足珍贵。罗伯聃曾翻译过《意拾喻言》(伊索寓言)，语言上很有特色，适合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用作阅读理解练习。他的语言修养和对汉语研究的深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 ~ 1900)是慕家遗腹子，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他自幼学习刻苦，曾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专业，成绩为同学所称羡。1847 年伦敦会派遣他来华传教，8 月下旬与伟烈亚力一起到上海。他学习中国方言时表现出的天赋令人惊叹，中国老师稍加点拨就能融会贯通，不久竟能用上海话和南方官话传教，口若悬河，每每吸引众人耐心倾听。他先后在天津、牛庄、苏州、上海布道讲经。1848 年他和麦都思到上海郊区传教，因违反规定引发了"青浦教案"，英国驻沪领事要挟清政府赔款道歉，慕维廉就是当事人之一。1890 年至 1891 年他被推选为广学会临时总干事，1894 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在华 53 年中他长期在墨海书馆参与圣经翻译工作，共出版著述 40 余部，是上海伦敦会传教士中著述最多者之一。其中有：《地理全志》(Universal Geograph, 1853 至 1854 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分上、下两编，上编 5 卷，每卷介绍一洲；下编 10 卷，介绍世界各国自然历史地理概况。1883 年上海美华书馆又出版慕维廉修订的《地理全志》(续《瀛寰志略》，全书共 143 章)、《大英国志》(原著作者托马斯·米纳尔，与蒋敦复合译)、《格致新法》(原摘译自培根的《新工具》，与沈毓桂合译，曾在《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上发表，后来全译此书，以《格致新机》书名由广学会出版)、《中国与福音》(China and the

Gospel, 1870 年)。慕维廉的《地理全志》是一部中文版的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除了系统地介绍自然、人文、区域地理的基本知识外,还介绍了有关地质学、气候学、水文学和民族学的知识,在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他还著述宣扬基督和圣经的文章数十篇,但是唯世俗之论最受欢迎。1900 年慕维廉病逝于上海。

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 ~ 1905),字迪谨,1848 年奉伦敦会派遣以代理人的身份到上海,协助墨海书馆麦都思的工作。1856 年麦都思返英,艾约瑟接替他担任监理,主持该馆的编辑出版事务。1852 至 1860 年间,他曾编译《中西通书》,内容包括中西日历对照、世界各地时间对照、日食和月食、中国农历节气、世界大事和科学发明等。1858 年 3 月艾约瑟回国休假,一年后与新婚妻子再次到上海。1860 年一度去烟台传教。曾经与杨格非等人应太平天国的邀请去苏州会见李秀成和洪仁玕,还为中英生丝贸易上书洪秀全。1861 年他辗转天津传教,两年后又到北京建立教堂。1872 年他与丁韪良在北京创办《中西闻见录》月刊。1880 年他被中国海关聘为翻译,在北京任职一段时间后去上海,居沪长达 15 年。

艾约瑟在华的主要经历是传教和编译书籍。他在语言学、语音学、语法学、社会学和宗教学方面学养有素,造诣非凡,对汉语和中国文学、宗教、贸易也有深刻了解,译著颇丰。他的主要译著有:《中国人的宗教状况》(The Religious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1859 年)、《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 1878 年)、《关于鸦片或中国罂粟的史料》(Opium: Historical Note, or the Poppy in China, 1898 年)、《中国的佛教》(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 1893 年)、《西学略述》、《西学启蒙》(1898 年)、《冰洋事迹述略》、《中国在语文学上的位置》(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1871 年)、《中国通货》(Chinese Currency, 1901 年)、《中国银行与物价》(1905 年)、《访问苏州的太平军》、与包约翰(John Shaw Burdon, 1826 ~ 1907)、白汉理(Henry Blodget, 1825 ~ 1903)和丁韪良合译《北京官话新约全书》(1866 年)、先后由湛约翰和他负责费时 16 年完成的文理和合译本《新约》(1906 年出版),编译《欧洲史略》、《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富国养民策》、《西学启蒙》、《身体启蒙》(1898 年),与李善兰合译《重学》(三卷本)、《初等力学教程》和《圆锥曲线提要》、与王韬合译《格致西学提纲》等书、由他口述,张福禧笔录的《光论》、王翰口

述，他翻译的《格致西学提要》等书，均由上海总税务司出版，影响甚广。宗教方面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艾约瑟还在1884年第15卷《教务杂志》上发表过《秦汉时代的道教》、《中国的宗教迫害》、《早期道教成长中的足迹》；在《中国评论》上发表过《道德经》(1884～1885年第13期)、《明堂》和《中国占星术导论》(1886～1887年第15期)、《火神信仰》(1889～1890年第18期)、《道教的外部根源》(1890～1891年第19期)、《道教的称谓》(1895～1896年第94期)等文章。

艾约瑟编著的《上海话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Shanghai Dialect，共225页，1853年由长老会出版社出版，1868年再版)是第一部西方来华传教士编写的汉语方言语法专著。他根据自己的记录把当时的上海话声调系统描述为：阴平急高降，阴上高平，阴去急高升，阴入短高升，阳平低平，阳上缓低升，阳去急低升，阳入短低升。他还把上海话的入声字按照韵尾分为两类：一是以h收尾的，例如：fah(法)、hah(瞎)、nyih(热)；二是以k收尾的(当时的上海话里仍有k韵尾)，例如：pak(百)、hok(霍)、kak(革)。虽然艾约瑟没有对这两类韵尾与韵类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但是可以看出他对汉语切韵音系的韵尾系统及其与方言的关系已有充分了解，分析和记录均可信。

艾约瑟的《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1857年由长老会出版社在上海出版，1864年再版)，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汉语语音共8章；第二部分为词类共12章；第三部分为句法，另有三个附录。这是一部开创性的专著，主要靠作者自己的语言学素养和长期社会调查积累的第一手资料，考察面涵盖了汉语语音、语法和修辞的方方面面。他所提出的问题和所归纳的要点基本符合现代语音学和语法学的原则。在标音方面没有采用已在部分传教士中流行的马礼逊系统，调号的标注是用英文逗号在每一个汉字的一角分别表示上平、上声、去声、入声、下平。他十分注意官话与方言的区别。在词汇部分他的视点首先放在虚词和实词的总体划分上。由于受到西方语法理论的影响，他对于汉语的词缀、名词的性、数、格，形容词的比较级、代词的分类、动词的态、肯定与否定方式以及构词规则等，参照点基本上是英语或拉丁语法。句法部分也是这样，作者注意到汉语短语的内部组合规则和外部制约关系，语序的重要性，但是也花了许多篇幅分析汉语的从句(包括间接从句、宾语从句、关系从句、归纳从句、解释从句、比较从句、相似从句、条件从句和附加

从句)和并列分句,部分失诸穿凿附会。

艾约瑟编撰的《汉语口语进阶》(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1862 年伦敦会出版社上海出版),全书 104 页,分为前言、52 课课文、52 组分类常用词语和附录。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本精心设计的较好口语教材。

1857 年第 10 号《六合丛谈》在介绍他的语言著作时有这样的一段评论:艾约瑟"居中国九年,于音韵之学,穷流溯源,辨之綦精。凡士自各省来者,无不沿接讨论。以英文著一书,曰《官话活法》,俾英人效华言者,知所入门。向时艾君曾撰《上海土白活法》,讲论赅备,观此二书,知艾君于中国声音之理,博考而详,探讨于古书者久,故得自立一说。"①

艾约瑟是一位有影响的英国汉学家,1875 年曾获英国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05 年在上海逝世。

五、悬壶济世的传教士

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 ~ 1873)出生于英国北安普敦郡韦尔福德一个独立教会的牧师家庭,年轻时曾在伯明翰总医院当过医工。1835 年他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获医学士学位,成为皇家外科学院会员和伦敦会医疗传教士。1845 年他的妻子简·阿贝女士(Jane Abbay)去世,两年后与马礼逊的女儿玛丽·丽贝卡·马礼逊(Mary Rebecca Morrison)结婚。前妻和后妻各为他生育子女二人。

1839 年合信来华,是第一位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专业医生。像所有的初期传教士一样,他刚来华时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编写传教读物,为进入中国社会开展各项世俗化工作。他在澳门、香港和广州引进了一些新式医疗设备,为当地居民诊病治疗,用汉语编写医疗手册,培训医务人员,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对于基督教的好感。

1839 年合信与雒魏林到达澳门担任澳门伦敦会医师,主要开展饥荒救助,治疗天花、霍乱和麻风,帮助吸食鸦片者戒毒。当他看到那些鸦片受害者身心所受的摧残以及妻离子散的惨状时,他公开对于英国政府所执行的贸易政策提出反对意见。

---

① 转引自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第 12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0 年。

1843 年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 1804 ~ 1889)被聘任为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合信前往接替他在香港创建的眼科医院工作。培训当地的医务人员并向医疗传教士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分级建议,是他支持 1845 年成立的中华内外科协会的主要工作。由于对所采取的方法和策略观点的分歧,医疗传教会内部分化成两大派别:以合信为首的香港医疗传教会和以伯驾为首的广州医疗传教会。

1847 年他的岳父马礼逊去世后合信回到内地。因为当时广州仍然不对西方人开放,他便把医院建在市郊,为麻风病人和吸食鸦片者治病,同时培训一批能胜任小手术的医士。1856 年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进犯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一触即发,医院不得不停诊。1857 年他被上海仁济医馆(The Chinese Hospital)聘为医生,1859 年返英后曾在克利夫顿和切尔腾纳姆开业,直至 1864 年。1873 年 2 月 16 日他在锡德纳姆病逝。

合信在广州 8 年间曾引进了一些有影响的英语医学著作,后来有些被译成了中文,成为中国医学院的教材。合信个人主要的中英文著作有 21 种,其中包括:《解剖学和生理学纲要》(Outline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 1850 年)、《西方外科业要义》(First Lines of the Practice of Surgery in the West, 1857 年)、《内科和药物业务》(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1858 年)、《英汉医学词汇》(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858 年)和《自然哲学和自然史》(Natural Philosophy and Natural History)等。他曾编译过《博物新编》(1867 年在《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上发表),与管嗣复合译《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与陈修堂合译《全体新论》。

与其说合信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不如说他是一位务实的医生。他在华期间所做的世俗化工作,淡化了他的神职人员色彩,他把自己的医术和医学理论都贡献给了当时受苦受难的中国人。在中英文化学术交流方面,他的贡献也是突出的。

第三章
后传教时期的英国汉学

19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为英国汉学史中的后传教时期研究阶段。

一般认为,欧洲的“中国热”后期英国汉学开始形成规模和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基本上摆脱了教会的影响,进入了世俗化轨道,取得了较大发展,研究人员数量增加,研究手段不断更新,出现了一些超越传教时期知名度的汉学家和有影响的著作,汉学研究正逐渐成为独立学科。

牛津大学的汉学课程始于 1875 年理雅各开设的汉学讲座,1888 年剑桥大学也聘请了威托玛开设汉学课程。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除了理雅各和威托玛外,还有道格思和翟理斯等。大名鼎鼎的傅兰雅则是英国汉学界中的另类硕儒大家。他们研究的不仅仅是普通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或者信仰问题,而且还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历史、政治、社会、外交、贸易、语言和文学,甚至包括考古和疆域。交流不再停留在单向模式,而是开始转向了联想和思考,进一步把研究成果用于影响本国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政策的制订。一批批学子开始涌出汉学殿堂的大门,为下一阶段质的飞跃做好了人才和工作条件的准备。

这一时期有不少非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其中一些人曾受到从事职业外交的父亲的影响,另外一些人出生在来华传教士的家庭,从小受到过中国文化的熏陶,也有一些人是自己选择了汉学专业然后投身汉学研究领域的。他们中的多数人专业素养较好,知识和阅历丰富,精通中、英两国语言,有些人甚至还通晓多种汉语方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宗教、地理和传统,因此能作出超越前人的成绩。

两国国情的变化也是英国汉学进入新阶段的转折因素。在 1840 年至

1842 年的鸦片战争中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赔偿 2100 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中英共同商定中国海关征收的进出口税率，以及英国人在条约口岸和相关城市的居住、旅行、经商、传教、采访、探险的权利和治外法权。在 1856 年至 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又与英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增加了开放口岸，重新修改中国海关贸易税率，确定外国使团与总理衙门直接接触的途径，允许外国人持通行证在条约口岸以外地区往来。

随着英国在华的经济和外交利益的扩大，他们需要更多通晓汉语并熟悉中国事务的人才。其结果是：英国大学开设与中国有关的课程比以前多了，官方和民间研究中国国情的机构增加了，涌现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型汉文通事和善于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潮流中观察分析中国事务的“中国通”，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汉学专著，并且把汉学研究成果直接用于本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制订。

一、汉籍翻译大师理雅各

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亨特利镇的一个富商家庭，1822 年与米怜的儿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1815～1863）就读于同一所小学。美魏茶父亲米怜在华的传教经历以及与他们父子之间书信往来所传递的信息，对于理雅各成长的影响是深刻的。1829 年理雅各在教区中学毕业后又和美魏茶一起进入阿伯丁国王学院和阿伯丁大学，曾获甲等奖学金。1836 年理雅各因为坚持自己的非国教信仰而失去了在皇家学院当拉丁语教师的资格，只好在一所公理宗学校担任数学和拉丁语教师。

1839 年理雅各在伦敦海博利神学院完成学业后到伦敦大学学习汉语，导师是基德牧师。同年以传教士身份与新婚妻子玛丽·伊莎贝尔·马礼逊（Mary Isabella Morrison，1816～1852）动身来华，同船的传教士还有他的学长美魏茶。当时清朝规定西欧传教士不可进入中国内地，他们只能暂住马六甲。尽管水土不服，但是理雅各仍身兼数职，努力工作。他担任了伦敦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记者和顾问、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校长约翰·埃文斯的助理，并负责管理书院的印刷所。不

久校长因染霍乱去世,理雅各代行其职务。

英华书院是米怜于1818年在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帮助下创办的一所学校,其宗旨是传播基督教福音,对西籍和华籍传教士进行培训,课程包括英语、汉语和神学理论。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米怜、柯大卫和麦都思等都先后在该校担任过教学和管理工作。在代理校长职务期间,理雅各积极宣传基督教教义,撰写《致马六甲华人有关霍乱书》在当地居民中散发,从医学角度告诫人们改变迷信观念。他还编译了《英汉马来语辞典》(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和《智环启滚塾课初步》(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作为教学用书。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开始着手准备圣经汉译和汉籍英译的工作。1841年7月美国纽约大学授予他名誉神学博士学位,表彰他"对基督教世界与文学领域的杰出贡献"。同年11月他奉命正式担任英华书院第七任校长职务。

1843年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到香港,理雅各主持该校教务。鸦片战争后的香港,民怨沸腾,社会动荡,治安混乱,居民生活条件恶劣,英华书院面临着重重困难。理雅各曾向港英当局申请扩建校舍,屡遭拒绝。后来在港英、美传教士讨论修订圣经中文译本问题时,理雅各在"上帝"等概念的认识和汉译选词方面与麦都思等人产生分歧,修订工作又成为他难以摆脱的烦恼。

1844年英华书院改名为英华神学院(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理雅各还创办了伦敦会在香港的第一座华人礼拜堂,自己先后撰写了教义手册《耶稣山上垂训》、《约瑟纪略》、《养心神诗》和《重修礼拜堂仁济医馆祈祷上帝祝文》,由何进善(1818~1871,伍廷芳之岳父)等人协助翻译注释,黄胜等人在学校印刷所印行散发。后来何进善的儿子何启(Ho Fuk-Kai, 1859~1914)也成了理雅各的教友和支持者。

1845年理雅各向港英当局申请资助办学未准,心中郁闷。年底因高烧数日病因不明,决定返英就医,并携学生吴文秀(Ng Mun-sow)、李金麟(Lee Kim-leen)和宋佛俭(Song Hoot-kiam)同行,帮助他们提高英语阅读和口语能力。治病期间他四处游说,介绍自己在港办学情况,宣传教育世俗化的主张,畅谈系统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价值和重要性,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他的呼吁获得了当时的国务大臣格莱斯通的同情,同意为他致

信港督戴维斯。

1848 年粤港两地传教士建立了一个传教站，每三个月开会一次，交流传教经验，协调相关事宜，由理雅各担任秘书。这一年他的女儿安妮死于台风之灾，对于他的家庭是一次严重打击。此后传教授课之暇，他除了支持妻子办好英华书院附属女子学校（Ying Wa Girls' School），周日在公理宗教堂用英语和汉语主持弥撒，撰写《上帝的日子》（The Lord's Day）等一类的布道文册外，还潜心翻译中国儒家典籍。

1856 年英华神学院因为经费不足人员短缺而停办，但依靠教会维持还继续授课，到了 1858 年才全部停课。面对狼藉的校园，理雅各无法控制心中的失落感，不敢奢望有生之年能再次听到学子们的读书声。英华神学院所提供的西式教育有助于培养香港社会需要的人才，也是理雅各平日宣教、布道、开展公益活动、发展教徒、联系其他牧师、教师和学子的重要场所。学院的停办就意味着他的活动范围的缩小，从感情上和习惯上都是无法接受的。同年，他因为健康欠佳再次返英治病，并利用机会与出版商洽谈他翻译的儒家经典的出版问题。此时他的前妻已经去世 6 年，经他哥哥的介绍认识了丧夫多年的汉娜·威利茨（Hannah Willetts），两人结婚后携各自女儿同去香港。这个家庭再次恢复了有主妇主理家政的生机。后来理雅各的两个女儿也加盟了父亲执着从事的教育事业，在他所创办的两所学校任教，并在香港结婚安了家。

理雅各为推动香港教育的世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多次呼吁对当时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敦请当局加大教育投资。1847 年他申请的补助书馆计划得到批准，三所中文学塾每月获得 10 港元资助，并成立了教育委员会进行监督。1860 年香港教育委员会改组为专门领导公立学校的教育局，理雅各在该局的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教育革新计划，建议停办所有的皇家书馆（接受资助的学塾），以新式的中央书馆取而代之，加强英语教学。1862 年香港第一所中央书院（公立中学）得以创建，提供现代西式教育，校长史钊活（Frederick Stewart）实行的世俗化教育与理雅各的主张不谋而合。1865 年港府办学部取代了香港教育理事会，特别邀请对于教育事业做出多年贡献的理雅各和其他同事参加港府举行的茶点招待会，以示表彰。

理雅各为华人教会医生黄宽（英文名 Wong Foon，1829 ~ 1878）等人享受与英国同事同工同酬的问题，先后与伦敦会苦苦据理力争 10 余年。

1860年后他与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1822~1864)秘密通信往来,曾在英国报刊上公开撰文反对鸦片贸易,反对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en, 1833~1885)指挥英法联军镇压太平军的暴行。那时香港台风和火灾时有发生,他为此经常四处奔走呼号,动员募捐赈灾。他还一度联合有关传教士和商会,组织上千人签名,呼吁取缔香港的赌场。

从1862年至1865年理雅各连续数年为港府培训口译和笔译人员,《三字经》为选用的教材之一。他的深厚专业修养和丰富的翻译经验使得讲座极富教育意义,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1870年理雅各荣获阿伯丁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后与伦敦会签订了三年合同,担任佑宁堂牧师。这除了宗教方面的原因外,也包含着理雅各希望佑宁堂的印刷所能够帮助出版他的《中国经典》。1871年理雅各还为给英国士兵上圣经课专门撰写了《无偿的福音》等文稿。在佑宁堂任期结束后理雅各回国途中还顺访了上海、芝罘(烟台)和北京的教会工作站,经日本和美国返英。

1875年一些从事中英贸易的英商建议牛津大学设立中国语言文学教席,聘任理雅各为首任汉学教授,牛津大学欣然应允,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愿意提供薪酬。该学院原是1352年由基督圣体会(Guild of Corpus Christi)和圣母玛利娅会(Guild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在牛津创建的一所学院。1348年黑死病在不列颠蔓延,死亡人数多达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造成牧师奇缺。因此基督圣体学院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训牧师。该学院是牛津的最小学院之一,学生大约二三十人,但是校舍建筑古色古香,学院中庭有一个17世纪建立的日晷柱,门外是一片绿草地,环境优美。副校长利德尔博士(Dr. Liddell)和东方学教授弗勒德里希·马克斯·马勒(Friedrich Max Muller)对于理雅各来校开设汉学课均表示欢迎。因为理雅各曾为马勒编撰的《东方圣书》提供过自己的译著,彼此有所了解。

18至19世纪上半叶牛津大学曾经明文规定该校学生和教师必须是国教教徒,1854年规定有所修改,但是对于攻读硕士以上课程的研究生、申请奖学金资格和指导教师仍然保留严格限制。1871年英国国会正式修改了有关条文,使理雅各得以走上牛津大学的汉学讲台。在华英国商人为基督圣体学院的汉学教学筹集资金专门成立了委员会,由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任主席。理雅各的年薪为250镑,要求他每年授课时间不少于6个月。1876年10月27日理雅各发表了庄重

的就职演说,希望汉学课程的开设有利于中英两国人民的了解与和平事业。不久之后,以香港总督戴维斯名字命名的奖学金(Davis Chinese Scholarship)正式设立,凡在汉语和中国文学学习方面成绩优秀的学生每人每年可获50镑奖学金。这是继伦敦大学之后开办中国语言文学课程的第二所英国大学,标志着英国汉学的进一步发展。同年理雅各荣获了法国儒莲中国文学奖,表彰他在翻译《中国经典》所作的卓尔不群的贡献。

1880年理雅各被提名为香港中央书院第二任校长,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二位妻子汉娜去世,使他悲恸难已。1882年他已经完全失聪,但是仍然坚持授课,每日笔耕不辍。1884年在母校爱丁堡大学校庆典礼上他被授予了神学博士学位。两年后他不幸中风,健康每况愈下,但是还以极大毅力撰写《我的一生》(Notes of My Life),继续翻译《楚辞》。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病逝于牛津。

理雅各长期在香港生活和工作,除了授课、宣教、为港人的教育奔走呐喊外,主要还是从事儒家经典的编译和注释,以及中西宗教和文化的研究和比较。朝斯夕斯,数十余载。

1858年理雅各在广州参观贡院,院中7242间考棚和肃穆庄严的考场情景使他惊诧万分。他看到了中国是一个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国度,感悟到如果传教士不了解中国文化和传统,就无法在中国开展福音传播工作。由于得到了英国鸦片商人查顿(William Jardine, 1784 ~ 1843)和颠地(Lancelot Dent)的资助,他于1841年开始翻译"四书"和"五经",以《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为总书名,从1861年到1886年陆续在香港和伦敦出版。

在理雅各之前曾经有不少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教士翻译过儒家经典,但是由于时代和译者条件的限制,那些译著的水平始终存在高下之别。一些译者只满足于对原著的字词和句子表层意义的理解和表达,翻译经验的缺乏往往使译文晦涩难懂。中外译经历史表明:在经典文献的翻译中,重要概念的含义不能只靠查阅辞典或者孤立地从某个句子本身来分析判断,而应该从辞源、文本、历史语境和译文语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况且儒家典籍最早的成书时间相距理雅各时代已经两千多年。较好的办法无疑是通读史书,不吝时日与学科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典籍中许多基本语汇的译法定位是有原创性的,这也是翻译的困难所在。作为第一个系统地研究并翻译中国儒家典籍、道教和佛教文献的英国汉学

家,理雅各正是遵循了上述原则,严谨的治学态度又支持了他的科学、求实和有责任感的译风。例如"君子"(gentleman)、"仁"(benevolence)、"八卦"(eight trigrams)、"大人"(great man)、"天"(Heaven)、"道"(Path)、"性"(Nature)、"颂"(sacrificial odes)等词,翻译看似简单,其实在反复推敲比较中不知耗费了他的多少年心血。由于中国学者帮助他熟悉并借鉴了宋明理学和晚清儒学的研究成果,使他的译文增色不少,其权威地位经受了西方汉学界后来学者的一次次挑战而不动摇。

与理雅各交游甚密的中国学者、医生、律师、神学家和太平天国领袖有:王韬(1828~1897)、黄胜、洪仁玕、罗中番(Lo Chung-fan,? ~1850)、黄宽、何进善、何启等人。如果把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的漫长庞大计划看作一项译经工程,那么,上述中国人士对于理雅各来说都是关系最密切的顾问、同事、朋友、合作者和坚定的支持者。

王韬,苏州秀才,1849年供职于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创办的上海墨海书馆,主要职责是编辑润色传教手册,但是他本人并不信教。因为上书太平军而被通缉,英国人保护他去香港避难,之后在英华书院谋得了一个职务。当时理雅各正在翻译儒家经典,需要一位满腹经纶的中国学者为他读经讲经,答疑解惑,他正是最佳人选。1867年理雅各回国治病,译经之事暂停,但是心中仍然日日记挂,于是邀请王韬去苏格兰续创大业。后来理雅各决心翻译全部儒家经典,打算退出伦敦会,以便全身心投入译事。理雅各在译经的过程中先后借鉴了王韬的《皇清经解校勘记》、《毛诗集释》、《春秋左氏传集释》、《周易注释》和《礼记集释》等著作。1870年王韬与理雅各返港后一度担任了香港《中外新报》主笔,后来又和黄胜合作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经常撰文议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1873年理雅各返英定居,临别前王韬曾撰文赞扬他的业绩,惜别依依,情谊甚笃。1884年王韬获准返沪,加盟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院,出任院长一职。可以说,没有王韬的襄助,理雅各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是不可能达到出版时的水平的。

黄胜,字平甫,广东香山人。儿童时代生活在香港,1841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学堂,喜欢代数和几何,对于西方自然科学优感兴趣。21岁时,在美籍校长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德臣西报》(China Mail)主笔肖德鲁特(A. Shortrede)、美商李启(Ritchie)和苏格兰人康白尔(Campbel)的资助下,与容闳(1828~1912)和黄宽等人一起前往美国马萨

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英文、文法、算术、哲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课程。1848 年黄胜因病返港后在《德臣西报》负责经营管理和印刷业务,后来任职于英华书院,常去理雅各家中做客,帮助他翻译儒家经典。理雅各曾在 1862 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序言》中说:"谨向教会印刷所主管黄胜君诚挚致谢,唯君之精通英语,始能称校核之职也。" 1853 年英华书院出版《遐迩贯珍》,黄胜出任监督,后来主持伦敦会在港出版机构长达 20 年,成为早期中国报业知名人士之一。1857 年香港最高法院的注册主任通过理雅各,提出以月薪 130 港元聘任黄胜为高级译员。虽然当时黄胜在伦敦会的月薪仅有 30 港元,但是考虑到教会事工更能为港人谋福利,便婉言谢绝了。1864 年黄胜应聘任江南制造局的英文教习,三年后返港继续担任英华神学院的印刷出版工作,并兼香港《华宇日报》主笔。1871 年英华神学院院印刷所关闭,黄胜联合王韬买下了全部设备,合办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他们在该报刊登大量文章介绍西学,呼吁改革。这期间黄胜还应聘帮助北京总理衙门建立书局。1873 年黄胜受容闳之托率领第二批中国学童赴美留学,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担任翻译。1883 年黄胜加入英国籍,曾任香港法院华人陪审员和香港立法局议员。黄胜对于理雅各译经工程的长期支持,既有语言翻译方面的,也有技术和精神方面的。

洪仁玕是广东花县官禄村人,洪秀全的族弟,太平天国领袖之一。他自幼苦读,五科应试落第,长期任村塾教师。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事时洪仁玕正在清远县教书。他当即组织了 50 多名拜上帝会信徒声援太平军,第二天洪秀全也派人前往接应,被清军挫败。为躲避官府缉捕他秘密进入了香港。1851 年他受聘担任德国巴设会(Basel 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瑞典籍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 1819 ~ 1854)的汉语教师,并通过韩山文认识了许多在港传教士。第二年他接受了韩山文为他的洗礼,课余常与他一起探讨基督教教义。1854 年韩山文向理雅各引见了洪仁玕,在理雅各的帮助下洪仁玕在夷馆找到了一个教书职位,自己也利用机会在夷馆学习天文、地理、历算和医学。此后四年中洪仁玕还同时受雇于伦敦会,成为理雅各的私人助手,每日为他讲经读经。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兴趣和热情,理雅各曾寄希望于洪秀全,从宗教意义上帮助他确立了"拜上帝会"的名称。由于洪仁玕的丰富知识和宽容性格,理雅各对他的才干非常敬佩,说洪仁玕是"他见过的最亲切而又多才

多艺的华人”。后来洪仁玕还把自己的兄弟细波(Sye-po)介绍给理雅各家当佣人。1858年理雅各返英治病期间,洪仁玕在湛约翰资助下到了天京。理雅各是韩山文之后与洪仁玕关系最亲近的西方传教士和庇护人。他到了天京后与理雅各之间书信不断,常把各类小册子寄给理雅各,理雅各也把洪仁玕对传教士的态度向伦敦圣教书会报告。由于长期居住在香港和上海,洪仁玕结交了许多有知识的传教士,体验了城市生活中的西方文明,理雅各和黄胜创办的《遐迩贯珍》对他的政治观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他萌生出改变宗教现状,与外邦发展友好关系、实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愿望。

何进善,字福堂,广东南海人,出生于一个贫穷家庭。他年幼时跟当印刷工的父亲侨居马六甲,曾就读于一所伦敦会办的主教学校,在一家药店当过伙计。大约在1837年他进入了英华书院,学习中文、英文、神学、几何学、地理学、天文学和伦理学,理雅各还教过他希伯来语、希腊语、英语、历史和神学。他天资聪慧,进步很快,几年后就可以流利朗读《新约》和《旧约》原著,可以用希伯来文写作。1841年理雅各开始翻译儒家典籍,何进善既是他传教的助手,也是他翻译经书的顾问。三年后何进善任职于该书院,是当时唯一的华人主讲教师。1843年何进善和理雅各随英华书院一起迁港,协助理雅各的教学和在华人中的传教工作。1846年10月,他在香港佑宁堂受封为牧师,此后长期任职于伦敦会香港分会,常往返于东莞、广州和佛山等地传教。有时每周要做三次礼拜,理雅各与何进善分工合作,把讲道内容打印出来散发,或者把圣经中的故事编成短剧表演。1846年理雅各返英,委托他管理教堂事务。何进善在注释圣经、宣扬圣道方面,对于伦敦会早期在华传教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他的足迹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广东。1861年至1865年理雅各翻译《书经》时,曾请何进善事先把原文译成英文供他参考。何进善从小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思想教育,熟悉儒家经典,反对偶像崇拜。他在一篇神学研究论文中曾经引用《孟子·梁惠王上》中的一句话:“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证明圣经《十戒》中说的“祖先罪行的天罚”的正确性。理雅各曾撰写过《何进善传》(Sketch of Ho Tsun Sheen),表达了对他的尊敬与怀念。

何进善的儿子何启,原名何神启,字沃生。出生于香港,接受过理雅各的洗礼。曾在香港中央书院就读,在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和林肯法学院攻读专业。他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大律师,从1890年至1914年历任立法

局议员，也是参加香港立法局的第三位非官职华人议员。他把许多西方新的医学技术引进到中国，先后创办了雅丽氏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为纪念其已故英籍妻子而建）和香港西医书院，还协助创办了香港大学、圣士提凡中学，建设启德机场。他在西医书院任教时孙中山正在该校学习医学专业。他热情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掩护兴中会据点的活动，还担任过兴中会的对外发言人。他是律师、医生、慈善家和教育家，著名的香港华人领袖和改革运动的倡导者，曾获得英国政府授予的爵士勋章。理雅各从何进善父子那儿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

此外，传教士湛约翰在 1852 年主持伦敦会香港分会教务工作时也帮助理雅各翻译过中国古籍。

像许多学问家一样，理雅各平日常与书本为伴，生活简朴，忘寝废食，无暇交游，言语直率，有时也固执己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英国汉学和中英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在履职方面表现出的奋志经营作风，在治学方面表现出的毅力、执著和追求，都堪称为英国汉学大师风范。

1898 年 1 月 14 日上海英文《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转载了《铁圈球锤杂志》（Pall Mall Gazette）刊登的一篇题为《汉文教授理雅各博士》的文章，作者“知情人”（One Who Knew Him）回顾了理雅各晚年的汉学研究、居家生活和为人处世，对于我们了解他在汉学领域中的辛勤耕耘和杰出奉献都很有帮助①。译文如下：

刚刚辞世的理雅各博士，享年 82，是一位非常可爱的老人。他长寿，阅历丰富，生活极为简朴。他相貌堂堂，满头银发，脸颊红润，眸子深蓝，这些与他无比慈祥的面貌并存于世人心中。他是如此正直，如此健康，生活如此敞亮，完全不像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人们会想象，他本可以在苏格兰山野的料峭清新空气中，终日漫步于长着石楠草的地方，度过人生漫长岁月。可他在牛津的晚年生活却并不是那样。他在四壁堆满神秘书籍的书房里，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几乎没有人掌握其答案的陌生学问。我曾经听说，如果他遵从苏格兰教会的旨意，早就该是苏格兰大学、阿伯丁或者其他什么大学的教授了。我不知道他对于国教的不信奉具体属于什么性质，但

① *Dr. Legge*, *The Chinese Professor* by One Who Knew Him from *the Pall Mall Gazette*, reprinted in *the North-China Herald*, January 14, 1898, p. 71.

是他在牛津那些日子里所参加的宗教活动是再普通不过的了。在以高教会派和不可知论派为个人唯一精神标志的牛津,不信奉国教让人觉得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不过那却更成为理雅各博士坚持己见的理由。一个又一个星期天,人们总会发现他端坐在一群微不足道的做买卖的会众之中,聆听着某某神甫在圣坛前的布道,比起他所掌握的简明的大学问来,神甫的宣教无疑是有点华而不实了。

他可能一直对罗马天主教感到反感,可是有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却想方设法挤进入了他的社交圈中,出乎意料地与他成为盟友。她原料想一旦他发现自己所属的教会必定感到意外,他们之间的友情也将就此结束,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他把她看作是跟自己一样的异教徒,把另类的叛教看作教派之母。事实是这位善良的老人不善于与他人结仇。

他曾经不时地因为来听他讲课的学生人数少而感到有些不愉快。既然斯莱德教授可以使教室座无虚席,为什么他讲授孔孟学说却不能呢?打算当传教士的年轻人和准备报考领事部的考生都来听他的课,但他的班很少超过四五名学生。

年复一年,他在牛津克布尔坡地3号楼的书房中埋头翻译着中国经典。墙壁四周堆满了汉籍,有《诗经》、《书经》和其他儒家典籍。这类学问是为极少数人研究的。但是理雅各博士每当想到多少年轻人前往不可胜数的中国大学去寻求圣贤智慧,人数之多,热情之高,竟使英国大学相形见绌,于是心中感到宽慰。

无论冬夏,他每日清晨三点开始在书房工作,总是晚上10点才就寝。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在酒精炉上给自己煮一杯咖啡,正当全家人都还在酣睡时就开始翻译文稿。他不像早起的人那么自以为是,要是家中哪位懒散的客人躺在床上吃早饭,他会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一定会宽容对待。他从来不曾这么懒散,使自己都觉得奇怪。

心地坦然有时也会使人陷入尴尬境地。他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可喜的是他的想法是善良美好的。有时因为失言冒犯了他人,他能巧妙地让自己摆脱困境,如同他人冒犯自己一般。有一次让他扶一位对自己年龄颇为在意的老太太下楼吃饭。"人家吩咐我,"他像个失聪的人一样大声地说道,"扶一位最年迈的女士来这里。"只见那位老太太怒冲眉梢,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失礼了,连忙用最谦恭的口吻说:"这不是,我来了,首先请来了一位妙龄少女啊!"

在政治上理雅各博士是自由派，在“国人治国”的日子里则是民族自治的拥戴者。他说，孟子教导说每个国家都有权自己管理自己。难道最保守的托利党对于多少世纪以来就存在的政见还心怀不满吗？

他常以未泯童心向人展示家里摆着的许多中国古董。都是香港友人送给他的礼物，他在那儿曾备受拥戴，因为他无法不受拥戴。

我听到有人在一次宴会上问他是否不曾接受过为他的在华使命而赠与的巨额资产。

“接受过，没错！”理雅各博士回答说，然后他谈到了使我们大为吃惊的一笔大额款项。在留出时间让我们回味之后他像往常一样继续和蔼地说道：“那是一位可爱的好老太太，不过她的事着实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所有事情都解决之后才发现她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给我，只不过是一场误会罢了。而我后来却发现自己倒该了别人数百镑的债。”

他有过许多烦恼，但是都没能破坏他的平静生活，也没有玷污他的光彩。几年前我见到他时他依然故我，满头漂亮银发，浓眉之下闪烁着一对慈祥眼睛。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赢得人心的性格。牛津的生活使人自悟，或者使人觉得枯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位生活简朴、精神矍铄的老者恰似“拉普兰之夜”的圣诞老人①一般可敬可爱。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第一卷收录了《论语》(Confucian Analects)和《大学》(The Great Learning)的译文，1861 年出版；第二卷收录了《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的译文，同年出版；第三卷收录了《书经》(The Shoo King: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的译文，1865 年出版；第四卷收录了《诗经》(The She King: Book of Odes)的译文，1871 年出版；第五卷收录了《春秋》和《左传》的译文(The Ch'un Ts'ew with Tso Chue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so Chuen)，1872 年出版。近年来海内外出版社又将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增补到七卷，增收的译文为《礼记》(The Li Ki: The Book of Rites)和《易经》(Book of Changes)。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汉学系统工程，无论从汉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中英翻译、还是从英国汉学

① 语出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拉普兰之夜”使人联想到芬兰的一个北极村，在银装素裹的平安夜乘坐八只驯鹿拉的雪橇向各家各户孩子们分发糖果和礼物的圣诞老人。

研究来看,其影响都是旷日持久的。16 世纪后曾经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英译过儒家经典,然而多数只停留在小范围个人操作,把“四书”和“五经”完整地译为典雅英文向西方读者系统介绍的,唯有理雅各一人。

理雅各的其他译著还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1852 年)、《孔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 1867 年)、《孟子的生平和学说》(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Mencius, 1875 年)、《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与基督教之比较》(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 1880 年)、《道家典籍》(The Texts of Taoism, 1885 年)、《佛国记:法显的印度和锡兰取经之行》(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ein of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 D. 399 ~ 414) in Search of the Buddhist Books of Discipline, 1886 年)等。

理雅各学养有素,学风严谨,知识渊博,译技娴熟,文字练达,在过去一百多年中被翻译界视为楷模,把他和法国的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 1835 ~ 1919)和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 ~ 1930)并称为三大汉籍翻译大师。下面以他翻译的《诗经·卫风·竹竿》为例作简要说明:

原文:59.《竹竿》

籊籊竹竿,以钓于淇。
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淇水滺滺,桧楫松舟。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译文①

With your long and tapering bamboo rods ,
You angle in the Qi .
Do I not think of you ?
But I am far away , and cannot get you .

The Quanyuan is on the left ,
And the waters of the Qi are on the right .
But when a young lady goes away ,[and is married] ,
She leaves her brothers and parents .

The waters of the Qi are on the right
And the Quanyuan is on the left .
How shine the white teeth through the artful smiles !
How the girdle gems move to the measured steps !

The waters of the Qi flow smoothly ;
There are the oars of cedar and boats of pine .
Might I but go there in my carriage and ramble ,
To dissipate my sorrow !

卫风《竹竿》是描写卫女嫁入侯门，思归故里，饱含情真意切的一首歌谣。前三组描写对于少女时代的回忆，最后一组描述同样的淇水，同样的舟楫，却不能泛舟归去，令人无限惆怅感伤。理雅各所译《竹竿》，意思转换准确。把"巧笑之瑳，佩玉之傩"译为"How shine the white teeth through the artful smiles! How the girdle gems move to the measured steps!"对仗工整，韵律铿锵，妙趣横生。考虑到原文的口语特点，译者并没有使用古雅英语，而注重帮助读者读懂并欣赏这首歌谣，风格定位准确。这样的译法，看似容易，其实不易，因为还要照顾到韵律和意境，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很难做到。汉诗平仄互协的规则无法在英译时按照对等音律转换，但是纳入四种基本英诗格式（抑扬格、扬抑格、抑抑扬格、扬抑抑格）有时是可行的。

① *The She King*, *or Book of Odes*,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4,, London: Dover Publications, 1871.

本篇译者已充分注意到英诗的节奏特点。把“女子有行”译为“But when a young lady goes away, [and is married]”,严格地说不是英诗格式。但汉语“行”是多义词,在这里是“出嫁”的意思,英语“go away”也有多层含义,因此括号中的译文兼具补充说明意思和韵律平衡的功能。

再以理雅各翻译的《易经·19卦》为例。

原文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初九:咸临,贞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六四:至临,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译文:19. Lin[①]

Lin (indicates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supposed in it) there will be great progress and success, while it will be advantageous to be firmly correct. In the eighth month there will be evil.

---

① *Yi Jing*, or *Book of Changes*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Oxford University, 1882.

1. The first nine, undivided, shows its subject advancing in company (with the subject of the second line). Through his firm correctness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

2. The second nine, undivided, shows its subject advancing in company (with the subject of the first line).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 (advancing) will be in every way advantageous.

3. The third six, divided, shows one well pleased (indeed) to advance, (but whose action) will be in no way advantageous. If he becomes anxious about it (however), there will be no error.

4. The fourth six, divided, shows one advancing in the highest mode. There will be no error.

5. The fifth six, divided, shows the advance of wisdom, such as befits the great ruler.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

6. The sixth six, divided, shows the advance of honesty and generosity. There will be good fortune, and no error.

大约在17世纪初传教士把中国的《易经》传入了西方世界，激发了莱布尼兹关于电子代码创制的想法，也启发了哲学家黑格尔辩证逻辑定律的确立。《易经》是探索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部汉籍，内容博大渊深。古《易经》只标明上经和下经（六十四个卦），现代版的《易经》常把“传”（解释）与六十四个卦并列，便于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每一个卦都有一个“彖辞”，用于说明一个卦的主旨，以天道说人事。六十四卦中每卦都有六个爻，每个爻都有“爻象”。乾卦（第一卦）和坤卦（第二卦）是《易经》中最重要的卦，其他卦都是从这两个卦演衍生而来的。“文言传”就是对这两个卦象所作的基本解释。《易经》因深奥的哲理性使其语言带上某种神秘色彩，预测未知更赋予它迷信的表象，一般的工具书往往无济于事。因此，翻译时首先必须弄懂六十四卦的结构，明白它所传递的信息，掌握专用术语的含义。理雅各显然在翻译《易经》前下过一番功夫，请教过不止一位中国学者，克服了种种困难，融会贯通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表述时把卦名与“彖曰”或“象曰”作为相关单元部分来翻译，使读者一目了然。要创译易学的一系列专用术语，难度相当大，仅此一条就是贡献。他的成功之处在于赋予那些术语专业色彩的同时，又尽量使之易懂，既贴近原意，又不

失译学规范。然而,与其说他呈献于读者之前的是深思熟虑的译文,倒不如说是一种译述,有些学者认为理雅各的译本只能用作卫礼贤的《易经》译本的补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许正是理雅各比其他译者更高明更独到之处。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是他对于英国汉学的卓越贡献,也为汉籍的翻译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对于现在和将来的汉学家、史学家和翻译家都有启迪。诚然,由于文化修养、个人体验和表达定位的差异,理雅各的翻译,特别是对于《诗经》和《易经》这些先秦作品的翻译,误译和漏译在所难免,至少有些地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比如,第19卦中的"临"是对于六十四卦之一的卦形含义("二阳于下逼进于阴)的解释,把它译为"Lin indicates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s supposed in it",不能算是很贴切很充分;把"六四:至临,无咎"("阴爻"为"六";"兑下坤上"为"临";"无咎"即"无凶")译为"The fourth six, divided, shows one advancing in the highest mode. There will be no error"也有悖逆"增词不增意"之嫌。不过,如果把他的译文中的任何失误和不足视为翻译程序中的一个开放式和讨论式环节,那么就可能更易于读者接受,对于汉学界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无形的资产。

关于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的译文特点和得失,香港浸会大学费乐仁教授在他的《十九世纪儒家玄学术语及其汉语和苏格兰语之间的关系》[①]有过这样的评论: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1861年至1872年初版,和1893年至1895年部分修订后的再版)在宗教和哲学方面都是19世纪对儒家传统译释的分水岭。被那些承认理雅各巨著意义的人所忽视的,是支持其哲学观点的苏格兰'常识性'的现实主义。正是从这一哲学传统及其苏格兰新教人文主义进步的联系中,理雅各确定了儒家玄学术语的具体翻译(以及后来的重译)范畴。此外,这些术语还固化在理雅各在每页译文的脚注所作的更为复杂的评述结构中。……苏格兰现实主义新亚里士多德词汇的适用性和

① *19th Century Ruist Metaphysical Terminology and the Sino-Scottish Connection: Evaluating the Hermeneutic Relevance of this Connection in James Legge's Chinese Classics* by Lauren Pfister, reprinted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ng Western Knowledge Into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East Asian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Gottingen 6 ~ 9 December, 1999.

译释，对于一些最基本儒家玄学术语的翻译是有影响的。比如，用“principle”（原则）、“truth”（真实）和“duty”（职责）来翻译“道”，表明了这一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倾向，而用“God”（上帝）来翻译“帝”和“上帝”，即便在苏格兰现实主义学派的自然神说法中有充足的根据，也让人觉得特别容易引起争议。

1898 年 1 月 28 日的《北华捷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理雅各教授》的文章①，对于这位英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

关于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系列，作者介绍说：“牛津的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了收录《中国经典》部分内容的新版本，还将印行完整的版本。‘四书’为两大卷，《书经》、《诗经》和《易经》三大卷，《春秋》和《礼记》共七卷，装订起来总共为八开本的十一大卷。除此之外，在《东方圣书》中还有两卷道家著作，包括《老子》和《庄子》以及《太上感应篇》。这些译本对道教及其哲学进行了生动的介绍。理雅各的学术研究是一丝不苟的，但是他的思想并不深奥。在《道教入门》中他用了一章篇幅说明道教始于老子之前，第二章探讨了道教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以及两位作者著作的编排情况，第三章论证了‘道’的意义和道教要诣，第四章介绍了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两位大师的评价，第五章是对《太上感应篇》的介绍。这些章节提供了值得了解的生动事实，雄辩地说明了作者撰著鸿篇巨制的能力，以及面面俱到相互衔接的初衷。”

关于理雅各的学术品格，作者写道：“他身上的高贵品质使他对此具有坚定信心。他充满激情，能用完整的、令人信服的切实思维的概括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在香港佑宁堂的神坛上关于圣经真谛的富于争辩的陈述吸引了法学界的听众。他那中文翻译家的准确性，即便对于喜欢通过挑剔无名学者来表现自己批评才能的人来说也是无懈可击的。在中国文学翻译的准确和博览群书方面，儒莲就像理雅各一样，因为他需要哲理性的洞察力。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法国人能像儒莲那样如此广泛涉猎中文书籍，连他都对理雅各的翻译作出了高度评价。威托玛勋爵在剑桥大学的继任翟理斯教授也跟儒莲一样热情地赞扬了理雅各的翻译技巧。……理雅各对于批评从来不作超过三言两语的答辩。他不吹毛求疵，本性善良，

① *Professor Legge*, *in the North-China Herald* of January 28, 1898.

从不放任自己。他有苏格兰式的幽默感,性情温厚。"

关于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经典》方面的贡献,作者概括说:"为什么需要从哲理的角度来研究汉语?汉字、中国的早期哲学、文学作品的性质与潮流以及文明之初的特点,都可能源于西方。但是理雅各把这些要探讨的问题都统统抛置一边,而只做了一件事:在地球这方存在着最古老、人口众多的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文学。他说,为了传教士和各种专业的学者,我将把中国最优秀最古代的作者的著作忠实地翻译出来。他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二、汉语拼读方案设计者威妥玛

威托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 ~ 1895)生于伦敦,在哈罗中学毕业后前往剑桥三一学院完成大学学业。他的父亲是皇家高原团的韦德少校,1838 年为他在 81 团谋得了一个军官职位,1839 年威托玛转入了高原 42 团,军务之余自学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他曾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被晋升为陆军中尉,1842 年 6 月随军驻港,后调至长江防务。1845 年他被香港最高法院聘为粤语翻译,第二年任商务监督德庇时的汉文秘书助理,1852 年被任命为驻沪副领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廷组建三人关税委员会,威托玛被聘任为税务司。1855 年他担任了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包令(John Bowring, 1792 ~ 1872)的汉文秘书。1857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后他作为统军代表额尔金的汉文秘书,多次参与天津条约的谈判,曾陪同卜鲁斯(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 1814 ~ 1867)前往大沽口交换天津条约批准文件。威托玛自额尔金返华后继续在他手下任职,还曾陪同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 1828 ~ 1885)前往通州安排营地。他也是北京外交使团成立初期的汉文秘书。1864 年卜鲁斯返英,威托玛为英驻华使馆临时代办。1869 年至 1871 年他担任英驻华使馆公使,1875 年被封为爵士。

威托玛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是长期从事职业外交,仕途一帆风顺,跟中国人打交道时以态度骄横闻名。在华四十余年,公务之余博览群书,对于汉语和中国文化有独到研究,写过不少文章,编撰过英汉辞典。1883 年回归故里,三年后向剑桥大学图书馆东方部捐赠了中国文献 4304 册,1888 年被聘任为剑桥大学首任汉文教授。去世时 77 岁。

他的主要著作有:《寻津录》(Book of Experiments, 1859 年)、《语言自迩集》(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全四册,1867 年、1886 年、1903 年再版)、《文件自迩集》(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s of Chinese, London:1867)、《汉字习写法》(A Set of Writing Exerciese, designed to Accompany Colloquiual Series of the Tzu Erh Chi, 1867 年)、《北京音节表》(Peking Syllabary, 1895)等。

《语言自迩集》的书名取自《中庸》:"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1876 年 5 月 16 日威托玛在该书的《一版序》中说:"本书为政府译员而编写,目的是为帮助他们学习公务口笔语,包括口语和公文两个系列(《语言自迩集》和《文件自迩集》)并附译文答案。第一版的《语言自迩集》分四册:一、口语体课文和包括全部生词的附录;二、练习答案;三、音节表;四、汉字练习。"威托玛在序言中引用了艾约瑟 1864 年在上海出版的《汉语口语语法》一书中的话称,"官话"就是"官场语言",官话有南、北、西之区别,以南京、北京和成都为其标准音。因为外交使团都在北京建馆,使馆译员应该学习北京话。二十多年前许多外国人按照南方音拼读汉语。艾约瑟认为马礼逊在编写第一部《华英字典》时是用过时的发音给汉字注音。麦都思在马礼逊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但基本维持原样。他认为马礼逊的方案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已为大家所熟悉。卫廉士(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 ~ 1884)和马儒翰曾对马礼逊的《华英字典》重新作了编排,但只是拼写方式上的改进,并不比原方案更准确。罗伯聃是北京话说得最好的英国人,按照他的意见威托玛学习了北京话,并得到了密迪乐的大力帮助。密迪乐在不久以后发表的有关汉语和中国行政的《漫笔》中首次提出了拼写北京话的方案。不过除了"hs"的用法外,威托玛没有采用他的方案。他说最初遇到的困难是汉语著作中没有一个现成的拼读方案可供参考。中国知识分子用反切法拼读,汉语方言的韵书都按韵头和韵尾编排,只有懂汉字的人才能认读。主要的不足之处是韵书用语多半为成语,发音古旧,用于拼读的声母和韵母对于中国人来说仍是未切分因素,对于学习者的耳目均无启迪作用。威氏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八年多,1855 年一位中国学者给他提供了一份北京音的语音表,他的老师应龙田又按《五方元音》给他编写了一个生词表。该书所收汉字一万多个,按五个声调排列,每一调类的例字都包括 12 个声母和 20 个韵母。应龙田对每一汉字的读音一一作了

订正,去掉了第五声(入声)。威托玛经过七年使用,认为方案基本正确,而且所收的口语用字甚严。1861 年他的老师去世后几位中国学人又帮助威氏编写了另一个口语用字表,付印前英国使馆汉文秘书查尔斯 ·俾斯麦(Charles Bismark)帮他进行了校核。

18 ~19 世纪外国传教士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汉字读音和方言发音设计过数十套拉丁字母拼写体系,俗称为"辣体"(即"拉丁体")。威妥玛拼读方案出版后受到中外知识界的重视,也引来了多方质疑,他的学生翟理斯后来在编写《英汉辞典》时对这套拼法加以修订和简化,形成了"威托玛 - 翟理斯"拼写法。应该说该方案是西方传教士和学者设计的所有拼读汉语系统中较为科学的体系,也是中西学者共同研制的成果。西方人把我国地名、人名、商标等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时曾广泛使用过威托玛 - 翟理斯的方案,在翻译界也沿用了数十年,但是从语音学和翻译学角度看该系统有许多不准确之处,存在着认读和书写等方面的种种不便和问题。1957 年我国国务院通过、1958 年人大批准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语言学家按照科学的语音学原理制定的专门拼写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的系统,在新闻、出版、教育和外语翻译中被逐渐推广使用。1977 年 9 月 7 日在希腊雅典召开的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建议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的国际拼写标准。1979 年 6 月 15 日联合国秘书处正式下达文件通知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在各种拉丁字母文字中转写中国人名、地名的国际标准。1981 年 8 月 1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也发出国际标准 IS07098《文献工作——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从此威托玛 - 翟理斯拼写体系退出了中国内地的出版、新闻、教育和翻译历史舞台,汉语拼音作为文献工作中拼写有关中国的名称和词语的国际标准地位得到了完全的确立。

三、伦敦大学汉学教授道格思

道格思(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 ~ 1913)汉文通事出身,学养有素,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他于 1858 年来华,先后在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和英国驻华公使馆担任过汉语通事,还担任过缅甸中国事务顾问。1865 年回国后他任不列颠博物馆中文藏书部助理,后升为主任。19 世纪 40 年代末兼任伦敦国王学院汉学教授,1903 至 1908 年被伦敦大学正式聘为汉学教授。他的主要著述有:《非基督教的宗教体系:儒教和道教》

(Non-Christian Religious Systems: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1879 年)、《中国》(China, 1882 年)、《不列颠博物馆中国藏书、文稿、绘画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87 年)、《华语鉴》(A Chinese Manual——A Condensed Grammar with Idiomatic Phrases and Dialogues, 1889 年)、《中国传奇》(Chinese Stories, 1893 年)、《中国社会》(Society in China, 1894 年)、《李鸿章》(Li Hung Chang, 1895 年)、《1506 年至 1912 年的欧洲与远东》(Europe and the Far East, 1506 ~ 1912, 1903 年)等。

《华语鉴》是道格思的一部重要汉语著作,1889 年的版本由伦敦桑普森·洛和马斯顿有限公司(London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Ltd)出版,英国赫特福德斯蒂芬·奥斯汀父子印刷公司(Stephen Austin and Sons, Printers, Hertford, Britain)印行。全书 64 开 376 页,铅印。大概因为技术问题,汉字部分多处挖补。作者说该书是专为来华的英国军人、文职官员和传教士而编写的。课文中的句子多半选自当时中国流行的日语教材,因为他认为那些都是基本句式,汉语语法模式则主要套用英语语法。全书共分二十七章,所使用的汉语拼音系统与威托玛式基本相同,但是与其他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他以词为单位拼写而不是按音节拼写。

道格思在该书中对于汉语的起源和特性、汉字和汉语语法体系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论述。他认为汉语属于乌格罗 - 阿尔泰语系(Ugro-Altaic Family),特点是主语在动词前,形容词在所修饰的名词前,当两个名词连用时其中一个是属有格。他还武断地认为汉族是大约在公元前 2300 年从西南亚移入中国的,携入了巴比伦文化;中国人从原住地的居民处所学得的艺术之一就是书写艺术,构成汉字的粗俗笔画和符号可能是原来一些土著人用来表达思想的符号;中国人不懂语文学,缺乏研究评价文字的能力,因此只能研究汉字的后期形式,即:象形、指示、会意、转注、假借和借声(形声)。关于汉语语法,除了有套用之嫌外,书中的理论还常有前后矛盾之处。例如他谈到两个名词连用时其中一个是属有格,但是谈到汉语名词时又认为名词没有格的变化,因此生造出"外国的人"和"中国的人"之类的词语。他还提出了"汉语工具格用动词性助词来表示","夺格用介词来表示"的理论,例如:"他拿棍子打了他"、"他将一根枪杀死了他"、"你从哪里来了"等。作者又说,汉语形容词无性数格变化,都是表示性质和关系的名词,只是在句子中的位置使它变成了形容词,或者在表性质的名词后加上

关系词和关系代词。口语中在形容词后加“的”使之起谓语作用。一些由两个形容词和两个名词构成的词组,第一个形容词用来修饰第二个名词,而第二个形容词则用来修饰第一个名词,例如“阴阳清浊”(The *yin* principle is impure, and the *yang* principle is pure)。其实这通常是两个名词性并列成分构成的词组,道格思错误地把它看作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尽管书中的许多大胆观点没有令人信服的语料依据,不过从整体上看该书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系统汉语著作,有不少创见和独到分析,使当时学习汉语的西方读者能找到有利于比较和理解的实例。

诚然,就像当时西方学者的其他同类专著一样,《华语鉴》中也存在不少病句和误译的句子,例如:“我的贱恙颇好”(My lowly ailment is rather better)、“我雇的房子”(The house of my hiring)、“他卖不论什么东西都不好”(Whatever things he sells they are all bad)“拿那个土扫拢来”(Take the dust and sweep it together)、“得罪了请免”(I have sinned, please forgive me)、“不曾拜大和尚,未知法体如意么?”(For a long time I have not paid my respects to the greatest priest (Buddhist). I do not know whether 'the body of the law' is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inclination, ay?)、“闻道令爱出嫁,配着名郎门当户对,谨贺谨贺”(I hear it said that your honoured beloved one (i. e. daughter) is going to be married, and mated to an illustrious youth, and that the 'mentanghu' (i. e. family relationships) agree. I respectfully congratulate you, I respectfully congratulate you)。

《中国语言和文学》(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是1875年5至6月道格思在皇家学院的讲稿,由伦敦特鲁布纳出版社(Trubner & Co.)出版,斯蒂芬·奥斯汀父子印刷公司印行。全书收录了道格思的两个讲稿:讲稿一(Lecture 1)和讲稿二(Lecture 2),内容广泛,涉及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汉语历史的发展进程,汉语语音、汉字和语法特点的介绍和分析,对英国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历史的回顾和现状的反思等。第三部分与作者在《华语鉴》中的论述观点基本相同。

关于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性问题,道格思认为:尽管在历史上非汉族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势力曾统治过中国,但是对中国人的生活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广州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旗人驻军都被当地人同化了。一世纪佛教确实从印度传入了中国,但是就像蒙古人和满人一样都不

得不被吸纳和同化。汉语为四亿人所使用，中国文学可以上溯到相当于大卫王时期，在诺曼底征服者入侵不列颠之前就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汉语是英国人与四亿中国人进行交际的唯一手段。

谈到汉语的性质和特点时，道格思说汉语和藏语、交趾支那语、缅甸语和朝鲜语都属于一个语系，通常被描述成最古老的单音节语言，它的每一个词都是词根，没有曲折变化和胶着，没有格，没有字母系统，书写时使用数千个互不相同的符号。这些特点对于比较语言学家很具诱惑力。有人说汉语是一种最原始的语言，但是进一步的研究仍未证实这一理论的正确性。虽然汉语的书写形式使其自身发展受到限制，但是它形成于汉民族引以为自豪的伟大时期，即使今天每一个中国人回顾他们的成就时都会认为汉语仍包含着优秀语文的正确性。通过对汉语的深入了解可望在语文学方面获得巨大收获。由于艾约瑟先生的努力，学者们才了解到：在中华帝国的哪个省份可以找到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了的古韵母 m、k、t、p，以及从孔夫子时代到现在仍在汉语语音中存在的 d、b、z、dz、zh 等声母。

也许是为了给讲座增加趣味性，也许道格思本人掌握了欧洲人学习汉字的许多笑料，在谈到汉字时他不无风趣地说：汉字“皇”是一个会意字，原来写法由“自”和“王”两个部件构成，因为古人曾经说过“先为己主，才为人主”。后来这个汉字被写成了“皇”。最近《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在一封信中谈到，蒙古人曾把那个“王”直译为“察臯汗”（Tchagau Khan），而俄国人却把它解释为“白人沙皇”。卡勒里（Callery）曾引用一本耶稣会士的著作说，汉字“船”，从宗教角度看反映了圣经中所说的那次洪水，因为它由“舟”、“八”和“口”组成，明确指出诺亚方舟上的八个人。汉字“婪”由“女”和双“木”构成，也与原罪有关，说明了我们的第一位祖先置身于生命与好恶之林时如何被一种强烈的诱惑所征服。当年西方传教士对汉字的这种解释无疑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也是早期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真实折射。

道格思在讲座的开头和最后都对英国当时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英国每年与中国的贸易额高达 4000 多万镑，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大于其他欧洲国家，但是英国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却举步维艰，落后于法国和俄国，几所名校的汉学教席空缺多年，人才流失，知名的汉学家寥若晨星，令人担忧。他说：“学习汉语的困难随着未知事物的增多而被夸大。该是更好了解这一语言的时候了。在当今世界我

们不能冷落这样古老的语言,否则将如同轻视古老的西方语言一样。”

如果说道格思在那为期两个月的汉学讲座中的一些观点明显存在着历史和学科的局限的话,那么他对于英国汉语教学的关切可以说是真诚的,批评也是中肯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呼吁确实起到了推动和鼓舞的作用。

四、科技翻译家和教育家傅兰雅

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出生于英国肯特郡海斯镇的一个清贫牧师家庭。中学毕业后他就在一家酒厂当工人,每天的差事是打扫卫生、管理工具、擦皮鞋。他的少年时代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和商人越来越多,他常有机会听他们介绍在中国的见闻或者阅读到此类文章。在他童蒙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既遥远又神秘的东方国度,向往之心油然而生。渐渐地,凡是有关中国的书籍他都要想方设法弄来看,在学校写作文也总喜欢以中国为题材,还常常让母亲给他做大米饭吃。后来他得到一份奖学金得以进入伦敦的海勃利教育学院(Highbury Training College)学习,1860 年完成了大学学业。

早在中学时代傅兰雅就在圣公会教堂接受过洗礼。1861 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被英国圣公会(Anglican Church)派遣到香港圣保罗书院(St. Paul's College)任校长。该校的前身是 1841 年由英国圣公会派驻香港的第一任教区牧师史丹赖(Rev Vincent Stanton)创办的英华学堂(Anglo-Chinese School),中国幼童在此接受英语和汉语教育,只有一位教员和 9 名学生。后来学生人数扩大到 33 人,不幸的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却死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孟加拉部队的印度士兵哗变中,该校便改为英语学校,傅兰雅上任后才恢复了双语教学。他除了负责学校的全面管理工作之外还教英语,日复一日对香港生活和中国人有所了解,渐渐地融入了当地的社会。九龙湾的浴血残阳,教会医院的穷苦病人,衣着褴褛的街头小贩,无不引起他对不公历史的怨恨和对于未来岁月的憧憬。这是他的工作与神职机构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阶段。

1863 年傅兰雅受聘于京师同文馆。那是晚清时期一所培养翻译和外交人才的洋务学堂,对外英文译名为 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1861 年由奕䜣奏请设立,1862 年 8 月同治皇帝批准筹建,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又称"总理衙门"或"译署")。该馆先后开设了英文馆(1862年)、俄文馆(1863年,原俄罗斯文馆裁撤)、德文馆(1871年)和东文馆(日文馆,1897年),原先只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后来扩大到15~25岁的满族和汉族学员以及部分年龄稍大的学员。原定学习期限为三年,1876年后学习外文、天文、化学和测地的学员学制增至八年,通过汉译教材学习上述科技课程的大龄学员的学习期限则为五年,学员人数最多时达120人。

傅兰雅是该校继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 1826~1907)之后的第二位英语教习,每天教授两小时的英语,年俸大约1000两银子。实际上这一时期他的教学工作不只是英语,也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作为一位学有专攻思想敏锐的年轻人,他从所接触的学子、教材和复杂纷纭的中国社会中受到了启发,真切地感悟到处在由封建帝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转化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和中国年青一代对科学技术的热切追求,这启迪了他对于中国教育走"格致之路"的思考。他后来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曾经这样写道:"盖中西久无交涉,所有西学不能一旦全收,将必年代更迭,盛行格致,则国中之宝藏与格致之储才,始能焕然全显。考中国古今来之人性,与格致不侔;若欲通变全国人性,其事甚难。如近来考取人才,仍以经史词章为要,而格致等学置若罔闻,若今西人能详慎译书而传格致于中国,亦必能亲睹华人得其大益。虽不敢期中国专以西学考取人才,然犹愿亲睹场中起首考取格致等学,吾其拭目望之矣。"①

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由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推荐到京师同文馆执教,后来晋升为总教习(校长),掌管教务达30年之久。丁韪良来到京师同文馆之后的第二年傅兰雅辞去了教习职务,离开北京到上海任职于一所教会学校。该校原是道光年间办起来的一所基督教男塾,后来扩大并改名为英华学堂。学生多半为商界子弟,主课为英语,同时也修汉语,学制7年。学校得到珠海华侨唐廷枢(上海广肇会馆创始人之一)等人的积极支持。1858年郑观应(1842~1921)在上海英商开办的保顺银行当雇员时就曾在该校学习英语,并"研修泰西政治实业治学"。1865年7月12日上海英文《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刊登该校董事会有关办学方针的决议称:该校"将要认真教

① 参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三章),传引自罗新璋编《翻译论集》第223~22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授英语。学生在校期间,如果英语熟练,条件许可,还可对其他课程进行用英语教学。""所学习的宗教信条,必须同英国教会的教义相一致,但在教学当中不要把宗教过分突出。"[①]傅兰雅认真执教,并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学校的宗教色彩。在授课之余努力学习汉语,广泛涉猎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书籍。但是该校的校董会主要成员是西侨,英国圣公会的影响无处不在,他感到了一种压力,于是于1868年5月辞职。

傅兰雅离开上海英华学堂前两年曾兼任《上海新报》的编辑。该报创刊于1861年12月,被认为是《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②]的中文版,主要刊登译自《字林西报》的国际新闻和内地消息,也刊登一些有关上海外侨生活、宗教活动、租界要闻和物价船期之类的报道。1867年该报刊发了合信的《博物新编》、裨治文的《联邦志略》和伟烈亚力的《重学》以及该报编辑部的组稿《西算学》等科技读物。这种沟通中西社会提倡新思想新潮流的编辑工作正是傅兰雅所喜欢的,对于他在英华学堂的治校思想和后来他所选择的世俗化道路都有很大的影响。他曾在一篇时评中建议清政府遴选一批20岁左右的学员专修英语,择机派往他国深造。这一主张在当时算是相当前卫的了。但是1872年上海《申报》创刊,《上海新报》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不得不于1872年年底终刊。

傅兰雅在英华学堂任教期间与上海学界结交甚广,曾与中国近代化学先驱徐寿(1818~1884)父子和数学家华衡芳(1833~1884)等学人过往密切。徐寿江苏无锡人,出身破落地主家庭,虽然是一位落第童生,却也饱读诸子百家,对于音乐、几何、重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和电学等近代科学书籍都广泛涉猎,撰写过《医学论》、《汽机命名说》、《考证律吕说》等著作,译书13种。他与华衡芳一度被聘任为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工程师,晚年仍倾注精力翻译西书,传播先进科技。其子徐建寅(1845~1901)17岁随父到安庆军械所,参与黄鹄号轮船和轻(氢)气球的设计制造。后奉调江南制造局,1879年以驻德参赞身份在德国、法国和英国考查造船厂,订购拟作北洋水师主力舰的定远号和镇远号,为富国强民理想奋斗毕生。

---

①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2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字林西报》原名《北华捷报》,英商奚安门1850年8月3日创办,1951年3月31日终刊,1864年6月由周报改版为日报,是上海最早的英文报纸,英国记者詹美生(R. Alexander Jamieson)、华美德(Marquis L. Wood)、傅兰雅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曾先后任总编。

华衡芳生于江苏无锡荡口镇，从小喜欢数学，熟读中国古代《周髀算经》、《算法统综》、《九章算术》、《数理精蕴》等典籍。傅兰雅的身边除了许多熟悉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西方传教士朋友外，也有不少像徐寿父子和华衡芳这样知识渊博思想活跃的中国学者，这使他在上海三十多年的工作充满乐趣，开拓了学科视野，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提高了汉语水平，坚定了个人世俗化的信念，在实现自己的追求中得到了鼓励和快慰。

同治四年（1865 年）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建了一家大型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局内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在我国洋务运动时期曾经有两个影响较大的官办译书中心，江南制造局是其中之一，主要翻译科技图书，也兼及社会科学书刊，译员由傅兰雅、林乐知、李善兰（1811 ~ 1882）、徐寿、华衡芳、徐建寅、钟天纬（1840 ~ 1901）、贾步纬（1840 ~ 1903）、李凤苞（1834 ~ 1887）、赵元益（1840 ~ 1902）等中外人员组成。其他机构，如：福州船政学堂、广学会、益智书会、科学仪器馆、墨海书馆、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等，也翻译了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但是范围和数量较小，其中不少属于宗教人士的译著。1860 年以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洋务派译书机构逐渐成为全国西方科技书籍的引进和翻译中心，先后翻译出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一百多种，图书数十种，还有几十种图书虽已经译出但是还未出版。

1862 年曾国藩奉同治皇帝令推选熟知西法之学人才，将徐寿和华衡芳召至安庆“令考究泰西制造与格致所有益国之事”。1867 年徐寿和华衡芳奉命选购并翻译西方科技图书，徐寿请傅兰雅协助购买，两人情谊日深。1868 年傅兰雅正式应聘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持馆务，月薪白银 250 两。1871 年傅兰雅与徐寿次子徐建寅合译《运规约指》，两人配合默契，译著刊刻后备受关注，得到了曾国藩和徐寿认可。

1869 年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又名“上海同文馆”，是 1863 年李鸿章奏请仿效京师同文馆在上海设立的外国语文学堂，招收 14 岁以下学童专习西文和自然科学，学制三年，毕业后从事洋务工作。因与江南制造局所设翻译馆目标相类，所以上海江海关道奏请合并。傅兰雅与林乐知和美国传教士金楷理（Carl T. Kreyer）等人在此同时肩负教习、编书和译书多项重任。他自知只受过大学普通教育，知识有限，因此不惮劳碌，灯下苦读，奋志经营，辛勤履职。他来华三年后在北京与安娜·罗尔斯女士结婚，因为公务缠身无法顾家，多有遗憾。其妻不幸于 1879 年去世，从

此又孑然一身。他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记述译书生涯时曾感慨地说过:他与其他西人"常居局内,专理译书,故人远处,无暇往来;而且水土为灾,不胜异乡之感,终朝一事,难禁闷懑之怀。然而多年敏慎,风雨无虚者何也?盖以为吾人于此分所当耳。况上帝之意,必以此法裨益中国,安可任意因循,违乎天耶!是故朝斯夕斯,忍耐自甘,所以顺天心耳。"①

1874年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倡议建立一所能传播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格致书院,翌年傅兰雅以董事会董事(当时有华董和西董各4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创办工作。"格致"取名于《礼记·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19世纪后与西学声光化电等相联系,成为自然科学的代名词,格致之学也成了富民强国的科技之路。1876年6月22日格致书院在上海公共租界北海路正式开院,内设格致室、知新堂和书房。后来因为人事变动和经费紧缺等原因一度陷于停顿。1879年书院在《万国公报》和《申报》上刊登招生公启:只要每年交纳40金就可参加西语、算学、化学、采矿和机器制造课程的学习。傅兰雅和徐寿、华衡芳等学者组织了西学知识系列讲座,求学者人数日众。1884年徐寿病故,傅兰雅特邀从香港返沪的王韬(1828~1897)出任院长。傅兰雅和王韬设置了四季考课和春秋特课,邀请李鸿章、郑观应、盛宣怀(1844~1916)和薛福成(1838~1894)等社会名流命题考试。命题范围以西学为主,旁及洋务、时事和史论。应课者每次过百,除格致书院肄业生外还有广方言馆学子,以及来自天津、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诸多省市留心时务的士子。课卷评定名次,辑录成册为《格致书院课艺》,并刊行传世。这种课考从1886年至1897年例行不辍,格致之学从此风气大开。1895年傅兰雅为了鼓励人才振兴格致,同时也为了广开财路,在格致书院开办了周六夜校班,设置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和制造六门课程,均以算学入手。他本人亲任算学教习,并指导化学试验。满一月则面试,一门考核合格后可以改修其他课程。就学者通常有三四十人,深受社会各阶层欢迎。

由傅兰雅具体负责管理的格致书院图书馆是一所新型的图书阅览中心,陈列了包括西方科学书籍、各国史志、报纸期刊、经史子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译新书,还有天球仪、地球仪、温度计、电报装置、机器模型、五金

①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三章),《翻译论集》第224页。

矿石标本，以及火车、枪支、大炮和钢结构房屋的照片。该馆有偿对外界开放，对于广大市民读者了解世界、研究科学、启迪心智，帮助极大。

格致书院还开办了一家名为“格致书室”(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ot)的科技书店，出售中外学者的科技著作和各类期刊，从开业时的371种发展到两年后的878种，还代销画像、地图、仪器、印模等物。头三年内就销售图书15万册，获利17000多银元，几年后又在北京、天津、沈阳、烟台、福州、厦门、香港设立了分销处，售书逐年增加，业绩非凡。直到1911年傅兰雅才将格致书室产业转让。

1875年8月傅兰雅得悉由丁韪良和艾约瑟在北京主编的《中西见闻录》即将停刊，便决定自筹资金自任主编在上海创办第一种科技期刊《格致汇编》。1876年2月期刊与读者见面，第一期英文名为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第二期更名为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其间因傅兰雅送妻子返英、临时担任中国驻英公使郭嵩寿秘书以及出版经费欠缺等原因先后于1878年3月和1882年1月停刊。《格致汇编》于1892年终刊，历时7年共出版60卷。原来每月出版一期，1890年后改为季刊，由《申报》馆铅印，双栏线装。每期栏目包括算学奇题、格致杂说、互相问答、博物新闻和披阅新书，注重介绍西方的科技发明、科学家生平事迹、自然现象、医药卫生和新技术新产品，内容丰富，语言通俗，图文并茂，此外还刊登格致书室和西方科学仪器制造商的一些广告。“互相问答”专栏独具特色，深受读者欢迎。该栏主要刊登各地读者来信，询问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科技知识，例如：火油除臭、奶酒酿造、量脑法(智商测试)、催花早开、测光仪、旋风成因等，涉及范围甚广。傅兰雅均一一作答，或者请人专文回复，数年内先后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300多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敢为天下先，对于普及现代科技知识起到了推动作用。《格致汇编》除发表译自英、美、法等国科技杂志的“格致要端”外，也发表中国学者和西侨学人的科技文章，介绍日本的科技之路，探讨中国的格致前景。在刊发的9篇重头科技译文中，除《有益之树易地迁栽》一文为美国医生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所译外，其余皆为傅兰雅本人译作。这8篇译文是：《格致略论》、《算器图说》、《日本效学西国工艺》、《汽锤略论》、《韧性玻璃》、《印布机器》、《轮锯图说》、《西国造糖法》。该刊主要撰稿人还有丁韪良、范约翰(John 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1830～1917)、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艾约瑟和慕维廉等。徐

仲虎(中国驻德参赞)和徐雪村也为该刊写过文章。第一期发行3000册,短期内就销售一空,不得不重印以飨读者。发行点由最初的24处增至80多处,除了京津沪、东南沿海省份和长江地区外,还远及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格致汇编》是傅兰雅呕心沥血的杰作,所传播的现代科学思想和观念在中国知识界和海外华人中影响深远。

上海格致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傅兰雅和中国学人卓识远见,声名远播,功不可没。后来由于王韬病故,傅兰雅移居美国,庚子赔款引发的社会动荡,使得格致书院逐渐失去昔日之辉煌。1911年停办后由上海租界工部局接管,1913年改名为格致公学,结束了三十余载的历史。

傅兰雅居沪几年后学术活动逐渐频繁,不久又投身于益智书会。当时中国的教会学校多半都沦为圣经班,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和课程表,教学内容随意性很大。随着西方新教势力在中国通商港口城市的扩大,教会学校的教材问题越来越突出。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由傅兰雅负责编写初级教材,林乐知负责编写高级教材,内容涉及教义、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历史、生物和体育等科。至1886年该会先后编写出版了104种教科书和数十种教学挂图。傅兰雅负责组织编写了26种,其中12种是有关科学方面的,5种为附有手册的科学知识挂图,8种为科学须知,均为教会学校所采用。有些非教会学校也闻风而至,争相购买,反响热烈。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会议在沪召开,决定把益智书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傅兰雅被推选为委员。1893年他担任英文《教务杂志》教育栏编辑,1895~1896年被推选为中华教育会执行主席,分管教育事务。

此时傅兰雅已经变成一位潜心译著,热心格致新知,关注科技普及的翻译家和教育家,神职色彩逐渐淡出了他的在华生活。

傅兰雅一生译书129部,其中57部为自然科学,48部为应用科学,14部为军事科学,10部为历史和社会科学。他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编译二十八年(1868~1896年),先后译书77种,约占当时全馆所译图书的五分之二。从1877年至1886年傅兰雅还为益智书会编写了24种教科书,其中科学方面的12种,手册和挂图4种,科学须知8种。傅兰雅离开中国赴美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路易斯·阿加西斯东方语言文学教学职位以后,仍继续为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籍14种。他直接参与了购书、译书、编书、出版和发行的各个环节,对于选题的确定、书目的审阅、译名的定名、

译稿的推敲、译论的归纳都有独到的观点和重要的建树。

傅兰雅的主要译著①

译著书名	原作者和书名	合译人	编刻年代
《微积溯源》	Fluxions by W. Wallace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华衡芳	1874 年
《代数术》	Algebra by W. Wallace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华衡芳	1873 年
《代数难题解法》	A Companion to Wood's Algebra	华衡芳	1879 年
《代数须知》	Algebra (Outline Series)		1887 年
《画法须知》	Mensuration (Outline Series)		1887 年
《三角须知》	Trigonometry (Outline Series)		1888 年
《微积须知》	Calculus (Outline Series)		1888 年
《曲线须知》	Conic Sections (Outline Series)		1888 年
《三角数理》	A Treatise on Plane and Spherical Trigonometry by J. Hymers	华衡芳	1877 年
《决疑数学》	Probability by T. Galloway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华衡芳	1897 年
《算式解法》	Algebra Made Easy by E. J. Houston	华衡芳	1899 年
《数学课题》	Mathematical problems		1895 年
《数学理》	Elements of Arithmetic by A. de Morgan	赵元益	1879 年
《算式集要》	Mensuration and Practical Geometry by C. H. Haswell	江衡	1877 年
《运规约指》	Practical Geometry by W. Burchett	徐建寅	1870 年
《重学图说》	Mechanical Powers		1885 年
《重学须知》	Mechanics (Outline Series)		1889 年

①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工程教育档案文献选展《江南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傅兰雅》和马祖毅著《中国翻译史》(上卷)中的英文资料校核编写。傅兰雅译著中未查考到原著英文书名的暂未列入此表。

《重学水学气学器说》	Scientific Handicraft by J. J. Griffin		1894 年
《电学》	Student's Textbook of Electricity by Henry M. Noad	徐建寅	1879 年
《电学纲目》	Notes of Course in Electricity by J. Tyndall	周郇雨	1894 年
《电学图说》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1887 年
《电学须知》	Electricity (Outline Series)		1887 年
《化学鉴原》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hemistry by D. A. Wells	徐寿	1871 年
《化学鉴原续编》	Chemistry, Inorganic and Organic, with Experiments and a Comparison of Equivalent and Molecular Formal by C. Bloxan	徐寿	1875 年
《化学鉴原补编》	Chemistry, Inorganic and Organic by C. L. Bloxan	徐寿	1880 年
《化学考质》	Manual of Qual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by K. B. Fresenius	徐寿	1883 年
《化学求数》	Quant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by K. R. Fresenius	徐寿	1883 年
《化学分原》	An Introduction to Practical Chemistry, Including Analysis by John E. Bowman	徐建寅	1871 年
《化学易知》	Chemistry Textbook		1880 年
《化学须知》	Chemistry (Outline Series)		1886 年
《化学器》	Chemical Handicraft by J. J. Griffin		1894 年
《化学工艺》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reatise on the Manufacture of Sulphuric Acid and Alkali by G. Lunge	汪振声	1898 年
《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	Vocabulary of Names of Substance of Occurring in Various Words on Chemistry: Chiefly in Bloxam's *Chemistry*	徐寿	1885 年
《物质遇热改体》	Changes of Volume Produced by Heat by G. Foster	徐寿	1899 年

《声学》	Sound by John Tyndall	徐建寅	1874 年
《声学须知》	Acoustics (Outline Series)		1887 年
《光学图说》	Handbook to Diagrams in Light and Heat by W. Lees		1890 年
《格物图说》	Properties of Matter		1885 年
《气学须知》	Pneumatics (Outline Series)		1886 年
《力学须知》	Dynamics (Outline Series)		1889 年
《水学图说》	Hydrostatics and Hydrodynamics		1890 年
《水学须知》	Hydrolytics (Outline Series)		1891 年
《光学须知》	Optics (Outline Series)		1895 年
《热学图说》	Heat(Outline Series)		1890 年
《天文须知》	Astronomy (Outline Series)		1887 年
《地理须知》	Physical Geography (Outline Series)		1883 年
《地志须知》	Political Geography (Outline Series)		1882 年
《测候诸器说》	A Treatise on Meteorological Instruments by E. A. L. Negretti	江衡	1880 年
《植物图说》	Botany by J. H. Balfour		1895 年
《植物须知》	Botany (Outline Series)		1894 年
《动物须知》	Zoology (Outline Series)		1894 年
《农务要书简明目录》	Bibliography of Agricultural Reference Works	王树德	1901 年
《农务化学简法》	Agricultural Chemistry	王树德	1903 年
《意大里蚕书》	The Art of Rearing Silkworms by Count V. Dandolo	汪振声	1898 年
《儒门医学》	A Medical Handbook By Frederic W. Headland	赵元益	1876 年
《法律医学》	Principles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 by W. A. Guy	赵元益	1899 年
《西药大成》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by J. F. Royle and F. W. Headland	赵元益	1887 年
《通物天光》	X-Ray by W. J. Morton	王季烈	1899 年

《西药大成药名表》	Vocabulary of Names of Material Medica Occurring in the Translation of Royle's Manual of Material Medica and Therapeutics with Lists of Name and Places Occurring in the Same Work, and in Various Treatise on Chemistry and Allied Subjects	赵元益	1887 年
《全体图说》	Physiology and Anatomy (Outline Series)		1894 年
《化学卫生论》	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 by F. W. Johnston	栾学谦	1881 年
《孩童卫生论》	Health for Little Folks by Mrs. M. H. Hunt		1893 年
《幼童卫生论》	Lessons in Hygiene by Johnnot		1894 年
《延年益寿论》	How to Live Long by DeLacy Evans		1892 年
《治心免病法》	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 by Henry Wood		1896 年
《测地绘图》	Method of Conducting a Trigonometrical Survey by E. C. Frome	徐寿	1876 年
《行军测绘》	A Practical Course of Military Surveying by A. F. Lendy	赵元益	1873 年
《画形图说》	Aids to Model Drawing by F. C. Richardson		1885 年
《画器须知》	Drawing Instruments (Outline Series)		1888 年
《航海通书》	Nautical Almanac	贾步纬	1871 年
《海道图说》	Chinese Sea Directory by Reed	王德均	1874 年
《测绘海图全法》	Hydrographical Surveying by W. J. L. Warton	赵元益	1899 年
《俄国新志》	History of Russia	潘松	1894 年
《各国交涉公法论》	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 by R. J. Phillimore	李凤苞 俞世爵	1894 年
《公法总论》	International La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y E. Roberston	汪振声	1894 年
《宝藏尖焉》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Metallurgy by W. Crooks	徐寿	1893 年
《开煤要法》	Coal and Coal Mining by W. W. Smyth	王德均	1871 年

《开矿工程》	Boring and Blasting by O. Byrne	赵元益	1879 年
《矿学须知》	Mineralogy (Outline Series)		1893 年
《开矿器法图说》	A Descriptive Treatise on Mining Machinery, Tools and Appliances by G. G. Andre	王树善	1899 年
《求矿指南》	The Prospector's Handbook by J. W. Anderson	潘松	1899 年
《地学须知》	Geology (Outline Series)		1883 年
《银矿指南》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Testing and Working Silver Ores by C. H. Aaron	应祖锡	1891 年
《冶金录》	The Moulder's and Founder's Pocket Guide by F. Overman	赵元益	1873 年
《矿石图说》	Mineralogy and Paleontology (Handbook Series)		1884 年
《锌版印图》	On Photo-zincography by A. de Courcy Scott	江衡	1876 年
《西艺新知》	Modern Arts and Manufactures of the West	徐寿	1877 年
《造铁金法》	Iron: Its History, Properties and Process of Manufacture by W. Fairbairn	徐建寅	1880 年
《汽机必以》	A Catechism of the Steam Engine by J. A. Bourne	徐建寅	1872 年
《汽机新制》	Practical Rules for the Proportions of Modern Engines and Boilers by N. P. Burgh	徐建寅	1873 年
《兵船汽机》	The Marine Steam Engine by R. Sennett	华备钰	1894 年前
《工程致富略论》	Aid Book to Engineering Enterprise Abroad by E. Matheson	钟天纬	1894 年
《考试司机》	Handbook to the Local Marine Board Examinations by W. H. Thorn	徐华封	1894 年
《海塘辑要》	The Practice of Embarking Lands from the Sea by J. Wiggins	赵元益	1873 年

《制机理法》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orkshop Companion	华备钰	1899 年
《铸钱工艺》	Coinage (from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钟天纬	1894 年
《电气镀镍》	Nickel-plating by A. Watt	徐华封	1894 年
《电气镀金略法》	Electro-Metallurgy Practically Treated by A. Watt	周郇	1880 年
《铸金论略》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Casting and Founding by N. E. Spretson	汪振兴	1902 年
《保富述要》	Money by Bright	徐家宝	1894 年
《国政贸易相关书》	The State in Its Relations to Trade by T. H. Farrer	徐家宝	1894 年
《营工要览》	Instruction in Military Engineering	汪振声	1894 年
《营城揭要》	Fortification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y J. E. Portlock	徐寿	1876 年
《英国水师考》	British Naval Examinations	钟天纬	1895 ~ 1896 年
《俄国水师考》	Russian Naval Examinations	李岳蘅	1900 年前
《美国水师考》	U. S. Naval Examinations	钟天纬	1895 ~ 1896 年
《美国铁路考》	The American Railway by T. C. Clark	潘松	1899 年
《水师操练》	Instructions for the Exercise and Service of Great Guns on H. M. 's Ships	徐建寅	1874 年
《防海新论》	A Treatise on Coast Defence by Victor von Scheliha	华衡芳	1874 年
《轮船布阵》	Fleet Manoeuvering by P. Pellow	徐建寅	1873 年
《制火药法》	Gunpowder by Richard and Henry Watts in Chemical Technology	丁树棠	1871 年
《开地道轰药法》	Dynamiting Employed by Sappers	汪振声	1893 年
《行军铁路工程》	Military Railways	汪振声	1886 年

《船坞论略》	Treatise on Decks	钟天纬	1894 年
《行船免撞章程》	Naval Regulations	钟天纬	1895 年
《长江图说》	Charts for Navigation of the Yangtsze	王德均	1874 年
《造船理法》	Modern System of Naval Architecture by J. S. Russell	徐建寅	未刊
《西国陆军制考略》	The Armies of the Great Powers	范本礼	1894 年
《格林炮操法》	Gatling Gun Drill by Franklin	徐建寅	约 1874 年
《炮与铁甲论》	A Treatise on Ordnance and Armor by A. L. Holley	徐建寅	1880 年前
《历览纪略》	Notes on Tour Through Iron Manufacturing Districts by J. Fryer	徐寿	1874 年
《西礼须知》	Western Etiquette: What to do (Outline Series)		1885 年
《戒礼须知》	Western Etiquette: What to avoid (Outline Series)		1886 年
《富国须知》	Political Economy (Outline Series)		1892 年
《美国博物大会图说》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Building and Catalogue	应祖锡	1892 年
《美国加邦大书院图说》	An Illustrated Descrip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00 年
《邦交公法新论》	Manual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J. H. Ferguson	程瞻洛	1901 年
《教育瞽人理论法》	Method of Teaching the Blind	傅兰雅	1911 年
《佐治刍言》	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ance by William & Robert Chambers	应祖锡	1885 年
《艺器记珠》	Pocket Book of Useful Formulae for Civil and Mechanical Engineers by G. L. Molesworth	徐建寅	1879 年
《器象显真》	The Engineer and Machinist's Drawing book by V. Lebland	徐建寅	1872 年

傅兰雅译书注重实际,知道如何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指导理论进行英汉翻译。他曾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从境外订购英文书籍统筹规划,并悉心制定译书具体原则。他主张应该首先翻译格致诸书和泰西大类编书,"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用之书,故作类编之意渐废,而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别。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①

傅兰雅认为译书首先必须忠实原文,不失原书要旨。如果使用深奥语言译书,可能许多人看不懂。格致诸书多用于启蒙,译文应该通俗易懂,才能有益于初学者。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译书多半都与中国学者合作。他本人首先通读原著,努力了解有关学科的知识和道理,然后才把内容逐句译成汉语。与他合译的中国学者都是某一学科的专家,除了记下所译内容外,还不时从译者和读者的角度提出种种问题。傅兰雅虽然平日刻苦学习,通晓数种方言,但是并不精通所翻译的全部学科知识,于是必须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原著的深奥思想和理论,并研究如何用汉语表述才能使中国读者读懂。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大约每天只译数千字,但是合译双方都以此为乐,以此为荣,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译文脱稿后通常还要由中国学者润色,重要的译稿更须反复斟酌,核对原文,因此错误极少。

这种译书方式虽然不是历史上的首创,早在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中就有西域胡僧和中土儒僧合译或者返国高僧主持翻译场佛经译事的先例,但是在傅兰雅工作的江南制造局这种合作译书的机制可以说已被完善并发挥到非常科学和规范的程度。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从上面的列表中可以看出,傅兰雅的个人和合作译著大部分都是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军事科学有关的内容。这除了与创办近代工业的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的指导思想和当时的社会潮流分不开外,也与利玛窦之后的部分有远见的西方传教士倡导的格致之路和傅兰雅本人的世俗化思想关系密切。他所翻译的十几部法学(如《各国交涉公法论》)、史学(《法国新志》)、艺术(《西画初学》)、政治学(《佐治刍言》)和社会学著作曾经产

①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第二章,《翻译论集》第219页。

生过一定的影响。例如 1885 年他所译的《佐治刍言》与康有为的《大同书》、1896 年所译的《治心免病法》与谭嗣同的仁学，显然都存在某些方面的联系。

傅兰雅为审定中西人名、地名和新术语的翻译做了大量工作。许多近代新学科术语就是通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向中国读者介绍的。他说翻译西书的第一要事为名目，如果译词都是汉语辞典中现成的，那简直无法做到。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新词不断出现，如果不加统一，圣讳禁用，翻译就很困难。前人使用过的译名，如无不妥应该沿用，如果词义乖误或者容易产生曲解的，就应该淘汰。为此他提出“采用华文已有之名”、“设立新名”或“作中西名目字汇”三种翻译人名、地名和术语的方法。1869 年他在与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 ~ 1901）的通信中曾讨论过科学名词的汉译问题。1875 年他与徐寿合译《化学鉴原续编》时曾把“aniline”（苯胺）音译为“阿尼里尼”，把“dextrine”（糊精）音译为“对格司得里尼”，把“ether”（乙醚）音译为“以脱”（又译为“以太”），现在看来虽然不算尽善尽美，却也被沿用了数十年。由他先后与中国学者合作编制的中西名目表有《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 年）、《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 年）、《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1887 年）和《汽机小西名目表》（1889 年）等。这些名目表凝聚了中西学者多年的心血，许多译名准确、形象、具有独创性，其中一些沿用至今。

傅兰雅为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堪称为西学东渐的使者。他在翻译学和另类汉学方面的贡献，也是世人皆知的。

西方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始于 16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以及以后来华的罗马天主教徒都服从并通过自己的活动体现了教皇“中华归主”的扩张旨意。但是当时西方国家没有派遣攻城掠地的军队来华，有些耶稣会士还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态度，甚至担任了钦天监一类的世俗职务，赢得了许多中国人的好感。

以英国福音布道会和美国大觉传道会为首的西方宗教团体派遣新教徒来华始于 19 世纪初。当时的社会背景十分复杂，在中外文化冲撞和西方列强对华虎视眈眈的情势下，他们中的一些人中扮演了多重身份的角色。像马礼逊和裨治文等人，在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方面都有相当突出的成就，但是他们在汉学中表现出来才华却被自己身上沉重的宗教光环所压抑和扭曲。

傅兰雅在华的主要经历在上海。那是当时五个条约口岸之一,是外国人聚居的城市。鸦片战争后列强与清廷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外国人在那儿建立教堂,治外法权使传教士不受大清法律约束,因此大批西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便相继涌入。1850 年上海的外侨只有 220 人,英国租界才初具规模。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后,英租界外侨人数多达 2727 人。早期的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时采取了有别于一些天主教传教士直接抨击中国文化宣讲福音的做法。他们闭门翻译圣经,研究汉语,编写字典,了解中国国情,建立医院和学校,介绍西方科技。19 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新约全书》委员会汉译本就是新教徒们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精心译制的,在中国宗教界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傅兰雅是传教士出身的学人,他的教育背景、家庭生活和个人观念,无不体现了与教会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以译书办报的方式帮助中国开发民智之时经常想到的是一个基督徒的神圣使命,但是他平时结识了许多文人学者和平民百姓,对于中国社会和民众逐渐亲近了解。他的社会阅历客观上有利于他在普通中国人中找到共同语言。有时他似乎意识到宗教行为可能在他和中国百姓之间形成鸿沟,因此有意无意地淡化他工作中的宗教色彩,甚至在教科书委员会上郑重宣布自己不参与宗教图书的编写,反对在格致书院的阅览室陈列宗教书刊。但是他也郑重地说过:"中国没有基督教是不行的,她也不能把基督教拒之于门外。基督教必须胜利。中国如要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要求摆脱压迫者的压迫而获得自由,那就必须把智力培养和基督教结合起来。"①他的内心世界是矛盾的,却也是真实的、清白的。傅兰雅的高贵之处在于他是西学东渐大潮的积极参与者,在西方科技著作的汉译方面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的翻译出版和教育实业,真心实意地帮助过许许多多平凡的中国人。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历史教授保罗·科恩对他做过这样的评价:"英国人傅兰雅最初作为教会学校的教员来到中国,他可以称为'世俗派传教士'的最初典型。虽然他在各种教育事业中与传教士合作,但他和教会的任何差会没有关系,并且他重视加强中华民族更甚于使中国人改信基督

① 《1896 年教育展望》,载 1896 年 1 月英文《教务杂志》,译文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 24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教。傅兰雅的使命是向中国传播西学，特别是传播科学。”[①]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

1896年傅兰雅移居美国，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文言文和官话等课程。虽然教务繁忙，但是还多次来华访问。此外他还编写了《中国教育名录》(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1895年)和《中国留美学生入学指南》(Admission of Chinese Students to American Colleges，1909年)等书。后者是他奉美国教育当局之命为中国留美学生撰写的英文留学指南，长达221页。他曾让长子傅绍兰(J. R. Fryer)接任他在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工作，不幸傅绍兰英年早逝。

1911年傅兰雅捐赠白银6万两在上海四川路创办第一所盲童学校(Institution for the Chinese Blind)。他让幼子傅步兰(G. Fryer)专门去费城欧文·布鲁克盲童学校学习盲童教育，结业后来华担任该校第一任校长。该校20世纪20年代后分为小学、中学、中师和大学四部，高中盲生由盲校保送到圣约翰高中随班就读，大学盲生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盲生学习的大学课程，除了物理和化学实验课不能与明眼学生同班上课外，其他课程都可以参加。他们刻苦学习，出现了大批学业优秀的人才。这是我国特教史上第一所盲校，意义深远。后来傅兰雅又捐资在汉口建立一所盲童学校、在上海建立一所盲女学校，在上海时中书局出版过《教育瞽人理论法》一书。

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曾分别赐予傅兰雅三品顶戴和三等第一双龙宝星勋章，对他来华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嘉奖。

傅兰雅1915年以名誉教授身份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怀念在华生活。1901年北洋大学派遣9名留学生赴美深造，他担任了他们的监护人。1928年傅兰雅在美国辞世，终年90。

傅兰雅为在中国传播科学技术所做的锲而不舍的努力，对于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情，对于翻译和教育事业的执着和献身，是同时代外国人的杰出代表。他的事迹是英国汉学史和中英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篇章，将永载史册，为后世汉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

①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63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五、剑桥大学汉文教授翟理斯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的父亲是一位牧师,曾受教育于牛津大学。1867年翟理斯以使馆翻译生身份来华,先后任职于英国驻汕头、厦门、宁波和上海领事馆,后来由汉文翻译逐渐晋升为副领事和领事,在华生活共26年,1891年离任回国。1897年他接替威托玛担任剑桥大学汉文教授。

翟理斯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对于中国文学、历史、儒学和辞典编写有独到研究。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是与德庇时和理雅各齐名的英国汉学家。

他的主要译著和著述有:《字学举隅》(Synoptical Studies in Chinese Character,1874年)、《华英辞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74年;三卷本1892年;两卷本1912年)、《中国概况》(Chinese Sketches, 1876年)、《历史上的中国及其他概述》(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1876年,1882年)、《有关远东的词汇表》(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1878年)、《中国文学瑰宝》(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83年;1884年,伦敦伯纳德·夸里奇(B. Quartich)出版公司出版,1922～1923年与《中诗英韵》(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合刊成两卷,上卷为诗歌,下卷为散文)、《老子遗存》(The Remains of Lao Tzu,1886年)、《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与社会改革家》(Chuang Tzu: 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1889;1968年)、《中国共济会》(Freemasonry in China, 1890年)、《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1892年)、《中国人名辞典》(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898年,又名《古今姓氏族谱》,1896年翟理斯经康德黎介绍与孙中山相识,曾函请他写自传编入该书)、《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及满文书书目》(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898年)、《中国绘画史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1905年)、《中国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1911年)、《中国和满人》(China and the Manchus, 1912年)、《中国和汉人》(China and the Chinese,1912年)、《翟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 1914年)、《儒教及其对手》(Confucianism and its Rivals,1915年)、《关于鸦片的一些事实》(Some Truths about Opium,

1923 年)、《佛国记》(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1923 年)、《千字文》与《闺训千字文》(Master Essays in a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聊斋志异》(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洗冤录》等书。他的译著是了解中华文化和研究汉学的珍贵文献。

《中国概况》是翟理斯的第三部著作,1876 年完成。当时他才 31 岁,正在驻华领事馆工作,手边缺乏各类工具书,但书中却表现出他的广博知识和横溢才华,令同辈学者折服。他的《中国文明》1911 年 5 月由格罗兹出版社(Globusz Publishing)出版,虽然当时已经退出外交界,但是正执教于剑桥大学。全书 85 页,包括 14 部分,分别为:前言、封建时代、法律和政府、宗教与迷信、公元前 1200 年至公元前 220 年、妇女和儿童、文学与教育、哲学与体育、文娱活动、元蒙时期(1260 ~ 1368)、明朝和清朝(1368 ~ 1911)、中国人和外国人、观点、参考书目。翟理斯在简短的《前言》中写道:"本书以提纲挈领的方式介绍从远古至急剧过渡的当代的中国文明,主要是为对中国有所了解或者一无所知的读者编写的,希望能把他们吸引到范围更广、脉络更清晰的综述中去。"书中的叙述简洁生动,语言通俗易懂,内容客观直白。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系教授侨舒亚·福格尔(Joshua A. Fogel)在翟理斯的《现代汉学中的两部早期经典文献》(Two Early Classics of Modern Sinology)的引言《翟理斯与中国》中对《中国概况》和《中国文明》是这样评论的:

这两部著作是翟理斯在清朝末年写成的。《中国概况》问世的时间正当太平军造反变法维新刚刚开始,《中国文明》则是在推翻清朝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出版的。此时中国进入了寻求深入变革的时代,翟理斯真心实意地肯定了清廷加大步伐进入的君主立宪。他在第二部著作中曾写道:"随着公元前 200 年君主制的确立,一个政体诞生了。就其实质而言,它一直在沿着相同的路线持续发展,直至今日。"他几乎不知道,就在他的书稿付梓之际,清朝帝制行将长眠。也许他对此有所预感,这可能有助于说明他为什么常常引用孟子的话并提到"民主"(不是他的原话)思想在中国国内的根源。他确实明确地指出过他看到了晚清制宪变革的根源在于孟子"以民为本"(他的原话)的信念。

关于翟理斯的这两部书——从出版到现在已经分别过去了大约 125 年和快 100 年了——最应该肯定的是:今天人们仍然可以阅读它,并能从

中获得极大好处。在西方汉学界自修成才的文人小圈子中，较早的有艾约瑟(1823～1905)和卫礼贤(1873～1930)，晚些时候的有高罗佩。他们的作品通常已被人们淡忘，最伤我们感情的是人们已经记不起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学者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了。希望翟理斯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多少可以使这个现状得到平衡。①

翟理斯对于汉字和汉语语音及其拼写系统也做过深入研究。1859年威托玛根据马礼逊用拉丁字母拼读汉字的办法制定了一个新的拼写系统。1912年翟理斯对威氏的系统作了较大改进，主要表现在用相同字母加点的办法来标识送气和不送气的汉语双唇音(p－p')、舌尖中音(t－t')、舌根音(k－k')、舌尖前音(ts－ts')和舌尖后音(ch－ch')，被誉为"威托玛－翟理斯系统"(Wade-Giles System)。这套办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便于书写和记忆，因此曾被中外教育、新闻和出版界广泛采用达数十年之久。这大概是西方人创制记录汉语普通话的最成功罗马母写拼字系统，无论在使用人数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和采用范围之广来看都是最好的。

翟理斯的《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出版于1892年，是同类工具书中收词汇最多的一部。1912年的修订版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大16开本，正文1711页，并有附录，曾获儒莲奖。

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是一部有影响的代表性学术著作，1897年曾作为戈斯(Edmund W. Gosse)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第10种出版。1900年伦敦威廉·海涅曼公司(William Heinemann)出版了该书的单行本，共448页。1909年、1923年和1928年纽约阿普尔顿出版公司(Appleton & Co.)连续再版。1958年和1967年纽约丛树出版社(Grove Press;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再版了该书。1973年佛蒙特州查尔斯·E·特尔出版公司又出版了修订版。该书按照春秋战国("分封诸侯时期")、汉朝、魏晋南北朝("小朝廷")、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的历史脉络，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用西方读者熟悉的语汇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还翻译了部分小说、戏曲和诗词的片断，《聊斋》和《红楼梦》一章竟着墨30多页。作者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因为译文部分生动练达，出神

① Joshua A. Fogel, 2004. *Herbert Allen Giles and China* Introduction to *Two Early Classics of Modern Sinology*, Kurodahan Press, 2003.

人化，可读性强，还在于他采用了独特说史的方法。他没有孤立地介绍和分析各个时期的文学代表作，而是有机地提供了中国文学史发展的整个人文环境。例如在介绍早期神话时，作者论述了中国文化和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概况，在汉朝部分介绍了佛教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在介绍唐诗、宋词的光辉成就时也涉及与后世文学发展相关的古文运动、辞书的编写和印刷术的发明。作者既侧重介绍各朝的主流文学，又兼及民间和宫廷文学，既聚焦于文学硕儒大家，又关注当时社会赖以依托的医学、天文、科技、园艺甚至饮食方面的点滴进步。综观全书，作者力图做到详略得当，分寸适度，既展示了个人的真知灼见，又吸纳了其他学人的研究成果，因而极富代表性。当读者被中国文学精彩片断打动之时，在不受任何陌生的文学史术语和概念的困扰之下，几乎无不忘情地欣赏着大师们所创造的情感氛围之中。从这一点来看，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似乎不是真正的“史”，他的文学理论家身份让人怀疑，但这也正是作者的高妙之处。当然，跟中国文学史专家（如鲁迅和郑振铎）编写的文学史比较起来，最大的反差是，翟理斯对于许多享有盛誉的作家及其作品着墨不多，有些重要的文学形式甚至忽略不提。至于对于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介，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读者的兴趣和价值观来评判的，也算别开生面。虽然它不是外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但却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史论，没有深厚的中英文学养是无法完成的。

关于翟理斯几十年孜孜不倦的汉学研究工作，他的一丝不苟的学风和客观公正的观点，侨舒亚·福格尔教授曾经在《翟理斯与中国》中做过这样的综合评价：

翟理斯在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在这里重印的两部著作中，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表现出深切和持久的敬仰之情。在大英帝国所宣称的鸦片大行其道（翟理斯对此有所质疑）以及西方对于中国普遍表现出的一种优越感的鼎盛时期，他的这一立场并非中庸之道。他致力于通过比人们所想象的还陌生的中国事物来让外国读者看到中国的重要性，努力确保其时广为流传的有关中国的离奇谣言不攻自破，使普通人性在中国人身上重现出来。

以鸦片为例，直至今日，无论是学者还是局外人似乎都认为，翟理斯时代的中国各级阶层的人都普遍吸食鸦片。他争辩说情况完全相反，当时他就在中国，那是一种离奇的夸张，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鸦片太昂贵了，在当

代中国吸食鸦片成瘾的现象跟英国人饮酒和酒精中毒的程度相比，其严重性不可能超越英国人自己的国家。

翟理斯的确常常拿中国跟当代西方进行有趣的对比，中国都无不略胜一筹。例如19世纪中国妇女的糟糕地位尽人皆知，在翟理斯时代确实如此，但是他竭力证明这个看法也是被夸大了的。他并不否认一般夫妇都喜欢生育男孩，然而他断然否认杀害女婴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厌恶妇女的做法和准则。同样地，当中国人被想象为非常残酷地惩罚囚犯，“中国水牢”和“凌迟”仍可见于英语辞典，翟理斯却回答说中国人并非异教国家的野人。“中国百姓不是魔鬼，不会在平静、受极度冲动支配时刻，得意忘形地坐观杀戮和酷刑。”

实际上，翟理斯在中国的岁月使他懂得中国人的基本面子和人性观念。他就像许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成年的欧洲伟大汉学家，是通过在外交部门工作或者在实地居住而获得有关中国人及其文化和语言知识的。许多西方生意人几乎无法与中国人相处，即便“容忍”也仅仅为了既得利益，而翟理斯不像他们，他发现接近可以培养无限的亲情。有些人跟中国人接触很少却妄谈什么中国人的性格，一个世纪之前奢谈“民族性格”的现象比现在普遍得多。对此翟理斯几乎无法容忍：

那些周游世界、曾在香港被职业扒手掏走过钱包的浅薄的观察家，那些缺乏训练有素的观察和比较能力的驻外观察家，竟敢断言中国人不具备诚实的美德。然而那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真心致力于了解实情的人，可以说个个都会站在他们的对立面。除了职业罪犯之外，任何阶级中能找到的真正诚实程度简直都会让人吃惊。中国商人说话有信用早已家喻户晓，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他自己原本也可以这样夸张地表达中国人有比西方人体面得多的记录：“中国人美德的突出程度是罕见的感恩。一个中国人从来不忘做善事，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会忘记对给好处的人的感谢。”“从他脸上的冷静表情外国人无法看到一种普通人性的内在表现，那只是因为外国人不具备发现这种人性的智力，因而会争辩说没有。其实这种人性始终存在着。”

翟理斯对于他所处时代的中国的无比敬重之情，表现在他把基督教和基督传教士与西方文明区分开来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早在《中国概况》和《中国文明》中我们就发现他对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所持的特别激烈的批判态度。他在书中多处反问道：中国人有自己的三种宗教

(儒教、道教和佛教,如果把伊斯兰教包括在内就一共有四种宗教了),有什么必要再接受一种完全是外国的宗教呢?不管怎么说,他基本上认为,虽然中国人因为迷信招惹麻烦,但是他们并非宗教意识非常强烈的民族。这一界线并非我们现在所希望的那样划得一清二楚,而且,后来他还争辩所说儒家学说不是什么宗教。这表明,跟传教士及其支持者的观点不同的是,只因他相信中国人比欧洲人已经有更高的道德修养,因此不需要基督教来帮助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

他认为,中国人确实需要西方的文明和科学使自己的古老文明现代化,但是这在不增添基督教累赘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他的争辩比乍一看来更具破坏性,因为在早先的耶稣会士和后来(翟理斯时代)的新教教徒的活动中,基督教都想把宗教与西方科学和医学拴在一起入侵中国。传教士实际上想表明没有这个就得不到那个。的确,西方基督徒展示的就是传教士所推介的科学,两者是互为依赖的皈依。翟理斯认为这是彻头彻尾荒谬的观点,因为,显然,在上一世纪与新世纪之交许多中国改革派急于在没有基督教的情况下就获得现代科学所带来的最大价值。

翟理斯曾经表现出对于古老中国哲学中的孔孟之道的共鸣,甚至偏爱。他常常以举隅的方式,多次引用孔子的话,作为全体中国人信仰的代表。在我们的时代,多数读者都不大可能认真看待以"中国人认为"开头的句子。在翟理斯时代,当"民族心理"被视为一种时尚(甚至在学者中)时,这种方法往往被普遍采用,即便他完全不相信每一个中国男子和女人会追随2500年以前孔子所确立的信仰体系也会如此。至于孟子,他更是情有独钟。人们以肯定的口气说翟理斯在许多场合曾经表达过尽人皆知的"革命的权利"的观点。

当谈起一些世俗的话题,翟理斯总有许多虽然可能引起争辩但却更有意思的文章可供阅读,因为他亲眼见过和描述过的许多风俗习惯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这些话题包括:中国戏曲、中国体育、舞蹈游戏、黄包车和手印(他认为都是中国人的发明)、印刷、儿童和家庭、婚俗、法律和法治、现代教育等等。此外,他在前现代中药、姓氏起源、造币、公共假日和宗教节日等系列题材的著述中都掌握了丰富的材料。

翟理斯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人如何敬惜字纸。他在两部著述中都描述了中国人从不随便丢弃字纸,总把路上的字纸拾起来放在一个专门的纸筐中,在特定的日子把它带到庙里当供奉烧化。少数真正懂汉语的外国

文人观察并记录了这一习俗，这生动地说明了这些外来人士深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能力的开端。①

六、西法西学的倡导者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字菩岳，出生于新南威尔士农民家庭，先后就读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浸礼会学院神学系。1870年到上海，为英国伦敦会驻上海分会代理人。19世纪70年代他在山东和东北一带巡回传教，经常穿着中式衣服，与一位浸礼会医生四处讲道治病。1876年华北大旱，他设法前往募款赈灾，同年他移居山西太原。

李提摩太1887年到北京，1890年担任天津《时报》主笔，撰写了大量宣传维新变法的文章。同年11月，曾任益智书会秘书的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成立了以编译西方文化书刊为宗旨的同文书会，出版了许多有关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的书籍和图片，宣传西方生活模式和发展道路。1890年韦廉臣病逝，由李提摩太接任其职务，两年后该会更名为广学会，继续出版发行宣传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书刊。李提摩太接管1889年同文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后仍按月出版，在主编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回国休假期间，他总管各项编辑事务，由中国学者蔡尔康、任保罗和范子美等人协助撰稿，并着手编译《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出版以后受到支持维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1893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各省举行恩科乡试。《万国公报》利用外商捐款印刷李提摩太原来在天津时撰写的《自西徂东》一书数万册在举子中散发，使该报声名远播，推动了各省教会的代理销售业务。督抚大员为表示支持广学会纷纷捐款，各招商局也认购报社图书分赠同好。在李提摩太任总干事25年期间，广学会共出版了461种图书，初版和重印的竟达100多万册。据说光绪皇帝为了了解西法和西学，曾授命搜集新书129种，其中广学会出版的就有89种之多。1899年2月《万国公报》发表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英国进化论者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前四章)，首次在中国报刊中三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片断。康有为和

① Joshua A. Fogel, 2004. *Herbert Allen Giles and China* Introduction to *Two Early Classics of Modern Sinology*, Kurodahan Press, 2003.

梁启超在他们创办的强学会会刊《中外公报》上曾先后转载广学会的许多文章，李提摩太本人也在《时事丛刊》上发表了政论30余篇。这期间，李提摩太还先后编印了《泰西新史揽要》(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 by Robert Mackenzie)、《中西四大政》、《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对维新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一定影响。

李提摩太熟读儒家经典，能言善辩，在中国知识界和政界结交颇广，饱学之士梁启超当过他的私人秘书，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丁宝桢、翁同龢、康有为、孙中山都跟他打过交道。他曾经向几位大臣条陈过许多新的政见，大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名为《新政策》的书，鼓吹中国应该聘用外国人经营事务。

他热心教育出版事业。1907年他提出利用庚子赔款创办新式学府，是年山西大学堂(Shanxi Imperial University)正式成立，分中斋和西斋，由他出任该校西斋监督，因此曾被清廷赐头品顶戴。

李提摩太的主要著作还有《华夏诸神表》(Calendar of the Gods in China, 1906年)、《万众皈依》(Conversion by the Million in China, 1907年)、《在华生活四十五年回忆录》(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1916年)等。他在传教之余还翻译过若干部中国的文学作品，例如元朝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的《西游记》和袁家骅编写的《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

1916年李提摩太因年迈多病辞去广学会的领导职务，1919年病逝于英国。

七、职业外交家兼汉学家庄延龄

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1849～1926)是外交官出身的英国汉学家。早年师从苏谋事(James Summers)，1869年来华，1871年至1893年先后担任天津、汉口、九江、广州、福州、镇江、温州、上海、海口英国领事馆官员或领事职务，韩国釜山和汉城领事或总领事，缅甸的中国事务顾问等职。1896年被利物浦大学聘为汉学讲师，5年后被维多利亚大学聘为汉学教授。

他的阅历丰富，熟悉外交事务，对中国文化有深刻了解，经常在《中国评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皇家亚洲文学会华北分会会

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教务杂志》、《通报》(T'ung Pao)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从他的著述中可以窥见19世纪下半叶一位英国职业外交家兼汉学家的思路和心态。

他的主要译著和著述有:《蒙古游记》(Travels in Mongolia, 1871年)、《中国家法比较》(Comparative Chinese Family Law, 1878年)、《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看法》(Chinese Account of the Opium War, 1888年)、《中外关系》(China's Relations with Foreigners, 1888年)、《中欧往来》(China's Intercourse with Europe, 1890年)、《逆行长江》(Up the Yangtze, 1892年)、《缅甸—兼论与中国的关系》(Burm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1893年)、《鞑靼千年史》(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1895年)、《中国风俗》(Chinese Customs, 1899年)、《中国通史》(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1901年)、《中国古代简史》(Ancient China Simplified, 1908年)、《中国宗教之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 1910年)等。

八、多次前往新疆和甘肃探险考古的斯坦因

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1863~1943)出生于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籍犹太人,但为了个人前途幼年时曾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10岁时他被送到德国上学,学习过德文、英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在莱比锡大学和维也纳大学时还学习过梵文和波斯文。21岁时在蒂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ybingen)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后,又先后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不列颠博物馆专攻突厥语等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对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马可·波罗来华事迹很感兴趣,喜欢丝路各国客商带进的文化艺术,立志要做考古探险家,对事业的追求十分执著。1885年他到布达佩斯的卢德维卡(Ludovika)军事学院学习了地形测量学。1886年,斯坦因回到英国,在大英博物馆和牛津的阿希摩兰博物馆研究古钱币。1889年至1899年他曾先后担任印度旁遮普大学东方学院院长和加尔各答大学校长。他终生没有结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所追求的事业上。

一般认为,斯坦因第一次到中亚和我国西部探险考古的时间是1900年至1901年。19世纪末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亚和我国西藏和新疆的探险及其成果,使年轻的斯坦因受到鼓舞和启发。1889年9月斯坦因向

当时的英属印度政府申请到新疆和甘肃进行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1900年5月，他利用假期前往和田，在丹丹乌里克挖掘了一座唐朝寺院废墟，搜集到描绘“鼠王传说”、“东国公主传来蚕种”和“龙女出嫁”等内容的木板画。1901年通过寻找两块用楼兰国佉卢文写着“死亡”字样的木板的主人，在塔克拉玛干发现了东西长6.4公里，南北宽22.5公里的尼雅遗址。接着又寻访了安迪尔、拉瓦克等佛教遗址。他前后4次在尼雅发掘出了大量汉木简，佉卢和犍陀罗语文书，丝、毛、麻织物，绣花皮革和漆器残片，以及椅子和木桥等大批中国古代文物。

斯坦因第二次来华探险的时间是1906年至1908年，是他第一次中国西部探险的继续。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他还发掘了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至敦煌。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转运站，宗教圣地，中西文化的交流汇合点，自然是考古的重点。1904年他考察了可汗宁沙尔佛寺、三仙洞石窟寺和巴昌阿格拉唐代寺院遗址。1906年调查发掘了米兰、楼兰、交城和汉长城几处遗址。1908年他经麻扎塔格到阿克苏，发掘了唐代寺院和戍堡，勘测了图木舒克、托古孜沙来和穷梯木等唐代驿馆，在拉尔塔格寺院遗址出土了数件佛教遗物。

前往敦煌之前，斯坦因经英国驻疏勒（今新疆喀什）官员马继业（George Halliday MaCartney，1867～1945）的介绍认识了师爷蒋孝琬（？～1922）。蒋氏湖南人，光绪年间在新疆任师爷，后来在莎车衙门任职，精通古文，擅长古物鉴赏，熟悉官场事务。他以助手身份陪同斯坦因前往敦煌，途中教他中文，帮助疏通关系，解读出土物文字、雇佣车马劳工、整理资料。在敦煌当斯坦因看到玄奘早年翻译出来的经卷时，兴奋之情难以自已。蒋孝琬用神秘的口吻对王圆箓道士说，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那些秘藏经文托付给对佛经一无所知的他，以等候来自印度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他假托斯坦因就是沿着当年去印度取经的玄奘的足迹西来的僧人，要取回唐僧带到中国的经卷，送到印度的神学院研究，为佛增添光辉。最终他们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允许他们仅仅以200两银子的代价从莫高窟藏经洞运走价值连城的24箱写本和5箱绢画及丝织品。经清理，斯坦因那次带走的中国文物共有完整卷文7000件，残缺的6000件，还有其他一些文物。

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国西部探险考古的时间是1913年至1915年，但是早在1912年9月初他就向印度政府提交了经费申请和计划。他从今克什米尔境内的斯里纳喀尔出发，经过和田、拉瓦克、喀达里克、尼雅、楼兰、敦

煌、吐鲁番、库车等地,历时两年八个月,行程万余里。在巴楚县图木舒克至麻扎塔格进行了考察,在拉尔塔格遗址发掘了5座唐代僧房遗址,出土了20多件佛像和青铜饰物,测绘了和田和瑚玛喇克河(子里河),以500两白银从王道士处再次获得570余件敦煌写本。那些卷子是王道士专门收集的,多为完整长卷。蒋孝琬因病不能陪同斯坦因,便推荐一李姓师爷从中协助,但是斯坦因带回的写本则由蒋孝琬本人帮助整理、编目、考释。他此次收获相当于第二次考察的两倍,仅准备由莎车运至克什米尔的装箱就花去了一个来月的时间。

其他国家考古学家得悉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获得大量写卷和文物的消息后也纷纷效仿,派人到那没有设防的西部边陲地区寻宝,其中有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日本人吉川小一郎、俄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1908年二三月间伯希和从藏经洞运走大量珍贵写本、文书、佛教文献和各民族文字史料。1915年1月奥登堡也赶着载有18000号写卷和300余件文物的驼队离开了敦煌。1923年冬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用化学制剂将莫高窟3万多平方公分的12幅壁画粘走。1925年福格中国考察队企图将莫高窟第285窟西魏时期的壁画全部剥离到美国,由于当地人民反对未能得逞。外国探险队的劫掠使藏经洞所藏五万多件卷子绝大部分流失国外。

斯坦因一次又一次地获得大量珍贵资料,深受英国政府的和学术界的赞赏。他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考古报告给自己换来了一个爵位封号,牛津和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英国政府接受他加入英国籍。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美国的学术机构也先后向他颁奖。

1930年斯坦因第四次来到新疆喀什葛尔,在吐鲁番盆地3千公里范围内寻觅古迹。他的探险活动虽然不敢张扬,但是很快就被我国文化界发觉,遭到强烈反对,南京政府于是下令禁止他进行任何挖掘工作,并且吊销了他的护照签证。但是他仍悄悄地在尼雅搜集文献,发掘的少量文物存放于英国驻新疆领事馆。此后他既未发表任何考古报告书,也未在任何场合提到过那次考察,致使那次考察的具体情况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斯坦因晚年仍然不忘探险和考古研究。他一度把兴趣转到了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境内罗马时期的灌溉系统。

斯坦因掠走的古文书和文物涉及边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语言等内容,有诏敕、信函、户籍、田簿、经卷、文书、医书、符咒、账本,年代上

自魏晋，下至宋初。那些文物、文献、写本和经卷，多数是汉文的，但是也有少量藏文、回鹘文、龟兹文、婆罗谜文、和田文的。除了佛画还有许多经变画和幢幡，对于研究中国宗教、军事、民族、边疆、文字、印刷、书写和纸张的变化，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史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他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正式报告，全书共五卷，有图片三百四十五张，图版一百七十五幅，地图九十五幅，是研究中亚文化历史的重要文献。国际上常把斯坦因尊为敦煌学的创始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确实推动了当时的西域研究、丝路考古、中亚探险和敦煌学的发展。

1907 年 6 月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运出的 29 箱写卷、佛画和文物，16 个月后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只纳了 130 镑的税。他第三次从新疆和甘肃运回的写本、佛像和各类文物的原定分配方案是：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和回鹘文写本由不列颠博物馆保存，和田文、龟兹文、藏文写本由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存，佉卢文写本存不列颠博物馆，婆罗谜文写本存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钱币和绘画由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和不列颠博物馆平分。但是斯坦因回英后又自行决定文书部分由不列颠博物馆收藏，印度博物馆只保存若干样品；图画和艺术品存印度博物馆，不列颠博物馆只存若干件样品。1973 年，英国图书馆东方部与不列颠博物馆分立，原来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的东方图书与斯坦因运回的写本文书并入了新建的英国图书馆藏书楼。目前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和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也收藏着斯坦因从敦煌运回的部分经卷、佛画、壁画、文稿、木简和其他文物。斯坦因还与匈牙利的学术界长期保持联系，生前曾有两次指定给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的私人捐赠，包括考古资料、图册、期刊、信件和四千多张探险照片。

20 世纪初斯坦因来中国考察多次，发现了许多历史遗迹和文物，形成了系列考古报告。1884 年至 1886 年他曾经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的一幢小石屋里整理、研究他从中国运回的文物。他把在中国探险遗留下来的清政府公文等部分文件收藏在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馆。他的著述多半是有关他在中国新疆和甘肃的考古发掘和旅行记录。主要著述有：《埋藏在沙下的和田遗迹》（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第一次中亚探险旅行记，1903 年）、《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第一次中亚探险正式考古报告，两卷，1907 年）、《中国沙漠下的废墟》（Ruins of Desert Cathay，第二次中亚探险旅行记，两卷，1912 年）、《西域考古记》（Serindia，

第二次中亚探险正式考古报告，五卷，1921 年）；《千佛洞》（The Thousand Buddhas，1921 年，国内有王竹书译本《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敦煌发现的壁画目录》（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1931 年）、《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第三次中亚探险正式考古报告，四卷，1928 年）以及《在中亚的古道上》（On Ancient Central Asia Tracks，第三次中亚探险旅行记，1933 年，国内有向达译本）等。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亚探险的历史中，斯坦因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的价值在于通过探险考古向世人揭示了中亚和中国西部疆域的丰富蕴藏，赋予了陈陈相因的敦煌写卷巨大的学术价值，充实了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勾勒出由考古发掘培育出来的西域学规范，使之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学科媒介。斯坦因是一位有野心、有作为的人物，敦煌的汉简、经卷、文书、佛画、法器、残绢和漆片为他铺就了通向成功之路。但是斯坦因在学术界中的形象又像圣诞节早上第一个排队进入大减价超市抢购的贪婪市民。在中国西部边疆没有设防的年代，他以最低的代价搬走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无价文化瑰宝，出境之后再按投资和回报的份额分配所得。回顾一下以厚重的中华文化积淀为依托的敦煌学，在充满成就感的同时也不由得使中国学人为逝去年代的国宝流失而感到几分难堪。

1943 年 10 月的一天，81 岁高龄的斯坦因乘美国驻印公使的汽车从白沙瓦到喀布尔，一心想在阿富汗圆他未了的考古梦，不幸几天后因中风而辞世，被安葬在喀布尔市郊的外侨公墓。一块普通的墓碑上刻着“马克·奥利尔·斯坦因，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学者、探险家兼作家”等字样，孤寂地竖立在坟茔之前，留下了许多有关这位西方探险家及其毕生事业的是与非、功与过、荣耀与罪孽、现实与梦想，让世人评说。

九、紫禁城中的洋太傅庄士敦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 ~ 1938）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字志道（取《论语》“士志于道”之意）。爱丁堡大学毕业后考入牛津大学玛格德琳学院，专攻现代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学位。1898 年考入英国海外殖民部，同年以见习生身份被派往香港，曾任港英总督府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1898 ~ 1903）的私人秘书。1904 年经骆任廷（James Haldance Stewart Lokhart，1858 ~ 1937）推荐先后任威海

卫政府的秘书、正华务司、南区行政长官、威海卫行政长官等职务。

威海卫是1898年清廷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1852～1915)在北京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后租给英国的,刘公岛、威海湾群岛和沿岸十里海面也包括在内,租期为25年。1900年英国在威海卫设立行政长官署,直属英国海外殖民部。庄士敦精通汉语,崇尚儒家思想,虔诚信奉佛教,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他到任后看到当地民风淳厚、山川秀美,感到振奋,决心致力于维护儒家传统。他对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严厉批判,在他1911年以笔名"林邵阳"(Lin Shao yang)出版的《中国人就基督差会事致基督教界》一书中有深刻的表述,也曾因此为自己树敌不少。他认为,如果中国放弃自己的传统,使自己的理想、哲学、道德和制度西化,虽然可能变得富有强大,但是必将失去许多优秀和伟大的品质,值得自尊自强的东西将不复存在。英国殖民部官员因此视庄士敦为保守主义者和儒家信徒,是离经叛道,甚至称他为"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同僚也长期与他格格不入,关系冷淡。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庄士敦向英国政府建议将威海卫归还中国,或者与中国重签租约,因为原来英国帮助中国抗俄抗日的借口已经失去了意义,否则就是违背国际义务,也必将损害英国利益,但是他的主张没有得到采纳。庄士敦感到失望,准备离开威海卫,或者弃政从文,希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或者香港大学接纳他为教授,然而都未能如愿。

1918年8月,庄士敦到内地旅行,10月来到上海,在一个偶然机会遇到了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曾陪同戴涛贝勒访问日本和欧美的李鸿章次子李经迈。他与北洋政府官僚徐世昌(1855～1939)是至交。徐世昌是直隶(今河北)天津人,因得结盟兄弟袁世凯的资助在应试中先后中过举人和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曾任东三省总督、袁世凯内阁的军谘大臣和国务卿。那一年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仍保留帝号的溥仪请他为自己指派一位英语师傅,徐世昌便托李经迈代为物色人选。辛亥革命后李经迈一度到威海卫避难,与庄士敦交谊深厚,对于他的才能和为人赞赏有加。当天他便与庄士敦商谈此事,庄士敦欣然应允,便通过徐世昌与英国驻华公使馆交涉。英国政府接受了对庄士敦的任命,在他离开威海卫前特别授予他高级英帝国勋章。

自1919年3月4日起庄士敦被聘任为溥仪的英文师傅。溥仪在毓庆宫第一次见到庄士敦时,尽管行过君臣之礼,仍然感到自己徘徊在怕与不

怕之间。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很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邦邦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①

从此溥仪的生活中开始添加了许多新内容:先是按照读汉籍时的规矩为他的英文日课增加了一个伴读,然后是为他个人买来的墨镜、西服、怀表、戒指、网球、电话和自行车之类的东西,接着是把辫子剪掉。平日,庄士敦除了教溥仪学习英文外,还在自由谈话中向他介绍英国文化和习俗,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使用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第三章第五节中记录了他和庄士敦之间的师生情谊和中西文化的碰撞:“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学问的人。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发生这样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对中国的丝织绸缎的价值发生了动摇,他口袋上的自来水笔竟使我因中国人用毛笔宣纸而感到自卑。自从他把英国兵营的军乐带进宫里演奏之后,我就更觉得中国的丝弦不堪入耳,甚至连丹陛大乐的威严也大为削弱。只因庄士敦讥笑说中国人的辫子是猪尾巴,我才把它剪掉了。”②

直到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的军人逐出了紫禁城,1000来名太监排队出宫的壮景才为昔日的小朝廷画上了一个句号。庄士敦虽然也从张旺胡同搬到了地安门内的第二个寓所,但是还与溥仪保持着密切联系,帮助策划如何把皇上送到牛津大学玛格德林学院去留学。1924年12月溥仪称病不起,庄士敦陪同他躲进了德国医院。同时他到英国驻华公使馆去请求协助,遭到英国公使麻克类(Robert Macleay)的严词拒绝。从此,庄士敦与英国驻华公使馆的关系降至冰点。庄士敦只能通过一个过去的宫中奴才向溥仪传递口信。每年春节庄士敦都要穿上朝服,以显示他与当年皇上的特别关系。

1905年庄士敦担任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1927年复任威海卫行政长

①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②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官。再次回到威海卫,那儿的一草一木都使他感到亲切,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居然向英国殖民部提出了几个延期把威海卫归还中国的方案。1930 年 10 月 1 日,中国与英国就收复威海卫问题长达 9 年的谈判结束。民国政府派外交次长王家桢为接收专员,参加了行政长官署前的交接仪式。王家桢和行政长官庄士敦检阅了英国海军及苏格兰陆战队的告别仪式操练。11 时 30 分,英国人登舰准备离去,王家桢对庄士敦说:"请吃过午饭再走吧!"庄士敦用汉语回答说:"不行呀!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过了正午就是你们的天了。"

庄士敦返英后,由骆任廷推荐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文教授兼外交部顾问。亚非学院是英国最早开设中国文化讲座的院校,名师硕儒荟萃。老舍、蒋彝(Chiang Yee)、萧乾、刘若愚等不同时期、不同学科的中国著名学者曾经协助打造了这座金碧辉煌的汉学大厦。庄士敦虽然没有教学资历,却也是名校出身,博古通今,汉学教席由他补缺。1934 年他买下了苏格兰西部的克雷格尼希湖(Lock Craignish)上的三个小岛,建了几座小楼,分别命名为"松竹厅"、"威海厅"和"皇帝厅",陈列着从中国带回的古玩、书籍、朝服和顶戴等物,有时还在门前升起旧满洲国旗。这一年他完成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以怀旧的心态描述了溥仪逊位前后的种种变故。1935 年他向亚非学院告假半年到中国来见驾,给学校留下的联系地址是"满洲新京皇宫大内长官转交"。他终于在长春见到了久别的溥仪,挚手言欢,惆怅无限,但是对于皇上的挽留却婉言辞谢。1937 年庄士敦与伊丽莎白·斯巴肖特女士(Elizabeth Sparshott)结识后邀她在岛上同居。

这一年庄士敦的健康每况愈下,6 月请辞亚非学院获得允许。回爱丁堡后延医治病,自觉来日无多,回首往事,百感交集,于是让家人销毁他的全部书信文稿,留下了一桩桩无人知晓、无人可以排解的是非恩怨。1938 年 3 月庄士敦撒手尘寰。

他的主要著作有:《从北京到曼德勒:自华北穿越四川藏民区和云南到缅甸》(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ntan Such'uan and Yunan, 1908 年)、《华北之狮与龙》(Lion and Dragon in Northern China, 1910 年)、《中国人就基督差会事致基督教界》(A Chinese Appeal to Christendom concerning Christian Missions, 1911 年)、《佛教徒之中国》(Buddhist China, 1913 年)、《致传教士函》(Letters to A Missionary, 1918 年)、《中国戏剧》(The Chinese Drama, 1921 年)、《儒教

与现代中国》(Confuicianism and Modern China, 1934)、《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1934 年)等。

十、潜心研究中国民俗和方言的麦嘉温

英国传教士麦嘉温(麦高恩,John Macgowan, ? ~1922),1860 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和厦门传教。他精通汉语,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民俗民风和方言,著作颇丰。计有:《耶稣还是孔子——厦门差会的故事》(Christ or Confucius, Which or, The Story of the Amoy Mission, 1889 年),《中国通史》(A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Earliest Days Down to the Present, 1897 年,1906 年的修订版书名改为《中华帝国史》The Imperial History of China)、《华南掠影》(Pictures of Southern China, 1897 年)等著作。

1909 年麦嘉温在上海出版了《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Lights and Shadows of Chinese Life)一书。这是一部反映中国文化的代表作,记录了清末中国社会的三教九流和民俗民风,在低沉平淡的描述中读者可以感到了某种感染力量。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传教士纷纷到厦门和台湾传教。为了便于宣讲教义,传教士们借用罗马字系统先后编写了各类厦门音(与台湾闽南语在词汇和腔调上略有差异)英汉辞典。麦嘉温在这方面有突出建树,先后编写过《英华口才集》(A Manual of the Amoy Colloquial, 1869 年)和《英厦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Amoy Dialet, 1883 年),是为数不多的英汉方言辞典中有较大影响的两部。在他之前的这类辞典仅有:麦都思(Walter H. Medlhurst)在马六甲出版的《福建方言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l-Keen dialect of Chinese Language, 1832 年)、美国牧师打马字的《唐话翻字初学》(Tngoe hoan ji chho-hak, 1852 年)、罗啻(Elihu Doty)的《翻英华厦腔语汇》(Anglo-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 1853 年);在他之后的同类辞典有:杜嘉德的《厦英大辞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 of the Chang chew and Chin chew dialects, 1873 年)、打马字的《厦门音的字典》(E-mng-im e ji-tian, 1894 年)、加拿大牧师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的《中西字典》(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the Formasan Vernacular, 1893 年)、甘为霖

的《厦门话辞典》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1913 年)、巴克礼的《厦英大辞典增补》(Supplement to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1923 年)。这些方言辞典对于教徒们读经学经有很大帮助,客观上对于当地扫盲运动的开展和文化知识传播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十一、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汉学家慕阿德

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 1873 ~ 1957),生于杭州,其父慕稼谷(George Evans Moule, 1828 ~ 1912)1858 年来华,任安立甘会华中教区主教。慕阿德在中国度过童年后回英国上学。37 岁时再次来华在山东传教。1933 年接任翟理斯在剑桥大学的中国语言和历史教席,是一位研究中西交通历史的汉学家。

他的主要著述有《1550 年前中国的基督教徒》(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1930 年,国内有郝镇华译本,中华书局出版,1984 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证》(The Christian Monument at Si An Fu, with Catalogue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Society, 1858 ~ 1917)、《中国景教》(Nestorians in China: some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1940 年)、《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1949 年的中国统治者》(The Rulers of China, 221B. C. to A. D. 1949, 1957 年)、《行在考及马可波罗游记校注补遗》(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 1957 年)等。

第四章
国际化、专业化和团队化的现代英国汉学

20 世纪下半叶至现阶段英国的汉学进入了现代研究时期。

这一时期的研究普遍从书斋和研究室扩展到大学殿堂，逐渐形成了英国汉学研究结构和队伍，国际化、专业化和团队化为其主要特色。

1961 年发表的《海特报告》推动了英国的东方、东欧、斯拉夫和非洲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在若干所大学创办了中国研究中心或汉学研究学院。1986 年发表的《帕克报告》除了进一步确认亚洲和非洲语言和文化研究对于英国外交和商贸的重要意义外，还进一步扩大了汉学研究规模，完善或者改进了汉学研究机制，出版了核心刊物和文集。选题更加广泛，形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运作模式。政府部门和基金会的投资为研究人员的培养和聘用、调查和研究方式的现代化、国际汉学界的交流和互访、设备和条件的改善、成果的出版和应用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无论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看英国汉学都可与欧洲各汉学研究大国水平并驾齐驱，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英国 110 所高等院校中直接开设汉语课程的已达 10 余所，系统教授中国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等相关课程的院校大约有 20 所。代表人物有李约瑟、龙彼德、韦利、巴雷特、鲁惟一等人。长期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席的美籍汉学家德效骞也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物。

英国汉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出现了质的飞跃。

跟前一时期比较起来，汉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参与汉学研究的人数、新型人才的素养，汉学研究的涉科范围，汉学研究机构的设置，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和认同率，汉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汉学活动的类型、

频率和国际合作，汉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等等，都超越了过去。

这一时期，英国汉学研究机构不再依附于教会或者政府部门，资金来源除政府拨款外还有民间赞助、基金会和外国财团的襄助。各类研究所和高等院校已拥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专家和专业方向明确的学员，研究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汉语学习和学科素质的培养已经形成规模化和专业化。研究成果逐渐以商业产品形式被国内的外交、贸易、教育、文化、军事、宗教部门所采用。职业汉学家队伍已经形成，有相当多的汉学家能直接阅读四书五经、道藏佛典、《资治通鉴》、《永乐大典》、《清通典》等文献史籍和类书，能引用第一手资料撰写论文。其中一些人，不但通晓几种欧洲和亚洲语言，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福建话、广东话、上海话或者客家话，多次来华进行采集资料或者田野调查，甚至长期侨居中国。汉学刊物数量虽仍然不多，但是已经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汉学研讨内容被纳入本国研究所和高校的年度课题、专业会议和竞标项目，活动往往超越国界和洲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局面和贸易扩大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关注，英国政府和学术界为适应中英关系发展所做的努力，在不同程度上对汉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虽然《赵氏孤儿》和《好逑传》等中国文学作品曾分别于 1738 年和 1761 年就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但那只是个别零星的情况，早期的耶稣会士主要关注辞典和教科书的编写以及儒家典籍的翻译。直到德庇时、理雅各和翟理斯来华后，才开始翻译中国诗歌和散文。翟理斯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全译了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则》和 1880 年翻译出版的《聊斋志异选》（共选译故事 164 篇）、韦利 1918 年出版的《汉诗一百七十首》、德庇时 1929 年出版的《汉文诗解》和理雅各 1871 年的英译《诗经》，开创了中国文学被译介到英国的新纪元。中国文学作品的系列英译是中英两国文化交流日臻深入的产物，预示着英国汉学研究范围的扩展和新时代的到来，英国汉学家作为变化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都以超越前人的热情投身其中。

一、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现代英国汉学界

翟林奈(Lionel Giles, 1875 ~ 1958)出生于中国,曾用小翟理斯、翟林奈、翟来乐等汉名。其父翟理斯,其弟翟兰思(Lancelot Giles,1878 ~ 1934)曾先后在英国驻华各领事馆任职。

1900 年翟林奈进入不列颠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专职管理中文图书。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文书部分藏入该馆后,他开始汉文写本的编目、整理和研究工作,直至 1940 年退休。1919 年翟林奈根据不列颠博物馆图书与写本部的三种《秦妇吟》写本撰写了一篇论文,1923 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百周年庆祝会上宣读,得到了专家好评。后来他根据五种写本重新对论文进行修改和扩展,以《〈秦妇吟〉考证与校释》的书名发表。

翟林奈的译著主要有:《老子语录》(The Sayings of Lao Tzu,1905 年初版,以后多次再版)、《中国神秘主义者沉思录:庄子哲学选读》(Musings of a Chinese Mystic; selection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Chuang Tzu;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onel Giles,1906 初版,以后多次再版)、《孙子兵法: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论著》(Sun Tzu on the Art of War: The Oldest Military Treatise in the World,1910 初版,以后多次再版)、《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An Alphabetical Index to the Chinese Encyclopaedia, 1911 年)、《〈列子〉中的道家学说》(Taoist Teachings from the Book of Lieh Tzu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1912 年初版,以后多次再版)、《〈论语〉新译》(1920 年)、《孟子》节译本(The Book of Mencius: abridged,1942 年)、《敦煌六世纪》(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 London,1944 年,收录有关历史、地理、户籍、俗文学作品论文多种)、《中国列仙:传记选》(A Galery of Chinese Immortals: Selected Biographies,1906 年,1948 年再版)、《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卷子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 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中国神秘主义者沉思录》(Musings of a Chinese Mystic: Selections from the Philosophy of Chuang Tzu, 1959 年)等。

翟林奈出身于翻译世家,熟读汉籍,对于中国文化有较深入的了解。他的古汉语功底好,学风严谨,学养有素。由于长期从事汉籍和写本的管理,他善于鉴别不同版本的学术价值,熟悉读者的困难和需求,因此在动手

翻译前对于文本的选择，翻译时对于概念的准确把握，对于英汉对照和注释方法的运用等，都比同时代的翻译家略胜一筹。翟林奈翻译的中国古籍，如：《孙子兵法》、《论语》和《列子》等，忠实原著，译文流畅，比同类译著的质量高，受到汉学界的普遍好评。

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1885～1954）曾用汉名"苏瓦贝"，生于太原。他父亲苏道味（Arthur Sowerby，1857～1934）原籍美国，1881年以浸礼教传教士身份来华传教，77岁时在英国病逝。苏柯仁在英国读完中学和大学后，于1905年在天津英国教会书院任教。他是一位博物学家，平时喜欢观察自然环境，曾长期在山西、陕西、东北各省以及蒙古等地为不列颠博物馆采集植物标本。1923年他与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在上海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s）。福开森于1888年受美以美会委派到南京传教，曾创办汇文书院（南京大学），协助盛宣怀创办上海高等工业学堂（南洋公学），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顾问。他喜欢中国传统绘画，收藏过大量中国古董，发表过有关中国美术的专著。苏柯仁的学术兴趣与他的相同，平日彼此过从甚密。《中国科学美术杂志》原为双月刊，每年一卷。两年后改为月刊，1926年每年出两卷。从1927年起该杂志中文刊名更改为《中国杂志》，英文名称也相应改为China Journal。该刊以刊登短文为主，配以精美照片，风格清新明快，1941年终刊。

苏柯仁还先后担任过上海亚洲学会干事和会长。抗战期间生活坎坷，一度遭到日本人怀疑，软禁在家，失去了自由，后来还被押送到集中营。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英国。

苏柯仁的主要著述有：《华北的禽兽》（Fur and Feather in North China，1914年）、《中蒙边境狩猎和科学研究》（Sport and Science on the Sino-Mongolian Frontier，1918年）、《满洲的博物学家》（The Naturalist in Manchuria，1922年～1923年，五卷）、《一位侨居中国的博物学家笔记》（A Naturalist's Note-Book in China，1925年）、《博物学家海滨假日见闻》（A Naturalist's Holiday by the Sea）、《捕猎钓鱼杂忆》（A Sportsman's Miscellany）等。

叶女士（Evangeline Edwards Dora，1888～1957）的英文名字音译为"多拉"，其父为苏格兰长老会1913年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叶氏本人未承

父业,在华主要业绩是担任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校长4年。1921年被聘为伦敦大学汉学讲师,庄士敦退休后晋升为该校远东系主任和汉学教授。她生于中国,在中国接受过教育,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独到研究,主要著述有《唐代散文》(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he T'ang Period, A. D. 618~906,两卷,1937年~1938年)、《孔子》(Confucius, 1940年)、《中国十三经分类指南》(A Classified Guide to the Thirteen Classes of Chinese Prose,1948年)、《柳宗元与中国最早的风景散文》(Liu Tsung-yuan and the Earliest Chinese Essays on Scenery,1949年)等书。

二、韦利:出类拔萃的翻译家和汉学家

韦利(Arthur Waley,1889~1996)生于英格兰肯特郡,从小聪明、好学、思想活跃。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大卫·弗雷德里克·施洛斯(David Frederick Schloss)非常同情当时罗马尼亚犹太人的不幸遭遇。外祖父雅各布·韦利(Jacob Waley)原是伦敦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犹太人协会第一任主席。韦利在兄弟中行二,他的哥哥西吉斯蒙德·大卫·施洛斯(Sigismund David Schloss)曾任英国财政大臣,被授予过爵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孀居的母亲出于犹太人对德国的反感心理,让韦利改姓了自己娘家人的姓。

1903年韦利就读于拉格比公学,酷爱文学和语言。1906年获得奖学金进入了牛津大学的国王学院。三年的大学殿堂生活使他有机会接受迪金森(G. L. Dickinson)和穆尔(G. E. Moor)等众多名师的指点,得以广泛涉猎中国散文和诗歌,研究中国文学史、绘画史和思想史。其间他曾为学习语言和文学在德国和法国居住一年。1910年他因为角膜炎影响左眼视力,养病期间跟弟弟休伯特到欧洲大陆旅行。他们先到挪威滑雪,然后突发奇想要到叔叔的出口公司去做生意。往来于伦敦和南美的外贸工作对他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他却通过西班牙的一位朋友的关系在不列颠博物馆找到一份差事。1913年他成为该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总管助理。工作要求他必须掌握中文和日文,于是便首先学会认读馆藏中国书画上的题词和说明文字,日复一日,中文进步很快。

他终日进出于因刚刚建立还凌乱不堪的图书馆中,那种氛围使他产生了对于东方诗画的浓厚兴趣和激情。他觉得把那些中国古诗译成英文,不

论出版与否，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更希望身边的朋友能分享他的乐趣。诗人和文艺批评家托马斯·斯特恩斯·埃利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和罗杰·弗赖伊（Roger Fry）跟他是至交。埃利奥特鼓励他把翻译出来的中国诗歌送去出版，并建议他根据韵律节奏把版面设计成具有高低起伏的效果。但是当弗赖伊到一家出版商那儿去咨询时，对方首先问的是印刷的数量，他回答说20本，可出版商要求至少必须印行200本才够工本费，于是计划只好作罢。然而在韦利的心中对于中国古诗的热情始终未减。后来他花了几镑钱请一位印刷工人给他印了40首英译的汉诗，让弟弟跟他一起用家中剩余的墙纸作封面，装订成册，作为圣诞节的礼物分赠朋友。那个自费出版物虽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却标志着韦利学术生涯的开端。不列颠博物馆书画部的《通讯》刊发了有关韦利第一部诗集的消息，1917年《伯灵顿杂志》第1～2期，在登载韦利的第一篇文章《一幅中国画》的同时，还发表了他翻译的数百首唐诗和前唐诗。此后便有许多关于他的译作的评论见诸伦敦大小报刊和文艺副刊。1918年伦敦康斯坦布出版公司（Constable & Co.）出版了他的《汉诗一百七十首》，1919年纽约阿尔夫雷德·诺普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推出了他的《译自中文》，从此名声大振。

在《汉诗一百七十首》的《前言》中他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当代人完全可以接受的非常理性的社会，那儿重视肢体亲切接触而产生的友谊。这无疑是韦利本人的价值观，也是英国青年艺术家和作家的美学观点。韦利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认为那本诗集的求购数之所以一直不减的原因之一，是过去人们通常不读诗，因此它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1940年我在政府部门工作时，许多打字员小姐和女职员买了《汉诗一百七十首》让我签字。好几位对我说她们平时不看诗，在看到了我翻译的诗歌之前始终认为诗歌太专业太难懂。"

有些中国古诗确实太专太难，韦利只好不译。他选译的古诗都是不需要专门为外国读者作解释或者不需要音乐伴奏的作品。他的读者群始终都是广大民众，而不是学者或者爱诗小圈子中的人。

1918年韦利对比自己年长10岁的舞蹈批评家贝里尔·德佐特（Beryl de Zoete）产生了好感，后来两人同居到1962年她去世。其间他们一起去了巴厘、印度、斯里兰卡和巴西。贝里尔·德佐特也开始翻译外国作品，取得了好成绩。韦利终于找到了事业的切入点，而且也算已经成家立业。事

业上的成功使他一步步青云直上。1919 年他又出版了新作《译自中文续编》,第二年开始发表英译日文诗歌。此后他结识的作家学者和上流社会人士也越来越多。

1929 年韦利辞去了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的工作,表面上是他不愿做书画的编目工作,实际上是打算专心致志译书,觉得自己的稿费收入足以维持生计。1929 年春艾莉森·鲁滨逊闯入了他的生活,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接触。这一阶段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不仅仅被视为一位翻译家,而且也是与当代杰出的英国汉学家齐名的人物。他努力追赶时代新潮流,开始涉足新领域。

韦利始终关心学术界的最新动向,总想了解中国考古的新发现。1924 年中国"古史辨派"的报道见诸报端后,他就像许多英国学人那样非常认真阅读有关材料。韦利所了解到的事情是这样的: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部分受到西方学术观点影响的历史学家,如:顾颉刚、胡适和钱玄同等"古史辨派"人物,提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批判的观点。胡适倡导"整理国故",顾颉刚便开始对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进行了研究和辨伪工作。他们主张用社会进化论和大胆疑古的观点,借鉴西方社会学和考古学等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他们发起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并把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了《古史辨》八册。顾颉刚从疑古辨伪的角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批评梁启超对孔子的过度美化,认为六经不是孔子"托古"之作,也没有什么史学、哲理和政论的价值。顾颉刚还主张打破中国自古只有一个民族和地域统一的观点。这些观点给韦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他理解和翻译中国先秦古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尝试用崭新的目光来审视汉籍。1933 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易经》的文章,大胆提出了"经文中肯定保存着奥秘的神谕,而且在英国、欧洲、非洲、中国和日本都可以找到与其相似的典籍"的观点。1934 年他出版了研究《道德经》的专著,书中的长篇《导言》取代了通常由其他最权威的学者撰写的文章,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1937 年他出版了在民俗学观念指导下翻译出来的《诗经》,第二年又推出了《论语》。他主观意识到自己学术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很想知道他通过普通商业渠道发表的译本在民众读者群中的反应。他在《论语·序言》中写道:"此书多少有点枯燥,有点技术性。但是我不希望被人认为我确已为了追求学问而放弃了文学,或者忘记了普通读者的要求。我

的下一本书是《中国古代的三种思维方式》，将完全没有专门用语，跟这本孔子语录有很大差别。"后来他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剑桥大学哈隆教授的帮助下，他了解到他的专著所涉及的那个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学人的精神世界。韦利在自己的书中时不时抒发议论，但那既不是哈隆观点的扩展，也不是为读者越俎代庖的分析，仅仅是一种三言两语的点拨。

1940 年他担任英国军情处的检查员，审阅过中国驻英记者萧乾等人发自伦敦的中文新闻稿，也检查过日本商人字迹潦草、语法不通的电报，有关细节他在战后的诗文中都有过自嘲式的追忆。

1945 年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授予他荣誉研究员称号，1948 年伦敦东方学院授予他名誉讲师称号。1952 年他获得了大英帝国勋位，1953 年他被授予了女王诗歌奖章。

1958 年他出版了《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看法》一书。跟以往著作不同的是，那是一本反帝的史书，也是一本与诗歌翻译无关的专著。他曾表示过不列颠博物馆应该把斯坦因运回去的部分中国文物归还中国。不幸韦利早在 1956 年获得的荣誉勋位因此被取消，但是这一年日本政府却授予他二级勋章，以表彰他翻译日本文学名著所作的贡献。此后他深居简出，有时好不容易被到访英国的热心读者找到，他便设法馈赠他们一些稀奇古怪的纪念品表示感谢。

韦利在学术讨论和社交场合中都不善言辞。曾经有人请他去剑桥大学替补哈隆教授的空缺，但他却说："那不如让我死了好！"学术生涯的那种重负使他畏惧，当然也不是谁都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1948 年他被聘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名誉讲师之后，他参加过多次人文学科考试，讲过课，也主持过课堂讨论。那时的讲课和课堂讨论经常被沦为一种模式，一组学生按照老师的事先布置议论了一通之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韦利也往往端坐教室一角，不知如何引导学生深入讨论。

韦利一生共著书 27 部，撰文数十篇。主要有：《宋玉〈风赋〉》（The Man Wind and the Woman Wind，1917 年，1918 年）、《登徒子好色赋》（Master Teng-t'u，1919 年）、《汉诗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 年）、《译自中文》（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1919 年）、《译自中文续编》（More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1919 年；1941 年）、《日本诗歌》（Japanese Poems，1919 年）、《（白居易）〈游悟真寺诗〉及其他》（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1923 年）、《司马相如〈子虚赋〉绪言节

译》(Tzu-hsu fu [introduction only],1923 年)、《逐贫赋》(Driving Away Poverty,1923 年)、《中国画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1923 年)、《玉延寿〈鲁灵光殿赋〉》(1923 年)、紫式部所著六卷本《源氏物语》(The Tales of Genji, 1925 年 ~ 1933 年)、清少讷言《枕草子》(The Pillow-Book of Sei Shonagon, 1928 年)、《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1933 年 ~ 1934 年)、《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 年)、《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看法》(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1958 年)、《中国古代三大思维方式》(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1939 年,1940 年)、《西游记》(Monkey: A Folk Tale of China,1942 年)、《中国诗歌》(Chinese Poems, 1946 年)、《蒙古秘史及其他》(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nd other Pieces, 1964 年)、《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 772 ~ 846 A. D. ,1949 年)、《真正的唐三藏及其他》(The Real Tripitaka and other Pieces, 1952 年)、《袁枚:十八世纪的中国诗人》(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1956 年,1957 年)、《李白的诗歌及其创作道路》(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1959 年)、《白乐天》(日译本,1959 年,1987 年)、《敦煌曲子词与话本》(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 an anthology,1960 年)、《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1963 年)、英译李志常的《炼金术士之旅:道士印度之行》(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The Journey of the Taoist Ch'ang-ch'un from China to the Hindukush at the Summons of Chingiz Khan, Recorded by His Disciple Li Chih-ch'ang,1963 年)、英译王弼的《老子注》(《道及其力量:老聃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The Way and its Power: Lao-Tan and its Place in Chinese Thought,伦敦 1934 年版,后五次再版)。

下面节录的是 1937 年韦利翻译的《论语·公冶长第五》的片断:

原文

一、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二、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三、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链也。”

四、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 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五、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六、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七、孟武伯问子路仁乎? 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八、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九、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於予与何诛?”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

十、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刚?”

十一、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译文](第七段原文可能部分脱落)

- The Master said of Kung-ye Ch'ang that he might be wived; although he was put in bonds, he had not been guilty of any crime. Accordingly, he gave him his own daughter to wife.

  Of Nan Yung he said that if the country were well governed he would not be out of office, and if it were in governed, he would escape punishment and disgrace. He gave him the daughter of his own elder brother to wife.
- The Master said of Tsze-chien, "Of superior virtue indeed is such a man! If there were not virtuous men in Lu, how could this man have acquired this character?"
- Tsze-kung asked, "What do you say of me, Ts'ze!" The Master said,

"You are a utensil." "What utensil?" "A gemmed sacrificial utensil."

- Some one said, "Yung is truly virtuous, but he is not ready with his tongue."

  The Master said, "What is the good of being ready with the tongue? They who encounter men with smartness of speech for the most part procure themselves hatred. I know not whether he be truly virtuous, but why should he show readiness of the tongue?"
- The Master was wishing Ch'i-tiao K'ai to enter an official employment. He replied, "I am not yet able to rest in the assurance of this." The Master was pleased.
- The Master said, "My doctrines make no way. I will get upon a raft, and float about on the sea. He that will accompany me will be Yu, I dare say." Tsze-lu hearing this was glad, upon which the Master said, "Yu is fonder of daring than I am. He does not exercise his judgment upon matters."
- Mang Wu asked about Tsze-lu, whether he was pea thousand families, or a clan of a hundred chariots, Ch'iu might be employed as governor, but I do not know whether he is perfectly virtuous.

  "What do you say of Ch'ih?" The Master replied, "With his sash girt and standing in a court, Ch'ih might be employed to converse with the visitors and guests, but I do not know whether he is perfectly virtuous."
- The Master said to Tsze-kung, "Which do you consider superior, yourself or Hui?" Tsze-kung replied, "How dare I compare myself with Hui? Hui hears one point and knows all about a subject; I hear one point, and know a second." The Master said, "You are not equal to him. I grant you, you are not equal to him."
- Tsai Yu being asleep during the daytime, the Master said, "Rotten wood cannot be carved; a wall of dirty earth will not receive the trowel . This Yu,—what is the use of my reproving him?"

  The Master said, "At first, my way with men was to hear their words,

and give them credit for their conduct. Now my way is to hear their words, and look at their conduct. It is from Yu that I have learned to make this change."

- The Master said, "I have not seen a firm and unbending man." Some one replied, "There is Shan Ch'ang." "Ch'ang," said the Master,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is passions; how can he be pronounced firm and unbending?"
- Tsze-kung said, "What I do not wish men to do to me, I also wish not to do to men." The Master said, "Ts'ze, you have not attained to that."

《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弟子之弟子记录整理而成的书，口语风格，文简旨远，词约义丰，从这一点看无论理解还是翻译都不可能太难。虽然成书于春秋战国，但基本上是一部语录体散文，与其他先秦汉籍比较起来更显得言简意赅，直白晓畅。然而它又确实是一部难读难译的书，因为它是儒学中最主要的经典，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道德、历史诸多方面的背景和知识。再者，《论语》版本多。孔子去世后儒家分衍成了至少八个流派（一说十八派），汉代传习的《论语》版本就有《齐论语》、《鲁论语》和《古文论语》之别，文字、篇名和篇数都不一致，许多后代学者对其中一些章句都有迥然不同的理解和看法。这些信息都可能由侨居英国的中国学者和返国的英国汉学家带到了大学课堂。即便是当代印行的《论语》，句读的不同就可能给翻译增加许多困难。例如本篇中的"女器也"与"女，器也"；"孟武伯问子路：'仁乎？'"与"孟武伯问：'子路仁乎？'"至于流传到英国的译注本大约有邢邴疏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上述情况，都可能给韦利翻译《论语》增加许多困难，一般读者可以回避的问题，译者是无法回避的。好在他能充分利用工作关系，从不列颠博物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借到各类参考书，可以向他身边的中国学者求教。据萧乾在《欧战杂记》中记述，20 世纪 30 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赴德顺访伦敦时曾跟韦利切磋中文十余天。那时他的中文水平已经很高，因此两人探讨的很可能跟韦利当时翻译《论语》和撰写中国古代三大思维方式等专著的事情有关。《论语》原文包含语录、对答和简短记叙三种体式，其语言风格体现了直白明快、质朴近

本,但是又隽永典雅,含蓄厚重。这符合孔子平易近人的特点,也表现了为师者庄重简默诲人不倦的作风,以及在倡导诗学修养的孔门弟子中师生之间对话的哲理性和启迪性。从《论语》的版本选择和译文整体来看韦利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除个别地方外,他的理解和翻译都比较到位。最难能可贵的是译者尽了最大努力再现原文风格。这些翻译技巧主要体现在:1. 大量使用英语短语和单句,使记言和问答口语化,如:"You are a utensil"(女,器也)"What utensil?"(何器也?)"A gemmed sacrificial utensil."(瑚琏也),"Tsze-lu hearing this was glad"(子路闻之喜);2. 酌情使用英语兼类词,镜像古汉语的词法构造,如:"可妻也"(might be wived);3. 使用仿古句式,如:"I know not whether he be truly virtuous"(不知其仁)和倒装句"Of superior virtue indeed is such a man"(君子哉若人),但是分寸得当;4. 使用书卷气较浓郁的句式,但是不铺张浮华,如:"They who encounter men with smartness of speech for the most part procure themselves hatred"(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I am not yet able to rest in the assurance of this"(吾斯之未能信——"吾未能信斯"的倒装句)。从总体上看,韦利的译文非常贴近现代英语读者的欣赏水平,也再现了早期儒学文体的特色。韦利译文中的错误也在所难免,例如他把"吾与女弗如也"译为"I grant you, you are not equal to him(没错,你不如他)"。

韦利的译著数量多,影响广,其中一些书籍多次再版。德国作家布莱希特早在1939年出版的《中国诗歌》中就转译了韦利翻译的七首中国古诗。他英译的两本道教经书被欧美汉学界视为经典译本。他编著的《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法》先后被转译成德文和法文在汉堡和巴黎出版。紫式部的《源氏物语》、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古典文学瑰宝,深刻表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百态和价值观念,文字细密蕴藉,刚柔兼具,韦利成功地译出了其中的前两部。虽然一些英国汉学家经常批评他的译文不忠实原文、不符合翻译规范,但是因为韦利所选原著都是经典名著,他本人的英文修养极好,他的诗人气质和语感赋予了译文很强的可读性,使之畅达优美,因此深受读者欢迎。

林语堂认为韦利译文出类拔萃,例如他翻译的《道德经》就有不少佳句,所以林语堂在自己的译本中也从中选用了一些。韦利翻译的《诗经》、中国古诗和乐府都不用韵,这与其说是翻译中的一种大胆尝试,倒不如说是他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的一种巧妙变通,却也能达雅兼顾。翻译界对于

“以诗译诗”的观点一般都持认同的态度。但是因为汉诗平仄互协的规则与英诗格律差别太大，没有也不可能有成套的对应规则可以遵循，只有像理雅各和翟理斯那些有深厚功底的学者才能出奇制胜。韦利1937年推出的新译《诗经》，打破了风、雅、颂的分类，完全按照内容组合，其实从汉籍的翻译角度来说并不够严肃，使他的译本丢失了部分文化精髓，成为类似史论中的“戏说”版本。他也确有一些译错的地方，但这对于外国译者，特别是自学成才的译者，即便是佼佼者也是在所难免的，可以得到读者的谅解。他的译著对于现代诗人威廉·巴特勒·耶茨（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和埃兹拉·卢米斯·庞德（Ezra Loomis Pound, 1885～）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韦利完全靠自己刻苦努力和书本知识的营养成为举世闻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他也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他向广大英语读者介绍了中日优秀文化，为20世纪东学西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乔纳森·斯潘塞（Jonathan Spence）说：“亚瑟·韦利采撷了中日文学中的瑰宝悄然佩戴于胸，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他更了解中国和日本民族的西方人大有人在，也许其中一些人能同时娴熟驾驭中日两种语言。但是他们都不是诗人，而那些比韦利更优秀的诗人却又不懂汉语和日语。令人震惊的是，韦利所选译的那些作品大多不为当时的西方人所知，因此意义非凡。”①

韦利晚年时贫病交加，贝里尔·德佐特得了舞蹈病，他本人不能握笔写字，每天为她朗读的都是与汉学无关的书。伦敦大学曾催促他搬出学校的房子。1962年贝里尔·德佐特去世前韦利把家搬到了伦敦郊外的海格特。他平日写点小文章，发表一些短评，研究蒙古语和阿伊努语，做些迎合潮流的事。1966年他不幸遇车祸，检查身体时发现已患脊椎癌。一位笨手笨脚的护士在把他抱到病床时再次摔断他的脊椎，使他的病情加重。与他正式结婚后的艾莉森·鲁滨逊终日守在他的病榻旁，直至他去世。

在葬礼中，亲友们悲声齐颂《孟子·牛山之章》：“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没有人能考证出韦利生前是否读过《孟子》中的这篇美文。但当他的亲友——红颜与白发并立于区区数平方英尺

① Jonathan Spence, 1975. *The Explorer Who Never Left Home ——Arthur Waley.*

的坟茔之前，悲壮地吟诵着儒学经文目送他走向人间终极，此情此景，谁能不为这哀悼逝者的安魂曲所感动？谁能不对于未来世界美德复归的呼唤而深思？

三、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汉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生于伦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哈里街（伦敦医生聚居的著名街区）的内科大夫，母亲是一位天资聪颖的音乐家和作曲家。他家有一个藏书丰富的书房，其中宗教和哲学的书籍最多，当年壮志未酬的李约瑟不知在那儿度过多少个忘寝废食的白天和夜晚。

1918年李约瑟在剑桥大学岗维尔－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攻读胚胎生物化学专业。虽然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并没有“子继父业”的风尚，但是父亲对于他的潜移默化影响却是无处不在的。直到花甲之年他仍在剑桥书房的壁炉架上恭恭敬敬地摆放着父亲身穿英国红十字会制服的照片，这不仅仅是为了缅怀故去的亲人，而且还表达了一种时刻牢记父亲的悉心教诲的心态。

李约瑟大学时代最崇拜的教授是英国现代生物化学的早期开拓者霍普金斯（Frederic G. Hopkins，1861～1947），除了他的学识和为人外，还因为当时许多剑桥学子都被告知未来社会将是原子和分子的世界。1922年李约瑟大学毕业后霍普金斯为他争得了一份奖学金，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是《环糖的代谢机制》，从恩师处获取了不少灵感。1924年他在岗维尔－凯厄斯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被聘为该校研究员，1933年晋升为高级讲师。他在霍普金斯教授实验室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多年，成果丰硕。1931年他曾出版一部三卷本的《化学胚胎学》（Chemical Embryology）专著，并在该书的《引言》中对胚胎学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42年他又出版了一本《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Biological Chemistry and Morphogenesis），他毕生从事的科技发展史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迈出第一步的。

在研究自己专业的同时他对于宗教、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兴趣未减。他阅读过许多与此有关的书籍，并留心观察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1925年他曾经编辑出版过一本《科学、宗教和现实》（Science，Religion and

Reality)的书,收录了韦布(Clement C. J. Webb, 1865 ~ 1954)、埃丁顿(Eddington, 1882 ~ 1944)和马利诺夫斯基(Malinowski, 1884 ~ 1942)等学者有关哲学、天文、宗教和巫术方面的文章。李约瑟编入该书的自己文章是《机械生物学与宗教意识》,主要探讨了"生物学的哲学"。这里所说的"哲学",在早期英语的学科词库中包含着有别于现代"哲学"的含义。例如拉丁语语法曾用经院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的理论来解释,18 世纪法国唯理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也把语言的规则与哲学系统联系在一起来研究。李约瑟所说的"哲学"是以高屋建瓴的目光关注研究生命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他没有局限于从学科范畴和专业兴趣角度来分析阐述观点,不满足用化学分子式或者物理公式来演示生物存在的奥秘,在当时算是相当前卫的了。这一治学态度始终贯穿于他后来主持编写的中国科技史的系列论著中。从这本书的编辑思路也可以清楚地解读后来他为什么对于中国道家的炼丹、养生、风水、古代房内术以及《易经》等情有独钟的原因。

李约瑟还跟剑桥大学的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学习过汉语。他学习的第一本汉语古籍是《管子》,为他的文言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2 年李约瑟受命于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随同该协会代表团访华,在重庆和昆明等地做文化联络工作,组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通信研究员,协助中国科研单位和各大学重建科研组织,考察教学、科研以及图书和设备的使用情况,推动战时中国后方的工业和科技活动以及对外交流工作。不久他又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身份再次来华。在华的四年生活对于他的学术生涯具有重要意义,他游历了大后方的许多地区,结识了中国知识界的许多著名学者、科学家和政界人物,直接接触了大量中国文献典籍,寻访了历朝的文化古迹。对于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制造历史的了解使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觉得需要对中国人几千年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进行更全面的研究,以便向世人展示其真实的历史。

1946 年春他离开重庆前往巴黎,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时的教科文组织尚未形成规模,他经常奔走于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等地之间,以无比的耐心和毅力劝说有关当局同意把自然科学纳入该机构的功能范围。大功告成之日,他荣膺该机构自然科学部首任主任之职。平日公干之

余,他总是不忘收集有关中华文明和科技发展历史的资料,并开始着手撰写文章。1948 年他在教科文组织任职期满后回到了剑桥。这座大学城的草地、廊桥、花坛和剑河对于他来说都是亲切难忘的。他曾经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追求过理想和爱情,开始了艰难和漫长的学术生涯。昔日的课堂和书斋,如今又成了他的基地和家园,心中感慨无限。后来除了短期出访外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儿。

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和岗维尔-凯厄斯学院研究员,他回国后的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紧张中度过的。1955 年他应聘参加了由世界和平理事会发起成立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证。他鲜明的政治态度曾引起一些英国学者的误解和非议。1966 年至 1976 年他一直担任岗维尔-凯厄斯学院院长职务。70 年代后任英中友好协会和英中了解协会(SACU)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访问。1984 年应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的邀请他和鲁桂珍访问了台湾。

李约瑟的私人感情生活是丰富而又坎坷的。作为外交官,在大庭广众之中他曾经是鲜花和美酒中的座上客,是为数不多能用拉丁文致祝酒词的官员之一,但是在谈判桌上他却又是说客和代言人,往往穷于应付,苦不堪言。作为教授和院长,他的府邸曾有过厨师和花匠,在无数次学术界应酬和师生聚会中也风光过,但是在书斋中长期疲于奔命,冥思苦想后的孤寂,却又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1976 年辞去院长职务后原有的每月生活津贴随恭维和请柬一起失去,一度为筹措研究经费赴美求助,却又因为二十几年前调查美军细菌战的官司而遭美国领事馆的拒签,无奈地徜徉于加拿大客舍中的情景谁能知晓?相濡以沫的爱妻李大斐(Dorothy Moyle,1896~1987)在他艰难的日子里身患重病,令他悲伤,只有周六下午与好友漫步于剑河旁,谈皇权论婚嫁饮咖啡才使他略得几分宽慰。

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除了他本人毕生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和努力外,还得益于各国学者的先后加盟和鼎力相助。有中国学者,海外华人学者,还有英国、美国、德国、波兰、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其中贡献突出的有:鲁桂珍、王铃(Wang Ling, 1917~1994)、何丙郁(Peng-Yoke Ho)、罗荣邦、黄兴宗、屈志仁、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鲁惟一、席文(Nanthan Sivin)、迪安(Albert Dien)、白馥兰(Francesca Bray)、叶山(Robin Yates)、狄特·库恩(Dieter Kuhn)、卜德(Derk Bodde)、卜鲁

(Gregory Blue)、卜正民(Timothy Brook)、石施道(K. Gawlikowski)、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麦克尤恩(E. McEwen)、丹尼尔斯(C. A. Daniels)、孟席斯(N. K. Menzies)、哈布斯米尔(C. Harbsmeir)、彼得·戈拉斯(Peter J. Golas)、雅诺什·梅里亚斯基(Yarnosch Meliasky)、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贝思朗(John Berthrong)、瓦格纳(Donald Wagner)等人。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分属于不同年龄段,有自己的社会背景和信息资源,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也许还有代沟。他们共同的丰硕成果的取得,不仅仅有图书室、办公室和田野调查的艰苦付出,也包含着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争论、修正和协调。据何丙郁回忆:"长期以来,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们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索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①

王铃博士,号静宁,是李约瑟的最得力的合作学者之一。他的祖籍南通,1943 年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李约瑟结识,1946 年移居剑桥,1957 年移居澳洲,两人的情谊和书谊堪称学人风范。在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一、第二和第三分册、第五卷第六和第七分册中,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李约瑟曾经不止一次感激地说过,没有王铃的鼎力合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就不可能跟世人见面。后来王铃任教于澳大利亚国立堪培拉大学,但是旧友情深,还经常回到剑桥看望李约瑟和其他同事。

何丙郁(1926～)是哲学和理学博士,先后任新加坡大学物理系教授、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主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格里菲思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亚洲研究学院教授兼院长、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主任。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研究课题涉及天文、数学、气象、炼丹诸多方面,是国际著名的科学史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长期与李约瑟合作共事。

1995 年 3 月 24 日李约瑟在剑桥家中安详辞世,按照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埋葬在研究所院中的菩提树下。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的国内中文版译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系采用美籍学者冀朝鼎博士为原著题写的书名而定名。这是李约瑟和志同道合的学者们长期奋力投入的庞大学术工

① 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遇》,载《中华读书报》,2000 年 8 月 9 日。

程(英文简称为 The SCC Project)。在卷帙浩繁的史书中寻找尘封千年的题材和资料,在堆积如山的文件夹和卷宗中考证史实的真伪和价值,把平日的社交和应酬缩小到最低限度,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岗维尔-凯厄斯学院的书斋里埋头工作。

1948 年 5 月 18 日李约瑟在致剑桥大学出版社社长罗伯茨(S. C. Roberts)的一封信中写道:"应该说我觉得自己能胜任此项工作,因为我担心如果我不用些时间去做,也许很多年后才会出现别的有资格的人来完成它。要把眼前的命题做好,需要一位占有大量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能干科学家,而且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欧洲科学史和科学思想的知识,并在此方面做过创造性的工作,具有必要的汉语水平,不依靠翻译就能读懂文章并能查阅原文,他本人在中国生活过,曾有机会接受过中国学者的指导。我深知个人才疏学浅,但觉得比起其他对此题材感兴趣的人来说更接近这些要求。……我要说的是自己坚信,此项工作有助于国与国之间的了解,特别是日后其他人能寻找到某种更通俗的方式来诠释书中结论时,更是如此。我在中国时确实有过这样一个印象:有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和科学家,对于是什么原因妨碍了他们的伟大文明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问题感到有些迷惑不解。整个亚洲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焦虑',因为他们知道今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妨碍他们独立地把科学工作做得像西方人一样出色。…… 倘若欧洲也像中国一样受制于那些妨碍他们的因素,那么我们这里也可能出现不了伽利略、格斯纳和牛顿。我认为,对于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的更好了解是重要的,这样可以消除长期盘踞我们心中的错误概念:认为中国纯粹是一个农业和艺术国度,此为其一;中国人自己对于希伯莱预言书、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律也应该增加更多认识,欧洲发明技术耀眼光辉在他们面前往往使得这些文明显得黯然失色,此为其二。"①

罗伯茨原来认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长度以一册为宜。李约瑟表示同意,但是要求该书的容量为 600 页至 800 页之间。1954 年第一卷出版后在西方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超出他们的意料。此后在一卷又一卷脱稿付梓的同时,新的题材和史实一个又一个地被发现。李约瑟要求助手们"把每一块石头都翻一个个儿"(leave no stone unturned, 意思是:想方设法,把所藏的中国史书都认真通读几遍)。因为第四卷的容量太大,只好分

① 译自 *Joseph Needham's Proposal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成三分册出版，于是以后数卷的编写计划也不得不作了相应的调整。从第一卷到第四卷，李约瑟在同事们的协助下自己执笔。从第五卷开始，每分册由一人按照原来设计的指导思想和体例撰写，最后由他定稿。为了更好地开展这一举世瞩目的学术工程，李约瑟邀请了更多学者加盟。主持这样一项被学术界称之为“里程碑的项目”，其复杂性和挑战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在同事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科技经理”(science manager)，李约瑟本人也引以为荣。

李约瑟自1976年卸任岗维尔－凯厄斯学院院长的职务后研究经费入不敷出，项目几乎无法进行，生活难以为继。在此困难时刻他得到了美国、香港、日本和英国等地个人和财团的资助，成立了东亚科技史管委会(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在鲁滨逊学院内建成了李约瑟研究所(The 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

东亚科学史管委会组成团体包括香港的东亚科学史有限公司(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Inc.)和纽约的东亚科学史基金会(East Asia History of Science Foundation)。按照英国法律该管委会作为慈善机构注册，由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前院长、英国学术院院士杰弗里·劳埃德爵士(Sir Geoffrey Lloyd，音译)任主席，全力支持“由一个人发起的最大型历史综合和多文化交流的单项计划：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它资助李约瑟在剑桥大学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帮助组建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和李约瑟研究所。杰弗里·劳埃德主席向剑桥大学行政当局报告了管委会的组建和活动计划，并获准加强李约瑟研究所与剑桥大学东方学院之间的联系，共同筹措资金，拟设专职院长，增加教学和研究席位，扩大李约瑟业已展开的中国科技文明研究领域。

东亚科技史图书馆(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位于鲁滨逊学院(Robinson College)内，专门为李约瑟和同事们编写中国科技和文明史而设，同时也对世界各国研究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学者开放。原来的馆址在岗维尔·凯厄斯学院，随着研究工作的扩大，图书资料的增加，不得不多次搬迁。1976年李约瑟卸任岗维尔—凯厄斯学院院长之职后馆藏图书搬出，1991年新馆落成。馆内收藏着中文、日文、英文和其他文字有关中国科技史、数学和医学的图书数万种，包括大量重要文集和20,000余册单行本，订阅了大批不为欧洲各地图书馆所拥有的中文期刊，其中英文的50多种，汉语的110种，日文和韩文的若干种，以及微缩胶片、手稿、笔

记、照片、地图等资料。部分图书是李约瑟从1937年以来自己购买的，大部分是从中国和世界各地采购来的，包括《道藏》、《大藏经》、《四库全书》、《图书集成》等重要典籍。藏书数量目前仍在逐步增加，目标已达到中国科技研究图书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该馆的电子编目工作已经开展多年，为的是向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开放远程调阅业务，提供各种重要参考信息。

1990年李约瑟因为健康原因辞去了研究所所长职务，由何丙郁继任。何所长鉴于所内经费紧张，一直没有领工资。1995年9月，副所长古克礼和东亚科技史图书馆馆长约翰·莫非特(John Moffett，音译)访问了北京和香港，向中国资深学者咨询如何保持研究所的科研优势，在科技史领域扩大与中国学术机构的合作。他们在香港会见了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主席，在北京先后访问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冶金史研究所、科技大学、社科院图书馆、科学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医学院、中国社科院档案馆等单位，并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续签了三年的购书合同。

为增加经费来源，研究所改革了管理体制，根据市场要求扩大科研项目，于2001年制订了一项中国科技史电视专题片制作的五年计划，拟向世界各国发行拷贝，将所得部分收入贴补研究所的经费。2002年研究所在世界范围内公开招聘所长，原任副所长古克礼竞聘成功。研究所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研究，编写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制定的出版计划是7卷34分册。

李约瑟的毕生著作等身，除了《化学胚胎学》、《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和许多演讲、感言和短文外，他的重要论著和文章还有：《唯物主义与宗教》(Materialism and Religion，1929年)、《赞美者的马克思主义》(Laudian Marxism，1932年)、《基督教与社会革命》(合作编写，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1935年)、《平等主义者与英国革命》(Levellers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1939年)、《基督教和共产主义》(Christianity and Communism，1939年)、《中国的科学》(Chinese Science，1945年)、《科学前哨：中英科学合作馆文件汇编》(Science Outpost：Papers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1942～1948，1948年)、《欧洲和亚洲的对话——在英中友协的主席致词》(The Dialogue of Europe and China——Predential Address to the Britain-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1955年)、《中国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Iron and Steel Technology in China，1958年)、《人类法则与自然法则》(Human Law and

the Law of Nature, 1961 年)、《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The Grand Titration: 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1969 年)、《欧洲和中国在普世科学革命中的作用》(The Roles of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Revolution of Oecumenical Science, 1967 年)、《中国和西方的职员与工匠》(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West, 1970 年)、《中国的科学与西方》(La science chinoise et L'Occident, 1973 年)、《历史与人类价值》(History and Human Value: a Chinese Perspective for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hilosophy and Social Action, 1976 年)、《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科学史的编修》(与 Gregory Blue 合编,Heterodox Marxism and the Historiograhpy of Chinese Science, 1997 年)等。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业已问世的部分和计划编写的部分是:第一卷《导论》(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李约瑟主编,王铃协助,1954 年出版。第二卷《科学思想史》(History of Scientific Thought),李约瑟主编,王铃协助,1956 年出版。第三卷《数学与宇宙学》(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 of Heavens and Earth),李约瑟主编,王铃协助,1959 年出版。第四卷《物理和物理技术》(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第一分册《物理学》,李约瑟主编,王铃和肯尼斯·罗宾逊协助,1962 年出版;第二分册《机械工程》,李约瑟主编,王铃协助,1965 年出版;第三分册《土木工程和航海》,李约瑟主编,王铃和鲁桂珍协助,1971 年出版。第五卷《化学和化学技术》(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第一分册《造纸和印刷》,钱存训主编,1985 年出版;第二分册《炼丹术:金子的转换与长生不老药》,李约瑟主编,鲁桂珍协助,1974 年出版;第三分册《历史综述:从朱砂到合成胰岛素》,李约瑟主编,何丙郁和鲁桂珍协助,1976 年出版;第四分册《装置与理论》,李约瑟主编,鲁桂珍和席文协助,1978 年出版;第五分册《生理炼丹术》,李约瑟主编,鲁桂珍协助,1984 年出版;第六分册《军事技术:火箭与攻城》,叶山主编,王铃、石施道、麦克尤恩协助,1995 年出版;第七分册《火药的史诗》,李约瑟主编,何丙郁、鲁桂珍和王铃协助,1987 年出版;第八分册《射击武器和骑兵》,迪安和罗荣邦主编;第九分册《纺织技术》,狄特·库恩主编,1987 年出版;第十分册《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库恩主编;第十一分册《非铁金属冶炼术》,富兰克林和贝思朗主编;第十二分册《冶炼和采矿》,瓦格纳主编;第十三分册《采矿》,彼得·戈拉斯主编,1999 年出版;第十四分册《盐业、墨、漆、颜料、染

料和胶粘剂》。第六卷《生物学和生物技术》(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第一分册《植物学》,李约瑟主编,鲁桂珍和黄兴宗协助,1986年出版;第二分册《农业》,白馥兰主编,1988年出版;第三分册《农村产业和林业》,丹尼尔斯和孟席斯主编,1996年出版;第四分册《园艺和植物技术》;第五分册《动物学》;第六分册《酿造和食品科学》;第七至第十分册《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和药学》。第七卷《社会背景》(The Social Background):第一分册《初步思考》;第二分册《经济结构》;第三分册《语言与逻辑》哈布斯米尔主编,1998年出版;第四分册《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最后结论》。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已被先后译成日、法、意、西等国文字,得到广泛的好评。文革时期,我国科学出版社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书名出版过若干卷,但是与原著的卷名不对应。20世纪80年代末,由各学科专家正式组成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卢嘉锡出任主任,并专门设立出版翻译办公室,译稿定稿后交付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潘吉星主编的《李约瑟文集》,199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潘吉星主编的《李约瑟集》,1999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李约瑟文献50年》。1968年在第十二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李约瑟被授予了乔治·萨顿奖章。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自然科学部主任,出版了《李约瑟: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物》(Joseph Needham: 20th-Century Renaissance Man),对他在促进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问世,既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也蕴含着一种精神的感召力,其意义和影响是超世纪的。李约瑟和同事们通过《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首次用西方所熟悉的语汇成功地解读了巨大的中国自然和社会科学文库,系统地向西方读者论述了中国历代的重要科技成就,展示了中国几千年五彩纷呈的人文视野,把中华文明作为西方文明之外的典范向世人介绍。无论从编写的时间跨度、学术资源的开发或者研究人员的眼光和胆识来看,这一巨大学术工程都是史无前例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

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教授施博尔(Kristofer M. Schipper)等主持的《道藏工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欧洲汉学协会发起,欧洲科学基金会赞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有关科研机构参与,来自欧洲各国的25名青年和年长学者,同时在巴黎、罗马和维尔茨堡三地分小组进行工作,对《正统道藏》和《续道藏》的经文内容、年代、作者和时代背景进行归纳、分类、翻译和编排,最后输入电脑数据库,打印成册,以供检索、助读和研究之用。经文摘要长达百万字,并译成了多国语言。这也是一项耗资巨万、费时十余载的世界工程。但是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与上述两项工程比较起来显然还有伯仲之分,前者无疑是当今汉学界的一项最具有经典意义的杰出成果。

李约瑟和他的同事们从比较科技史和中外科技交流史的角度,凭借专业集体的智慧,对中国在数千年文明史上的重大成就进行了分类、描述、比较和评估。他们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冶炼炉和钢铁冶炼技术,公元前18年以来中国人对太阳黑子、超新星、日食和彗星的观察,汉初中国人开始使用的胸带挽具,宋人秦九韶的解高次方程法,850年《真元妙道要略》中记载的硝石、硫磺和木炭等火药构成要素,1000年中国医生如何为预防天花接种疫苗,1080年沈括提出的磁偏角理论,1090年开封水运仪象台的机械钟的计时价值,叶梦得在《云水录》记载的从尿液中提取性激素的方法,以及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对414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的记述,等等。一桩桩,一件件,有依据,有史证,有分析。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由于政治和经济等原因,西方学术界普遍冷淡、贬低甚至千方百计否定中国科技文化的成果。李约瑟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向世界表明:中国除了四大发明外,在冶金、医学、机械、纺织、开矿、航海、土木工程,甚至数学、语言和逻辑等方面都有惊人的成就。中国是世界文明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李约瑟曾经说过:"人们总以为科学是西方的专利,与中国毫无关系,实在是大错特错……我此生最大的用心,就是还给中国科技一个公道。"他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科技史的学术意义,对于人类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具有极大的推动和激励作用,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新千年之初所倡导的方向。

李约瑟原来是专攻生物化学的,后来却以一种特殊方式"皈依"到中华文化和文明方面来。与其说这是时代、机遇和学术思想结合的结果,倒

不如说是中西文化交汇历史的必然。在政治上他的立场是开明的。他承认自己是“左派”,据说他曾在剑桥的一次演讲中称:众人可以视他为“毛派基督徒”或者“道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也说过“我的宗教观念不允许我尊奉马克思主义”①。他除了对中国科技和文明的重大事件怀着满腔热情去探讨外,对于道教等学说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倾心于炼丹和长寿的研究,不掩饰对性生活“采阴补阳”和“还精补脑”价值的认同,认为“在许多方面风水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恩惠之物”,从《易经》的研究中竟发现了八卦的组合方式与布尼兹的二进制数学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仍然是基督徒,他只不过是在即物穷理而已,并没有把儒道理论看作异端邪说,更没有叛逆自己信奉的宗教。他的学术态度是坦诚、实事求是的,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发明、哲学理论和宗教体制总是虚怀若谷地去进行研究探讨。这是他和那些排他性极强的西方学者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学术上成功的奥秘。

李约瑟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为了编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他从1937年起就十分注意采集资料,购买书刊,积累素材。1942年后屡次来华每到一处他都留心观察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情况,拍摄照片,深入访谈,与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学者交流切磋。除了注意中国古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察外,他在每一卷写作前后还按照学科编写卡片,建立资料文件夹,以及人名、术语、参考书目索引。他使用的参考书范围十分广泛,有大量中文和英文的,还有日文、韩文、越文、梵文、阿文、希腊文、波斯文、拉丁文,甚至乌尔都文的。他考证的范围还包括庙宇、碑刻、壁画和民俗工艺品。他曾因为在北京琉璃厂一位女老板处购得叶德辉编写的《双梅景丛书》像孩子似的兴奋不已,从敦煌的骑射壁画中推测中国古代马鞍的形制,从广州博物馆的古代海船复原模型联想到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规模。他在剑桥书房中有一个中国南方农村世代使用的风车模型,那既是一件来华旅游的纪念品,也是他研究力学原理在中国古代农用器械制作方面应用的证物。上班时间他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学者,但是周末跟同事在剑河旁漫步时对于偶然发现的野生黑草莓也会在脸上露出儿时般的笑容。退休前他在研究所内事必亲躬,记忆力超常,办事从不拖拉,每天虽然9点上班,其间通常还要和同事们一起喝咖啡、饮茶,但是他的文稿却写得又快

① 黄仁宇:《李约瑟给我的影响》,载《历史月刊》1995年5月号。

又好，令同事称羡。他上午跟剑桥大学出版社社长商谈出版书稿的计划，下午便将协议认可信件发至社长办公室，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学者们中不失为楷模。在研究所人员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从善如流的老人，但是他在学术观点上从不放弃原则，凡是他不认可的观点或文章，他都不采纳到《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

李约瑟不仅属于英国，也属于世界。他熟悉中国文化，对于印度科学、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他曾经谈到过法显、玄奘、义净等中国僧侣去印度求经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有关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算法、历法和药方、那沙特拉系统与中国二十八宿位置上的差异、《梨俱吠陀》中记载的不死药，都是他关注和考察过的问题。他曾正确地指出古波斯是巴比伦文化向中国和印度传播的中继站，印度数学家学习了三角理论并把它传播到欧洲等史实。他的知识面跟他的感情世界一样始终超越了自己所在的国界。

海内外不少学者曾经撰文指出李约瑟著作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可以商榷之处，例如批评他接受了中国道家学说中的不少消极观念，特别是关于性生理和性心理的问题，更不该把炼丹视为中国前现代科学发展的动力；认为他在分析中国四大发明和计时器的释放机制等问题时观点含糊，忽视独立发明的事实是他著作中的一大疏漏；他通过界定学科范畴（例如物理学和地震学）和严格区分“真科学”（如天文学）和“伪科学”（如占星术），把中国传统科学从具体文化环境中提取出来纳入了欧洲模式。关于为什么中国在14世纪前的世界领先科技成就长期徘徊在经验主义阶段，没能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所谓“李约瑟问题”（Needham's Question），症结是否在于现代实验科学和科学理论体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既然没有发展现代科学，因此这个问题就没有提出的价值。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实际上属于一些中外学者早就关注、客观上无法类比的“伪问题”。1980年以后国内学术界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论文300余篇，专著多达30余部，1982年还在成都召开过“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研讨会”，争论可谓激烈。至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版的价值，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迎合了政治需要而被媒体不恰当地夸大了，或许因为李约瑟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因而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评价就有所偏高。有些批评者甚至借用鲁桂珍的话说“李约瑟并不是职业汉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他没有接受过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

应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定事实根据,但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却见仁见智。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复杂,也是不难弄清楚的。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确实存在疏漏和不足,对于这么一部系列专著,没有问题和争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比起许多西方汉学家的论著来那就算不了什么了。李约瑟研究所内有许多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学者,对于汉藉原文的解读一般都没有问题,这在西方汉学界实属难能可贵。许多资深专家参与了撰写工作,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使相互切磋、理解和观点修正成为乐事,这无疑是这一系列专著先进水平的保证。至于个人的观点能否被其他学者认可,则应该进行具体分析。

由于年代久远、个人专业知识的局限和学政部门不重视等多种原因,历史上许多重要科技资料都被长期冷落或者尘封高阁,不为一般人所了解。即便在顶尖专家巨匠密集的高层科技团体、学府和院所,在分工高度专业化的今天,他们多数人也只熟悉自己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业务。仅仅评借个人的力量,要真正读懂和全面评介《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是困难的,由此得出的任何结论也不可能是权威性的。目前国内的少数评李文章,并没有从具体史实或者专业理论方面去分析问题,而往往纠缠于一些细枝末节,提供的只是一些与争论焦点无关的个人身边琐事、随感式的议论或者主观的联想,难以令人信服。有一位节目主持人在谈到有关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时竟说"实际上我们过去也没有领先",对数千年中国文明史下这么一个沉重的结论,如果提供不出史实和数据,就太轻率了。无知可以学习,学术上的浮躁则应该引起重视。

埃里克·泽克(Erik Zurcher)在《缅怀李约瑟博士》(In Memoriam: 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一文中生动地刻画了李约瑟的精神世界和他的生命意义:"用红色来描绘李约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许多方面都背离了东方学者常规的行事方式。也许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把人性和职业的兴趣结合起来,而这一点在一个人的身上通常是无法统一的。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虽然是一位知罪的基督徒,却又自称是名誉道教徒;他既追求自由又信仰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位有使命感的人。作为一位科技历史学家,他想通过揭示古代中国的成就,以及中国对于后来可能演变为科学革命的历史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打破他大多数同事所持有的狭隘的欧洲中心论。但是除此之外,他还希望这样的顿悟能有助于一个更美好的普世社会的建立,当这样的境界出现之日,那

些似乎相互矛盾的观念——科学的，人文主义的，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都将融为一体。这些都包含在他1945年为一本书所写的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中：《历史与我们同在——试论政治宗教和科学信仰》。……他的去世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空缺，因为李约瑟是一种不会重复的现象。他的巨著标题中的词语结合起来，就最充分、最真实地体现了他本人一生的含义：一位追求科学的人，一位崇尚文明的人！"

四、葛瑞汉与中国程朱理学

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出生于威尔士的珀纳思，父亲格雷厄姆（Charles Harold Graham）原先做煤炭生意，1925年去马来亚经营橡胶园，1928年病逝。1937年葛瑞汉在希罗普郡的埃尔斯大学毕业后，遵父命就读于牛津大学神学院，1940年毕业后参加英国皇家空军，1944至1945年在军营中学习日语，后来被派到马来亚和泰国等地英军中任日语翻译，退役时军阶为中尉。

葛瑞汉虽然专修过神学，但是却在年轻时就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1946年他进入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攻读汉学，1949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后留校担任古汉语讲师。1953年他以《两位中国哲学家——程明道和程伊川》的论文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955年葛瑞汉与中国满族小姐张得保结婚，1964年生一女儿。夫人经营一家进出口公司，女儿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汉学，母女长期住在诺丁汉郡。

葛瑞汉先后访问过世界各地大学和研究所，其中有：香港中文大学（1954～1955年）、美国耶鲁大学（1966～1967年）、密歇根大学（1970年）、康耐尔人文学会（1972～1973年）、台湾清华大学（1987年）、美国布朗大学（1988年）和夏威夷大学（1989～1990年）。1981年他当选为英国研究院院士。1984年至1986年他任职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经常徒步上班。1991年因饮酒过量引发胰腺癌，病逝于伦敦。

葛瑞汉长期从事中国古籍研究，除了道家典籍《庄子》和《列子》外，还研究过墨家经典、唯理论和反唯理论、唐诗汉赋、宋明理学和古汉语词法。他的著作很多，涉科范围广泛，治学严谨，知识广博，累出精品，在国际汉学界享有盛名。

葛瑞汉的主要有:《中国两位哲学家——程明道和程伊川》(Two Chinese Philosophers: Ch'eng Ming-tao and Ch'eng Yi-ch'uan, Lund Humphries, 1958 年)、《列子新译》(The Book of Lieh-tzu,1960 年)、《价值观问题》(The Problem of Value, 1961 年)、《晚唐诗选》(Poems of the Late T'ang, 1965 年)、《后期墨家的逻辑、伦理和科学》(Later Mohist Logic, Ethics and Science, 1978 年)、《庄子·内七篇及其他》(Chuang-tzu: The Seven Inner Chapters and Other Writings from the Book Chuang-tzu, 1981 年)、《〈庄子选译本〉评注》(Chuang-tzu:Textual Notes to a Partial Translation, 1982 年)、《理性与自发性》(Reason and Spontaneity, 1985 年)、《中国哲学和哲学文献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1986 年)、《道教辩士——古代中国的哲学辩论》(Disputers of the Tao,1989 年)、《理性中的非理性》(Unreason within Reason)、《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与张海晏合著,2003 年)。

葛瑞汉写的论文数量也很多,主要有:《公孙龙的名实论》(Kung-sun Lung's essay on meanings and things, 1955 年)、《〈公孙龙子〉的结构》(The Composition of the Gongsuen Long tzyy,1957 年)、《儒学》(Confucianism, 1959 年)、《西方哲学中的"存在"与中国哲学中的"是非"和"有无"的比较》(Being in Western philosophy compared with SHIH/FEI and YU/WU in Chinese philosophy, 1959 年)、《对新版〈古代汉语语法〉的意见》(Observations on a New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1959 年)、《杨朱与禽子的对话》(The dialogue between Yang Ju and Chyntzzy , 1959 年)、《列子著作和年代考》(The date and composition of Liehtzyy , 1961 年)、《〈楚辞〉骚体诗的韵律》(The prosody of the SAO poems in the Ch'utz'u , 1963 年)、《中国诗的语调模式:平仄》(Tone patterns in Chinese poetry,与唐纳(G. B. Downer)合撰, 1963 年)、《性本善与原罪》(Natural goodness and original sin, 1963 年)、《中国哲学传统中的理性》(Reason in the Chines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n the Legacy of China, edited by Raymond Dawson, 1964 年)、《〈墨子·小取〉的逻辑》(The logic of the Mohist Hsiao-ch'u, 1964 年)、《自由与平等》(Liberty and Equality, 1965 年)、《诗赋选译》(Translations of Poems and FU i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1965 年)、《哲学中的"存在"和语言学》('Being' in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1965 年)、《中国诡辩家的"坚白

论”》(The ‘Hard and White’disputations of the Chinese sophists, 1967 年)、《中国逻辑》(Chinese logic, 1967 年)、《孟子人性论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Men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1967 年)、《古代汉语中的“存在”》(‘Be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The Verb ‘Be’ and its Synonyms,1967 年)、《古代汉语的代词》(The archaic Chinese pronouns, 1969 年)、《庄子的“齐物论”》(Chuang-tzu’s ‘Essay on seeing things as equal’, 1969/70 年)、《汉语句法的一些基本问题》(Some basic problems of Chinese syntax, 1969 年)、《程颢与程颐》(Ch'eng Hao and Ch'eng Yi , 1970 年)、《墨子辩证篇的语法》(The grammar of the Mohist dialectical chapters, in A Symposium on Chinese Grammar, 1971 年)、《中国、欧洲与现代科学起源》(China,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971 年)、《李贺诗新译》(A new translation of a Chinses poet: Li Ho, 1971 年)、《后期墨家论〈墨子·大取〉中的伦理学和逻辑学》(Later Mohist treaties on ethics and logic reconstructed from the Tach'u chapter of Mo-tzu , 1972 年)、《对墨家光学方面的系统研究》(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Mohist optics,与席文合撰, 1973 年)、《后期墨家辩论中的“必然”与“优先”的概念》(The concepts of necessity and the ‘a priori’ in Later Mohist disputation,1975 年)、《庄子与逍遥游》(Chuang-tzu and the Rambling Mode, 1976 年)、《汉语虚词“曾”》(The Chinese particle TZENG , 1977 年)、《〈墨经〉的结构》(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ohist Canons, 1978 年)、《二程》(Entries for the Ch'eng brothers, 1978 年)、《中国的“农家”和农民乌托邦主义的起源》(The Nung-chia ‘School of the Tillers’ and the origins of peasant Utopianism in China, 1978 年)、《〈庄子〉篇目真伪辨》(How much of Chuang-tzu did Chuang-tzu write, 1979 年)、《汉语格律诗的结构和破格》(Structure and license in Chinese regulated verse, 1980 年)、《老聃传说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Legend of Lao Tan, 1981 年)、《杂家》(Other schools of philosophy, 1983 年)、《道家的“自发性”和“是与应该”的二分法》(Taoist spontaneity and the dichotomy of ‘is’ and ‘ought’ in 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1983 年)、《价值观、事实和面对事实》(Value, fact and facing fact, 1985 年)、《〈墨子〉核心篇章中反映的早期墨家分派》(Divisions in early Mohism reflected in the core chapters of Mo-tzu, 1985 年)、《自私的权利——杨朱学派、后期墨家》(The right to selfishness: Yangism, Later Mohism, Chuang-tzu, 1985 年)、《李白〈蜀道难〉

的翻译》(Translation of Li Po, 'The hard road to Shu', 1985 年)、《程朱人性说的新意》(What was new in the Ch'eng-Chu theory of human nature in 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 1986 年)、《公孙龙关于整体与部分的辩论》(The disputation of Kung-sun Lung as argument about whole and part, 1986 年)、《阴阳及相关想法的性质》(Yin-Yang and the nature of correlative thinking,1986 年)、《西湖诗选》(Poems of the West Lake, 1987 年)、《先秦儒家对人性问题的探讨》(Hsien-Ch'in Ju-chia tui jen-hsing wen-t'i ti t'an-t'ao,1987 年)、《一篇被忽视的前汉哲学文章〈鹖冠子〉》(A neglected pre-Han philosophical text: Ho-kuan-tzu,1989 年)、《与汉语相关的概念体系和语言学相对主义》(Conceptual schemes and linguistic relativism in relation to Chinses,1989 年)、《佛教传入前中国的唯理论和反唯理论》(Rationalism & Anti-rationalism in Pre-Buddhist China, 1990 年)、《思考与回答》Reflections and Replies, 1991 年)、《中国的语言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91 年)、《神秘主义和秘密接触、规则、礼仪和职责问题》(Mysticism and the Question of private access, Rules, Rituals, and Responsibility,1991 年)。

葛瑞汉的《中国两位哲学家——程明道和程伊川》是一本研究中国理学的专著,曾先后于 1958 年和 1978 年在伦敦的伦德·汉弗莱斯出版社(Lund Humphries)出版和再版,1991 年和 1992 年在美国出版和再版。任继愈和张岱年都认为该书是当代西方汉学名著之一,2000 年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了汉译本《中国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译者程德祥是程门二十九世裔孙,河南省广播电影电视厅高级工程师,专门从事二程兄弟和程门弟子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

程朱理学(又称程朱道学)是宋代理学各派中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由程颢(又称明道先生,1032~1085)和程颐(又称伊川先生,1033~1107)兄弟创立,为南宋学者朱熹(1130~1200)所继承和发展。二程兄弟在洛阳讲学分别长达 10 余年和 30 余年,学子众多,儒家理学经他们宣讲成了当时的流行学问,内容详尽,架构完整,他们也因此成为北宋理学的中流砥柱。程颢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题;程颐也提出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的观点。从这一点看葛瑞汉的选题无论对于西方读者还是东方读者都十分有意义。从研究方法看,我国研究程朱理学的传统方法是以人物个案为主,新中国成立之后常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来评价理学人物,程朱理学

一般被列入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范围，但是包含着辩证法的积极因素。葛瑞汉对二程的研究建立在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大体上按照传统的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二程兄弟的人性论、行知论和理欲观，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客观选择。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撰写有关汉籍的专著比翻译更难，因为作者必须阅读大量史料，采用科学方法鉴别，尽可能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自己又能融会贯通，高屋建瓴地作出评价。葛瑞汉的成功正是他在这些方面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他用西方学人熟悉的方法和语汇对二程理学进行全面深入研究，语言流畅准确，使读者看到了理学的形成、发展和传播的一脉相承的轨迹，也看到了理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现在乃至将来文明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为了便于读者理解，作者特别地在附录中收录了文本校勘、引证和评论资料。该书的中文版还保存了作者收录的553条二程语录和部分英译，这对于读者来说显然提供了更多方便。作者的汉语修养和知识深厚，熟悉先秦诸子著作，了解儒、释、道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所赋予该书的权威性和可读性能超越其他同类专著。作为西方汉学界对二程理学研究的开拓之作的作者，葛瑞汉本人也当之无愧地成了最受尊敬的当代英国汉学家之一。

五、中国隋唐史专家杜希德

杜希德（又译崔瑞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1925～）毕业于剑桥大学卡特琳娜学院，专攻中国隋唐史和隋唐史学史。1954年～1956年任伦敦大学中国史教授，1956年～1960年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1960年～1968年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汉学教授，1968年～1980年接替蒲立本再次担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1980年移居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汉学教授，为美国汉学界培养唐史新秀效力。退休以后他回归故里，尽管眼疾影响笔耕，但仍然坚持编撰《隋唐史》，英译《唐律疏义》等书稿，曾来华赴日实地考察搜集史料。

从1966年起，杜希德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一起主持《剑桥中国史》系列的编写工作。其中，1979年他自己独立承担编写该系列的第三册《隋唐史》（卷上，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1987年与当时的高级汉学讲师鲁惟一共同编写第一册《秦汉帝国史》（The Ch'in and Han Empires，BC 221～AD200），1988年至1998年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莫特(Frederick W. Mote)合作编写《明代史》(上卷和下卷, The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Part 1&2),1995 年又与慕尼黑大学弗兰克教授合作编写第六册《五胡政权与边邻邦国》(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 ~ 1368)。这套中国史系列的共同特点是以西方现代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吸收有关研究成果,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宗教信仰、民族关系和对外交往进行综合考察,为西方读者提供一个较专业较权威的读物。由于执笔者个人的观点和方法不尽相同,因此体系编排上也有所区别,但是大致都属于研究型或者教学型两者之间。从中可以看出杜希德和费正清作为总编所表现出的个人学贯中西的专业才能和融会古今的广博学养。作为唐史和史学专家,杜希德对于中国官修史书和民间史料有清楚的认识,主张充分利用敦煌氏族史残篇作为隋唐史的参考资料。

杜希德的其他著述还有:与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 1913 ~ 1976)合撰《儒家学说》(The Confucian Persuasion,1960 年)、《唐代财政管理》(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1963 年)、与芮沃寿合编《唐代透视》(Perspectives on the T'ang,1973 年,1981 年)、《中世纪中国的印刷与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1983 年)、《唐史手册》(A handbook for T'ang history,1986 年)、《唐代官修史学》(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1992 年)、《史家、读者与时间历程》(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1996 年)、《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敦煌新证》(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 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等。

六、英国学术院中国组主席杜德桥

杜德桥(Glen Dudbridge,1938 ~)生于英格兰的萨默塞特郡,1962 年在剑桥大学马德林学院(Magdalene College)研修完中文学士课程,1963 年至 1964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学院(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1967 年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自 1965 年起担任牛津大学汉语讲师,后晋升为高级讲师,1985 年被剑桥大学聘任为汉学教授,1989 年任牛津大学东方学院院长兼教授。这期间他还先后兼任英国皇家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英国学术院中国组主席、当代亚洲研究委员会主席

和《译丛》顾问等职务。

杜德桥是英国知名的汉学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宗教、神话和中国社会史。他善于把古典文学和宗教、历史、民俗结合起来进行实证性研究，发掘其文学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价值。他的博士论文《西游记：一部16世纪前的中国小说之研究》(The His-yu chi: A study of antecedents to the six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1970年)，通过对早期版本的考证以及中国古代民俗和文物资料的研究，重构人物原型从口头文学到戏剧和小说的发展变化过程，探讨了这一文学形象的内在社会文化价值。他的《妙善的传说》(The Legend of Miao-shan, 1978年)，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发现该传说与《妙法莲华经》的渊源关系，认为观音菩萨女性化和中国化是在当时中国环境中的一种文学再创造。

他撰写《李娃传：对一个九世纪中国故事的评析》(The tale of Li Wa: Study and critical edition of a Chinese story from the ninth century, 1983年)的过程中，曾运用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方法，对各种版本中的每个词每一句话进行了考证、诠释和翻译，对故事形成的时间、环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撰写《唐代的宗教生活和世俗团体》(Religious experience and lay society in T'ang China: A reading of Tai Fu's 'Kuang-i chi', 1995年)时，从《太平广记》中的志怪故事中寻找有关8世纪中国社会世俗生活的资料，探讨了当时世俗社会的结构和变化。

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Miaoshan Chuanshuo: Guanyin pusa yuanqi kao, 1990年)、《三国典略辑校》(Sanguo Dian lüe Ji jiao, 1998年)、《19世纪80年代的台南原住民：南港管灯人乔治·泰勒文字考》(Aborigines of South Taiwan in the 1880s: Papers by the South Cape lightkeeperGeorge Taylor, 1999年)、《中国中世纪失传的书》(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 2000年)。

他的主要学术论文有：《西游记祖本考的再商榷》(The Problem of Xi you ji and Its Early Versions: A reappraisal, 1964年)、《一百回西游记及其早期版本》(The Hundred-chapter His-yu chi and Its Early Versions, 1969年)、《妙善石记：两处早期岩刻》(Miao-shan on Stone: Two early inscriptions, 1982年)、《广异记初探》(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Guang yi ji, 1986年)、《西游记：十年前的猴子和水果》(The His-yu chi Monkey and the Fruits of the Last Ten Years, 1988年)、《三个失落天堂的传说》(Three Fables of Paradise

Lost,1988 年)、《唐代传奇和唐代崇拜:8 世纪的若干例析》(Tang Tales and Tang Cults: Some cases from the eighth century, 1990 年)、《尉迟迥在安阳:8 世纪的崇拜及其神话传说》(Yü-ch'ih Chiung at An-yang: An eighth-century cult and its myths, 1990 年)、《花月三娘与粤剧〈陈香太祖〉》(The Goddess Hua-yüeh San-niang and the Cantonese Ballad Ch'en-hsiang T'ai-tzu, 1990 年)、《泰山女香客:17 世纪小说片断》(Women Pilgrims to T'ai-shan: Some pages from a seventeenth-century novel,1992 年)、《17 世纪小说中的香客:泰山与〈醒世姻缘传〉》(A Pilgrim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Fiction: T'ai-shan and the Hsing-shih yin-yüan chuan,1991 年)、《柳毅传及其他》(The tale of Liu I and Its Analogues,1994 年)、《李娃传再析》(A Second Look at Li Wa Chuan,1995 年)、《唐代前后的五道将军》(The General of the Five Paths in Tang and pre-Tang China,1996 年)、《中国的白话文化:1995 年 6 月 1 日在牛津大学前的就任演讲》(China's Vernacular Cultures: Inaugural lecture given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1 June,1996 年)、《神像显灵:五个唐代故事》(Buddhist Images in Action: Five stories from the Tang,1998 年)、《唐代话本的分类问题》(A Question of Classification in Tang Narrative: the Story of Ding Yue,1999 年)、《英国人对 19 世纪末台湾原住民的了解》(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Formosan Aborigin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1999 年)、《唐代宗教文化研究源流考:问题和程序》(Tang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Culture: Problems and Procedures,2001 年)、《关于说郛丛书的承传性:波德雷安中国书籍研究》(Towards a Genetics of the Shuo fu Blocks: A study of Bodleian Sinica, 2004 年)、《一千年的中国书面叙事文学》(A Thousand Years of Printed Narrative in China, 2004 年)。

1998 年,乐黛云、陈珏和龚刚编选的《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收录了十位欧洲汉学家在此前十年中发表的 18 篇优秀论文,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有杜德桥研究《柳毅传》的一篇论文。陈晓明在《他山之石更奇崛——评〈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中分析说:杜德桥的那篇文章跟以前的同类专题研究不同的是,没有照搬现成的结论,而是另辟蹊径,通过发掘和考察蕴含在原作中的不同的故事来源,将

它们整合成一个统一的观点，并阐发了各层所暗含的社会和伦理价值[①]。该文集收入的杜德桥的另一篇论文是《尉迟迥在安阳：一个8世纪的宗教仪式及其神话传说》。陈晓明认为作者运用了人类学和传统历史学方法，在民间和官方的二元结构矛盾中发掘主题，表现出地方祭祀仪式与政府权威的冲突，结论是：中国宗教的历史性的大变动，往往伴随着一个复杂的无规律可循的过程[②]。从以上两篇有代表性的论文看来，杜德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时常采用类似校勘学、目录学和版本学过滤方法，但最终落实到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科学评述，揭示了作品的现实意义。

七、一流学府栽培出来的英国汉学大家

鲁惟一（Michael Loewe，1922～）曾就读于剑桥的佩斯学校和牛津的马德林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不得不离开牛津，参加了首批日语学员班学习，接受无线电译码和解码培训。1942年至1956年在英国政府联络总部担任特派员，自学古汉语，研究中国古代史。1951年牛津大学亚非学院授予他一级特优学位（a first class honours degree），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1956年他担任伦敦大学东亚史讲师，1963年获博士学位。此后被剑桥大学东方学院聘任为汉学讲师近30载，直至退休。退休后他的学术活动仍很频繁，参加了多卷本的《剑桥中国史》的编写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在家还是在学院，对同事，对朋友，对其他学者都热情帮助。尽管每日忙于研究工作，但他还是兼任了许多职务，其中包括：学院东方研究会主席，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女王学院、悉尼萨塞克斯学院、露西·卡文迪什学院和沃尔夫森学院的教务长。1984年至1986年他曾任欧洲汉学学会主席、庚款委员会和皇家亚洲学会执行理事、《大亚洲》和《早期中国》等期刊的编委，《剑桥中国史·秦汉卷》主编，斯德哥尔摩、哈佛和芝加哥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许多院校和研究所的访问学者。2002年他被美国艺术和社会科学院授予了荣誉会员资格。

---

① 陈晓明《他山之石更奇崛——评〈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

② 陈晓明《他山之石更奇崛——评〈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23日。

鲁惟一是著名汉学家,曾先后出版专著10余部,在汉学期刊上发表文章50多篇,他编撰的书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关于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如何确定第一手材料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有许多考古新发现,需要考察并与已有文献进行对照的数量越来越多,有必要采用人类学和神话学等知识对新史料进行分析。宋代以后的新史料不断增多,数量统计和社会学或经济学概念的结合是欧洲汉学的成果之一。他在编写《剑桥中国秦汉史》时曾经研究了中国在20多年中出土的简、帛以及其他形式的史料,澄清了官修正史中的一些错误记载。

他的专著有:《中华帝国: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Imperial China: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Modern Age, 1966年)、《汉代政权档案:卷一,历史评价;卷二,文件》(Records of Han Administration. Volume 1, Historical Assessment; Volume 2, Documents,1967年)、《中华帝国汉代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during the Han Period,1968年)、《汉代的危机和冲突》(Crisis and Conflict in Han China,1974年)、《通往天堂之路:中国人对于长生不老的追求》(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1979年)、《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Chinese Ideas of Life and Death: Faith, Myth and Reason in the Han Period, 1982年)、《以中国为骄傲》(The Pride That Was China,1990年)、《汉代的占卜、神话和君主制》(Divination, Mythology and Monarchy in Han China, 1994年)、《秦朝、西汉和新朝文献辞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 Xin Dynasties,2000年)等。

他发表的文章有:《汉代文献札记》(Some Notes on Han-time Documents from Chü-yen,1959年)、《汉代贵族的等级》(The Orders of Aristocratic Rank of Han China,1960年)、《汉代粮食度量制》(The Measurement of Grain during the Han Period,1961年)、《汉代的军事行动》(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Han Period, 1961年)、《敦煌汉籍札记》(Some Notes on Han-time Documents from Tun-huang, 1963年)、《汉代发兵考》(Some Military Despatches of the Han Period,1964年)、《中国与中亚的关系》(Chinese Relations with Central Asia,1969年)、《香料与丝绸:公元1~7世纪世界贸易面面观》(Spices and Silk: Aspects of World Trade in the First Seven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Era,1971年)、《汉武帝之征战》(The Campaigns of Han Wu-ti,1974年)、《新中国考古》(Archaeology in the New China,1976年)、

《中国新近发现的手稿》(Manuscripts Found Recently in China,1977 年)、《东西方的衰落》(Decline and Fall in East and West,1978 年)、《中国和日本近年出土的木简及其价值》(Wooden Documents from China and Japan: Recent Finds and Their Value,1980 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手稿》(The Manuscripts from Tomb No. 3 Ma-wang-tui,1981 年)、《钟山郡王陵》(The Royal Tombs of Chung-shan,1985 年)、《西汉的经济调整》(Attempts at Economic Co-ordination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1985 年)等。

巴雷特(Timothy Hugh Barrett)是剑桥大学哲学博士,1978 年又以论文《李翱:释子、道士还是新儒家》(Li Ao: Buddhist, Taoist or Neo-Confucian)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巴雷特主要研究东亚古代史和宗教,是一位多产的著名汉学家。在他的著述中创见颇多,分析独到,论据充分,针对性强,因此影响面广。早在 1978 年他就在《中国的教派》(Chinese Sectarian Religion)中提出西方民间宗教研究人员与新中国历史学家观点上的本质差异:前者把八卦教和义和团看作是异端教派,是秘密结社,而后者则认为是农民起义。1988 年他为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宗教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撰写的《道教史研究》(Taoism: History of Study,1988 年)综述了中国、日本、韩国、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的道教传播情况。1987 年夏天他在向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的一次研讨会提交的《不思进取,不可思议》的洋洋万言论文中,简要回顾了英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对于英国汉学研究的过去和现状中不足之处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获得了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好评。125 页的修订本的单价 4.95 英镑,因为切中时弊,竞相求购,书商一再加价。

他的汉学专著、评论、序、跋甚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外,还有:《李翱思想中的儒释道》(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in the Thought of Li Ao, 1978 年)、《〈慎子〉与〈养生要旨〉的流传》(On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Shen Tzu and of the Yang-Sheng Yao-Chi,1980 年)、《道教和佛教对〈道德经〉解释中的玄义》(Taoist and Buddhist Myster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o-te ching,1982 年)、《中国末世说之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Eschatology, 1983)、《约翰·布拉夫的汉学著述》(The Sinological Writings of John Brough

(1917—1984),1986 年)、《〈汉朝至隋朝的哲学和宗教〉跋》(Postscript to Chapter Sixtee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from Han to Sui], 1986 年)、《李约瑟与道教经书》(Joseph Needham and the Taoist Canon,1988 年)、《中国 17 世纪的历史和精神著作》(History Writing and Spirit Writ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1989 年)、《中华文明中的宗教传统:佛教和道教》(Religious Traditions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Buddhism and Taoism,1990 年)、《玄奘与禅宗和净土宗》(Hsüan-tsang and "Ch'an (Chan) and Pure Land Buddhism", 1991 年)、《道教》(Taoism, 1991 年)、《了解中国宗教的变化和进步》(Change and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Chinese Religion,1991 年)、《元蒙秘史:一些新发现》(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Some fresh revelations, 1992 年)、《骈文溯源:也是一种假设》(The Origin of the Term Pien-wen: An alternative hypothesis,1993 年)、《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局图书馆的汉学新发现》(Sinological Gleanings from the Library of 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1993 年)、《佛教的鼎盛》(The Efflorescence of Buddhism,1994 年)、《孤陋寡闻与科技信息:评'西方入侵'前中国对西方的了解》(Ignorance and the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Some Comments on China's Knowledge of the West on the Eve of the 'Western Invasion',1995 年)等。

古克礼 (Christopher Cullen)在牛津大学获得工程硕士后,进入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继续学习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获得古汉语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20 世纪 90 年代,古克礼加盟李约瑟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研究和撰写工作,长期担任李约瑟研究所的常务副所长和剑桥大学李约瑟著作出版委员会主席,李约瑟去世后他被推选为研究所所长。1995 年至 2000 年他还担任《龙腾》(The Dragon's Ascent,8 集电视历史纪录片)项目的高级顾问,加强了李约瑟研究所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四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2002 年他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聘任为名誉研究员,同时还兼任内蒙古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

古克礼 2002 年 11 月 26 日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做的《〈伤寒论〉和宋代名医许淑微》的报告和 2004 年 5 月 27 至 28 日在天津师范大学所作的《关于〈筭数书〉研究》的报告,是他在华许多学术交流的一小部分。

古克礼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持的学术态度比较客观公正。他认为

二里头是否构成夏文化不能仅凭《尚书》进行判断，还应以历史文献为依据。

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的天文和数学：周髀算经》(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the Zhou Bi Suan Jing, 1996 年)、《敦煌写本与中世纪的中国医学》(Medicine in Mediaeval China: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合作项目，2004 年)和《筭数书译稿》(Writings on reckoning，2004 年)等。

此外，他还发表了论文《中国天文学家地球平坦论：〈淮南子宇宙学片断研究〉》(A Chinese Eratosthenes of the Flat Earth: A study of a fragment of cosmology in Huai nan tzu，1976 年)、《能否在远东记录中找出伯利恒星》(Can We Find the Star of Bethlehem in Far Eastern Records 1979 年)、《李约瑟论中国天文学》(Joseph Needham on Chinese Astronomy，1980 年)、《八世纪的中国切线表》(An Eighth Century Chinese Table of Tangents，1982 年)、《中国的科学和医学》(Science and Medicine in China, 1983 年)；《了解》(Understanding, 1984 年)、《17 世纪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宋应星论气和五行》(The Science/Technology Interfa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ong Yingxing on qi and the wu xing，1990 年)、《宋应星谈天》(Song Yingxing on astronomy，1991 年)；《哈雷彗星与公元 10 世纪的'鬼魂'事件》(Halley's comet and the "ghost" event of 10 B. C. 1991 年)、《中华帝国末年的患者和良方：〈金瓶梅〉见证》(Patients and Heal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Jinpingmei, 1993 年)、《促进古代中国科学进步的动因：汉武帝和公元 104 年的天文大变革》(Motivations for Scientific Change in Ancient China: Emperor Wu and the Grand Inception Astronomical Reforms of B. C. 104，1993 年)、《宋应星：寻找运动宇宙的中国狄德罗》(Song Yingxing: a Chinese Diderot in search of working space，1994 年)、《耶鲁中国论丛：帕克和休姆谈中药》(Yale on China: Parker and Hume on Chinese Medicine，1995 年)、《如何编撰对比数学史》(How Can We Do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Mathematics，1995 年)、《观象：东汉时期的黄道和赤道》(Seeing the Appearances: Ecliptic and Equator in the Eastern Han，2000 年)、《拟构过去，想象未来：东亚在了解现代科学的发端与可能趋向中的基本作用》(Constructing a Past, Imaging a Future: The essential role of East Asia in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of modern science,

2001 年)、《医案:中医文献的原始模式》(Yi'an (case statements): The Origins of a Genre of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2001 年)、《中国有关月球的首次完备理论:刘虹的独创》(The First Complete Chinese Theory of the Moon: The innovations of Liu Hong c. A. D. 200,2002 年)、《学习刘徽:数学计算的另一途径》(Learning from Liu Hui: A Different Way to Do Mathematics, 2002 年)等。

霍克斯 (David Hawkes,1923 ~)是韦利的高足,1945 至 1947 年霍克斯在牛津大学研修汉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英国皇家军队中学习日语,后从事文员工作。1948 至 1951 年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回国后继续学习战时中断的研究生课程,1953 年毕业后留校当讲师。1959 至 1971 年他被晋升为汉学教授,1973 至 1983 年被聘任为牛津大学研究员,现为该校名誉研究员。退休后他与妻子先后住在威尔士和牛津。

20 世纪 80 年代他曾将自己的 4500 册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戏剧方面的中、英、日文书籍捐赠给威尔士图书馆。

霍克斯是 20 世纪后半叶英国著名汉学家。《楚辞:南方之歌》(Ch'u Tz'u: the Songs of the South,1985 年)是他早期的译作,忠实再现了原作的风貌。他的《杜甫读本》(A Little Primer of Tu Fu,1967 年)是广为人知的唐诗翻译作品。此外他的著述还有《汉语:古典、现代和高雅的语言》(Chinese: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1961 年)、《中国文学论集》(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1989 年)和《石头记翻译笔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Translator's Notebooks,2000 年)等。在元代全真剧与杂剧的关系,以及杂剧《赵氏孤儿》对欧洲戏剧的影响等专题研究方面,他也发表过许多新颖独特的见解。

为了翻译《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1971 年他辞去了牛津大学的中文系教席。经过两年的苦译,伦敦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第一卷译本,20 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又相继出版了后四卷。霍克斯翻译的前八十回共分三卷:第一卷"荣华富贵的岁月"(The Golden Days),1973 年出版;第二卷"秋结海棠社"(The Crab-Flower Club),1977 年出版;第三卷"金玉良言"(The Warning Voice),1980 年出版。1993 年他的女婿约翰·闵福德(John Minford)曾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报《东亚史》上发表金庸的《鹿鼎记》译稿,其中的《纵横钩党清流祸/峭茜风期月旦评》等章节是霍克斯

翻译的。虽然翻得很顺手，但他个人不是很喜欢武侠小说，最终只好停笔。1968 年闵福德回到英国时打算翻译《红楼梦》，霍克斯建议他翻译后四十回。后来他们分头完成，但是常一起讨论译稿。闵福德翻译的后四十回分两卷出版，第四卷“孽债”（The Debt of Tears），1982 年出版；第五卷“梦醒时节”（The Dreamer Wakes），1986 年出版。为了使读者更好理解故事中的人物，霍克斯分别用汉语拼音翻译贾府里大、小主子的名字，用意译法翻译丫鬟的名字，用法文翻译戏子的名字，用拉丁文翻译道士、和尚、尼姑的名字。至于小说中的大量习俗、典故、物品、戏剧和诗词，则单独加以介绍。为避免西方读者对于原文一些颜色词语理解的歧义，他采用了灵活变通办法译出，例如把“红楼梦”译为“the Dream of Golden Days”，把“怡红院”译为“Green Delights”等，可谓用心良苦，别具匠心。霍克斯的中英文造诣非凡，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体裁，十余个寒暑在书斋中字斟句酌，呕心沥血，运笔传神，准确生动的译文使故事中的人物呼之欲出。比起同类译文来，更具可读性，后来多次再版，在英语读者群中受到广泛欢迎。由于他设计的英译《石头记》的整体框架构思巧妙，使他和闵福德的译文衔接自然，风格协调，浑然一体。

霍布恩（Brian Holton）出生于苏格兰的加拉希尔斯，少年时生活在西非和爱丁堡，曾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杜伦大学。毕业后在母校和纽斯卡尔大学教过汉语，在宁波大学教过英国文学，是纽斯卡尔大学欧洲汉英口笔译研究生课程的首任导师。目前在香港理工大学担任翻译课教学工作。他长期从事笔译，许多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杨炼的诗歌以及 17 世纪冯梦龙编辑的中国民谣，经过他的译介得以在英语读者中广泛流传。他现在正以“Men o the Mossflow”为书名把《水浒传》译成苏格兰语。他近年的译著有：《平静的海滨》（Where The Sea Stands Still，汉诗英译，1995 年）、《李清照：声声慢》（LI Qingzhao “Shengsheng Man”，2000 年）、《翻译的限度》（Translating Transgression，2002 年）、《未来美好的星球》（A Better Planet，2001 年）、《老外侃老外》（A Foreigner on Foreigners，2003 年）、《水浒传苏格兰译本》（Wale a Leid an Wale a Warld：Shuihu Zhuan into Scots，2004 年）等。

八、国际精英会聚的汉学大舞台

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出生于奥地利,毕业于德国莱比锡大学,专攻汉学、日本学、古代史和宗教史。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部族迁徙史》(Siedlungsgeschichte Chinesischer Clans, 1923年),是他那个时代德国学术界最热门的选题之一,导师为汉学大师孔拉迪(A. Conrady)。虽然有人说他的汉语口语能力不佳,但是他学养有素,对于先秦诸子百家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在《老子》、《庄子》、甲骨文等方面的研究功夫独到,对于训诂学和音韵学造诣非凡,见解深刻,严谨的学风体现了莱比锡学派的特色和魅力。他的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汉学界。1930年起他任职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1934年晋升为教授。他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建设和汉学人才培养。早在1927年就在哈勒为德国东方学会建立了中文部。哥廷根大学的汉文典籍都收藏在他的汉学研究所内。他曾经请季羡林等中国学者推荐图书,直接从北平琉璃厂和隆福寺的书店订购中国古籍。

1938年11月哈隆移居英国,成为剑桥大学人第四任汉学教授。李约瑟曾经跟他学习过汉语。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尚未离开哥廷根时,剑桥大学曾通过哈隆介绍聘请他前往任教。1949年哈隆教授专程来华,用英国政府专款购买中文书籍一万余册。剑桥大学图书馆曾经使用由哈隆和龙彼德制定的汉学书籍分类法进行管理,并且按他们所定的方针长期从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购买书刊。

哈隆的主要著述,除了《月氏考》(Zur Uee-Tsi Frage)外,还有:《中国古代部族迁徙史》(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lan Settlement in Ancient China, 1924年)、《中国上古史辨伪》(1925年)、《中国人所知大夏人或印欧人始于何时》(Seit Wann Kannten die Chinesen die Tocharer oder die Indogermanen Ueberhaupt, 1926年)、《夫子及曾子的残篇:早期的儒家学说之一》(Fragmente des Fu-tsi und des Tsin-tsi Fruh- Konfuzianische Fragemente I',1932年)、《〈管子·弟子职〉残篇二》(Das Ti-tsi Fragment II,1933年)、《法家佚文:第一部分:〈管子〉及相关文本》(Legalist Fragments: Part 1: Kuan-tsi 55 and related texts,1951年)等。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曾提及与哈隆合作翻译《管子》的往事。

德效骞（杜布斯，Homer Hasenplug Dubs 1892 ~ 1969），其父德慕登（Charles Newton Dubs，1862 ~ 1936）是 1902 年与内地会刘佐霖到长沙设堂传道的美国遵道会（United Evangelical Church Mission）传教士。1916 年德效骞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硕士学位，两年后以圣道会（Evangel Mission）传教士身份来华。回国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中国古代史，1925 年以《〈荀子〉译注》为题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曾任马歇尔大学汉学教授，在《通报》上发表过论文。1944 年至 1945 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客座教授，1947 年至 1959 侨居英国，任教于牛津大学东方学院，1962 年至 1963 年被夏威夷大学聘为汉学教授。

1955 年，德效骞根据对罗马史、《汉书·地理志》和《汉书·陈汤传》的研究，在英国汉学学会举办的一次讲座中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发现：公元前 36 年汉朝军队击败了匈奴军队时发现俘虏中有 145 名罗马士兵，后来被安置在甘肃骊靬县。此事引起了巨大反响，有不少中外学者前往考察，写文章，有人支持他的观点，如：汉学家李约瑟和法国学者布尔努瓦等人，但是也有许多人不同意他的看法。

德效骞曾在国会图书馆用三年时间翻译《（前）汉书》，分三卷先后于 1938 年、1944 年和 1955 年在美国出版。内容十二帝纪和十志。每章译文前有一个简介，译文后有一个或者多个相关附录，注释颇为详尽精当。他的译文是建立在个人多年研究基础上的成果，因此相当准确流畅，典雅而不失厚重。汉学界许多学者认为，该译本不仅是欧美汉学家们的重要参考书之一，而且还可以用作汉学专业的学生学习中国历史散文的助读。

德效骞的其他译著还有：《荀子：古代儒学的定型者》（Hsuntze：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1927 年）、《荀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Hsun Tze，1928 年）、《哲学家老子的时间和环境》（The Dat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Philosopher Lao-dz，1941 年）、《孟子与孙子的人性论》（Mencius and Sun-Dz on Human Nature，1956 年）、《中英对照荀子》（The works of Hsun Tze，1973 年）等。德效骞曾荣获法国铭文学院颁发的儒莲奖金。

鲁桂珍（Lu Gwei Djen，1904 ~ 1991），祖籍湖北蕲春，父亲鲁茂达是南京的一位药剂师。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毕业后，鲁桂珍在北平协和医院深造，后任职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她的男友不幸在空军服役时殉职使她失去了组织家庭的机会。1937 年她与沈诗章和王

应昧一起前往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专业。

鲁桂珍与肌肉蛋白研究员李大斐在同一实验室工作。李大斐的丈夫李约瑟所从事的研究是胚胎生物化学,不久他们相互认识了。通过帮助李约瑟学习文言文,鲁桂珍给他带来了东方信念,增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在她的感染之下,李约瑟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和科技历史的兴趣和他们之间的情谊与日俱增。

1939 年鲁桂珍前往美国加州参加第六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后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秘书处工作了九年。虽然与李约瑟不在一起共事,但是彼此仍然保持密切联系。1942 年李约瑟写信告诉鲁桂珍他已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华使馆科学参赞,赴任前将到战时设在华盛顿的英国科学事务所参观,打算跟她见面探讨撰写专著的事情。

1957 年王铃赴澳大利亚履职,不再协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李约瑟便请鲁桂珍回剑桥跟他一起共创大业,得到了她的欣然应允。

鲁桂珍几十年如一日与李约瑟合作,默默无闻甘当助手,无论从彼此间的友谊还是事业来看都十分坚韧执着。鲁桂珍全力协助他编撰书稿,又帮助他在剑桥大学校区建立了李约瑟研究所,吸引众多学者加盟他们长期从事的中国文化的浩大工程,成了他的亲密助手。

李大斐去世两年后,鲁桂珍与李约瑟正式结为夫妻。平日两人都在各自书房安静地工作,但是喝咖啡时彼此总要匆匆相聚,有时也一起外出旅行。后来李约瑟健康状况变坏,听力和视觉每况愈下,行动完全离不开轮椅,鲁桂珍总是尽力照顾他。

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第四卷第三分册《土木工程和航海》,第五卷第二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第三分册、第四分册、第五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和第七分册《火药的史诗》,第六卷的第一分册《植物学》,都有鲁桂珍作出的重要贡献。1980 年她还与李约瑟合作编写过《天赐柳叶刀——针刺和艾灸的历史和原理》(Celestial Lancets—A History and Rationale of Acupuncture and Moxa)。她深厚的专业素养、一丝不苟的学风和为科学献身的崇高品格,一直是英国汉学界同事们引以为自豪的精神财富。

1991 年鲁桂珍患心肺病辞世。

龙彼得(Piet Vander Loon, 1920 ~ 2002)祖籍荷兰。1940 至 1946 年在

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攻读汉学，毕业后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多年，后来晋升为汉学教授，1972 年被转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他曾先后兼任剑桥大学图书馆名誉馆长、日本道教学会理事、法兰西亚洲学会名誉会员、欧洲科学基金会道藏研究计划指导委员会主席等职务，社会活动十分频繁。1982 年被推选为欧洲汉学协会会长，欧洲各国汉学的研究、教学和交流工作在以他为首的委员会指导协调下取得了长足进步。1987 年他离任退休，仍持荷兰国护照。

龙彼得的学术兴趣广泛，但主要研究中国道教、台、闽、粤民俗和戏曲。他对南戏研究功夫独到，广泛涉猎明清以来闽台剧本和散曲，写下读书心得数十本。他每到一处，都非常关心古籍图书，曾经发现并购得绝版书和孤本书多册。1964 年他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内发现刊于明神宗万历辛巳(1581)年间的潮剧戏文《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大全》，为现代潮剧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和线索。1987 年 3 月他还在汕头与潮剧院编创人员李国平和林淳钧等座谈过潮剧表演艺术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他在中国南方发现了嘉靖版南戏《重刊潮泉五色插科增人诗词北曲勾栏荔枝记》(现代版为《陈三五娘》)。据周振鹤《柏林读书小记》："前些年，英国著名汉学家龙彼得先生就在德国南部一个前选帝侯的私人图书馆里，发现了三种明后期的福建地方戏的剧本，虽然这些剧本没人看得懂，但几百年来就一直当宝贝似的供在那里，毫发未损。这一发现不但于戏曲史的研究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而且对数百年前的闽南话研究而言更是无可替代的宝贵资料。"他个人珍藏的古籍和古籍影印本有《善本戏曲丛刊》第四辑(影印)、《明刊闽南戏弦管选本三种》(台北南天书局 1992 年重印本)、乾隆刊本《同窗换书记》(现代版为《山伯英台》)、清书林郑元美刊本《新镌南北时尚青昆合选乐府歌舞台》等。1971 年他赴台做田野调查时，曾影印全套泉州方言的《同窗换书记》戏文赠与朋友供研究用。

《宋代收藏道书考》(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 A Critical Study and Index)是龙彼得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1984 年由伦敦伊萨卡出版社(Ithaca)出版。该书着重对宋代官方和私人家藏道书的性质、类别、差异以及道教经书的源流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极大关注。全书分英文和中文两个部分。英文部分的"皇家图书馆的诸文献目录"对刘歆《七略》、《仙道家》、《群书四录》、《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中兴四朝国史》、《四朝国史》、《宋史》中有关道教经书和

神仙书目作了详尽解释。在“家藏目录”中对《邯郸图书志》、《群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录题解》、《赵希辨的图书》作了必要考证。在“道教经典”部分就宋代道教文献目录的沿革作了回顾。作者反复审校了中文部分“宋代馆刻及家藏道书目录”，采用施博尔为《正统道藏》设计的目录索引编号和哈佛燕京引得号数推算表，按笔画顺序排列。全书总共收各类道书1600种，3600卷，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书中收录了不少被遗忘和遗漏的版本，包括大陆新发现的碑文和残篇。作者对宋代的道书及其刊刻、版式都作出了分析和说明，对于《道藏》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龙彼得的其他著述还有：《论〈管子〉的传播》(On the Transmission of Kuan-tzu，1952年)；由他辑刊的《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1992年在台湾出版；他的《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之研究》(The Classical Theatre and Art Song of South Fukien: A study of three Ming anthologies)综述了闽南话文学作品和梨园戏的历史，作为附录刊印书后。他还对明万历年间《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刊本(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和《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藏书)中的散曲做过详细评析，对二十六种剧目的情节和出处作出了考证。

他在道书和中国地方戏剧研究方面表现出来的才华和成绩是独一无二的，英国汉学界至今无人能超越。

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原籍加拿大艾伯塔州，在艾伯塔大学曾主修希腊文和拉丁文。1942年毕业后在太平洋战争情报站工作，结合业务自学过日语和汉语。1946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汉语和中国史，1951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教授古代汉语。不久他到日本东京和京都的图书馆进修。1953年他被聘任为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二十余年的英国经历使他成为英伦汉学界的知名人物。1966年他开始出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8年担任该校亚洲研究系主任。除了日常教学和研究工作外，他还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和学术活动，为许多的研讨会撰文写稿。1980年他成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1993年被聘任为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通讯会员，1971年至1974年被推选为加拿大亚洲研究学会会长，1990年至1991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92年至1993年任美国东方学会西部支部会长，1995年至1996年任国际汉语语言学学会主席。1974年他辞去了系主任职务，7年后退休，但是仍然笔耕不辍。

蒲立本原来致力于中国史学研究，1959 年后出于对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兴趣和古汉语教学的需要开始研究汉语历史语言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据他自己统计，1989 年以前他曾先后发表专著和合著五种，论文八十多篇，书评一百多篇。

他的主要著述有：《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1955 年)、《中国史和世界史：任职演说》(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An Inaugural Lecture，1955 年)、《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译注》(Wang An-shih's Record of an Excursion，1973 年)、《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Ancient China：Studies in early civilization，合撰，1977 年)、《柳宗元》(Liu Tsung-yuan，合撰，1978 年)和《文言语法纲要》(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1995 年)。

蒲立本的论文大多在《亚非学院院刊》、《通报》和《大亚细亚》等刊物上发表，主要有：《〈资治通鉴考异〉及其关于 730 至 763 年的史料》(The Tzyjyh tongjian kaoyih and the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Period 730～763，1950 年)、《顺宗实录》(The Shun-tsung shih-lu，1957 年)、《唐代文人生活中的新儒家与新法家》(Neo-Confucianism and Neo-Legalism in T'ang Intelectual Life，1960 年)、《早期汉语语法研究(一)》、《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1962 年)、《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二)》(1962 年)、《上古汉语和缅文元音系统的诠释》(1963 年)、《晚期中古汉语》(1970 年)、《晚期中古汉语(二)》(1971 年)、《关于汉语词族的一些新假设》、《关于上古汉语-s 的更多证据及其消失的时间》、《上古汉语的韵尾辅音》(1977 年～1978 年)、《安禄山之乱和晚唐长期尚武好战的原因》(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i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1976 年)、《中古汉语：历史语音学的研究》(Middle Chinese：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1984 年)、《早期中古汉语、晚期中古汉语、早期官话构拟发音的词汇》(1991 年)以及《一份以中亚婆罗米文书写的汉语文献：晚期中古汉语和于阗语发音的新证据》(合撰，1993 年)。

蒲立本敢于凭借自己扎实的古汉语和中国历史功底，积极参与中国学者的专业水准极高的学术讨论，对于一位外国学者来说实属难能可贵。例如在讨论中国历史上“尉迟”与“于阗”和“月氏”的关系时，蒲立本以语音对应关系为依据，将“月氏”谐音于“尉迟”和“越质”。他认为，“尉迟”最早并不是指于阗王姓。《晋书》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咸熙二年，国仁先祖之一利那

"立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讨尉迟渴权于大非川,受众三万余落"。当年大非川与小月氏住地湟中正好相邻。他还根据《魏书》卷二《武帝纪》中的记载:"(天兴)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迟部别帅率万余家内属,人居云中",断定尉迟部(即月氏)的后裔后来已成为北魏八家旺姓之一,直到唐代①。

又如汉语究竟有哪些亲属语言,多年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争辩双方的观点是:在汉语亲属语言分类问题上有白保罗和马提索夫对李方桂的批评;在汉语声调起源问题上有奥德里古尔和蒲立本对上古音构拟问题提出的挑战。前者涉及如何对待远程构拟与层级构拟,后者涉及如何对待比较构拟与内部构拟②。蒲立本提出的论点有科学依据,更令人注目的是他竟雄踞于强者之首,国际汉学界无不感到佩服。

修中诚(休中诚、许士、胡飞驷,Ernest Richard Hughes, 1883~1956),牛津大学毕业生,1911 年以伦敦会传教士身份到福建汀州(长汀)传教。1929 年至 1932 年任职于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33 年在牛津大学代理苏慧廉的汉学教席,教授中国宗教和哲学,帮助促进该校的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1943 年他再次来华,担任英国驻华使馆所属科学联络局成员。其间他曾专程到桂林广西大学商谈聘请陈寅恪去牛津大学任教事宜。在相处一个月中他和陈寅恪切磋学术,并对牛津大学的汉学的未来发展规划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讨论。1948 年至 1952 年他执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他的主要著述有:《东西方的个人》(The Individuals in East and West, 1937 年)、《西方世界对华侵略》(The Invasion of China by the Western World, 1937 年)、《中国,躯体与灵魂》(China, Body and Soul, 1938 年)、《中国古典哲学》(Chinese Philosophy in Classical Times, 1942 年)、《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 1950 年)、《大学与中庸》(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in-Action, 1954 年)、《两位中国诗人:汉代生活和思想简介》(Two Chinese Poets: Vignettes of Han Life and Thought, 1960 年)以及《文学创作法:陆机的〈文赋〉》(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等。

---

① 荣新江:《小月氏考》,载《中亚学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

② 参见何九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载《语言学论丛》第二十九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第五章
从史论和实践角度看英国汉学

一、世俗化与英国汉学的发展

英国汉学的跨世纪发展经历了从分散、个别、偶发到集中、整体和群发的漫长过程，其中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回顾汉学发展的历史，英国汉学家们不无难堪地发现：该国汉学的发展与早期新教传教士的宗教扩张行为（或者称为“普世化”）有着密切关系，新教传教士在华的福音传播竟得益于使中国人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早期的天主教在催生西学东渐的同时也曾为后来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鸣锣开道，涉足于大片真空地带，客观上有利于后来他们国家所需的人力、资源和产品市场的开拓。等到西方商人进入中国市场之后，许多人对于中国文明和传统的无知和鄙薄，逐渐动摇了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之间业已架设起来的桥梁的根基。

英国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1809年开始供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边译经办刊传教，一边以广州商馆的汉文通事资格直接参与通商、签约或者割地的谈判，他的双重身份客观上把自己的传教使命直接置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通过英美教会和商会的帮助，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了英华书院和恒河外方传道团，在马六甲建立了当时新教对华传教的最大基地。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不顾清廷禁令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了三次收集军事和经济情报的活动。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曾经主编中国境内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东西洋每月统纪传》。1837年至1840年他与麦都思、裨治文和马儒翰先后翻译了《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他的《救世主耶稣新遗

诏书》经太平天国修订后被广泛采用。在他身上世俗行为和宗教行为密不可分,但其政治背景却已经赤裸裸地超出了宗教范围。因为他主要服务于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人们往往把他的行为和英国的新教联系在一起。

中国历史上教案最频繁的时期就是新教在华传播时期。1840 年鸦片战争后全国发生重大教案 400 多起,其中多半发生在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各类反洋教揭帖和檄文一度引起群情激愤,出现了教案迭起的局面。尽管一些新教传教士在救灾、济贫、治病和扫盲等方面做了得民心、顺民意的工作,但是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却激怒了中国民众阶层和知识阶层,人们在感情上往往把新教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北京条约》规定保护外国传教士和教民,西方列强往往借机衍生事端,教案发生因此更加频繁。

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新教的最大不同点是赢得世俗当权者的支持及其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理解和尊重。

佛教文化是内省型非暴力文化,在处世接物上主张化粗俗为顺从,变邪恶为善良,因而它在华的传播方式主要依靠宣传教义和哲理。无论汉明帝夜梦金人的传说也好,《老子化胡经》的传说也好,都属于佛教与道教争正统争先后的"夷夏之辨"问题,以获得大众的理解和舆论的支持。达摩祖师对梁武王有关个人功德问题的回答引起他的不悦,又因实践新的禅法在中国北方遭到冷遇,于是面壁九年,是典型的佛家妥协和内省方式。在家居士应该遵循的"八戒"和出家信徒应该遵循的"十戒"为的是严禁佛教徒对世俗邪恶生活的追求,以净化心灵。佛教传入中国之初非常注意攀附中国文化传统,甚至还把道家的"清净无为"也吸收为养生要诀。虽然佛教在哲学思想上与儒家思想有所冲突,曾导致了"三武一宗"之难的发生,但是跟鸦片战争之后的反洋教教案比较起来,其性质却完全不同。佛教文化世俗化主要表现在信仰世俗化和庙宇世俗化两个方面。出家人的身份决定了进入世俗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世俗社会没有脱俗之人,只有佛教净土中才被认为有脱俗之神。

伊斯兰教在新疆地区开始传播时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事件:一是 8 世纪初受阿拉伯伍米亚王朝迫害的穆斯林逃往新疆避难,二是 757 年帮助唐朝镇压安史叛乱后留华的大食国军人。元蒙时代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来华当官、从军、经商、做工或务农,为了扎根华夏他们通过学习汉语和儒家行为规范实行自我同化,形成了回族。虽然新疆各族人民由萨满

教、佛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改奉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发生过战争，但是权力杠杆在中国穆斯林中从来没有作为强制性的传教手段来使用。伊斯兰教广泛吸收了阿拉伯古代宗教信仰以及犹太教、基督教的精华，是一种开放型和外向型的文化体系，不依靠传播教理来扩大影响，教族一体为其根本。初期的伊斯兰教育是家庭式的，宗教职业人员多半是世袭的，教民以清真寺为中心形成社团组织。中国穆斯林认为“五功”（念、礼、斋、课、朝）是尽天道，而“五典”（仁、义、礼、智、信）是尽人道。中国伊斯兰教义与传统儒家思想相互结合，是它在华夏大地生命力的强化剂。

形成对照的是，虽然利玛窦“奉天主真教，航海东来，其言多与孔孟合”（艾儒略语），但是1693年福建的一个代主教却训令教徒不得尊孔拜祖，1704年罗马教廷正式禁令拜天主以外的任何鬼神。后来由西方殖民扩张引发的一次次攻城掠地的战争，是新教在中国传播时期的教案的大写形式，是汉学发展中令英国学人难堪的阵痛，也是引导许多虔诚教徒世俗化的重要因素。而世俗化又是他们逐渐接近芸芸众生，使他们由天国使者变成了世俗化学者。

英国的汉学得以发展，主要归功于那些敢于接近中国社会，保持学人坚持真理的美德，渴求了解中华文明的世俗化信徒，例如伟烈亚力、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傅兰雅、李约瑟等人。虽然他们身上的光环黯淡了，但是作为汉学家的人格却变得更为高尚了。理雅各在香港倡导改变当时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体制，积极推动教育世俗化，学习英语的同时兼学科学知识，培训了大批官员、买办和通事。这个时期的教育改革后来被称为香港教育的“世俗化时期”。

英国汉学的大发展是在1945年斯卡伯勒的《为未来呐喊》和1961年《海特报告》发表之后的那段时间。两个权威报告帮助推动了英国的东亚、东欧、斯拉夫和非洲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在若干所大学创办了中国研究中心或汉学研究学院，改变了汉学研究停滞不前的状况。1986年发表的《帕克报告》又进一步扩大了汉学研究规模，完善或者改进了汉学研究机制。政府的拨款和基金会的资助，使英国汉学得以摆脱宗教、商业、政治和军事目的而存在，为不同民族和异域文明的沟通和交流而发展，为新教立足华夏大地而创新。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阶段在汉学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主要不是那些在弥撒之余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神职人员，而是那些在世俗社会一角的普通书斋或者课堂上为探求新知而献身的英国汉学理论

家们。

有许多英国传教士除了在神学理论方面的修养外，在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医学、艺术甚至自然科学方面也都各有专长。毫无疑问，作为传教士，他们必须在掌握基本的神学理论后才有资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作为学者的神职人员，不走世俗化之路却不可能在汉学领域中有任何作为。虽然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南怀仁、徐日升（Thomas Pereira, 1645 ~ 1708）、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 ~ 1741）、朗世宁（Joseph Castiglione, 1688 ~ 1766）、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 ~ 1759）走的是上层路线，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注重世俗学问，采用了文化手段传教，因此做出了非凡的成绩。对于有志于汉学研究的神职人员来说，世俗化是他们必须作出的一种选择。马礼逊和理雅各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

一些文章从教义宣传的角度来赞美马礼逊、米怜、戴德生和剑桥七杰①，说他们如何超凡脱俗，抛弃个人享受，为上帝作出无私奉献。他们确实认真地履行了所属教会赋予他们的来华使命，在基督教传播史上成为显赫人物。不过那不是世俗汉学家们追求的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上，人们并不都渴求圣诞子夜弥撒的庄严肃穆，礼拜堂圣歌班童声合唱的温馨，复活节伦敦郊外花车巡游一类的欢乐，或者节后超市不顾血本大减价的欲望满足。就汉学领域而言，人们更关心的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为同时代人争取什么，又为后代准备什么。虽然 18 ~ 19 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在传教士中造就了一批知名人物，但是从学科上说宗教信仰和汉学研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诚然，成功的汉学家需要渊博的学问和精到的功夫，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品格修养：对待历史的客观和公正态度，对待他国文明的平等和尊重评价，对待史料的严格和科学删选，对待结论的缜密和负责推断。敢于

---

① 剑桥七杰：指英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传教士章必成（Montage Harry Proctor Beauchamp, 1860 ~ 1939）、盖士利（William Wharton Cassels, 1859 ~ 1925）、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 1861 ~ 1946）、阿瑟·特威斯尔顿·普洛希尔 - 特纳（Arthur Twistleton Polhill-Turner, 1863 ~ ?）、塞希尔·亨利·普洛希尔 - 特纳（Cecil Henry Plohill-Turner, 1860 ~ ?）、司米德（Stanley Peregrine Smith, 1861 ~ ?）和斯塔德（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 ~ ?）七人。除何斯德是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炮兵科出身外，其余六人均毕业于剑桥大学。他们于 1885 年 2 月从剑桥出发来华传教，被认为是一个重要事件。1885 年 2 月 2 日在剑桥市政厅大厅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2 月 4 日又在伦敦的埃克塞特大厅再次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仪式。

接受对象国读者和专家的验证和评述，敢于接受不同观点的挑战，更是一种考验。这一切，只有世俗的汉学家或者世俗化的传教士学者才有勇气面对。神职人员凭借天国理论来观察社会，对于广大教众来说，特别是对于异教徒来说，不属于自己的世界可能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虚拟的世界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汉学的。

从某种意义上，传教士汉学家的“世俗化”就是“理性化”。历史已经证明世俗化是基督教文化在多元化世界中的发展倾向，也是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的成功资格。世俗的世界对于以“上帝使者”自诩的传教士来说是不真实的，而宗教的世界对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来说则是非本质的，他们必须在两者之中作出自己的选择。这是西方汉学进入课堂和研究所之前的一种现象，也是西方汉学进入专业化和团队化之前的特点体现。

二、史学倾向与汉学家的责任

通观历史不难发现欧洲的汉学发端于欧洲的史学（包括社会科学史和自然科学史所覆盖的理论和实践范畴）这一规律性的现象。这是因为两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对于中国问题的考察有基本相同的切入点，而且每一个重大进步和繁荣阶段的到来都与客观研究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从理论上讲，汉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选题和观点自由写文章，但是文章或者著述能否在汉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价值评判却有客观的专业标准。影响汉学著作价值、风格和特色的因素，客观方面的有：左右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潮流、由政府部门或者政治团体的导向所体现的政策因素、作者所处时代和国家的学术权威部门所倡导或认同的态度、方法与手段，以及资助机构、聘任单位和出版部门所操纵的经济杠杆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主观方面的因素则有：个人的立场观点、专业资格、认识高度、学科素养和方法选择等。真正的汉学家不仅仅是中国问题专家，还应该是中国学术理论家。他们所掌握的某一门类的中国知识应该是比较完备的，所关注的是已经或者正在浓缩为历史的社会内容。如果一位汉学家能用历史眼光对所研究的中国国情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而不是为少数人的蝇头私利奔走呼号，那么他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和追星族，成为影响他人思维中的中国形象的积极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外国汉学家的学术成败

得失与他们的史学倾向和历史责任感关系至为密切。成功的汉学家必定是有使命感的学者。

在17世纪来华的许多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中有许多经过严格挑选的有高度文化教养的精英,因为罗马教廷深知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首先必须改变皇室和大臣们的宗教信仰,而改变他们信仰的艰巨任务非耶稣会士精英莫属。虽然耶稣会士没有掌握西方来华传道团的领导权,但是他们在国内知识界和教会出版界都有自己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极为深刻,坚信中国人是西方文明之外的一个优秀民族。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崇拜心理在西欧和北欧,特别是在激进的法国知识分子中间,曾经产生巨大的反响。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勇敢地架设起了一座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桥梁。

从17世纪末延续到19世纪初的"中国热"在欧洲的降温原因,一是法国于1762年颁布了解散耶稣会的法令,使耶稣会士失去了自己的活动舞台;二是许多追逐利润的欧洲商人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在中国基层社会看到的多半是一些阴暗面,大凡不利于他们生财之道的中国事物都可能成为他们回国宣传的负面材料,于是在重商主义大行其道的西欧耶稣会士的学者们逐渐被人淡忘。

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一度削弱了法国在中国扩大市场方面的竞争实力。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一些英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科技成就开始持怀疑和冷淡的态度。少数人出于偏见、误解和无知,散布了丑化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言论,进而妖魔化(demonizing)、他者化中国。这一时期从英国到西欧各国的汉学界普遍存在着两种现象:一是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热情下降,从事汉学研究的人数减少了,汉学教席常常空缺;二是没有真才实学的伪汉学家投机取巧,不读书不研究就下笔千言,有些人到中国某一通商口岸呆上一段时间就著书立说,信口雌黄,哗众取宠;或者断章取义他人的著述,借题发挥,无中生有,蒙骗缺乏经验的读者。

19世纪中国在西方被妖魔化和他者化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出现的一种丑陋现象。所谓"妖魔化"不是笼统地指对于中国事物的否定或批评,而是指少数西方优越论者对于中国颠倒黑白的恶意中伤和别有用心的造谣攻击。所谓"他者化"是指西方列强在殖民扩张时代所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把新大陆和非洲等"他者"的世界描述为蛮荒和未开化的世界。显然这并不属于学术界治学观念的分歧,而是"他者"认识论者

的排他性镜像,与他者世界对立的西方存在才是惟一理性和文明的世界。在这种世界观的主宰之下他们把“他者”扩大到亚洲、非洲和所有被掠夺的地区。在对中华文明的认识方面,他们倾向于把个别中国人的缺点夸大为中华民族的弊端,把一时一地的现象上纲为中国人性格上的通病,力图编造一个似乎能解读所有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公式。正如英国汉学家罗伯茨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所说的:“随着西方观察范围的扩展,更善于观察的作者们发现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对中国人以偏概全的倾向。”他还引用了赫德日记中的一句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著作都陷入了毫无根据的以偏概全的错误之中。”①

1872 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麦华陀在他的《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中写道:“有关中国人的突出观点是,他们是非同寻常但却是愚蠢昏聩的人类,他们无休止地吸食鸦片,生出女婴就把她们溺死;他们日常食物中有小狗、小猫、老鼠,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在荣誉、诚实和勇气方面水平是最低的;对他们来说,残忍的行为是一种消遣娱乐。”②

1878 年副主教格雷(John Henry Gray)在他的《中国:人民的法律、礼节和习俗史》(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一书中写道:“中国人的道德特性是一本用奇怪文字写成的书,对于另一个种族、宗教和语言的人来说,破译这样一本书比解释他们自己的单一文字系统更复杂、更艰难。在同一个个体中,美德和邪恶,很明显地不相协调,但却同时并存。逆来顺受、温和软弱、乖巧柔顺、勤劳艰苦、知足常乐、欢快活泼、服从长者、孝敬父母、尊重老人都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与之相伴的是不诚实、说谎、奉承、欺诈、残忍、嫉妒、忘恩负义、欲壑难填和缺乏信任等等品质,中国人是一个软弱和却懦的民族。”③

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纪里备(William Hewitt Gillespie, 1868 ~ 1920)在《中国和中国的传教》一书中说:“保守原则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的心灵上,对他们来说,变化是令人厌恶、反感的。他们认为,要比几千年前的祖先更聪明是不可能的,因而,一个中国人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并崇拜圣人的

---

① 约·罗伯茨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 14 页。北京:时事出版社出版,1999 年。

② 同①,第 201 页。

③ 同①, 第 202 页。

箴言,遵循祖先留下的习惯,结果,中国人的心灵便处于停滞状态。人们评价埃及的话也适用于评价中国——人成了石头。这个帝国早就处于停滞状态,其条件,社会的和智力的,已经停止若干个世纪了……天才和创造性被认为是异己的和不能相容的因素……在这种状态下,进步是不可能的。他们目前的地位,就知识和文明程度而言,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而且事实上并不比一千多年前进步多少……然而,他们仍然对自己在一切方面低于外国人这点上认识缓慢,并且不情愿承认。假如我们一定要承认中国人是一个文明的民族,那么,它也只能是粗略加工过、而且仍然是一个野蛮的文明,这就是他们达到的程度。如果我们把他们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较,就会得出结论,即他们并没有前进和进步到他们应该达到的地步。"①

军医戈登(A. C. Gordon)在《从医学观点看中国》中说:"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对身体的痛楚漠然处之,或者对生活也是如此。自我残酷从婴儿时就注入其本性中,而且根深蒂固,以至于我发现,当手术进行时,旁观者以及患者的亲属却仍在微笑、互相打趣。我还看到一个人刚从手术台下来……微笑着对待下一个患者,似乎欣赏着他的痛苦,因为此时手术刀正切开那个患者的皮肤、鲜血从颤抖的肌肉上滴下来。"②

道格思在1875年5~6月在皇家学会所作的《中国的语言和文学》的讲座中曾经引述一个西方人的有关中国的这样一段谈话:"有这样一个国家,那儿的玫瑰没有香味,女人没有裙子,劳动者没有安息日,地方长官没有廉耻心,路上没有车辆,船没有龙骨,指针指向南方,表示迷惑不解时用手挠头,把左边视为上位,认为智慧来自胃部,把脱帽看作是无礼的举止,穿素衣即为举孝——如果发现那儿的一部文学作品不是用字母写出来的,语言没有语法,我们不应觉得奇怪。"

无论从语言学、逻辑学角度来看,还是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观点来考察,那些妖魔化中国人的言论多半都是十分轻狂和武断的。应该说明的是,为便于透视问题,上述言论仅仅取材于一位西方作者在自己著作中所搜集的个别反面例证,这是一位公正的汉学家的感受,但实际上这类言论在那个时期的西方有关中国的著述中俯拾皆是。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把他们看作另类,但是一个世纪后他们却不约而同地在严肃的西方历史学

① 约·罗伯茨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197页。

② 同①,第199页。

家的“东方主义者”名单中自我对号入座。其中一些人觉得委屈，或者同病相怜者为他们感到委屈，声称要投诉，要申辩；另外一些人却坚持认为事实确实如此。可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不听听《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1814～1865）在《中国与下孟加拉》（China and Lower Bengal：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1857～1858，1861年）一书中说的话：“我经常与那些极为出众、极为真诚的汉学家们探讨这个问题，并且总是发现，他们很乐于接受我的看法，即西方的意识不可能对中国人的性格形成一个总体概念。”①柯克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但是现在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看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彼此缺乏充分的了解与信任都可能妨碍一个人对异域文化的准确解读。

美国新教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在他的《中国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2年）中也说过：“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二十二年，这种情况并不能保证他就最有能力写作有关中国人的特性的文章，就像另一个人在银矿埋头工作二十二年，不一定证明他是写作一篇冶金学论文最合适人选……”②明恩溥的观点恰好印证了前面所作的判断。

翟理斯根据自己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体验，对于当时一些很少跟中国人接触的西方人妄谈什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现象非常反感。他批评许多西方生意人几乎没有与中国人友好平等相处，即便他们装出一种“容忍”的态度也仅仅为了既得利益。翟理斯认为外国人和中国人相互接近才能相互了解，产生友情。

造成妖魔化中国的原因很多。西方列强在国内产业革命和海外殖民化取得进展之后有些人变得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看不起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是其中主要原因。此时西方殖民主义者他者化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新大陆和非洲，而是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和世界上没有设防的贫穷地区。一些西方政客和学人，把中国和东方各国看作愚昧、未知和危险的国度。他们对中国的妖魔化改变了当时部分西方人的中国观。妖魔化必然导致反妖魔化的回应，不同文化的交流就可能因此陷入困境。

---

① 约·罗伯茨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198页。

② 同①，第190页。

有许多外国传教士和学者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揭露清朝官员的腐败无能，指出中国社会中落后守旧的现象，同情中国民众的艰难生活和不幸遭遇，他们一直赢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敬。即使有些人出于文化差异对中国社会某些现象看不惯，提出过过激的指责也能让人理解。有些学者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中国来考察，但是他们关心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通过博览群书，广泛收集材料，与其他同好合作分工，也写出了长篇巨著。例如1836年休·默里(Hugh Murray)、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彼得·戈登(Peter Gordon)、托马斯·林恩(Thomas Lynn)、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合著的《关于中国的历史性描述》(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China)，就是这样一部著作。该书共三卷，涵盖了中国古代史和现代史中的重大事件，作者们以其哲学观分析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叙述了欧洲各国为开辟前往中国的商业通道所作的努力，介绍了中国的工艺、文学、宗教、习俗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书中还有一幅中国地图和36幅杰克逊所作的版画插图，由爱丁堡奥利弗和博伊德出版社出版。书中的任何有争议的观点，在许多中国读者看来都不过是学术性的。

美国汉学家马森在评述《关于中国的历史性描述》时说："尽管这部著作漏洞百出，但因为它包罗万象，所以还是常常被人们当成一本参考书使用。该书的作者们在其著作中没有去引用诸如克拉普洛特(Julius Heinrch Klaproth, 1873～1835)、雷慕沙等同时代汉学家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欧洲大陆的汉学研究成果，与经由40年代及其之后逐渐增加起来的大众对中国的兴趣相去甚远，或者毫不相干。相反地，作者们大量使用了德梅拉(De Maila)、门多萨、珀洽斯(Purchas)及同类作者们的观点和资料。这部著作是引用17世纪到18世纪作者们的素材及大众化倾向的极好典型。"①

马森令人信服地把当时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学者们撰写的有缺点的汉学著述与妖魔化言论加以区别。他认为："尽管传教士们的作品在描写中国人性格和对中国哲学和文明的处理方法上有时不准确、持成见、带偏

① M. G. 马森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第43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克拉普洛特：(Julius Heinrch Klaproth, 1873～1835)，德国东方语言学教授。"珀洽斯"即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

颇，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作品是我们分析1840年到1876年期间的西方人的中国国家观和中国人民观的最为重要、最为丰富的资料来源之一。"①

19世纪是许多英国汉学家的中国观发生转变的时期。鸦片战争的发生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我们失去的远非45000万两关银所能体现的价值。但是政治家、学者和所有的有识之士在促进中英两国关系发展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英国汉学家们的杰出贡献，赢得了世人的广泛称道。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像斯坦因和郭实腊这样一些有争议的人物。前者在中国西部边疆没有设防的年代，以最低的代价掠走了所有他能找到的文化瑰宝，出境之后再按投资和回报的份额分配所得。后者一生虽有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技等方面的译著61种，但他曾违抗禁令，三次从广东闯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搜集地形、海防、军备情报。他们的史学倾向和历史责任无疑都是向少数人倾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认识到重新审视我们居住的世界和我们的历史的必要性。汉学家们在看到自己的成就的同时，也意识到对于本国和研究对象国的双向责任。他们的研究史学意识和历史倾向是否有助于取得最佳研究成绩，取决于他们的选择和实践，但是在宏观上也必然受到国际政治和史学潮流的制约。新千年开始时联合国提倡的人类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和平等共处，一反过去少数人崇尚的上国文明和强势文化主宰一切的观念，就是当前最大的国际政治和史学潮流。

今天我们研究西方汉学形成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术语境，不是为了对已存史实进行刮骨疗伤的新建构，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寻找规则，明辨是非，为今后国际汉学的发展开辟新航道，提供新思路。

21世纪将是英国汉学家全面研究中国的世纪，也将是英国汉学家为世界汉学施展才智和奉献成果的世纪。英国的汉学研究史表明汉学研究需要有世界眼光，需要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大潮之中来比较并考察中国，加强彼此的对话是汉学家们促进当代汉学发展的重要途径。综观现当代汉学家哈隆、韦利、李约瑟、葛瑞汉、龙彼得、蒲立本、杜希德、杜德桥、鲁惟一、德效骞和古克礼等人所取得的成绩，使我们高兴地看到了英国现代汉学在专业化和国际化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的速度与水平。

---

① M. G. 马森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第37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三、微观汉学、实证主义与区域研究

现代学术研究总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在国际同行之间相互借鉴经验中完善的。随着世界哲学观和认识论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对学科研究方法和手段提供的帮助，当今学术界已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硕果累累，人才辈出。从单一学科研究到跨学科操作，从微观考察到宏观比较，从单向立项到双向或多向链接，从静态分析到动态把握，从书斋中的个人冥思苦想到国际化专业化的团队攻关，学者们如此一步步迎来了国际汉学的新纪元。

鉴于历史条件的差异，我们不能以现代的标准和研究模式来要求传教时期和后传教时期的英国汉学家，更遑论前汉学时期的理论家了。就在一个世纪之前，档案解密、田野调查、数据库建设、量化分析、问卷回答、跨学科研究、专业研讨会和学术界的国际协作，对他们来说还是闻所未闻之事。

前汉学时期一些英国学者和自然神论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写过有关中华文明的文章，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懂汉语也没有来过中国，只能从欧洲耶稣会士的报告、水手和商人的来华见闻录以及同样没有来过中国的邻国学者们的译著中获取资料和灵感，因此免不了有理解肤浅和议论空泛之处，甚至有人云亦云之嫌。况且许多西方商人和水手作者缺乏必要的专业素养，语言也不都很精通，他们的文章常常有主观想当然和猎奇之处，论点论据并非无懈可击。1621 年罗伯特·伯顿在他的《忧郁症之剖析》一书中对于中国历史上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优越性的论述，确实切中时弊，令英人振聋发聩，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样的著述只不过是凤毛麟角。

许多新教传教士和驻华使领馆的官员长期生活在中国，广泛接触中国民众和社会，多数人通晓汉语甚至一两种汉语方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比任何外国人都更了解中国国情，如果不是一名汉学家，也本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问题专家。然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观察体验并不深入，所持的观点欠专业欠公允，喜欢从怀有离经叛道心态的中国人那儿获取信息，因此他们的材料，即便是第一手的，也可能掺假，以至于误导本国舆论。

斯卡思（J. R. Scarth）在《在中国的十二年》（Twelve Years in China: The People, the Rebels, and the Mandarins, 1860 年）一书的《序言》中写

道："绝大部分有关中国的书籍出自有官方身份的人——如传教士们和那些与当地人并无多少接触的人——之手：官员们整日放不下自己的架子，只能时常作些乏味僵硬的外交方式的访问。他们的主要信息是从那些属于中国官员的人那里得来的。传教士的机会要多一些，他们与人民的交往要多，而且他们的群众与统治者们没有多少联系，但是，从他们自己的立场上，所能见到的中国人又与绝大多数其他观察者的角度不同。"①

早期的英国汉学文章大多是随感式的就事论事，没有什么理论系统，尔后出版的部分专著也只是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作者仿佛不善于从历史语境中概括全面、总结规律或者与某一非西方理想模式进行比照。1875年5～6月道格思在伦敦国王学院所作的《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报告，是英国大学殿堂第一次系统介绍汉语和中国文学的讲座，在英国汉学史上有其重要意义。如果不能说它代表了当时英国汉学的最高水平，至少也可以说是代表了主流倾向。虽然道格思是通事出身，知识渊博，眼光敏锐，然而面对年青学子，他的讲座却显得通俗有余，学术性不足。其中有关汉语的观点跟他1889年出版的《华语鉴》中的论述大体相同。引用神职人员对于汉字偏旁部首的牵强附会的解释是其中的一大败笔。例如他引用了一位耶稣会士的著作说，汉字"船"是由"舟"、"八"和"口"三个构件组成的，明确提醒人们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道格思断定中华文化并非中国人自己创造的，而是公元前2300年从西南亚移入的。即便从西方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观点来看，他的武断说法也是职业历史学家所不能接受的。难怪翟理斯怀疑道格思汉学知识的权威性，把他编撰的不列颠博物馆图书目录贬为"门外汉的之大成"。

中国叙事史学发达，在文献整理和考据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传统的汉学思维模式以考据为特色，乾嘉史学考证更是通过世代学人的传承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这些对于熟读汉籍的英国和欧洲汉学家显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1901年翟理斯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是第一部从发展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进行描述的英语汉学专著，以朝代为顺序展开，提供了各类文学形式产生的背景史料，如汉字的演变、印刷术的发明、佛教的传入、戏剧的起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类书的介绍等。更为突出的是他把英译相关中国文学名著，例如先秦诸子散文、《前赤壁赋》、《红楼

① 约·罗伯茨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8～9页。

梦》和《聊斋志异》等，作为史证的一种方式。强调细节描写，充分使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正是新叙事史的治史方法。由此不难看出，翟理斯自觉或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中国和西方的写史手段：微观与宏观、专史与通史、事件与编年、考据与实证的结合，体现了分析历史哲学的理解、阐述、评论、研究和反思的要义。

长期以来，牛津大学的汉学教学隶属于东方学专业管理，与该校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中国研究缺乏沟通和交流。教师的学术兴趣偏重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普遍忽视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研究。剑桥大学在创建之初也以古文教学和古典文献研究为主，现代汉语、现代文学、现代历史以及相邻学科的教学和沟通滞后，经院式的导师制和微观汉学模式占着主导地位。面对世界学术新潮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学术潮流的冲击，他们一面坚守传统，一面也因势利导地作了一些调整。本科教学在传授传统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也逐渐增加了现代中国国情知识。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注重与社会学和历史学结合，把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经济史领域。20 世纪 40 年代剑桥大学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只能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进行选择，坚守“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原则。后来开设了两者结合的单一课程，不学习汉语的学生也可以撰写中国历史的学位论文，近年来还实行汉语与其他专业结合的双科学位制度。现代学科和相邻学科的内容相继进入英国大学汉学专业新编教材和讲座，商业管理、经济开发、国际政治、人力资源、人文地理、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化等涉科内容，在汉语教师的日常教学和科研以及汉学研究生论文选题中得都到了充实和加强。英国汉学教学和研究走上了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轨道。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的汉学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虽然美国的文明源于欧洲，但是并不是欧洲文明的异地重复，在发展规模和速度上都超越于欧洲。尽管美国的汉学也源于欧洲汉学，但是其战后的经济实力雄厚，汇聚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精英，留学欧洲的美国学者和侨居美国的欧洲学者共同帮助提升了美国的汉学水平。

美国高瞻远瞩的汉学研究方向与欧洲的传统汉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早在 1936 年资深汉学家费正清到哈佛大学任教时就主张扩大汉学研究范围，把重点由中国古代历史转向近现代史，并扩大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1946 年至 1949 年他指导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计划，向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注入了宏观研究的内容。20 世纪 50 年

代东岸的哈佛大学和西岸的华盛顿大学几乎统领了北美汉学研究发展的潮流，六七十年代之后又进一步形成了多元并立的局面。美国汉学研究的方向和手段创新主要体现在汉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区域研究、专业化操作、国际化团队攻关等方面。这对于欧洲同行的影响是巨大和持久的，主导西方汉学研究达二百多年的欧洲汉学传统从此被逐渐改变。

所谓的“区域研究”是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许多原哈佛燕京学社培养出来的美国学者，如费正清、拉铁摩尔和卜德等，后来都成为知名汉学家，对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注意到中国在远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呼吁加强对中国的了解。1946 年哈佛大学成立了国际与区域研究委员会。具体说来，“区域研究”是跨学科的、对特定地理区域的研究。就汉学而言，范围不局限于中国，而是扩大到亚洲和整个东方；就所涉学科而言，汉学专业的设置纳入了包括汉学、日本学、韩国学、印度学、埃及学和南洋学等专业在内的东方学院或者亚非学院管理。这种安排与西方世界的整体战略决策也是相吻合的。1992 年理查德·霍德－威廉斯（Richard Hodder-Williams）代表英国区域研究监测小组（The Area Studies Monitoring Group）递交了一份题为《联合王国的区域研究》的报告，正式认可了“区域研究”方法在英国汉学中的应用。

所谓“宏观研究（macro-studies）”是与“微观研究（micro-studies）”相对而言的概念，也是我国学术界所熟悉的传统汉学和宋学的标志性分野。传统汉学的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辨别文献真伪，反对空言义理，追求言必有据，无征不信。这种治经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可以克服凭个人主观推测来鉴别史料或褒贬政见、以“天理”和“心性”等所谓的“纲常”、“名分”来评价历史盛衰和王朝更迭的弊病，纠正历史撰修中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推动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使史学得以客观化。这种涉及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方法体系，有时缜密完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常被誉为“微观研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传统汉学强调重考证辨伪、轻分析评论的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史论的升华和对于历史的宏观把握，影响了历史学家履行自己的崇高职责。而宋学的学术特点则是重视阐明儒家经典蕴含的义理，褒贬发挥，以求达知圣贤本旨，不愿为琐碎的诠释、考据和数字所累。对于史实的正确诠释和解读无疑可以发挥“举一反三”的作用，使人产生“纵览天下，激扬文字”之感，因此常被视为“宏观研究”。然而没有看懂经书就空发议

论，必然无的放矢，或者虽然看懂了，却横生枝节，指鹿为马，就可能导致虚浮学风的盛行。在我国历史上革命浪潮汹涌的年代，一些投机的理论家常对同一事物先后作出不同的解释，使人无所适从的现象并不罕见。我国红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考据派”和“索隐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上述学术路数。然而，客观地说，“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作为治学方法各有千秋，无法用“孰好孰坏”的标准来划分界线。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用于各学科领域的研究，则可纲举目张，更臻完美。

现代英国汉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结合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1958 年葛瑞汉在研究中国哲学家程明道和程伊川时，首先收集大量原始材料，然后进行科学鉴别，最后才进入对二程兄弟的人性论、行知论和理欲观的分析，高屋建瓴地作出评价。我国研究程朱理学的传统方法常以人物个案为主，以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来划分人物营垒，把程朱理学列入包含着辩证法积极因素的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范围。葛瑞汉的研究方法因小见大，微观与宏观结合，使读者看到了理学的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客观历史条件，也看到了理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避免了先入为主的类推，结论令人信服。

1983 年杜德桥译述《李娃传》时，曾经运用研究莎士比亚剧作的版本学方法，对照《李娃传》各种版本的每一行每一个词，就其意义、用典、出处、褒贬进行考证和注解。他除了为翻译需要了解故事的背景、情节和人物外，还进一步把唐代传奇和唐代社会联系起来，在《导论》中揭示其蕴涵的社会和文学价值，并拓展其教学和研究的用途。这项研究与他后来的许多著作的研究方法都是一致的。“考证”是微观研究的一种方式，也是中国版的实证主义，没有丰富的学养和经验是不能胜任的。出色的考证，注释和解读的长度可以超过原作的数倍，但是常为编辑和读者诟病，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简直无法理解。

从 1966 年开始编写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是一项巨大的国际汉学工程，主编为剑桥大学教授杜希德和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第一卷《秦汉帝国史》由杜希德和鲁惟一合编，第三卷《中国隋唐史》由杜希德编写，第六卷《五胡政权与边境邦国》由弗兰克和杜希德合编，第七卷《中国明代史》由莫特和杜希德合编。因为有 105 位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史学研究人员参与编写，各卷方法和风格都不尽一致，但是包括人类学、神话学、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版本学、实证主义在内的各种方法几乎都应用其中，目标是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如实描绘历史。从叙事史学转向问题史学（history through problems）是他们关注并力图运用的方法之一。有些学者研究了中国20世纪下半叶的考古新发现，并与原有的文献和官修正史进行对照，从中确定第一手史料的价值。作为中国史学专家，他们比一般学者都更熟悉并掌握中国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式，因此读者不难发现，在那套史书中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研究方法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赋予了史料更高的科学价值和可信度，成功地开辟了史学编撰的新途径。

四、汉学大国面对的现实

1987年炎夏，伦敦大学历史教授巴雷特向该校亚非学院学术研讨会提交了一篇题为《不思进取，不可思议：汉学书籍和英国学者往事综述》[①]长达125页的论文，详细地回顾了英国作为一个汉学大国的汉学研究历史进程和存在的问题。论文着重谈到英国汉学研究的图书资源、汉学家的际遇和困惑，每每与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欧美国家的汉学历史和现状进行比照。该文史料翔实，分析深刻，批评尖锐，可谓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很快就在西方汉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为被广泛引用和谈论的话题。

巴雷特毕业于剑桥大学，长期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对于英国汉学界的人和事了如指掌，因此谈起来才如此情真意切。

与其说这是一篇论文，不如说是一篇忆旧抒怀文书。作者对于英国汉学的历史和现状心存疑虑，千言万语欲一吐为快，但直抒胸臆有失温良敦厚，刚柔并济或许可以感动身边更多的同道，即文中所说的“immediate audience”。论文开头写得很委顿，很迂回，甚至给人一种言不及义的印象，这或许是一种英国文人的说事方式。作者这样写道：

对于外界人士而言，图书馆长的职位有时好像是特别无奈的职责。跟

---

① T. H. Barrett, 1989. *Singular Listlessness*, Longon: Wellsweep. ISBN: 0948454040 — 0948454024. 正式付印时，作者对注释11和169之间的内容作了大量补充。本节有关论述根据作者原始打印稿译出。

书本打交道肯定是没完没了的差事。购书和编目部必须尽量设法应对潮水般涌来的出版物。无论信息技术多么高明,对于书籍发明所产生问题的解决我们好像还相差甚远——人们总是认为,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几乎还没有取得令人鼓舞的进步。对于汉学图书馆馆长,特别是今日英国汉学图书馆馆长来说,他有充分理由要极大地把奋斗水准提高:姑且不说图书供应唯一主流渠道以每年数千种速度推出期刊,就是以数万册的速度推出新书,也必须向另一半球订购。那些书刊的文字本身就足以搅乱图书馆长常规职责的大半,分类编目更非易事,特别是我们大部分图书馆都人手不够,情况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长就得以危急管理方式将其权限范围紧缩到直接过问的程度,而没有时间具体管编目是否保留或者发布。这样,哪个研讨会让我们估计一下自己图书馆的汉学资源,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意外的享受;所有中文书的读者对于不列颠图书馆、亚非学院和中文图书馆系统齐心协力使会议召开成为现实也会感激涕零。

这样的会议恐怕还必然存在着对于光明面过分渲染的诱惑力。假设这是一次轻松享受从回顾中得到异乎寻常乐趣的机会,那么它更适宜强调我们财富中珍稀事物的奇特性,以及在我们现有资源中可望对参考文献选题进行的精细研究,或者新近自动化进展展示的乌托邦前景,而不是思考诸如'我们藏书的严重不足'或'整日疲于奔命维持一般水平'之类早已为大家所熟悉的命题。但是这不只是为了纠正潜在的不协调——我们工作所追求的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以及历史和全球学术团体调研中,对比之下突显的阴暗面。说什么也比不上坦率承认英国汉学研究中的失误来得好,这对于迄今为止的历史记录将是公允的。

直至今天还没有任何一本出版物像下列文章那样专门谈到英国的汉学研究历史,这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这些文章,比如,将近50年前的一篇详尽研究东印度公司人员的汉语能力的文章,以及非常出色地简要记述一个以就职演说为开端的伦敦汉学教席的另一篇文章。这些文章清楚地表明,英国在这方面努力取得的成绩并不算出色。

当然,从我们现在的优势地位嘲弄前人的失败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却忘了我们的工作将来也有被看作是愚人之举的可能。深谋远虑的历史学家无疑对于前人创业的艰辛难以忘怀,对他们敬佩有加。尽管如此,汉学研究史欢迎比较,如果不是今昔对比,至少也应该是西方各国不同理解

程度之间的比较。把过去的汉学作为西方知识历史一部分的研究现在正在进行之中，但是所作的研究已经足够再次说明，大不列颠以外国家的名字在我们时代记录的事件最后整合中形象显然更为高大。我们已经有一份戴密微（Paul Henri Demieville，1849～1979，本节括号内有关人物的生卒或在位时间为笔者所补充，下同）所写的有关法兰西汉学研究发展情况流畅可读的简要概述。还有高第，他的名字只不过是为微戴密微祖国增色的许多名字中的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汉学研究史相对而言比较短，然而有一册专著对美国迄今为止的中国史编修进行了重新评估。

接着，巴雷特把议论焦点转向了中文书刊。他认为图书资料的积累很重要，中文书籍，特别是前现代（premodern）中文书籍，是保证汉学研究成果的先决条件。他说，在一个连大众喜剧都引用数百年前著作中的典故的国家，怎么能忽视其古典文学遗产呢？如果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干吗还要学习汉语？他写道：

然而西方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似乎还像一位鲁莽的外国闯入者，就像450多年前完全出于好奇首次记录下来进入馆藏的中文书。据说，那册中文书是葡萄牙国王把它和一头大象一起送给教皇莱奥十世（在位时间1513～1521）的礼物。虽然我不知道这两件礼物后来被如何处置了，幸好对于汉学图书馆长来说这种不易做到的双份捐赠没有成为一种固定的程式。不过实际上，对于伊比利亚水手来说，购买中国图书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初有意迈出更多了解中国的步子（与类似马可·波罗那样的旅行家所传播的中国信息不同的方式）。16世纪那些水手终于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立了直接而持久的联系。一位对中国毫无了解的学者也采取了这种方式——大约在16世纪中叶，巴罗斯（Joao de Barros，1496～1570）的中国仆人帮他购物时给他买了一些中文书，于是他通过那些书了解了中国。

可惜的是巴罗斯所写的东西已经遗失，连那个仆人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不幸的汉学研究先行者的许多助理的贡献并未得到很好的承认。每年公布的中国书籍的册数，即便在图书馆早期也是令人吃惊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芝加哥和宾夕法尼亚也都有了全面教授汉语的大学（虽然别的地方，从夏威夷到达特茅斯，也都教授汉语），而且一些美国职业汉学家——例如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和卜德——也已经在那些大学找到了工作。但是美国汉学的倡导者却向欧洲，特别是已经确立了自己规范的法国和荷兰以及伯希和等人，专门咨询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传教士出身的学者，例如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等人，这个时期也可能在美国其他大学执教，但是他们的主导作用却没有达到英国那样的程度。

谈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汉学情况，就得谈到不列颠博物馆。1907年斯坦因弄到了（在此姑且用一个中性词）一大批在敦煌发现的写卷并运回伦敦之前，翟理斯的儿子翟林奈于1900年到了不列颠博物馆。整整50年过去了，'小翟理斯'整理完中国文物之后退休了，他的编目也出版了。任务完成得不算快，而运回巴黎的另一大批写卷的目录的第一册，经过多人之手以后才于1970年问世，此后又有一册目录问世（共三册）。

不列颠博物馆一度也是韦利的家。他无疑也是本世纪英国知名的东方学家，他从汉语、日语和其他语言翻译的许多书具有特别的文学价值。1913年韦利开始服务于博物馆，1930年离任。斯坦因藏品中的佛画编目他做得惊人地快，于1931年就出版了。不过公正地替翟林奈说一句，佛画只有几百幅，而写卷却有数千。韦利的职业，可以说就是编目。就像托马斯·曼宁，就像翟理斯默默无闻的孤僻弟子（可否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却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其他英国汉学家（但巴克斯爵士的情况不好判断），驱使韦利研究汉学的动力纯粹是出于他知识方面的好奇心。他的汉语完全是自学的，并且很早就开始发表译著。一旦具备经济手段，他就潜心独自看书写作，果断地把业务上的分心职责减到最低限度。比方，当有人用剑桥的教席吸引他时，据说他曾回答说：'那还不如让我去死了的好！'原因是，尽管他的翻译是一流的，他的娴熟学养可以胜任一切，但是他对于欧洲大陆同龄人（更别说他的英国同事）所列举的汉学研究也许觉得有些乏味。他对于我国汉学研究总体水平的非正式奉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巨大的，然而他个人身上的卓越才能却使他回避了事业上的任何纷争。

在此，巴雷特把笔锋转向了英国汉学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英国汉学家和加入他们行列的外国汉学家的众星相，从英国——中国——德国——法国——日本——美国——欧洲，然后又回到了英国。好像是海阔天空，其实每句话都用心良苦。娓娓道来的不是故事，而是为英国汉学界把脉，是对顶级人物和各种流派的点评，带着几分人生哲理，几分无奈，几分感叹：

这样一来，尽管有韦利发表的作品，在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大学的汉学

研究前景却是非常黯淡的。虽然英国卷入了全球性冲突，但是突然要求未曾预见到数量的接受过东亚语言培训的军事人员，使英国戏剧性地结束了几个世纪百无聊赖的状态。20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伦敦、牛津和剑桥三所大学出现了一些进展，大多数情况跟欧洲的密布战云只有间接关系。在这些进展中，图书馆的中文书刊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在牛津大学，尽管苏慧廉去世后教授席位空缺多年，但是请来了中国学者向达，于 1936 年起草了一份购买中文书刊的报告，拨出专款 600 镑用于填补藏书空缺。1939 年，虽然语言培训计划写明学生专修‘书面语，非口语’，但该校还是建立了中文特优学院①。上述一些小进展体现出来的进取精神出现在传教士出身的修中诚在牛津大学执教期间。1933 年他开始在该校教授宗教和哲学课。

1938 年剑桥大学一位新教授的到来也给图书馆带来变化。他就是古斯塔夫·哈隆，孔拉迪(August Conrady，1864～1925)创建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学院的毕业生，在哥廷根任教时积累了多年的宝贵经验，在被迫移居英国前非常关注汉学图书馆资源的建设。1939 年他开始着手为剑桥大学图书馆制定一个完整的购书计划，但是大战的爆发推迟了计划的实施。

1936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接待了一位来自德国的避难学者西蒙。他是一位汉学教授和称职的学者型图书馆馆长，不过他的工资开始时是由某一位‘匿名赞助人’而不是大学当局所筹款项支付的。两年后他获得了讲师职称，但是大约十余年后才得到一个汉学教席。那是一个新设立的职务，因为早在一个世纪前设立的教授职位已由前传教士学校校长叶女士担任，她从 1921 年起就在亚非学院授课。

第二个教席的破例增设(西蒙所在远东系由原来三个教席整体扩大到 26 个)无疑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有关，但是直到 1943～1944 学年我们仍然能听到对于英国时局相当强烈的谴责：“我曾一度受香港大学委托为该校物色一位教授，他们幻想这位教授应该是英国人。我四处寻觅，却找不到愿意屈尊俯就并适合那种工资待遇的人……如果我想咨询汉学方面的事，恐怕就非去巴黎不可了。”

---

① 特优学院：按照英国考试和学位制度，学习并通过规定大学本科课程的学生，获得学士学位后可学习特优课程，参加研究生的课堂讨论，在研究生院或其他相关导师指导下写一篇副论文，才可授予特优学位。特优学院是为特优研究生设立的学院。

可是到了1949年,巴黎的汉学家却有意表示对于英国国家经费符合本国汉学研究需要的羡慕之情,力争扩大重组并发展以同等经费实现适合法国课程的开设。显然,英国战时对大批语言学家进行快速语言培训的经验迄今被认为不值得过分关注,正是斯卡伯勒伯爵委员会报告的主要背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该报告于1946年出版。但是,巴黎所欣赏的是,组织那个委员会的最初动议不是出自别人,而是出自我们惟一的东方学家兼外交秘书安东尼·艾登爵士(Robert Antony Eden, 1897~1977,更别说他担任首相时的职务了)。

这一阶段制定的计划并没有都付诸实施。比如,剑桥的目标是一名日语教授和另外三个日语职务,直到1985年才实现。教授的工资是日本个人认捐而不是由国家经费支付的。但是图书资料是斯卡伯勒伯爵委员会坚决支持的(见《斯卡伯勒伯爵委员会报告》第115.19节)。不久哈隆和西蒙便带着大把临时补助款到远东购买图书。图书馆的此次扩充也符合新聘任人员的需要:1946年至1947年斯科特小姐(Miss M. I. Scott,后来的学衔是"博士")已经当上剑桥大学图书馆东方文学馆馆长,这一关系延续了30多年。1950年至1951年她被聘任为负责汉学文献的助理馆长。

牛津的情况有时比较复杂。大战快结束时牛津大学聘任了中国一流的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接替苏慧廉的教席。但是他(是巴克斯的影子)因患眼疾无法视事,于是回国重操旧业。1947年仍然没有合适的英国人选,便从美国邀请德效骞来填补这一教席。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多才多艺的传教士学者(比如,他也是一位热情的巴松管吹奏者),为了维持厚古薄今的体制而不惜牺牲口语,但是他无法保持修中诚乐于与波德雷安图书馆建立起来的关系,于是只好给图书馆2000镑,而给德效骞8000镑建一个他自己的图书馆——东方学院现有汉学藏书中心。

但是,我们别忘记,英国并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汉学扩展阶段的惟一国家。虽然1939年在西德境内只有四个汉学研究中心,但是到了1952年至少有十个大学教授汉语。相比之下,英国直到1959年才有第四个大学开始汉语教学,那是杜伦的一位斯波尔丁的汉学讲师,他同时兼任古尔本基博物馆馆长和杜伦大学图书馆远东部负责人。而在北美,战后扩展的方向是从更长远角度对于汉学研究方式施加深刻的革命性影响,这在西方被看作是美国对于东亚研究的介入,大大超过欧洲各国过去所作出的贡献。

汉学界普遍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发展，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这一观点听起来似乎不符合逻辑，但又无法否认美国汉学的思路和实践对于有更长历史的欧洲汉学所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实际上，美国汉学家在战前就提出“汉学与历史学和社会学联姻”和“区域研究”的理论已经先声夺人，更别说早先倡导成立“庚款委员会”的形象工程引起列强各国的仿效，以及战后福特基金会对于英国大学汉学工程的捐赠了。国际汉学大舞台的交流本来就不需要签证，何况汉学研究容不得半点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也不能讲商情。想想这些，文人的窘迫和嫌隙自然也就可以涣然冰释。对此，工于铺陈奥妙道理的巴雷特是这样诠释的：

费正清认为，汉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只以先孕后婚的方式（shotgun wedding）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不过，不管这种延误多么不应该，结合多么勉强，它在美国出现的时间却比任何地方都更早一些。以巴黎为基地的汉学过去美国人想拼命超越，结果，与社会学家理论上更为大胆的方法相比较它却显得非常浅薄。费正清本人曾用这些话对巴黎汉学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描述：“建筑学术大厦的资料砖块的积累（至少也是知识的堆砌）形成了微观汉学传统（tradition of micro-sinology），它汲取的是考证学传统（为文本事实而事实）的营养。”芮沃寿对这一传统的影响还进一步作了这样的解释：“汉学研究在西方学术中仍处于停滞和不发达的领域。”

事实上，费正清和芮沃寿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都曾在牛津深造过（当然是以历史学家而不是汉学家的身份），这段经历使他们特别轻蔑欧洲汉学。但是在美国的区域研究全盛时期这种观点是相当普遍的。在回应新区域研究法主要倡导机关刊物《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杂志主办的一次汉学研讨会时，“默默地为汉学喝彩”的口号不是出自于美国人之口，而是出自于一位曾受业于哈隆的英国历史学家之口，否则就会有压倒优势的人认为汉学代表的是一种完全过时的研究。

在某些学术圈中，还有人进一步提出，既然中国现在这么坚决地否定自己的过去，那么就应该淡化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以利于进一步强调对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当然这一观点没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如果1945年美国图书馆藏书没有决定在现代资料的建设方面迈出第一步，那么这个重心的转移就可能碰到更多的困难。当时在华北和中国其他地方都有美

国人,可以代办购书业务,也使这个决定执行起来更加方便。

认为斯卡伯勒委员会只不过把欧洲大陆相当保守的汉学研究形式长期引进英国是不公允的。许多战后招聘加入汉学研究工作的一代人原来掌握的第一外语都是日语,这样便于他们利用日本人对于中国研究的知识(他们的前辈除了韦利外没有一个人这样做过)。他们得益于传统资源的把握与较为现代方式的诠释的巧妙结合,这也是英国的最佳日本学的特点之表现。尽管有些大学仍不愿意在课程表中加大口语教学的力度,但是英国武装部队通过全国媒体在汉语培训中却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战时的现代汉语口语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管怎么说,斯卡伯勒委员会报告发表以后的那几年,汉学研究方面的惟一重要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时代错误(anachronism),又回到了当年英国大学的中国事物是实际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唯一关心的事情。

当然,我所指的是李约瑟的研究,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于1954年出版,系列中其他十四卷的书名现在也已公诸于世。这一被广泛赞誉的项目,在封闭学术范围内——翟理斯及其同道的研究也是以此为其特色——尚无人追求。虽然今年亚非学院聘任中国问题专家担任新增设的亚洲科技史课一事终于使人们看到了把中华文明纳入正规课程的前景,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对英国业已存在的专职汉学研究产生任何冲击。否则李约瑟研究所的存在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因为它主要接受联合王国境外赞助而使现有研究项目得以继续进行下去,而且这些赞助主要是因为该所那个独一无二的图书馆才被吸引来的。

但是李约瑟研究所的创建用了整整25年时间,而在这25年中,尽管汉学研究的主流航道并不总是稳定,但还是在发展。1961年威廉·海特爵士领导的大学奖学金委员会(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下属的一个分会提出了对于后斯卡伯勒发展(post-Scarbrough development)进行检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对我国的汉学研究进行根本变革,以期接近美国的研究模式。彼得·帕克爵士说:"受美国样板的启发,将集中建立区域研究的各个地区中心。"1963年在利兹大学创建了第五个中文系现代汉学研究专业,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则在教学中增加了政经研究、地理学和社会学。紧接着,1965年爱丁堡大学主动提出了增加汉语教学;1967年福特基金会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创办现代中国研究所赠款32.5万美元,1968年6月12日该所正式成立。福特基金会同时还给利兹大学图书馆

50,000 美元赠款,帮助新成立的中心建设参考文献资源库。

但是海特委员会下属分会一开始的做法就是批评。1961 年人们注意到海特分会特别关注非学术短期做法的威胁。如果英国各大学都普遍接受他们的观点,那么,要把传统保持下去,现代汉学研究至少会成为业余人士或者新闻记者而不是为严肃学者的领域。1965 年一位英国大学人士对美国来访者说:"我们只把对现代中国感兴趣的学生派到美国去。"而那位美国客人个人的想法则是,欧洲现代汉学研究从总体上看资金不足,特别是"虽然我们开始得比较早,用了 20 年建设了可以用于选聘人员的人力资源库,但是为现当代中国研究投入经费却变得越来越困难。欧洲还必须从零开始。"

1971 年福特基金会的一份报告,在注意到美国汉学研究发展中的许多问题的同时,也说到"英国对于传统的兴趣又再度恢复了,不过还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权衡了海特扩展计划的综合利益之后,该报告最后说:"不能发展,也不能发动社会学家研究中国问题,表明了中国在英国知识界和国家关注事务中的地位并不重要。"

虽然从那时起也有一两个创举(例如 1980 年在牛津的女王伊丽莎白宫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但是在我学习汉语的 1967 年至 1971 年也许是我国汉学研究发展的高峰。比如,就在这一时期,1966 年开始策划的《剑桥中国史》已经具体化。在这持续进行的项目中,美国在财务和学术方面参与的范围再次表明英国战后发展的成绩是有限的。十年内开始严格控制开支,斯卡伯勒和海特时代增设的岗位开始消失。虽然六个现存的中文系没有减少(不过在格拉斯哥增设汉学研究的努力失败了),可是与此同时,美国大学中文系的数目却增加到 100 个左右,西德也增加到 20 来个。我国学术界职业中国通的人数很难统计,大约 40 ~ 50 位从事中文教学,大约还有 50 位活跃在与各自专业有关的汉学研究岗位上。相比之下,俄国的中国通大约有上千人,而美国的人数估计为 3000。

因为 1986 年彼得·帕克爵士《为未来呐喊》的报告,英国汉学研究的下滑过程被阻止住了,所提供的经费可用于支付一些岗位薪酬、学者和图书资料的费用。然而这笔经费的实际数量很难说达到扩展的目的,我们的前景也许不像当初看来那么黯淡,但是用"光明"来形容就有些夸张了。

说了那么多英国汉学研究的事,在面对我们面前的问题之前也许值得回顾一下往事。从前面的叙述中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对中国的

了解总是依靠友善的陌生人——中国人,例如科克的好友安德列亚·迪特斯(Andrea Dittis);眨眼睛的小个子沈福宗;刘亚骈(Liu Ya-pien,音译)烈士;征募壮丁钟阿三(Tchong Ah-sam,音译);还有19世纪的同事或秘书,从初学乍练的杨善达到卓尔超群的王韬,现代文学家如老舍和萧乾,学者李约瑟的合作者鲁桂珍,前非洲黑奴安东尼奥(Antonio);欧洲人如《好逑传》的不知名的合译者;意大利教师蒙图西(Montucci,音译),传教士路若汉神甫(Father Rodriguez);更近一些的还有西蒙和哈隆,美国人德效骞。这个名单是写不完的。

巴雷特不无惋惜地分析了多年来英国汉学界的人才流失,而国内的汉学席位却不得不请外国学者来充任,那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交流",而且英国大学图书馆的汉学藏书要籍珍本实在太少。他认为一再错失历史赋予的良机,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重大失误。一句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可是,对于战后美国汉学家倡导的研究方法又应该持什么态度呢?虚怀若谷地跟进还是沿着传统路子走下去?那是他那浓笔重墨的笔锋转向的另一个问题:

但是,看看英国对于自己图书资源的利用就明白,在正常的学术交换模式之后却是一幅不那么美观的英国失误的图像。我们图书馆的藏书大部分都是很一般的,标准的参考书表明,在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丰富的中文藏书。若跟东亚比较,当然有些不公允。就图书的质量而言,可以指出我们在三个主要方面的实力:非传统文献学家收藏的通俗文学;被当年中国政府禁止的政治颠覆资料(如太平天国和天地会的资料);以及敦煌写卷。但是,利用过这些资料的英国学者的名字(当然还有利用机会研究手边这些珍版书籍的人)跟来我国访问的学者相比之下,就显得格外相形见拙了。例如:柳存仁、萧一山、胡适、王淑敏(Wang Shu-min,音译)等人都并非等闲之辈。

运到巴黎的敦煌写卷的命运值得与我们的藏品相比较。诚然,巴黎跟伦敦比起来在写卷编目出版方面速度有些慢(东京比伦敦和巴黎又更胜一筹),但是为出版写本研究曾一度推出了系列单篇,近年来研究那些写本的一批学者持续不断推出的文集进一步丰富了敦煌研究的法语著作。英国学术界总是很难合作,愿意合作的学者非常少。甚至那些杰出的汉学家个人的书稿编撰,对我国的参考文献也无多少裨益:理雅各的著作收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而韦利的论文却在普特格。

将来也不可能只集中收藏前现代中国或者现代中国的图书，以此减少图书供应的数量（部分图书馆之间的分工也许可行），因为现在最佳学术研究的潮流，特别是在美国，都坚决反对这样的条块分割。不管是老式的汉学研究还是区域研究的方法都是以过去为对象。如果要做什么调整，那么就应该把侧重点转向对于前现代中国研究价值的重新确定，以及对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研究的相关手段的重申。与此同时，文革后的发展结果可以更多接触现代中国的资料，更不用说现场研究，已经使得别国绝对不会忽视的机会变得公开。对于非主流文献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已经出现，不仅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英语版本，也有法语、德语和俄语的版本。对于有关中国的日文文献的需求，今天比上一代人还更为迫切。没有足够的资金，我们就可能远远地被人抛在后边。为了学术研究自身的利益，为什么不抛弃对于最佳学术的所有主张，而专注"现实的中国"呢？那足以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达到其目的啊！不管怎么说，别的英语国家出版了足够多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使我们今天能了解到很多信息，无需依赖那些自诩为"上层人士"的服务。答案是：提倡实用汉学，实际上正是我们一直心照不宣地执行的方针。今天我们执行这一方针，也正是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一直不见成效的原因。所以，根据彼得·帕克爵士前任的意见，他被要求"就东方和非洲语言教学，以及为满足商务和外交需要而开展的相关区域研究之事进行调查。"但是，为了取得与其他国家确立的汉学研究标准一致，根据对翟理斯的现代汉学著作进行全面的心平气和的评估，可考虑到对于他的下列失误的意见：

"贸易"这个词，主要出现在英国与中国建立联系的历史中。这是出于对口笔语充分了解的需要。如果能签订商贸协定，能解读官方文件，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学习。

一个世纪以前，情况还是完全一样，就像泰勒（W. C. Taylor）从整体上展望东方文学的前景时所说的："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会在不显示即时经济好处的前提下如此困难地引入一个新的研究项目，或者扩大其原有项目的深入研究。"60年前，一位来访的法国东方学家就英国的学习和文学发表了许多评论，正如韦利1952年所概括的："他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还仍然正确"。最基本的事实是"在两座大学城之外，如果不是对商贸有直接的好处，学习根本就被人看不起。"

要求学术研究自我改善是个划算的举措，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就汉

语的情况而言,这里开始教授汉语的头一个世纪,人们都清楚情况怎么样。掌握了语言技能之后的那些人,由于年龄或者体弱不能再使用它了,就回国传授他们的知识。不能在教学中成人之美,充其量也就随意选择一些缺少活力的过时东西,试图教授一种常用的最难学的语言。

我们现在也处于一种危险的环境,也许更糟,使我想起了从教以来的这些年,看到大批才华横溢好奇求知的学生,翟理斯却认为罕见。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对学术生涯的前途感到失望,于是都转向了外交和贸易,或者前往海外求职。我们永远失去了整整一代学生,因为他们不具备我们时代所要求的资格返回大学生活。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可以补缺的岗位,我感到欣慰可以找到比我年长的学者。多年来他们在大学外找到了可以勉强糊口的工作,期待着可以利用很久以前得到的学识。这些先生和女士们非常难得,而且越来越少。在汉语知识可以马上换来回报的年代,年轻人却几乎没有一个愿意面对事业上的风险。

在我看来,仅仅提倡实用汉语,一句话,完全不切合实际,是浪费时间和钱财。可以肯定地说,尽管基础语言教学在大学环境中很困难,在别处几乎不可能,因此必须保留它的优先地位,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的都不仅仅是语言专家。那些在汉语和其他亚洲语言的研究方面作做出了比我们更好的成绩的人宣称:"应该把语言训练看作是人文学科及其本身价值的根本";"不把大亚洲文明的创造性成就纳入其中,学术生命终将枯竭"。我们敢嘲弄他们吗?眼下,在我们社会传播有关中国的广博知识简直少到荒唐的地步。比如,在历史教学中,有两份固定刊物一开始就向读者许诺它的覆盖面将是远东,甚至是中国专史。但是人们却发现在这10年中的头两年,它只用了0.2%和0.3%的篇幅分别刊登了看来好像是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历史经验。难怪彼得·帕克爵士引用了杜伦大学东方研究院主任的话说:"从文化政治学的角度,我不能不说英国看来低估了'古典'学科的'实用'价值了,"特别是跟法语比较起来更是如此。

不能简单地设想,现代中国较为远古和深层的历史背景可以干脆被忽略,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揭示这种古怪的观念如何形成,也许更让我们受益。如果我们国家真的对往事和有意义的过去缺乏兴趣,就像我们设想的中国那样,那么,从旅游业的每年收入,以及努力吸引中国尚未开始争夺的游客来看,我们就可能损失数百万镑。中国古代的物品在我们的拍卖大厅价格也因此不断上涨。难道与创造这些文物有关的知识不是实用知识?

失去吸引力的天才巴克斯爵士当年肯定意识到那是实用知识，而且曾经尽量把它使用到对他的赝品的鉴别中去。

当然，在巴克斯那个时代要点小聪明也可以发中国的财，就像他在那些明火执仗的日子里干脆抢掠中国的珍宝一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韦利对于斯坦因爵士态度的考查仍能说明对于亚洲的更为普遍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可能对我们现在的问题产生了某些影响。他写道：斯坦因完全按照过去考古学家的传统行事：在他们发掘的地方很早以前对伊斯兰的皈依使得当地居民跟他们远古的历史分开了。真的，在欧洲人非常熟悉的一些地方，那些居民就是我们过去的最近继承者。研究以弗所遗址对于了解现代土耳其有什么价值？但是现代中国与古代文明遗址的关系，实际上比现代希腊与巴台农神庙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在一个建筑几乎不用石块和金属，而文学遗稿具有比黄铜更具永恒价值的文明国度，为了对中国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我们首先要寻找的就是它的文字遗产。

我认为，所有藏书丰富、资金雄厚、人手充足、兼容前现代和现代汉学研究的图书馆，每一样东西，诸如供学习语言使用的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是有助于我们研究中国的实用工具。这些东西看起来似乎价格昂贵，但是可以同时起到值守专业学者的作用。在一个喷气机的世界学者们说走马上就能走，远方无能的学者也可以说来就来，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掌握汉学的实际好处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别的人就越来越不可能认为花时间教汉语和中国文化是值得去做的事情。反过来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学者们离我们而去就可能招致商业灾难的降临。我前些时候曾从汉学图书馆长的每日职责角度，把这次大会所提供的看作是珍贵的机会；从我国汉学研究的前途来看，即刻就我们的资源进行并行的检讨也是绝对必要的。

英国无疑是一个汉学大国，人才辈出，发表过很多鸿篇巨制，但是像巴雷特这样一篇对于英国汉学发展进行系统回顾和评析的文章却不多见。特别是以一位英国汉学家的敏锐视觉来审视缤纷的欧美汉学界，在揭示出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情节的同时，臧否人物，褒贬时务，可谓精悍却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引起同道关注乃情理中之事。

五、瀚海阑干百丈冰

1792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专使访华时在英国国内竟找不到一名

称职的汉语通事为使团服务，身为副使的斯当东不得不带着儿子去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从华人学员中物色人选。1999 年 9 月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和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的《汉学研究回顾》中也说："几乎没有一个英国公民能胜任汉语口头和书面翻译工作"（Few UK nationals can interpretand translate Chinese）。

"同欧洲大陆相比，英国人在汉学领域的研究处于落后状态。……1834 年，他（马礼逊——笔者注）去世后，有一个委员会购买了他的藏书，1838 年，这批藏书献给了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条件是该院必须设立一个至少保留五年的中国文学和语言学教授职称。塞缪尔·基德（SamuelKidd）一直担任这个职务至他 1842 年退休为止。到 1873 年这个职位还空缺。在这之后不久，生源短缺使得这个位置有一段时间无人充任。1846 年，伦敦的国王大学（King University）开设了汉语讲座，由苏谋事和罗伯特·K·道格拉斯（Robert K. Douglas）担任这个讲座的教授职务，很少有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把汉语引进到英国大学的教学中所遇到的困难证明，一般的说，英国人对中国语言缺乏热情。尽管如此，还是有个别英国学者对中国文献怀有浓厚的兴趣。"①

18 至 19 世纪，在高教会派和不可知论派得势的牛津，明确规定只有英国国教教徒才能成为该校学生和教师。1854 年学校当局对规定进行了修改，然而对于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的研究生、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和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要求仍然很严格。1871 年条文再次修改之后异教徒汉学家理雅各才得以走上牛津大学的汉学讲台。但是去听他讲课的仅仅是打算当传教士或准备报考领事部的学生，人数通常只有四五名。

早期的英国汉学教授多为退职外交官或者回国传教士，从学术上讲他们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从教学上看缺乏正规的校园环境，从财政支持上看长期带着慈善汉学性质。在很长一段时期英国的汉学研究是较受人冷落的一门学科，汉学研究人员多半还从事其他学科领域研究，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仍有一些汉学研究人员原是从事东洋学或南洋学研究的，他们所掌握的第一外语是日语，第二外语才是汉语。他们的工资待遇

---

① M. G. 马森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第 24 页。根据其他资料，引文中所说的"国王大学"（King University）应为"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苏谋事"（James Summers，东洋学家）应为"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1849～1927）。

普遍较低。好在那些汉学家也像当年退居林下的唐朝诗人白居易一般豁达大度,“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著书不为稻粱谋,知足常乐,才开创了后来英国汉学的发达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结束之后,由于军方和外交部门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迫切需要,为适应整个欧洲对汉学人才的需求,英国知识界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加强亚非语言的教学工作,充实图书,引进美国的区域研究方法,把汉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教学上提高口语训练在课程安排中的比例,选题上以厚今薄古代替重古非今的方向等建议,对于英国的汉学和东方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英国汉学精英就是在大战时期战云密布的伦敦天幕下开始被培训出来的。1961 年威廉·海特爵士领导的英国大学奖学金委员会(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的一个分会提出了对英国汉学课程进行重大改革使之接近美国区域研究模式的设想。80~90 年代英国的汉学研究上马许多重要项目,整体水平得到了提高,

但是专家认为不尽理想之处也还存在。比如能不能像美国那样通过基金会或财团资助办法把分散独立的汉学研究项目提升到国家工程级的水平?能不能采用双向研究方法:把汉学研究与对现实的反思结合起来?古籍教学传统是否应该坚持?实用汉语教学是否权宜之计?受传统考证方法影响而形成的微观汉学在英国仍受一些汉学家的青睐,在格拉斯哥大学开设汉语专业的计划始终未能付诸实施违背了汉学界人士的心愿。海特委员会的改革措施一出台就受到了批评,认为如果英国大学都照此办理,现代汉学将长期伦为业余和新闻界人士而不是严肃学者的研究领域。1986 年彼得·帕克爵士的《为未来呐喊》的报告发表后英国汉学研究工作停滞的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拨款、图书资料和研究生数目都有所增加。

道格思在《中国语言和文学》中曾对英国汉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过这样的批评:“国人除了跟中国人做生意外,对与他们有关的其他事情却漠不关心。汉语为四亿人所使用,汉字可以上溯至相当于大卫王时期,在诺曼底征服者入侵前就十分完善。我们跟他们的货物交换已达 4000 多万英镑,可他们的语言和知识却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在中国的利益大于其他欧洲国家,但在语言知识传播方面我们却落后于法国和俄国。除了不列颠博物馆的白之博士和有多部中国佛学译著的翻译家毕尔先生外,我们对汉语的研究仅限于那些出于职责不得不去接触汉语的人。正如一位法国领事对我说的,当英国人进口中国货物时,法国人却把自己的思想带

到了那儿,他们可以随口说出许多汉学家的名字,其中包括儒莲、克拉普洛特、雷米萨、波特尼耶等杰出的汉学家。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出于真正的学者天性,致力于汉语研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目前巴黎有三个教席,每次讲课都有大批学子前往聆听。而在伦敦却只有两个教席,其中一个已空缺多时,当席位补缺后,履职人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使主张设立教席者大失所望。在牛津和剑桥还没有汉语的一席之地……无疑,学习汉语的困难或者所想象的困难妨碍了许多英国人拿起汉语语法书和字典来。但如蒙诸位允许我敢说那些困难被过分夸大了。1823 年儒莲在巴黎开始学习汉语,1825 年他出版了一本孟子哲学的最佳拉丁文译本,那并不是一部容易翻译的中国典籍啊!"①

1987 巴雷特在《不思进取,不可思议》一文中写道:"从基德应聘到慕阿德退休的一个世纪之间,英国的汉学研究除了一两例特殊情况外完全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尽管出现了一些杰出的天才,可是说那是一个伟大光辉的时代只是跟早先几个世纪比较而言,那时因为商业的需要,认为理想的汉学研究就是要产生持久的感情效果,那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观点。本世纪下半叶如果没有外援(甚至外部基金)英国就完全无力在汉学研究中达到应有水平。西蒙和哈隆功不可没,是他们在斯卡伯勒扩展计划实施之后帮助我们提高了专业化程度。后海特时期现代汉学的兴起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是有目共睹的。自从哈隆来到英国以后三个历史最长的汉学研究中心的三个教席就从来没有由英籍学者担任过;而新近在利兹设立的教席根本就没有英国学者去担任,目前仍旧空缺。当然,学术业务中的国际援助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已经并将继续在我们的中文系任职的中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于我们的大学生活作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而许多中文系毕业的英国人自己却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甚至其他使用非英国教学手段的世界各地任教。"

谈到英国汉学研究图书设备的现状问题时巴雷特教授语重心长地说道:"英国的汉学研究一直不能很好地利用历史赋予我们的机会,事出有因,结局不同,我们必须加以正视。就我们的图书馆而言,前面回顾的最直接事实与结局有关。我们预料至少短期内英国的汉学研究岗位无法让本

---

①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75.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Lecture one, Trubner & Co, London.

专业的英国应聘者补缺。然而，如果英国图书馆让人觉得水平没有达到其他地方已达到的水平，到国外，特别是美国或加倍到欧洲大陆去招贤纳士的努力就将注定要失败。由于我国研究经费短缺，不能经常到国外去查阅人家的图书资料。如果我们的藏书让人觉得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那么我们就将被外部世界除名。岂止外部世界，连保住目前在这里工作的那些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也将不可能。"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英国政府各部门、学术界和工商界，在加强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六、昔日的荣光与来日的辉煌

本节要着重介绍的是两份英国的调查报告：一是 2003 年 6 月英国汉学学会的《关于英国学校的汉语教学》；二是 1999 年 9 月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和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的《汉学研究回顾》。这是英国现代汉学史上的两份重要文件，有助于了解英国现代汉学的发展进程、研究方向和汉学界的疑虑。

甲、《关于英国学校的汉语教学》②

《关于英国学校的汉语教学》是 2003 年由英国汉学学会组织，庚款委员会资助，埃奇希尔高等教育学院高级讲师詹尼·克莱格执笔的一份调研报告，旨在对 2002 年英国学校的汉语教学现状和用非汉语方式介绍中国国情等课程进行全面考察，以期改进工作，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参与推动英国学校汉语课程设置的单位有：牛津阿什莫兰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Oxford）、伦敦英国中国艺术家协会（British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London）、不列颠博物馆、切尔腾纳姆艺术馆和博物馆（Cheltenham Art Gallery and Museum, Cheltenham）、曼彻斯特中国艺术中心（Chinese Arts Centre, Manchester）、阿伯丁蒙哥马利发展教育中心

① T. H. Barrett, 1989. *Singular Listlessness*, Longon: Wellsweep.

② 据 *Chinese Studies in UK Schools——A report from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Lancashire: Edge Hill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译述。

(Montgomery Development Education Centre, Aberdeen)、爱丁堡苏格兰—中国协会、英中了解协会、肯特世界教育发展集团(World Education Development Group, Kent)。参加调研的有多金阿什科慕学校(Ashcombe School, Dorking)等18所英国各地学校,撰稿有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经济学督察大卫·巴特勒(David Butler, OFSTED Inspector for Economics)等24位人士。

调查的背景和目的

1999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的《汉学研究回顾》(The 1999 HEFCE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中写道:"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增长经济的关系,规模上超越了目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往来,对于联合王国来说是一个新挑战和机遇。……在大多数学校中仍然没有开设汉语课可能妨碍对于中国事情不断增长的兴趣。……在学校课程中扩大介绍中国的内容可以增加对中国和中国周边地区的兴趣和知识。"诚然,随着英国对于中国通和汉语专家人数需要的增加,那些人员就显得非常紧缺。英国汉学学会认为,英国的教育应该从总体上培养更多掌握汉语以及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人才。

中国之所以举足轻重,至少不只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占世界总数五分之一的人口。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一座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动力站。中国于2001年12月了加入世贸组织,这对于世界贸易和投资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全世界10%的经济活动在中国展开,随着今后数十年可能出现的倍速增长中国经济还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汉语已经成为世界上一种主要语言,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商业语言。中国是英国在欧洲以外的第一市场。联合王国的一些公司因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他们失去了生意,在中国经常可能发生文化误解。新近调查表明这显然是因为我们缺乏懂得汉语技巧的专业人才所引发的问题。(《商业语言服务台》)

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更多地了解中国,是一个全世界都意识到的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最近使用各种不同文化的英文资源的机会增加,以及在公民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全球性问题的涉及,扩大了把世界的方方面面纳入学校课程的范围。如果按照英国国家课程的规定,教育"必须使我们能对所生活和工作的快速变化世界作出反应",就应该广泛地在各个学校教授汉语。英国教育对于汉语的需求也要求学校增设汉语课。根据2001

年的统计数字,英国的华人已达247403人,占英国人口总数的0.4%,比1991年的156938人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英国的许多华人非常愿意保留自己的语言。近年来各大学注意到英国出生或者在英国受教育的华人学习汉语普通话的悟性。这些学生多半出生于说广东话或者客家话的家庭。

对于英国学校汉语和中国国情教学情况的考察,是为了把握全局,找出课程设置中的差距和不足,改进教学、游说议员、帮助教育专家的学术研究、向关心汉语教学的大专学校和华人社区以及制定教育政策的有关当局提供必要信息。

此次调研恰好与部分新建学校的中国国情教学计划的启动同步进行。200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英国教育就业部(Department for Educatrion and Employment, 简称为"DFEE")签署了一项教育联合框架协议之后,英国文化委员会开始实施中英两国学校在英国的汉语教学三年发展战略伙伴关系计划,得到了英国教育就业部的拨款。此计划包含各校校长访华、教师互换、北京夏季汉语培训班、校际交流和网络课程开发项目等内容。

本报告中的信息是2002年6月至10月间收集的。调查组向全英各中学分别寄送一份调查问卷,收回的答卷共175份,约占总数的3.5%。同时还广泛咨询了一些专科语言学院(Special Language College)、关心汉语教学的教育专家、资格和课程权威(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考试委员会科目官员(Exam Board Subject Officers)和教材出版商等。接受问卷调查的还有一些参与推动汉语教学的博物馆、艺术馆和志愿工作者小组。

汉语课程的设置

根据英国教育技能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 简称为"DFES")新近公布的数字,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开设汉语证书课程的专科语言学院50所,约占全部专科语言学院的30%。其中30所开设的是普通证书中等教育课程(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简称为"GCSE"),3所开设的是甲级证书/准理学士课程(A/AS Level),其余开设的是圣·马丁证书(St. Martins Certificate)或者自设学位课程。但是这些学校的课程并不完全名副其实,例如,3所开设甲级证书/准理学学士课程的学校,实际上有两所根本不教汉语。其中一所是成人夜校,但是并未达

到甲级证书水准;另一所操华语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学习普通证书课程和甲级证书补充课程。

据统计,2002 年夏天英国学习普通证书汉语的入学人数为 2701 人,学习准理学学士课程的入学人数为 1783 人。这些学生几乎全部来自中国人家庭,而且大部分上的是国际学校。20 世纪 80 ~ 90 年代英国操华语的东亚学生大量增加。1999 年以来,在英国私立寄宿学校学习的香港学生增加了 25%,中国大陆学生增加了 14.6%,在英国公学(public school)学习的大陆学生人数为 1300 人。

虽然近几年英国学习汉语的人数增加了,但是总体上看是低调的,缺乏组织凝聚性,课程主要为华人及其子弟设置,或者说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补充。

教育技能部计划在五年内把官方认可的专科语言学院的数目增至 200 所,并按照多战略语言的思路把汉语教学扩展至小学。但是在这一阶段只有少数学校看起来是认真开展汉语教学的。中学普通证书课程和教材的改进可以发挥作用。不过几十所非母语学校的学生在中短期内获得中学新普通证书资格的可能性不大。

在英国汉学学会调查的 77% 学校中教员都是兼职的。85% 的教员(包括专职和兼职)都是以汉语为母语,但是在专职教员中 50% 教员的母语都不是汉语。

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英国学校没有开设汉语课的原因为:

缺乏师资	占总数的 67%
没有华人学生	占总数的 46%
经费问题	占总数的 38%
没有纳入课程	占总数的 31%
没有教材	占总数的 30%
其他课程更为重要	占总数的 28%
学生缺乏兴趣	占总数的 24%
其他(多数回答没有时间)	占总数的 22%
课程/语言难度大	占总数的 16%

英国中学的日语教员多半是非母语出身,但是汉语教员却主要为外语助理(Foreign Language Assistant)和兼职母语教员。由于教员人手短缺和班级学生人数过多,便采用新式经济传输手段,例如通过教学光盘与拥有

多所教学点的专科语言学院链接。英国文化委员会正寻求通过视频会议模式把中国协作学校的授课音像传送到英国相关学校的解决方案。

英国文化委员会与中国的合作计划对于英国现有的汉语教学正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软进入（soft entry）方式，为长远的战略扩展与开发，家长和商贸的参与，建立起教学网络。其目标是到2007年外语助理人数以每年100的速度递增，来北京参加培训班的学生人数以每年150的速度递增，把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数目扩大到300所。

不用汉语讲授中国国情课

英国汉学学会此次调查只回收了18份答卷对“不用汉语讲授中国国情课”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于是他们又借助《历史协会通讯》月刊（monthly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散发了另外一份简短问卷，结果收到了8位历史教员的答卷。对这个问题兴趣之缺乏通过对教育标准办公室（The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England），简称为“OFSTED”）不同督导的面谈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他们用“边沿课型”（marginal subject）、“少见”和“代表性不足”等词语来形容中国国情课。

问卷的分析结果显示，大部分英国学校没有开设用其他语言讲授中国国情课的原因为：

缺乏师资	占总数的70%
没有华人学生	占总数的48%
没有纳入课程	占总数的42%
经费问题	占总数的39%
没有教材	占总数的32%
其他课程更为重要	占总数的31%
学生缺乏兴趣	占总数的28%
其他（多数回答没有时间）	占总数的19%
课程难度大	占总数的13%

在英国学校开展的中国节日和多元文化教育活动普遍受到欢迎。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展开，组织者和支持者是英国各社会团体，例如英中了解协会（每年10次）、英国中国艺术家协会（每年14次）、外交部资助的大不列颠—中国中心（Great Britain-China Centre，每年大约12次）。他们通过各自图书馆为活动提供相关资料，不过因为经费问题的原因现在多半

都难以维持。从性质上讲这类活动对于学校来说属于因时因地而设,但是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要求继续开展的呼声却持续不断。一些博物馆和发展教育中心(Development Education Centre)仍提供"宝盒"之类的资料。

曼彻斯特中国艺术中心长期聘任专职对外开展活动的干事和数名中国艺术家,每年在120~130个学校设立工作室,组织参观中国城和不定期的辅导活动。他们的宗旨是培养学生对于现代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意识,消除对于传统和风俗的固定看法,增强多元文化的学习。2002年该中心从艺术委员会获得220万英镑彩票大奖,使他们获得设置严肃艺术课程和开展艺术教育的实力。目前他们正考虑聘任持证教师对中国艺术家进行培训的可能性。

不列颠博物馆除了在学期中为准理学水平的学生开设艺术史和考古学课程外,还为学校提供艺术、历史、科技等跨学科课程。2002年因为生员不足,该馆的中国书法课未能续办。

未来的方向和结论

英国华人占全英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第三位,主要来自港、澳、台湾、大陆和东南亚。华人具有热心办学、鼓励自己子女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这客观上为英国的汉学研究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华人中出现了许多著名学者和科学家。他们是汉学研究的重要智力资源和参与者,在促进中英文化交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调查报告最后说:

中国正以一个强国姿态出现在全球化进程中,这必然对英国学校的汉语课程开设起推动作用。英国教育技能部号召,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应该改变对于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态度。推动汉语学习有助于改变学校文化,恢复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教育的活力,以期为英国各地学校开设外向型课程。

关注中国就是发展的开端。本调查接触的一些开展汉语学习的部门,例如经济贸易协会(Economics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曾经表示除了推动汉语学习之外还要做更多工作。对于其他部门来说,过去未曾考虑过这个问题,此次接触使他们大梦初醒。

令人觉得欣慰的是,在155份答卷中,有68份表示有关汉语学习的任

何建议对他们都是有益的，包括26所尚未开设汉语课的学校。

迫切希望得到对于学校进一步开展汉语学习的支持。推动汉语教学十分有利于全球化所要求的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变革。

乙、《汉学研究回顾》[①]

回顾的背景

1999年9月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和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联合推出了题为《汉学研究回顾》的书面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之前的10年中经历的政治、文化和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的变化，使人们看到了中国凭借国土面积和军事实力，以及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多年来在世界政治舞台中发挥了主要大国的作用。中国国内的政治变革使得对外交往更为便捷，正成为西方的巨大潜在市场和贸易伙伴。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The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非常关注本国对于中国在外交、文化和贸易关系方面的挑战的反应能力，对于高教系统能否在加强和扩大与中国关系所需的语言技能和专门知识方面给予支持提出特别质询。该部明确表示要把中国作为特例看待，太平洋沿岸国家对于英国专门知识和技术的需要，在范围、复杂性和优先程度方面与中国的需要都处于不同的层面上。

学术界内部也敲响了警钟。1996年亚洲研究(The Asian Studies)评估执委会主席在向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对于英国在支持亚洲研究广泛领域的学术活动方面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从长远的角度看将面临严重的损失一事表示了关切。1997年以科研为强项的部分大学教师访华回国后建议重新调整英国大学现行的汉学研究方针，把重点从传统领域、语言和文学方面转向纯语言习得以及社会学科中的当代中国研究。

1997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邀请了外交和联邦事务部、英国文化委员会、贸易工业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经社研究委员会

---

① 据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HEFCE Report 99/09 译述。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等部门的代表开会,正式成立了以布雷厄姆·贝哈拉尼雅(Bahram Bekhradnia)为主席的汉学研究回顾小组。1998年10月布莱尔首相来华访问对回顾小组是一次激励。他回国后表示:英国应该通过广泛研讨各类问题,在促进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回顾的方面和范围

回顾英国高等教育中汉学研究的现行设置所考虑的方面:不断变化的外交需要(包括英国所有在华利益、影响和承诺);由英国在华的贸易和市场发展而激发的工商需求;具备并保持这些课题在高等教育中的英国学术影响。找出可能阻碍这些方面所要求的设课和专门知识的差距和不足,提出包括今后更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设课的建议。

回顾小组认为,回顾不仅应该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和区域研究,也应该包括跟中国有关的社会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虽然对于东南亚华人社区的研究不是回顾小组的职责范围,但是任何有利于对那些社区的了解的观点在回顾中都是恰当的。

1998年6月,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和北爱尔兰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orthern Ireland),以首席执行官布赖恩·芬德(Brian Fender)的名义致函中英贸易委员会(China Britain Business Council)等50个关心中国的英国工商组织以及剑桥大学等所有英国大学,请他们通过信件和答卷形式,为总结英国高校中的汉学研究情况提供资料和数据。信中说:所说的"汉学研究"应包括与中国有关的汉语研究、地区研究和任何学科中的中国社科研究。根据目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和香港回归后的国际形势,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非常重视发展并增进中英两国之间的政治、商务和其他方面的联系。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和北爱尔兰教育部希望各大学充分发挥作用,从汉语研究、与中国有关的专门知识和学科方面提供资料,以满足专家作出决策的需要。

中英贸易委员会向所属会员单位发出的问卷,与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和北爱尔兰教育部向所属大学发出的问卷内容基本一致。中英贸易委员会发出的问卷译文如下:

回顾小组希望就与中国有关的学术研究和设置,特别是在下列问题方

面，听取所有关心中国事务和汉学研究的跨部门团体的意见：

1. 中国最近的发展对贵组织的专业活动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2. 您认为有关英国与中国的哪些方面和哪些学术研究，应列为不久的将来或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优先考虑的事情？（注：回顾小组有关“大中国”的地理概念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新加坡，汉语和这一地区的主要方言。）

3. 在与中国有关专家支持和建议方面贵组织有哪些特别要求？

4.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培训和熟悉文化的重要性是否有所改变？如果有改变，体现在哪些方面？

5. 为满足这些方面的要求应该如何充分使用资源？您是否注意到在目前安排中有哪些具体的差距和缺点？

过去的汉学研究

回顾小组重温了1945年以来与英国汉学研究有关的四份重要报告：1945年由斯卡伯勒伯爵主持的一份关于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的部门间专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1961年由威廉·海特爵士主持的庚款委员会下属分会有关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的报告；1986年彼得·帕克爵士提交的一份题为《为未来呐喊》的报告；1992年理查德·霍德－威廉斯教授代表区域研究监测小组递交的一份题为《联合王国的区域研究》的报告。

《斯卡伯勒报告》主要关注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中的语言和文学项目，旨在建立与主要人文学科的传统和品质同等的学科。《海特报告》根据斯卡伯勒的看法，建议大学语言系最好与地域兴趣相同的学科紧密结合起来，以便集中建立若干多学科地域研究中心，使之成为英国各大学汉学研究的核心基地。大学奖学金委员会为新岗位、出差补贴和研究生奖励设立了为期十年的基金。

《帕克报告》确认亚非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外交和商业对于专门知识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出现增长的势头。该报告还建议为满足上述需求应加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以及增加更多作为商业研究和应用学科的学位课程组成部分的亚非语言、文化和经济选修课目。不久之后，剑桥大学、杜伦大学、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先后在汉语教学

中开设了新课，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随后也开设了现代汉语和中国政治课。

1992 年理查德·霍德－威廉斯的报告正式确立了英国大学区域研究的地位。他认为他的报告算不上什么批评，而是表达一种关注。现实主义的判断是在今后 30 年内聚集成团的区域研究学者，除非在大学系统中新设教席，否则人数将会减少。但是他的报告没有很具体涉及汉学研究的问题。

《汉学研究回顾》将是英国 1945 年以来有关汉学研究的第五份报告，再次表明长期以来汉学研究都是与英国商业和外交利益关系密切的重要课题。

挑战和机遇

在这样的环境中英国文化委员会注意到形势发展的几个重要趋势。首先，现在汉语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在下一世纪跟英语一样成为主要的国际语言。在大中国和境外的华人社区中普通话的推广，在汉语书面语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消除了汉语成为一种国际语言的主要障碍，减少了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和汉语文本制作的手工和机械方面的费用。

其次，英国文化委员会相信在加强中、英两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可以也应该做更多一些事情。发展长远的互利关系不仅有赖于英国具体展示自己可以帮助对方的强项，而且还需要英国人坚持不懈地通过对于中国语言、历史、政府及其科技和专业实力的了解来保持与中国更全面的接触。如果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就需要不断扩大对于可称之为“文化解读者”(cultural interpreters)的培养。他们学会从中英两国关系立场出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也意味着最好地掌握了这些技巧的国家可以在跟中国建立贸易和文化关系方面走在别人前面。

这就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在跟中国建立关系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想到英国学习，特别是到英国大学学习。目前英国已经接待了大约 5000 名中国留学生，其中许多人可能学习工程或其他学科，他们的到来提供了建立持久和可出成果的机会。英国不可能派遣同样人数的留学生去中国，因为对于希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学生来说那样的方向是往往受到限制的。然而，目前很难找到那么多执着的英国学生带着十多份奖学金前往中国。这可以被理解为对于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缺乏

兴趣的表现,这种看法在以后扩大要求时也许不能很快被消除。

英国高等教育的前景

英国目前有各类规模和知名度的研究中心从事汉学研究。有些比较小,可能只有一个人,表现出对于某一机遇的个人的研究兴趣或者一个研究所作出的反馈。其他中心比较大,得到了全国的承认,设置范围宽广。有8所大学建立了设置良好的系或者研究所,在汉学或者东亚研究中承担着包括汉语在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些大学是:剑桥大学、杜伦大学、爱丁堡大学、利兹大学、牛津大学、设菲尔德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以及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

在英国高校57000位活跃的研究人员中,有400位曾经引用过与中国有关的著作,涉及医药和工程等学术领域,但是主要集中于亚洲研究、地理、经济、政治与国际研究、贸易和管理、会计以及历史。所引用的著作有汉语和中国文化研究、本地区的工程报告。从事亚洲研究的人员多数引用过三四本与中国有关的书籍。较多的人只在一处引用过与中国有关的著作,认为中国是他们研究的现象或者技术问题中的典型例子。

上述八所英国大学都有中文系或者亚洲研究系,科研非常活跃。还有一些具有同等研究水平的大学,例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伯明翰大学,也都对与中国有关的学科具有浓厚兴趣并作出了成绩。

很难统计出英国八所大学中掌握汉语技能的教师人数。欧洲汉学家学会的一份调查中显示在六所大学中有46位正式编制的教师懂汉语,其中三人还能讲广东话,另外两所大学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八所大学中的两所聘任了为数不少的兼职汉语教师。曼彻斯特区域研究数据库的资料显示有40位英国大学教师自称普通话说得比较流利。这与该数据库中记录的英国大学日语教师的人数大体相等,多于说其他欧洲语言的教师人数,但是又远远不及说俄语的教师人数。

英国汉学界的研究人员一般年龄较大,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切,但是尚未得到统计资料的证实。高层的汉学研究人员严重不足却是事实。英国许多与中国有关的学术领域很难找到国际知名学者来承担研究工作。许多人已经退休,得不到补充;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已经到国外工作,缺乏同等素养的流动学者补缺。

各大学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对中国礼仪、贸易惯例和思维方式的了解

充实与中国贸易有关的专门知识。此事最好的方式是进一步加强对于中国特区、直辖市(特别是北京)和商业最发达的沿海城市和香港的研究。

几乎没有一个英国公民能胜任汉语口头和书面翻译工作。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作出基金安排,以体现汉语与其他语言课程相比所具有的强化教学性质。确保学生的大部分汉语课程在中国留学期间得以继续也很重要。不能想当然事情就会如此,因为许多选修这些课程的学生得不到继续学习和旅行资助,得自己承担四年的学费。许多大学还认为更要注意把所学课程跟贸易、外交、商务和工业等具体需要挂钩。

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许多著名的英国汉学研究学者,包括那些靠后海特基金开始自己研究生涯的学者,将很快到退休年龄并需要别人接替自己。英国的设施要达到国外中文专家可以分享的水平尚需时日。鼓励人员调动、交流和学者访问可以确保英国有能力吸引优秀人才。

英国各大学还认为,学校课程中的中国课题的更宽泛的基础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兴趣,获得这些方面的知识。部分人士认为,将来英国高等教育中的汉语研究的任何扩展都可能因为开设汉语课的中学太少而受阻。

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学

英国的汉语课程设置主要为三类学生服务:攻读汉语学位的本科生,希望通过汉语学习与中国有关知识的其他专业研究生,为经商、外交和文娱目的而学习汉语的学生。随着中国国际形象的日益高大,这三类学生的人数将不断增加。

语言中心的设备和投资的多少取决于教学的目的和培训的性质。贸易和商务速成班和强化班对学生的要求与三年古汉语的传统课程对学生的要求有所不同。有些英国院校根据商业或者外交市场的需要设课。目前远程汉语教学,虽然得益于信息技术,但是因为书写软件的限制,其难度超过了欧洲语言。当前英国大学的汉语教学发展健康,能满足学生要求。建立语言中心的费用不算昂贵,只要师资具备,应该与学生要求同步提高。有些院校对于读学位课程的本科生入学人数增加的前景表示关切。这些学生要在中国度过一年时间,付费方式的变化使许多读学位的本科生不得不交纳四年的学费和国外的旅费和生活费。因为大多数英国学校不开设汉语课,给人的印象是汉语是一种难学的少数民族语言。

语言和学科专家的结合是保证汉学研究课题区域健康发展的关键。这种结合近年来主要出现在区域研究系。初级学位区域研究课程使学生可以在现代中国研究和古典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学习汉语。这些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汉语和中国文化知识,可以从事一般性工作。

结论和建议

回顾小组同意许多团体提出的观点:提高英国与中国各个领域的能产性接触能力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对于与中国有关的许多问题,主要是贸易和维护政治以及其他利益的问题的专家建议和要求,可能会快速增加。大家看到了高等教育部门在对此作出反应的领导和支持行动中的独特作用。人们觉得没有把握的是,高等教育系统能否就不断增加的要求像国家利益所希望的那样作出全面和快速的反应。有关高校可用资源和加盟这一领域的年青研究人员的短缺的其他呼吁实在太多。如果反应能力不到位,从长远角度看,对于高等教育和国家的消极作用将变得严重。因此回顾小组认为,采取措施加强和巩固作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基础的现有设置十分必要。

英国高等教育部门还应该在建设专门知识库、造就合格人才、为广大人员提供语言培训等方面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在一系列正面问题上为加强和改善高校的汉学研究采取行动。

为满足这些要求在高教部门必须怎样进行设置?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回顾小组已经在现有的设置中确定了一种适合在英国进行汉学教学和研究的水平定位和方式组合——比如,超越英国现行的与前东欧集团有关的设置。有些组织已经跟中国建立了工作关系可能收益甚少,只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利用的东西。除了八所已经设立汉学研究系的大学外,回顾小组还了解到教授汉语和相关课程或者从事相关研究的另外一些高校。有些在分立的单位或者中心确定了这样的设置,但是没有达到早已建系的大学的规模。比如目前那些大学没有一所能授予汉语单科学位。据了解,还有几所高校正考虑在第一时间设置某种汉学研究专业。

回顾小组认为这种设置模式可能为该课题领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然而,目前这个领域的群体活动在稳健广度、深度和等级方面,都还没有达到可以让人满怀信心地说需要将得到满足的程度。

回顾小组建议采取的步骤是建立基金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反映了为扩

大独特领域的研究从以往的作法中所吸取的经验教训。试图按照预测的要求准确对扩大进行规划是没有价值的。不要认为扩大设置必然导致学生要求或者客户对专家咨询的增加,虽然这事有可能发生。建议无论以后的要求的扩展水平如何,首先必须稳定现有设置。

高等教育中的汉学研究设置必须置于多元学科的环境中。回顾小组赞同海特提出的"三角法原则"(Principle of Triangulation),最近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在对于前苏联和东欧研究的报告中再次提到了这一原则。这就是说,对中国(或者任何国家)的研究中有三个方面的内容:汉语,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学科(如经济学或者发展研究)。这些是解决手边问题的办法。这三方面的内容应互为表里,相互依存。

为此,回顾小组建议:英国汉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应注重并建立现有学科之间相互协调的机制;高等教育基金机构为支持汉学研究增加可用资源,侧重维护并强化可行的专门知识中心和高校之间的合作中心;研究生基金机构应该设立若干奖项,对他们的长期学习和研究,包括前往中国留学、科研活动、汉学研究图书馆、数据库等给予资助和奖励。

附录一
专业与非专业的汉学刊物

汉学人才、汉学刊物和汉学机构是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的历史、规模、发展阶段、国际合作和成果应用水平的标志。如同早期英国汉学家多半出身于世俗化的来华传教士一样，与汉学关系密切的英国早期刊物和机构也都源于世俗化的教会出版物和机构。这是新教传教士与早期的来华耶稣会士的不同之处，也是他们在汉学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历史上英国传教士和学者在英国国内外创办或者合作出版与汉学研究关系密切的报刊很多，尽管时间长短不一，规模大小不等，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于国际汉学产生过积极影响。

早期英国新教传教士在马六甲、香港、澳门和内地创办的中英文刊物，除了大量刊登传教文章外，也在译介汉籍和中华文化的同时向中国读者展示了西方人文学科和近代科学技术的文献和成就，使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保持着双向有序的状态。英国的自然神论者受到中华文化的启迪，对于“三位一体”和“原罪”观点大胆提出了质疑，掀起了对抗教廷专制的浪潮。“中国热”的推崇者更是借鉴中国文化促进了本国艺术、建筑、园林、家具、绘画和舞台艺术等方面的推陈出新。英国学者对于本国重商主义的批判虽然不如一些欧洲大陆学者激烈，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园林建筑艺术中人与自然和谐的如画美学和空间美学的认同却产生过划时代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晚清的维新派和改良主义者也深受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努力改变观念，变法图强；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以西方新知识为武器，为彻底推翻封建帝制做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西方科学技术的输入，包括天文学、造船学、舆地学、工程学、机械学、物理学、生物学、兵器学、医学、数学和化学等，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国人改变保守、封闭和排外的观念，加速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变革节奏。

英国新教传教士像其他欧洲国家的神职人员一样，非常重视利用当时的科学技术译书、兴学和办报，毕竟媒体的作用是他们在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中的讲经布道所无法比拟的。他们通过相关教会组织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版和学术机构，团结中国广大教众和学人，扩大教会自身的影响，打造了19世纪之后英国在西方列强中的高大形象。报刊在传播福音和神学思想的同时，不管愿意与否，都使传教士本人在不同程度上迈出了世俗化的步子。于是涉足外交、军事、商务、文化、教育和国计民生的人和事就越来越多。此后那些新老神职人员，有的变成了日进斗金的商人，有的变成了巧舌如簧的通事，有的变成了诲人不倦的先生，有的成为刀笔吏报人，有的成为满腹经纶的汉学家。但是他们中的更多人则被赋予了具有丰富社会阅历、多重保护身份、多种谋生手段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特殊阶层的社会成员资格。

据统计，1860年欧美传教士和报商在华出版的中外文报刊数量有30多种，相当于鸦片战争前总数的两倍，到1890年便猛增到76种，10年之后这个数字又被更快速度所刷新。虽然只有其中一部分与国际汉学有直接关系，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些报刊对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马森曾经对1840年至1876年间的英国和美国的期刊进行过调查，统计到1000多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刊登在大约三四十家英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少数论文谈到了中国文学问题。其中2至3篇用表格方式列出了汉语的名言警句，有12篇论文描述了中国的各种宗教组织。这一时期在美国和英国的重要刊物上刊登了25篇以《中国和中国人》为题的文章，对中国人的性格、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进行介绍和评述。“从这36年中的每一年出版的文章数目和内容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840年这一年中，西方人对中国本身并不感兴趣。这一年的文章主要谈及的是鸦片和战争问题。1841年发表的文章其数目大致与前一年持平，但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的社会习俗、农耕、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各个部分情况。40年代后期，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似乎是削弱了，但是，1853年，太平天国叛乱又把西方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方来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西方人发表了许多关于这次反叛、英国对华政策、中国向外移民等方面的文章。在英国处于与中国的战争状态、美国人为移民问题而斗争时，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对

中国的风俗习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约在1865年,杂志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数目开始减少了,这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正在减弱。……这种减弱的趋势持续了一两年,60年代后期和整个70年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又迅速增长起来,并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商业方面的事务又开始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①

本章介绍的英国出版物和机构分属不同时期和不同类型。与英国汉学关系密切的早期刊物和机构多半都与传教有关,而近现代的报刊和机构则在专业化和学术性方面与早期的同类报刊和机构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1815年8月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带有鲜明的教会产品的烙印的话,那么到了1868年9月英美传教士在上海合办的《万国公报》则充分体现出现代报业的特征和作用了。无论从经费投入、选题范围、调查方式、分析深度、举证数量,到论文本身的学术含金量和应用价值来看,英国不同时期刊物发表的汉学著述之间显然存在着天壤之别。当代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辑出版的《中国季刊》则属于一种典型的汉学刊物。同样的差别也存在于从墨海书馆、广学会到英国汉学学会进程的各个阶段的出版物之中。

一、17~18世纪的三种英国学术刊物

《学术著作》(The Works of the Learned)

17世纪中叶英国有几种杂志刊经常刊登有关中国历史、社会、科技和宗教方面的文章,《学术著作》就是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该刊创办时间和创办人的具体情况不详,但是这份杂志曾经登载过许多与持续40多年的"礼仪之争"有关的文章和报道,对中国文化在英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1665~1886)

据载,世界上正式出版的第一份杂志是1665年1月法国人德尼斯·德萨洛(Denys de Sallo)创办的《学者杂志》(Le Journal des Savants)。《哲

① M. G. 马森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第65~67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学汇刊》(全名《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创刊于1665年6月,1886年终刊,每年一卷,共印行177卷,也是一份领先于世界的刊物。该刊的封面上写着:"反映当前世界各地有独创性的人员的事业、研究和艰辛劳动"(Giving Some Accompt of the Present Undertakings, Studies and Labours of the Ingenious in Many ConsiderableParts of the World)。第一卷篇幅为498页,第157卷为669页,第177卷为839页。作为皇家学会会刊《哲学汇刊》的学术起点较高,皇家学会第一任秘书奥尔德伯格(H. Oldenberg,1618~1677)一开始就极力主张利用该刊建立范围广泛的通讯制度,得到了许多学者和传教士的响应。其他秘书,如:汉斯·斯隆(Hans Sloane)、克伦威尔·莫蒂默(Cromwell Mortimer)和伯奇(Birch)都与当时来华的欧洲耶稣会士有私交或者保持着通信联系。

该刊长期刊登耶稣会士在华工作汇报、天象观测、书信往来、社会调查、文章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英之间的文化交流。例如1667年卷的23期至32期刊登的文章中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共20余篇,分别为:1《中国的奇异动物——野人、海马和海牛》(Animals of strange kinds in China, wildmen, sea-horses, sea-cowes, 26期,第286页);2《中国的大型建筑》(Architecture in China of huge state lines,26期,第487页);3《石棉——可以拉丝纺纱的中国化石》(Asbestus, a Fossile in China to be drawn and spun,26期,第486页);4《中国的巨型蝙蝠——佳肴》(Bats in China of huge bigness, and good meat, 26期,第486页);5《中国床如何防虫蛀》(Beds in China how preserv'd from Nermine, 2期,第485页);6《重达12000磅的中国传道书》(An Eccl in China weighing 12000 pounds,26期,第478页);7《中国的珍奇鸟类》(Birds in China of strange kinds,26期,第485页);8《中国的面包树——饭树》(A Bread-tree or Meal-tree in China, 26期,第485页);9《构造奇特的中国大桥》(Bridges of strange hugeness and fabrick in China);10《中国的卡兰巴木——一种乳香,或者叫做中国乳香,值得引进欧洲》(Calamba-wood in China, a kind of Lentiscum, or rich Tcrebinch, worthy to be transplanted into Europe, 26期,第485页);11《中国藤科植物,大得可作琵琶桶》(Canes in China so big that a Barrel may be made at every knot, 26期,第486页);12《中国的大海峡》(A Chanel in China very huge);13《与旱水牛厮打的中国大海牛》(Sea-cows in China

come off the shore and fight with land-cows,26 期,第 486 页);14《中国的各类珍奇化石》(Fossils's strange kinds in China);15《取于溪流的中国的金银》(Gold and Silver in China not sought other where than in Rivers and Fountains, 26 期,第 487 页);16《中国古代的发明——火药》(Gun-powder invented in China long ago);17《巧夺天工的中国艺术》(Ingenious Arts in China);18《中国岛屿——九九归一》(Isles, 99 in China turned into one, 26 期,第 485 页);19《中国的矿产》(Minerals in China);20《中国的奇山异峰——暴风雨中的烈焰和蒸云》(Mountains in China very odd for shape, burning and raising tempests, 26 期,第 485 页);21《中国的珍奇植物》(Plants of strange kinds in China);22《中国的诺尔河》(Rivers of Nore in China);23《中国一日多变的玫瑰》(Roses in China, that change the same day, 26 期,第 485 页);24《中国的维尼斯》(Vernice in China)等。

《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1731 ~ 1914)

全名《绅士杂志——每月商情》(The Gentleman's Magazine, or, Trader's Monthly Intelligencer),是 1731 年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在伦敦创办的刊物,创刊时每期 50 余页,售价 6 便士。每年一卷,每卷 12 期,1800 年每期 100 页,到 1804 年全年出刊 1330 页,1914 年终刊。据说是凯夫第一个赋予了"杂志"这个英语词的现代含义。该刊原计划用于登载商业信息、生死嫁娶消息和社会上的遗闻轶事,并转载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新闻,谱系学家对该刊很感兴趣。但是在办刊过程中却发表了许多自己征集到有关文艺批评、议会报道、历史故事、气象记录、时文、书讯和收藏之类的稿件,因此拥有众多的读者群。诗人和评论家塞缪尔·约翰逊经常在"小人国上院辩论"的栏目中发表经他用轻松文笔润色过的议会辩论报道。1736 年凯夫把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全部译成英文出版,其中包括马若瑟的《赵氏孤儿》,影响面因此进一步扩大。凯夫的专业嗅觉敏锐,对于中国的事物颇感兴趣,常在自己刊物中刊登有关中国的消息和文章。

二、早期两种海外中文传教刊物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15 ~ 1821)

清初沿袭明朝制度,查禁洋人私刻经卷进入内地设立讲会,1811 年清廷颁布《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违者必处以绞决。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多半以澳门、马六甲或者印度塞兰布尔为基地,创办学校、印刷所和传教刊物,伺机寻找各种借口潜入中国内地。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是嘉庆二十二年七月初一马礼逊在华人聚居的英属马六甲创办的近代最早的中文月刊,1821 年终刊,共出版 7 卷 80 余期。米怜任主编,他离开马六甲期间由麦都思代行编务。该刊木版雕印,高约 19 厘米,宽约 12 厘米。每期 6 ~ 9 页,七卷共 524 页,每页 8 行,每行 20 字。文句在右,旁圈。封面上方有该卷的出版时间,如"嘉庆丙子年全卷"等字样,正中刻有刊名,右侧为圣贤教诲"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左下角题"博爱者(米怜化名)纂"。最初只印 500 册,三年后增至 1000 册,最高发行达 2000 余册。散发的方式是告示当地华人每月初一至初三到米怜寓所领取,还秘密通过朋友、通讯员和航轮运至广州、澳门等地散发,或寄赠泰国、越南和南洋诸岛华人。该刊宣称其宗旨是"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内容主要包括神理、人道和国俗三个方面,每期直接宣传教义的文章都占主要篇幅。如:《神理》、《圣经之大意》(1815 年);《古今圣史纪》(1816 年起);《万人有罪论》、《神主无所不知无处不在论》(1817 年);《圣事接注》(1818 ~ 1819 年)、《引圣录句证神原造大地》(1820 年);《旧遗诏书卷分》、《论新遗诏书》(1821 年)等。该刊也重视向读者灌输知识砥砺道德。为了迎合读者的水平和口味,文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有几百字的短文,也有千字以上的长篇。第五卷后增加故事、寓言、书信、科普和七言诗等形式,图文并茂,同时也发表政治、商业、道德、科学、世界各国情况等方面的文章,后期还辟有"儿童页"。撰稿人除米怜和马礼逊外,还有麦都思和刻字工梁发。

米怜在卷首《序》中说:"无中生有者乃神也。神乃一自然而然。当始神创造天地人万物,此乃根本之道理。神至大至尊生养我们世人,故此善人无非敬畏神。但世上论神多说错了,学者不可不察。因神在天上而现着其荣,所以用一个'天'字指着神亦有之。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致可能分是非善恶也。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神理、人道、国俗、天文、地理、偶遇都必有些,随道之重遂传之。"他写的《张远两友

论》,发表后又印成小册子,多次翻印。1821 年米怜吐血病逝,《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停刊。

《特选撮要每月纪传》(Monthly Magazine,1823 ~ 1829)

道光癸末年六月(1823 年 7 月)麦都思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停刊之后在巴达维亚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内容主要包括宗教、历史、地理等,简称《特选撮要》。封面在左下方有"尚德者纂"字样。右上方有:"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竹纸木刻印刷,每册八页。1829 年停刊,共出四卷。该刊《序言》中说:"书名虽改,而理仍旧矣。"刊中插印中国及东南亚地图,用语体文介绍各地区的情况。

三、19 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重要会刊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24 ~)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 1823 年由学者和殖民官员创建于伦敦,是与由著名梵文学者和法官威廉·琼斯于 1784 年创建的加尔各答亚洲学会的对等组织。学会的领衔人物是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原会长、著名梵文学家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因为这个背景关系,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的主要研究工作与印巴次大陆的选题关系密切,但是范围却扩大到整个亚洲以及北非的埃塞俄比亚。学科研讨确定在近代政治历史和当代事务方面。在这一情势下中亚学会(后来改名为皇家亚洲事务学会)应运而生。1824 年乔治四世国王恩准了学会章程。根据该会 1824 年 8 月 11 日制定的章程,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的建立,旨在推动亚洲的科学、文学和艺术学科的调查。学会通过讲座、会刊及其他出版物,为亚洲的文化和社会提供了最高层次的讲台。它是英国亚洲研究领域中的高级学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英国在苏伊士以东地区的霸主地位的终结,该会不再以亚洲为学术研究范围。目前会员人数不算很多,但是始终拥有大量学术界和政界的精英,也有相当数量的非专业人士。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是大部分为英国和亚洲会员。目前学会会长由鲁滨逊教授(F. C. R. Robinson)担任,赞助人为威尔士王子查尔斯。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发表了大量有关亚洲和中东

(包括北非及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考古、文学、语言、宗教和艺术等方面的高质量论文和书评,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三期。此外还出版过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手稿、单行本和专题论文。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8 ~ 1884)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1858 年创办,是上海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的机关刊物,由伟烈亚力担任主笔,每年出版一册,但不久就停刊,1864 年才复刊。该刊是当时英语世界的重要汉学刊物之一,主要发表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文章,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仍在出版。1861 年 10 月,该刊因分会解散而停刊,1864 年又随分会恢复而续办。

四、1832 年英美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旧译《澳门月报》,1832 ~ 1851)

1832 年 5 月由裨治文、马礼逊和卫廉士在广州创办的月刊,1851 年 12 月终刊,每年一卷,共出 20 卷。主笔裨治文是早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汉语修养好,长期从事翻译、教学和传教,对于中国国情十分了解。《中国丛报》刊登了许多介绍中国和邻国的语言、历史、地理、宗教、科技、商业、文学、社会、艺术和道德方面的文章,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当时的历史和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刊还刊登了不少介绍中国古代文献、历史著作、神话传说,风俗人情以及古人对历史的解说和史学撰写原则方面的文章。例如 1840 年 5 ~ 12 月号的《中国丛报》有关于司马迁和司马光的史学研究情况的介绍,1841 年 1 月号有关于中国历史记载及其方法的简介,3 月号有关于中国纪年方式、内容和特点的讲解,11 月号有关于中国历史年表的说明。1850 年 3 月号的《中国丛报》刊登了魏源《海国图志》的第 12 编译文,5 月号有关于魏源《大清圣武记》的介绍。《中国丛报》还译载过《大清一统志》和《八旗通志》等清代历史典籍。1842 年郭实腊在《中国丛报》上曾撰文介绍《红楼梦》,是将中国古典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第一人。虽然在 1863 年以前英国和欧洲读者无法通过这份杂志了解中国,但是汉学界认为它的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为中西方的文化沟通发挥了桥梁作用。

五、郭实腊主编的近代中文刊物《东西洋每月统纪传》

《东西洋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3～1836)

《东西洋每月统纪传》是中国近代中文刊物,1833年8月1日创办于广州,1834年中断,1835年2月由广州的外国人组织对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接收,1836年全年停刊,1837年在新加坡复刊,1838年底终刊。先后出版过39期,其中六期曾重复出版,最后一期的出版时间为道光戊戌年(1838年)九月。

主编郭实腊出生于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受荷兰传道会招募于1826年到巴达维亚传教,一生辗转于马来、新加坡、泰国、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等地,与伦敦会关系密切。他着汉服,讲汉语,甚至入籍福建同安的郭氏宗祠,在印报纸、编词典、办学校的同时,也为鸦片贸易奔走呼号过。除德文外他还通晓中文、日文、荷兰文、马来文、暹罗文,一生著述80多种,关于中国的就有61种,涉及政治、科技、经济、金融、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语言天分和骄傲狂妄是他品格的两个突出方面。在谈到出版该刊的目的时郭实腊曾明确表示:"要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工艺、科学和原则,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和排外观念。刊物不必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方面使用粗鲁的语言激怒他们。这里有一个巧妙的途径以表明我们并非'蛮夷',这就是编者采用摆事实的方法,让中国人确信,他们需要向我们学习很多的东西。"

道光癸巳年(1833)六月号的封面上方刻印着该卷出版年份,中间为刊名,右内侧刻有古人贤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右下角题为"爱汉者纂"。《新闻》栏写道:"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过,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达,言之不疑,在邦必闻,樊迟问仁。在广州府有两个朋友,一个姓王,一个姓陈。两人皆好学,尽理行义。因极相契好,每于工夫之暇,不是你寻我,就我访你。且陈相公与西洋人交接,竭力察西洋人的规矩。因往来贯了,情感侠洽,无一点客套。虽人笑他,却殊觉笑差了。不打紧。忽一日,来见王相公,说道:'小弟今日偶然听闻外国的人纂辑《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莫胜快乐。'王道:'晚生大可取,总有妙才……'"其文笔通俗可见一斑。

参与《东西洋每月统纪传》编辑工作的还有马儒翰等人。他们给该刊

注入了世俗内容,使它成为中国境内的第一份有影响的中文期刊。介绍西方文化,包括宗教、历史、地理、商业、科技、动物、植物、文学和艺术等,是该报经常性的内容。例如1~16期开辟了《东西史记和合》专栏,连载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在《新闻》等栏目种报道过南极探险、蒸汽机车、天文观察、英国国政公会的爵房和乡绅房(议会的贵族院和平民院)等内容。科普读物有《火蒸车》、《水内匠笼图说》、《经桥》、《推务农之会》、《求五绝》等。翻译文章中首创的人名、地名、物名和概念的成功翻译,不少被沿用至今。该刊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编写的《瀛寰志略》都从中引用过许多有价值的资料。除了普及地理和科学知识外,该报还辟有"贸易"栏,率先报道了当时的市场价格。

六、1850年英商奚安门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old, 1850~1951)又译《华北先驱周报》或者《先锋报》,是1850年8月3日英商奚安门在上海创办的一份英文周报,每周六出刊,主要刊登新闻、商情、评论和领事公报。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该报还刊登过有关起义消息以及对起义的评论。1856年奚安门去世,报业由英商查尔斯·斯潘塞·康普顿(Charles Spencer Compton)买下经营,不久增办《每日航运新闻》(Daily Shipping News)。1861年该刊易手埃德温·皮克沃德(Edwin Pickwoad),他的公司"字林洋行"(Pickwoad and Co.)将《每日航运新闻》扩充为《每日航运和商业新闻》(Daily Shipping and Commercial News),专门刊登航运消息。1864年7月1日该社又将《每日航运和商业新闻》改名《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发行,《北华捷报》却成为《字林西报》的周六增刊。

创刊阶段《北华捷报》在刊登中外新闻、评论、英国驻沪领馆和商务机构的消息和告示的同时,也刊登船期、价格和各类广告。前三位总编均由出版者兼任。1861年后英国报人马诗门(Samuel Mossman)和英国记者詹美生先后被聘任为总编。他们都熟悉中国情况,有丰富的办报经验,还特聘了一批政府官员、商人、学者和传教士为其撰稿。马诗门的著述颇多,曾先后发表过《戈登将军旅华事迹日记》(General Gordon's Private Diary of His Exploits in China,1885年)、《中国概述——居民及其习俗》(China——

A Brief Acccount of the Country, its Inhabitants and their Institutions)和《大人的千金——太平天国造反和戈登的常胜军》(The Mandarin's Daughter: A Story of the Great Taiping Rebellion, and Gordon's Over-Victorious Army, 1876年)等著述。他的办报方针是"公正无私,但不中立"(Impartial, Not Neutral)。

《字林西报》主要报道中外新闻和商情以及英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动态,经常就重大事件发表评论,政治性强,在西侨中具有较大影响。英国驻沪领馆长期将其作为自己的喉舌,重要公告由其独家发表,但是在观点上该刊主要还是代表英商利益。除1881年至1886年巴尔福外,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盖德润(Richard Simpson Gundry, 1838~1924)、约翰·瑟克尔(John G. Thirkell)和蒙塔古·贝尔(H. T. Montague Bell)都担任过该刊主笔。该刊曾跟路透社远东分社就使用路透社电讯问题签约,在中国各地广泛聘用通讯员,还跟各地教堂保持着密切联系。遇重大事件必有系列报道和评论,反应十分快捷。1867年《北华捷报》停刊后《字林西报》的海外版《北华捷报和市场报道》(North-China Herald and Market Report)继续发行,后来又更名为《北华捷报和最高法院与领事公报》(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字林西报》的总经理和总编被捕,不得不再次停刊。《字林西报》在上海出版101年,是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报纸,1933年每天印数高达8650份。1951年3月31日《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同时终刊。

七、1853年麦都思在香港创办的中文月刊《遐尔贯珍》

《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1853~1856)是1853年9月3日由麦都思在香港创办的中文月刊,1856年5月终刊。最初由马礼逊教育会资助,旨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义。庆贺创刊号的五言诗写道:"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幽声开鸟道,声价重鸡林。妙解醒尘目,良工费苦心,吾儒稽域外,赖尔作南针。"该刊编辑思想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相近,常刊登有关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历史人物的短文,设有《英国政治制度》、《花旗国政治制度》、《香港纪略》和《金山采金规则》等专栏专论,每期《近日杂报》报道港澳和内地的新闻和世界大事,配发新闻照片,还刊登伊索寓言。1854年9月号还在《附记西国诗人语录一则》中刊登了弥尔顿(Milton)的

《论盲目》(On His Blindness),形式多样活泼。创刊号的《西兴括论》报道了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0年1月11日)广西浔州府桂和金田村举兵,以及咸丰三年二月十一日(1853年3月20日)太平天军攻占南京建都天京的消息。后来还报道了英国政府派遣港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1803~1863)"惟上海英人性命产业,断勿稍至损害"而秘密访问天京,以及上海小刀会领袖刘丽川通过英轮递送致洪秀全密函及外国宝剑一把,从天京购得《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历》、《天命诏旨书》、《太平礼制》、《天父下凡诏书》、《天条书》、《旧遗诏圣书》等十三种太平天国书籍的事情。该刊每期铅印3000册,定价15文,分别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发行。麦都思担任上海工部局董事会主席之后,主编工作由其女婿奚礼尔(Charles Batten Hillier, ~1856)担任。奚礼尔通晓汉语,原任香港警察法庭书记官,后调任巡礼府,兼定例局委员,熟悉市场运作和需求。1855年1月他大胆推出了商业广告业务,增刊《布告篇》,专门刊登外国在华公司、轮船、药品、在港开业的医生和学校招生广告,同时也刊登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和行市。各期商情,如:《西国通商遡援》(1853年3月号)、《茶叶通用述概》(1853年5月号)、《粤省公司原始》(1854年4月号)、《上海税务补衰救弊原委》(1854年10月号)、《论银事数条》(1854年11月号)、《英国贸易新例使国裕民饶论》(1855年11月号)等,读者反响特别好。《遐迩贯珍》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家中文刊物,受到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成为他们了解西学的重要资源之一。

八、1857年墨海书馆在上海创办的综合月刊《六合丛谈》

《六合丛谈》(Shanghai Serial,1857~1858)是《遐迩贯珍》停刊之后墨海书馆于1857年1月26日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综合性月刊,共出15期,1858年终刊,伟烈亚力主编。两个刊物在编辑方针、主办宗教团体、内容结构、封面设计、发行渠道、赞助人士和英文刊名等方面都十分相似,因此有人把《六合丛谈》看作《遐迩贯珍》的上海版。出版背景反映了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影响扩大,急于把宗教宣传和文化交流渠道从香港延伸到内地。

伟烈亚力在该刊《小引》中写道:"今予着《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

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苍穹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褰衽席。”

该刊是一份用牛拉机器印刷的杂志，16开本，高19.3厘米，宽13.5厘米，每册16页，版式按中国雕版古籍样式排列。第一期首页右侧上部印有“咸丰丁巳正月朔日”字样，下部为“第壹号”三字，中间为隶书刊名《六合丛谈》，左侧为“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内容除了基督教义宣传外，还有新闻、文学和科普知识，专设各国近事、海外异人传、西学说、杂记和新书等栏。发表的文章如：《总论耶稣之道》、《上帝无所不知》、《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地理、动植二物分界》、《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格物穷理论》、《潮汐平流波涛论》等。第一期的“金陵近事”报道了太平天国内部变乱的消息。该刊主要撰稿人除英国传教士艾约瑟、韦廉臣和慕维廉外，还有中国学者蒋敦复、王韬和韩应陛等人。

九、《中日丛报》和《中外新闻七日录》

《中日丛报》(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of Facts and Events in Science and Art Relating to Eastern Asia, 1863～1865)是1863年7月英国国王学院苏谋事创刊于伦敦的一份月刊，旨在增进英国人对于远东事务的了解。他认为欧洲社会各阶层都应该了解中国和日本的情况，商人必须了解中国的地理、气候和人口，传教士应该熟悉中国的语言、风俗、传统和自然面貌。为此，编者开辟了专门版面介绍中国的风景、名胜、哲学、政治、自然和艺术。但是该杂志于1865年12月停办，共出三卷，目标未能全部实现。

《中外新闻七日录》(Chinese and Foreign Weekly News, 1865～1870)是同治四年正月初八(1865年2月3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在广州创办的中文周刊。十六开，每期一册。报头右侧印有“广州城”，左侧有“远人采”等字样。刊登文章的内容广泛，包括数学、物理、医学、技术、天文和气象，科普读物有《气机论》、《种牛痘》、《日蚀月蚀论》、《勾股弦幂论》等。主笔在创刊号的《小引》中写道：“我侪耶苏(稣)教会忻忻而创是新闻七日录，非欲藉以邀利也，盖欲人识世事变迁而增其闻见……。”该刊对于开启国人的眼界和心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870年152期之后终刊。

十、以英、美传教士为读者对象的《教务杂志》

《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868 ~ 1941) 是 1868 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保灵(Stephen Livingstone Balwin, 1835 ~ 1902)在福州创办的中英文月刊,英文初名为"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nry Journal", 1869 年起改名为"Chinese Recorder",1872 年 5 月因保灵回美而停刊。1874 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复刊,改为双月刊,1885 年又恢复为月刊,1941 年终刊,前后共 72 年。虽然是一份以英、美传教士为读者对象的杂志,但是在了解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教运动的同时,读者也可以了解到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的一般情况。该杂志是当时西方在华各教派的联系纽带,它所刊发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在华英美传教士及其宗教活动、早期基督教在远东的传播以及教会势力在中英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教务杂志》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一份珍贵资料。

十一、宣传西学新学的综合性中文刊物《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1868 ~ 1907) 1868 年 9 月 5 日在上海创办,发行人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慕维廉、李提摩太、陆佩和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y, 1862 ~ 1931)在林乐知回国期间曾分别代行过管理职责。撰稿人有丁韪良、艾约瑟、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 ~ 1899)、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 ~ 1927)、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 ~ 1908)、玛高温、嘉约翰、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 1860 ~ 1921)、山雅谷和马林(W. E. Maclin)等近百名传教士。该刊前身是林乐知自费出版的《新教会报》(Review of the Times),初名《中国教会新报》,100 期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907 年 12 月终刊。其间休刊约六年,曾由周刊改为月刊,总共发行 977 期。虽然它不是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中文刊物,但却是西学新学内容最丰富、中外文化交流最频繁、发行量最大的一份综合性中文刊物。许多近代名人都曾在该刊发表过文章,孙中山先生的《上李傅相书》就刊登于 1894 年 10 月和 11 月第 69 至 70 期的《万国公报》上,梁启超和康有为也把它看作观时政必读之刊物。戊戌变法时,英、

美传教士一改福音信徒的慈悲面孔，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有关变法的文章竟达数百篇之多。此外该刊还追踪报道过中日甲午战争，长篇连载过林乐知对于中东失和事态的分析和评论。1889 年《万国公报》再次复刊后隶属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广学会，正式成为该会的机关报。由于内容包罗万象，广泛涉及时政、吏治、外交、天文、地理、交通、邮电、格致、技艺、风俗、民情，特别是国内外消息的报道，对于时政时局的评论和西国科学技术、医疗卫生、风俗文化的介绍，备受各阶层读者的欢迎，迎合了变革中中国知识分子求知若渴的心理，同时也惠及信徒、外侨和官员，因此每年发行数额竟高达四五万。

十二、1872 年德尼克在香港创办的汉学杂志《中国评论》

《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1872 ~ 1901) 是 1872 年 7 月德尼克在香港创办的双月刊，一年一卷，每卷 6 期，是一份早期重要的汉学杂志，1901 年 7 月终刊。该刊办刊目的与《中国见闻和传教杂志》(Chinese Recorderand Missionary Journal) 和《中日问题研究》(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基本相同，发表了许多由梅辉立、艾德 (Ernest John Eitel, 1838 ~ 1908) 和艾约瑟等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和远东的文学、艺术、科技、宗教等方面的文章，也常转载《中国丛报》的重要文章。《书讯》栏经常向读者介绍新书出版消息，并对内容作出评论。文章可读性强，符合当时渴望了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英国读者心理。

十三、20 世纪初创办的跨学科核心刊物《亚非学院院刊》

《亚非学院院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17 ~) 创办于 1917 年，至今已有 88 年的历史。该刊是亚洲、非洲和中近东古今语言、文化和文明史研究者的园地，是一份跨学科的核心刊物。涉科范围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科学史、艺术、历史、医学、语言、文学、音乐、哲学和宗教。每期除了刊登论文、述评、专访外，还辟书评栏目，提供年度论文索引，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从该刊2002年第65期第二部分的目录就可以看出其概貌:第267页至378页"论文"部分刊发论文5篇,其中有鲁惟一的《汉代君主宇宙观》(The Cosmological Context of Sovereignty in Han Times,第342至349页)。第379页至487页"述评"部分刊发述评61篇,其中"中近东"中有托马斯·奥尔森(Thomas T. Allsen)评乔治·莱恩的《元蒙欧亚的文化与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by George Lane)。"远东"部分有约翰·罗森诺(John S. Rohsenow)评巴雷特的《汉语常用谚语辞典》(ABC Dictionary of Chinese Proverbs by T. H. Barrett, 第379页至487页,下同);安德烈·莱维(André Lévy)评巴雷特的《用词方式:古代中国读本的撰写》(Ways with Words: 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arly China by T. H. Barrett);蔡宗奇(Zong-Qi Cai)评王次澄的《〈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思想、文化、创造性和修辞》(A Chinese Literary mind, Culture, Creativity, and Rhetoric in Wenxin Diaolong by Tzi-Cheng Wang);米歇尔·霍克斯(Michel Hockx)评顾彬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y Wolfgang Kubin);苏珊娜·霍(Susanna Hoe)评巴雷特的《北京被围困时的妇女》(Women at the siege of Peking by T. H. Barrett);芭芭拉·布鲁克斯(Barbara J. Brooks)评迈克尔·奥斯林的《1895~1938的日本帝国外交:领事、条约港口和对华战争》(Japan's Imperial diplomacy: consuls, treaty ports, and war in China, 1895~1938 by Michael Auslin);爱德华·罗兹(Edward J. Rhoads)评尼古拉·迪·科斯莫的《满族和汉族:晚清民初的民族关系和政治势力》(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y Nicola Di Cosmo);艾伦·理查德·斯威屯(Alan Richard Sweeten)评约瑟夫·李泽黑的《中国农村的基督教:1860年至1900年江苏省的冲突与和解》(Christianity in Rural China: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1860—1900 by Joseph Tse-Hei Lee);亚历山大·潘特索夫(Alexander Pantsov)评伊恩·撒切尔的《布尔什维克与1919~1927年的中国革命》(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by Ian D. Thatcher);大卫·巴雷特和拉里·修(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评拉纳·米特的《1932~1945年中日之间的合作:和解的限度》(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by Rana Mitter);蒋彝评巴雷特的《蛰居伦敦》(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 by T. H. Barret, 第464页);斯蒂

芬·福伊希特·王(Stephan Feucht Wang)评巴雷特的《中国大众的宗教:帝国的隐含表达方式》(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the Imperial Metaphor by T. H. Barrett);格雷格·奥斯汀和斯图尔特·哈里斯(Greg Austin and Stuart Harris)评雷纳尔·德里夫特的《日本和大中国:亚洲纪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Japan and Greater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Asian Century by Reinhard Drifte)。

十四、英国当代汉学领域的核心刊物《中国季刊》

《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由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编辑,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涉科范围广及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国际事务、通俗文化、性别研究,以及法律、人权、环保、文学和艺术,覆盖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海外华人地区。多数重点文章学风严谨,资料准确翔实,研究全面,具有深刻性和权威性。通过论文、研究报告、书评和中国大事记等形式,增加读者对现代中国的了解,并为读者提供不可缺少的助读工具。该刊每季一期,每年出一特刊,2006 年的特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 ~ 1976 年》。《中国季刊》还不定期发起召开学术会议,例如 1964 年 9 月 6 日至 12 日召开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讨会,旨在增进英美史学界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了解。

附录二
汉学书局和机构

英国圣书公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04 ~ 1937)

研究英国汉学离不开对英国汉译圣经的研究,因为对于一个像英国圣书公会这样的宗教团体和一个像英国这样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来说,圣经翻译必定是他们最核心最神圣的工程,因而会选送接受过最严格的多种语言训练并最具有献身精神的虔诚信徒参与,同时也会不惜工本地投入尽可能多的财力和人力,最终推出反映他们所期待的精品。据了解,目前圣经在世界各地已有1500余翻译版本,圣经在华销售数量也高达三亿册,所有来华传教士最关心的事情无一不是圣经汉译问题。从这一角度说,圣经汉译直接反映了传教国家的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综合汉学水平。

英国的国教是英格兰圣公会(English Church 或 the Episcopal Church),信仰者占英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大英圣书公会(又译"大英国圣经会"或"大英圣经公会",1811年以前还叫"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成立于1804年,是英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圣经推广组织。为了资助马礼逊等人翻译和出版中文版圣经曾先后支付他们8000英镑,在当时算是一笔巨额费用。该会曾经在我国哈尔滨、沈阳、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和广州等地设立机构,十分关注我国的基督教事业。

1843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香港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重译圣经,由中国各地的传教士分五组译出新约中文稿,交委员会审阅。在翻译过程中就是否把希腊文"Theos"译为"神"或者"上帝"的问题出现了两派观点,从1847年到1850年双方争论不休,未能统一意见。英国圣书公会代表主张译为"上帝",而美国圣经公会代表则支持"神"派的观点,因此1852年至1853年出版的《新约全书》汉译本有两个版本。鉴于这种混乱情况,《旧约

全书》的汉译由来自上海、广州和厦门等地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翻译。“上帝”版由麦都思、米怜、施敦力和理雅各于1853年译完，1854年出版，1855年与代表委员会所译的《新约全书》合集在上海出版，史称“委办本”或“代表译本”，由英国圣书公会发行。王韬曾经对该版译文进行过加工润色，大大增加了可读性。“神版”新旧约全书由裨治文和克陛存翻译，先后于1859年和1862年完成，1863年由上海华美圣经会出版发行。其间大英圣书公会派李太郭到上海设立大英圣书公会分支机构，资助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印刷和销售。1875年美国圣书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又译“大美国圣经会”或“美国圣经公会”，1816年成立于纽约）也派葛立克（L. H. Gulick）到北京、上海、福州和汉口等地设立机构，资助刊刻裨治文等翻译的圣经和中国方言版圣经。当时南京的太平天国也有500多人从事圣经翻译和传教手册编写工作。英国圣书公会和其他西方教会机构立即在信徒中发起捐献运动，声称要为太平天国印刷100万册新约全书，并在上海设立专门印刷所准备为他们出版圣经。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由新教各派联合协作，分文理（文言文）、浅文理（半文半白）和白话（普通话）三个小组再次翻译圣经，以减少译本过多引起对教义理解的混乱情况。杨格非所在的翻译组负责浅文理译本，他本人确信文理译本对于一般会众理解有困难，白话译本又难免带上浓厚的地方色彩。他参与翻译的浅文理《新约全书》于1885年在汉口出版，1889年苏格兰圣经公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还出版了他的官话版《新约全书》，他翻译的《旧约全书》（至《雅歌》部分）也于1905年付梓。在华新教徒翻译全部圣经的工作费时27年，其中国语和合译本最受信徒欢迎。虽然他们没有完全解决由“上帝”和“神”的译词选择所引起的翻译指导思想的分歧，但是彼此尚能摒弃成见，同心协力，成就译事，为后来圣经的中国方言版本和少数民族语言版本的翻译铺平了道路。这在汉学史和翻译史上都不失为佳话流传后世。

1937年5月，在华的大英圣书公会、大美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决定合并，成立中华圣经会（The Bible Society of China）。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23～1949）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建于1823年，1991年后简称为“皇

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创建人威廉·琼斯爵士1784年曾在印度加尔各答创建孟加拉亚洲学会,宗旨与皇家亚洲学会基本相同,后来成为它的一个分会。1870年建立的圣经文献学会(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1919年也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一个分会。从1829年到1900年,皇家亚洲学会先后设立若干个分会。其中有两个在中国:一是1847年建立的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RASHKB,非正式的名称也叫"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二是1857年在上海建立的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据记载,后者的前身原为上海文学和科学协会(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后隶属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为其规模最大、最活跃的一个分会。该会宗旨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若干亚洲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组织相关的研究,主要活动包括提供相关的文献和藏书、组织讲座和研讨会以及出版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其学术水平被认为是同类组织中最高级的。

墨海书馆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1843—1860)

墨海书馆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将其在印尼巴达维亚的印刷所迁至上海后开办的印刷出版机构,是英国汉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最初馆址设在上海县东门外的大境路一带,后来迁至山东路。在馆内供职的除麦都思本人外,还有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合信,中国学者李善兰、王韬、管嗣复(? ~1860)、张福僖(? ~1862)等人,经费由英国教会资助。该馆较早拥有较先进设备,有大小英文铅字7种、中文铅字2种,铁制印刷机3台。尽管没有电力,但是可以用牛力转动机器印刷书籍,一天可印4万余张,字迹清楚,油墨均匀。这样的印刷质量使作者和读者都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难怪有人作诗这样描述当时情景:"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

麦氏精通汉语,是翻译新约委员会中的伦敦会代表,熟悉出版印刷业务,十几年中居然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开始几年,墨海书馆主要出版宗教书籍和小册子,如《十条诫论》、《圣教要理》、《耶稣教略》、《天理要论》、《述基督教义》、《耶稣降世传》、《论悔

罪信耶稣》等。1844～1860 年该馆出版了各类书刊 171 种，其中基督教义、教史、礼仪等内容的 138 种，占总数的 80.7%，数学、物理、天文等科学知识的 33 种，占总数的 19.3%。

墨海书馆大量出版科学译著和知识读物始于 1850 年。例如介绍西方生理解剖学的著作《全体新论》，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的著作《博物新编》，介绍近代西方植物学的著作《植物学》等。出版的数学书籍有，1853 年伟烈亚力等人合译的《数学启蒙》2 卷，1857 年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续几何原本》，1859 年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代数学》13 卷和《代数积拾级》18 卷等。

在物理学方面有 1858 年伟烈亚力与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第二年又出版了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在天文学方面有 1859 年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谈天》18 卷。其他科学译著还有 1859 年出版的《植物学》8 卷，其中前 7 卷由韦廉臣与李善兰合译，最后一卷由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

墨海书馆还出版了慕维廉与蒋敦复合译的《大英国志》以及合信的《西医略谈》、《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重刊了合信所著的《博物新编》和《全体新论》。

该书馆还编辑出版了当时上海第一份中文杂志《六合丛谈》。除《圣经》和《六合丛谈》采用活字铅印外，其他书籍仍用雕版印刷。1860 年以后，美华书馆迁沪后该馆正式停业。

格致汇编社

(Office of 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 1876～1892)

格致书院是 1876 年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上海创办的一所译书兼教学的私立机构。此前英国使馆驻沪领事馆领事麦华佗曾建议设立一所传播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知识的学校，于是便由西董（傅兰雅和伟烈亚力等）和华董（华衡芳、唐景星、王锦堂和徐寿）组成董事会策划此事。1876 年 6 月 22 日格致书院在上海公共租界北海路正式成立。格致汇编社就是中文科技综合期刊《格致汇编》的编辑部，在书院成立几天后即出版了《格致汇编》第一卷。该刊历时共七年，以发表长篇和短篇译文为主，下设“算学奇题”、“互相问答”、“格物杂说”、“博物新闻”、“披阅新书”等栏目，1892 年终刊，出版 60 卷。主要撰稿人有丁韪良、范约翰、李提摩太、艾约瑟和慕维

廉等。徐仲虎(中国驻德参赞)和徐雪村也为该刊写过文章。汇编社还出版各期《格物汇编》中的重要译文的抽印单行本65种,内容包括《重学器》、《化学器》、《农事略论》、《地学稽古论》、《纺织机器图说》、《西国名菜嘉花论》、《工程机器器具图说》、《人与微生物争战论》等。1885年傅兰雅创办首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专门出售各种图书和期刊,共有书籍、地图、图解等371种,其中由西方学者撰写的175种,由中国学者撰写的196种,科技类图书153种。1888年格致书室出售的图书多达878种,其中外国学者著作650种。书室在北京、天津、沈阳、烟台、汉口、福州、厦门、香港等地都设立了分销处,每年售出图书15万册,收入1.7万余元。

益智书会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1877~1890)

清光绪三年(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首届宣教会议(The First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狄考文在会议发言中谈到了当时中国的教会学校多半已沦为圣经班,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和课程表,教学内容随意性很大,随着西方新教势力在中国通商港口城市影响的扩大,教会学校的教材问题越来越突出。他的意见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共鸣,决定推举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组成创立同文书会(后改为"益智书会",英文译名为"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专门负责教义、数学、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地质、天文、测量和体育等教科书的编写、编辑和出版。韦廉臣被委任为书会秘书。

会后的具体业务分工是:傅兰雅负责编写初级教材,林乐知负责编写高级教材。至1886年该会先后编写出版了104种教科书和数十种教学挂图。傅兰雅负责组织编写了26种,其中12种是有关科学方面的,5种为附有手册的科学知识挂图,8种为科学须知,均被教会学校所采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写的教科书大多以西方原著为蓝本,用西方史书的章节体讲解历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该会常把他们的教科书赠送给传教区内的中国私塾使用,有些非教会学校也闻风而至,争相购买,反响热烈。

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会议在沪召开,决定把益智书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1916年又改名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先后出版了算术、几何、代数、测量、博物、天文、地理、化学、地质、植物、动物、心理、历史、哲学、语言等各科教科书共98种,

20 余万册，供应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教育会下属的一个“统一译名委员会”，对西学名词翻译的统一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0 多年后，中国学者开始自编教科书，初期部分直接选用益智书会的教材，注意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生动有趣的编写原则，逐步建立中国新式教科书的体系。

广学会

(Society for The Diffus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87 ~ 1947)

1887 年苏格兰格拉斯哥一圣教书会解散，印刷设备转给了上海同文书会会长韦廉臣，他便联络赫德(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林乐知、李佳白、艾约瑟、和慕维廉等人成立广学会(1905 年英文名称改为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由赫德任会长，佛克任副会长，韦廉臣任督办，主管日常工作。会员最初只有 30 多人，主要是西方传教士、驻沪外交官、工部局官员、洋行经理等，只有少数中国人，1905 年发展到 254 人。1889 年该会创办了周刊《万国公报》，林乐知任主笔，聘请中国学者蔡尔康、任保罗和范子美等人协助编译工作。早期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有《基督实录》、《圣经释义》、《传教定例》、《宗教故事》、《人心交上帝》、《耶稣圣教入华的目的》等；刊物有《孩提画报》(1888—1890)、《训蒙画报》(1888 ~ 1890)、《成童画报》(1889 ~ 1891)、《中西教会报》(1891 ~ 1917，1912 年后称《教会公报》)、《大同报》(1904 ~ 1917)。1887 ~ 1900 年共出书 176 种，至 1911 年，扩大到 461 种。其中宗教书籍 138 种，占总数的 29.93%，非宗教书 238 种，占总数的 51.63%，其他内容的书籍 85 种，占总数的 18.44%。非宗教书籍中不少是西方科学文化著作的译本，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过重要影响。

1890 年韦廉臣逝世，1891 ~ 1916 年由李提摩太出任学会总干事。他致函全国各教会征求意见，决定成立学会售书处，调整出版方向，适当控制每年出版的宗教书籍和小册子数量，以改变印刷所亏损带来的困难。林乐知休假回国期间公报编辑由李提摩太代理。他熟悉业务，先后发表文章 30 余篇，在蔡尔康的协助下，曾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的书名翻译英国历史学家麦垦西的《十九世纪史》，从 1894 年 3 月至 1895 年 5 月在《万国公报》上连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出版单行本时该书改名为《泰西新史揽要》，一度作为历史教科书使用。

1894年英国地产商汉璧礼(Thomas Hanbury, 1832~1907)给广学会捐银600两,以货币、铁路、邮政,制茶、制丝、外交、禁烟为题征文,鼓励文人和政要发表意见,并创办养蒙学堂(Thomas Hanbury School and Children's Home),帮助教育中外通婚家庭的子女。汉璧礼去世前遗嘱捐银25000两,为广学建新会所。

广学会的业务不断扩大,先后延聘6位西人和18位华人参与译书办报,除李提摩太和林乐知外,高葆真、丁韪良、花之安、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 1850~1924)等人对于译书译报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影响扩大,经常得到英国布道会的赞助,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强学会所属的《中外公报》也常转载《万国公报》的文章,不久广学会的资产就超过了25万。李提摩太辞职后,继任瑞思义(William Hopkyn Rees, 1859~1924)为改进工作,曾到北京、天津、济南、汉口、广州和香港等地进行调查,调整了出版方针。1916年,广学会出版了海丁编著的《圣经辞典》、季理斐主编的《宗教伦理百科全书》,1934年出版了《四福音大辞典》,效益都不错。该会还先后同齐鲁神学院和金陵神学院合作翻译出版《宗教心理学》和《神学大纲》等神学丛书。后来增聘梅益盛(Isaac Mason, 1870~1939)和赫士(Watson McMillen Hayes, 1857~?)等人,瑞思义任编译和注释,季理斐、张纯一和杭海撰写时论。增办《大同报》和《女铎报》,继续发行教会公报,出版乐灵生(Frank Joseph Rawlinson, 1871~1937)编辑的英文《中国教会年鉴》、季理斐夫人主笔的《福幼报》月刊、李路德主笔的《明灯》半月刊、莫安仁(Evan Morgan, 1860~1941)主编的《宗教伦理百科全书》以及《道声》、《女星》、《平民家庭》、《民星》等。

广学会经常以送书赠刊方式回报国内外捐款的客户。曾一度委派传教士到科举考场散发书刊,以后又直接分送各级官员及各地学校,或者给入会读者免费寄赠年内出版的书刊。广学会的出版物最初委托美华书馆和申报馆经销,以后改申昌书画室和格致书室代销,并在北京、重庆、南京、镇江、福州等城市设立了35处经销点。

广学会先后编译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书籍,成为当时中国有识之士和知识阶层的精神食粮,例如韦廉臣的《格物探原》、花之安的《自西徂东》、李提摩太的《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列国变通兴盛记》、《泰西新史揽要》、林乐知的《文学兴国策》和《中东战纪本末》等。其中《泰西新史揽要》是一部19世纪欧美各国的社会发展史,由李提摩太与

蔡尔康合译,1895 年出版,印行 3 万部。《中东战纪本末》是一部中日甲午战争的资料和评论汇编,评述切中时弊,发人深省,对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该书由林乐知和蔡尔康合编,1896 年出版。

1937 卢沟桥事变后广学会迁至西南,与成都华英书局组成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朱立德、吴祖荫、丁光训和江文汉等先后担任过总干事。1947 年改组为中华基督教出版协会。在 50 年的历史中,广学会出版书籍刊物近千种,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基督教出版机构。

伦敦庚款委员会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 1931 ~)

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庚款委员会",简称为 UCC)的历史可以上溯到 1925 年以威灵顿勋爵为首的政府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学者胡适和传教士苏慧廉等人,研究如何使用庚子赔款的问题。当时决定将其中 20 万英镑用于加强中英两国之间的教育联系。根据皇家特许状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于 1931 年成立,负责管理这笔经费。按照规定联合王国各大学共同参与旨在加强中国和联合王国在智力合作并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任务。这笔经费当时可以支持大规模的中国研究计划,例如可以支付剑桥、伦敦和牛津大学教授的薪俸,但是这笔基金现在只能用于安排中英两国大学教师的一般性互访,以及一些图书馆的书籍采购、汉语教学研讨会、每年两名汉语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而且仅限于目前已经开设全学位汉语课程的英国大学。至于对访英国的中国学者和在英国研究汉学的欧洲学者的资助,通常都要与目标相似的其他单位,如中英研究员托管会(Sino-British Fellowship Trust)和英中教育托管会(The Great Britain-China Educational Trust)合作安排。递送申请的时间为每年 3 月 1 日、6 月 1 日、9 月 1 日或 11 月 1 日,委员会成员在上述时间开会评审各类申请。虽然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庚款教育拨款管理机构,但是对于英国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却有一定的导向和监控作用。会址设在伦敦白金汉门 59 号。

英中了解协会

(The 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 1960's ~)

英中了解协会创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是以慈善机构注册的非官

方、非党派的民间组织。协会通过会刊、媒体和其他渠道，向会员提供各类有关中国和各地华人的信息，组织友好访问和人员交流，增进英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组织展览、报告、讲座、观摩、表演和节庆活动，增加会员对于中国文化、历史、风俗和现状的了解和华人之间的沟通；为访华团队和在英就业、求学和居住的中国人，为英国华人社区子女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提供服务和帮助；同时也为专业学习、学术研讨和高层次交流提供信息和协助。英中了解协会的会员中汇集了许多知名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很多人关心中国的发展，为英国汉学的发展和英、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从英中了解协会2005年第三季度的工作安排就可以看出他们活动的丰富多彩：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第三层综合教育展厅展出从公元前5000年到当代的2000多件中国艺术品，展期两个月；7月2～3日举办中国出口陶瓷周末展出（第二部分），同时安排六场专题讲座；7月11日举办麻将之夜；7月25日下午专题为“成人折纸艺术”；7月28日专题为“9岁以上儿童使用的瓷碗的彩绘”；8月2日至14日中国水墨画和水彩画展；8月6日以“中国玉器艺术及其地位”举办四场讲座；8月10日兵马俑——9岁以上儿童手工，自己制作泥人带回家去；8月11日麻将之夜；8月24日皮影戏——儿童手工；8月25日中国传统水墨画——9岁以上儿童手工；8月30日午间游或新品展出，专题为“宗教与信仰”；9月15日麻将之夜。

英中了解协会的出版物有：《今日中国》（China Now）是英中了解协会会刊，创刊至今已经25年。《中国眼》（China Eye），会员通讯，每季一期，详细报道各类中国新闻和会员动态。其中的《中国文件夹》（China File）栏目包括新闻、动态、文章和评论。《中国焦点》（China in Focus）。《中国话》（English-Chinese Phrase-book）为前往中国的旅行者提供语言学习的帮助，书中有旅行、餐饮、换汇、购物、问候和数字等方面的常用短语，有汉字和拼音，便于使用者认读和记忆。

英中了解协会在曼彻斯特和切尔腾纳姆设分支机构，在会员中开展活动。曼彻斯特每年在弗罗德舍姆举办一次活动；切尔腾纳姆与中国山东威海结为姐妹城市，经常互相派团访问，开展对口交流活动。

英中协会

(The Great Britain - China Centre, 1974 ~)

英中协会(简称为 GBCC),是 1973 年在皇家学会内由英中协会和泰晤士报业集团联合举办的"中华魂"文物展之后的第二年建立起来的组织。泰晤士报业集团将展览会的收入捐赠筹建英中协会,英国政府也同意每年予以资助。

英中协会是一个非行政的公共机构,以民间方式致力于加强并发展联合王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促进相互了解,特别是中国对于英国政策、习俗、文化和制度的了解,以期在两国决策者之间建立长远的联系。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过去几十年中能保持持续发展主要是因为在政府和非政府层次上妥善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英中协会凭借自己的实践经验在政策制定和及其实施方面对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帮助。协会重视与中国开展交流、交换信息和咨询业务。

英中协会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资助、企业赞助、会费、基金、咨询服务收入。1999 ~ 2000 年度协会的进项为 776693 英镑,其中政府的资助为 27.5 万英镑。英中协会下设英中协会教育基金,为在英国攻读研究生课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留学生提供一定额度的奖学金。

从 2000 年 1 月起英中协会还承担英中论坛的秘书处工作。该论坛由中英两国政界、商界、法学界、学术界、媒体和艺术界的资深人士组成,英方主席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中方主席为宋健。论坛于 1998 年由布莱尔首相和朱镕基总理倡导,2001 年 10 月由江泽民主席和布莱尔首相在伦敦共同主持了第一次论坛开幕式。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英中两国的双边关系,以扩大工业、财经、法律、环保、教育、传媒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共识。

英中协会以担保的有限公司方式注册,由执行委员会运作,大卫·布鲁尔(David Brewer)任会长,四位议员、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任命委员参与管理。四名正式职工曾经去过中国,会说汉语,另外还有兼职会计和图书管理员各一人。

苏格兰—中国协会

(Scotland-China Association)

历史上苏格兰与中国的交往可以上溯到18世纪。苏格兰各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设了汉语、中国历史和文化课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就是中西植物学家大型合作项目的重要伙伴。1994年苏格兰国际开发公司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办事处,为打算开展对华贸易的公司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

1995年苏格兰—中国协会增设对华贸易俱乐部,为来华的苏格兰企业家提供网络帮助,组织他们在爱丁堡或者格拉斯哥定期召开非正式会议,在喝中国饮料、吃中餐的氛围中相互交流有关中国的文化和商务信息。每当中国驻英使馆官员或中国人民对外友协考察团到苏格兰访问,他们都聚会欢迎,并先后就城市规划、环境保护、金融服务、卫生保健和供电价格等问题进行过广泛交流。对华贸易俱乐部的活动得到了英中贸易委员会苏格兰分会的全力支持。为了促进苏格兰和中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关系的发展,1997年在邓迪的艾伯推大学创建了中国-苏格兰学院。

苏格兰企业和终生教育部副部长刘易斯·麦克唐纳(Lewis Macdonald)曾于2004年2月来北京主持中国国际教育展中的英国展厅开幕仪式,出席了苏格兰在华教育办事处成立的庆祝活动。10月12日苏格兰行政院长杰克·麦康奈尔(Jack McConnell)来华访问,出席"中国—苏格兰教育日"活动,与中国教育部的官员商谈双方的教育合作与交流问题。他还参观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席"中国—苏格兰教育论坛:携手铸造成功未来"研讨会,正式启动可为20名赴苏格兰深造的中国硕士留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的2005年度资助项目。

随着双方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和苏格兰结成姐妹城市的有大连与格拉斯哥,西安与爱丁堡,海口与珀斯。从1991年到2001年在苏格兰的中国人由10476人增加到16315人。在苏格兰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从1998~1999年度的408人增加到2002~2003年度的2666人。苏格兰对华出口的数额从1998~1999年度的1.21亿英镑,增加到2002~2003年度的1.56亿英镑。苏格兰—中国协会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各设一个分会,会员主要是侨居苏格兰的中国人和关心热爱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苏格兰人。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从事各种职业,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在爱丁堡、格拉斯

哥等地聚会，庆祝中国传统的节日，讨论大家所关心的中国事情，会见来访的中国代表团。他们也相约来华参观访问，出版杂志文集，在想练习英语或苏格兰语的中国人和想练习汉语的苏格兰人之间开展互帮互学活动。

苏格兰中国研究信息网

(The Scottish Information Network Online for Chinese Studies)

苏格兰中国研究信息网(英文简称为 SINO - CS) 是苏格兰汉学研究的联合项目网，由苏格兰高教基金会资助，目前参与的大学有：阿伯丁大学、邓迪的艾伯推大学、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该信息网为会员大学提供与研究项目相关的图书和信息服务，包括汉学研究硕士课程信息、中文藏书信息、网络图书推荐(有限使用)、新闻和动态、与汉学研究有关的链接以及图片资料。

英国汉学学会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英语简称为 BACS)

英国汉学学会成立于 1976 年，以推动英国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为其宗旨，有会员 200 多人，集体会员包括英国各大学中文系、历史系、远东系教学研究人员、汉学、东方学和南洋学研究人员、相关院校图书馆管理员和部分中小学汉语教师。英国文化委员会、语言教学和研究信息中心(Centre for Information on Language and Research)、现代中国中心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庚款委员会、英中协会、东方研究所图书馆(Oriental Institute Library) 等单位是该会的团体会员。英国汉学学会是一个非政治性组织，它除了联系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学术团体和学校外(包括汉学及其相邻学科的学术团体和高校专业)，也重视与产业界、媒体和地区政府相关部门的交流①。

该会的学校联络部干事(School Liason Officer)鼓励并推动英国小学、中学、中等技校和各类私立学校开展汉语教学。在英国政府近年来提倡的测试练习研究、汉语教学质量检测和英格兰高教基金会汉学研究评论等活动中，英国汉学学会在维护汉学领域的利益和优先地位方面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时还负责为英国 - 台湾代表处向参加在台暑期学习的英国学生

① Bulletin of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BBACS, 1998,2003).

发放的奖学金进行监管。

英国汉语教学研讨会(The British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Seminar,英语简称为 BCLTS)是英国高校汉语教师的一个组织,也是英国汉学学会下属的一个机构,其宗旨是通过在会员之间交流汉语教学经验和教材,进一步提高英国高校的汉语教学水平。顾问委员会由牛津大学的杜德桥、伦敦大学的佟秉正(P. C. T'ung)和利兹大学的叶步青组成。每年有两个工作室开展活动。

英国汉学学会还承担汉学研究生网络教学(The China Postgraduate Network,英语简称为 CPN)的工作,为汉学研究生创建一个结构性框架,提供英国国内外有关信息和动态,维护英国研究生数据库,帮助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愿意加入网络的研究生可以用电子邮件或者书面方式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可以通过年刊或者《东亚研究》网址相互交流研究心得,探讨学术问题。目前参加汉学研究生网络的英国大学有阿伯丁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利兹大学、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等。

根据欧洲汉学家学会(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简称 EACS)1986 年印发的会员通讯录,加入该会的会员共 300 人,其中英国会员占 17 人;理事会委员共 23 人,其中英国委员 2 人。

1987 年该会主席为爱丁堡大学的秦乃瑞(John Chinnery),1988 ~ 1989 年由剑桥大学的艾超世接任。学会每年九月利用假日举行三天年会(Annual General Meeting)暨学术研讨会(annual conference),与会会员和来宾宣读论文,举办大学的研究生代表报告自己的专题研究心得,最后由协会领导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通常还安排中国音乐演奏,中国电影的放映或者中国诗词歌舞节目的表演等项活动。以往讨论的选题包括 1793 年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出使中国、中国人的特点、中国文化、中国的科学和艺术等。学会每年出版一期《英国汉学协会会刊》(Bulletin of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内容包括年会报告、入选论文提要、学术动态等。最近几年,英国汉学学会还与英国日本学研究会(British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Studies,简称为 BAJS)和韩国学研究会(British Association of Korean Studies,简称为 BAKS)每 2 ~ 3 年在杜伦大学或者利兹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2005 年英国汉学学会年会于 9 月 15 ~ 16 日在诺丁汉大学汉学研究院召开,主题为《中国文化中的"内"和"外"可移动界限》。

1986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浤源和牛津大学高级讲师伊懋可曾向当时英国汉学协会会员 124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简历，访问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次数与逗留时间，主要著作或译著，教学活动，研究方向，对英国汉学研究的评价。在对回收的 75 份答卷进行分析时他们统计出：英国汉学研究人员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者 23 人，研究中国近代和现代相关学科者 34 人；出版过自然和应用学科汉学专著者 4 人，出版过社会科学汉学专著者 26 人，出版过人文学科汉学专著者 17 人，出版过其他汉学专著者 10 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普遍存在厚古薄今的倾向，原因之一是英国的传统汉学研究与当年传教士的学术路数存在着渊源关系，他们都是通过汉籍学习汉语进而了解中国的，原因之二是参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华人学者多半早年移居海外，对于古籍的熟悉和造诣无不超过对现代文献的熟悉程度。另外，出于外交、贸易、政治和战略方面的考虑，把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与国家、部门和行业利益结合起来，在战后得到的强调超过了英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朱、伊二氏的问卷调查虽然范围不够广泛，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英国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方向转移倾向。在回答有关个人汉学研究的关注对象和资料来源时，29 人说他们把大陆、台湾和香港作为汉学研究的整体对象来对待；28 人说他们把大陆单独作为汉学研究对象，而把台湾和香港单独作为汉学研究对象者人数为零；到大陆访问或参加学术活动的英国汉学研究人员人数和次数最多，其次为香港，第三位为台湾①。

不列颠博物馆

(The British Museum)

不列颠博物馆始建于 1753 年，收藏着 200 万年人类历史中中国、埃及、巴比伦、玛雅、印度、罗马、希腊和英国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史证、民俗作品和音像资料。有史前时期的器皿、价值连城的珠宝、绝无仅有的文物、形形色色的木乃伊、硕儒大家的真迹、名山古刹的东方神像、尘封千年的经书。全馆共有各类展品 700 万余件，每年来此免费参观的游客超过 400 万

① James H. Y. Chu（朱浤源），1986. *Chinese Studies in Britain: A Survey Report on Behavioured and Academic Preferences*，载《社会科学论丛》，第 229 - 255 页。

人次，是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巴黎卢浮宫齐名的一座公众博物馆。它的宗旨是完好保存所有藏品，向世界人民展示世界，通过世界和国家级遗产的陈列，使该馆成为来访人数最多的一座伦敦展馆，从而丰富人们的文化和经济生活。在那儿人们可以看到并体验到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对它进行深入比较，并从中获得知识和乐趣。

该馆的东方艺术馆展品大部分是中国文物，有半坡红陶碗，新石器时期的玉器和器皿，历朝的绘画、雕塑、漆器、弓箭、钱币，敦煌的佛画和经卷。在古代兵器展柜中有错金铭文越王矛、青铜钺、金柄剑、玉剑等。电脑目录显示该馆共收藏中国文物 2.3 万余件。但是由于中国文物和少量日本和韩国文物在一起混合展出，冲淡了主题和分类。

保存在十个库房中的大批中国文物，如商周时期的青铜鼎和甲骨文、汉代玉雕驭龙、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宋代的交子等，大部分都不对参观者开放。

不列颠博物馆有许多经验丰富的文物鉴赏和考古专家，但是由于资金短缺，人员有限，该馆中国文物的管理、修缮、研究、安全和服务尚不到位，因此无法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借展和巡展。与世界各国博物馆开展的交流和合作、学术和人员互访、刊物出版和专题研究与英国的国际地位并不相称，仅有的一些合作项目也是在不列颠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共同名义下进行的。为了筹措资金，博物馆允许出租场馆供个人举办舞会或宴会。2004 年 10 月 29 日在对外开放时间，东方艺术馆失窃公元 700 ~ 1400 年的中国文物 15 件。1990 年港商何鸿卿曾经注资不列颠博物馆 200 万英镑，帮助扩建更新中国展馆。

不列颠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

不列颠图书馆(包括阅览室和书库)原来是不列颠博物馆的一部分，收藏了英国各个历史时期出版的所有书籍、报纸和杂志。1973 年独立另建新馆，与不列颠博物馆的原图书部、专利图书馆(The Patent Office Library)、国家中央图书馆(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国家科学技术借阅馆(The National Lending Librar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英国国家文献馆(The 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和科学技术信息部(The Office for Science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合并，1998 年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不列

颠博物馆中央那座巨大的圆形穹顶阅览室是不列颠图书馆旧馆的标志性结构，今日仍然保留对公众开放。

不列颠图书馆的藏品总数已经超过1亿5千万件，分属400多种语言文字，每年新增3百万件藏品。目前该馆已收藏1600万册图书、期刊和杂志，66万种报纸，3300万件专利申请，30万件手稿，160万件有声及音乐收藏，20万张照片，400万帧舆图，800万枚邮票，26万件印度事务档案记录等。

馆区共有三个部分：图书馆本馆，位于北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西侧；报纸馆（Newspaper Library），位于伦敦北郊的科林代尔路，收藏着各种报纸的原件或缩微复制件，包括汉诺威发行的第一份报纸；英国图书文献供应中心（British Library Document Supply Centre），位于西约克郡波士顿快乐地，始建于1971年，1980年后扩建，占地20公顷，拥有图书400万余册，可以提供24小时之内送达的快速服务。

不列颠图书馆的主体建筑呈梯形，地上9层，地下5层，建筑面积11.26万余平方米。右侧是一个可以容纳200人的会议中心，用于举行各种学术会议和人员培训。大厅正中是问讯处，原国王图书馆的典藏位于最醒目的地方。不列颠图书馆新馆包括人文科学阅览室、自然科学阅览室、善本书阅览室、音乐资料阅览室、东方与印度事务部典藏、地图阅览室和手稿阅览室。目前全馆有工作人员2000多人，设有5700个电脑终端，每周一至周六免费开放，能同时接纳1277名读者，每年可为40至60万人次提供服务。

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和印度事务部的中文藏书5万多册，是世界上收藏敦煌和西域文献最多的地方。斯坦因从1900年至1934年先后5次从我国敦煌掠运的佛经600余卷，绘画500余幅，织绣150余方，印本、写本6500卷，汉魏晋木简、壁图、文物无数，除了当时探险出资方之一的英属印度政府所得外，其余文物分别存放于不列颠图书馆和不列颠博物馆。此外，东方和印度事务部的典藏还包括45卷《永乐大典》；清末至民国三十八年的2500种中国报刊（包括《京报》（1840～1908年）和《察世俗统计传》）；大量有关中英关系之外交、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文件；马礼逊遗赠的中文古籍；戈登及常胜军的资料；近60年来与中国大陆和港台图书交换或采购的书刊等。

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着大量名人名著手稿和珍版、绝版中文图书，对于

英国汉学和国际汉学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马礼逊来华前曾经从不列颠图书馆借阅1700年巴设汉译的圣经,通过抄写和阅读学习中文。1691年根据拉丁文转译成法文再转译成英文的《论语》也存放在不列颠博物馆。清代嘉庆年间印行的《乐府红珊》收录着当时民间流行的折子戏和俗曲,是不列颠图书馆收藏的流散国外的中国古代戏曲选集孤本。1838年郭实腊出版的《万国地理全集》在英国仅存1~2册,也可在不列颠图书目录上找到。该馆还收藏着200多帧刻印和手绘的中国古代地图,弥足珍贵。不列颠图书馆的环境还培养出像翟理斯和翟林奈父子以及韦利那样的汉学家。他们在东方部几十年的翻译、编目和研究工作,为英国构建了国家级的汉学库,体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汉学研究专业化的开端。

同治五年(1866年)张德彝随同赫德游历英国时,曾参观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他发现馆内收藏着汉文、满文、阿文和英法等国文字共80余万卷有关中国的图书,保存在书架或玻璃橱窗内,读者可以随意翻阅或者抄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治七年(1868年)秋,张德彝随蒲安臣率领的清政府使团出访英、美等国。他再次参观了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发现时隔两年该馆又新增许多中国图书,其中还有《大清律》和印度贝叶经。后来张德彝还拜访了馆长德格尔,注意到该馆增添的中国和日本图书中还有一张太平天国的《告示》。

不列颠图书馆经常举办各类中国文物研究专题讲座、中国版画、年画和丝绸之路文物展览。每年年底都邀请一位与该馆典藏有关的目录学专家举办由帕尼齐基金会(The Anthony Panizzi Foundation)资助的讲座。1999年的主讲人是牛津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杜德桥教授,主题为《中世纪中国散失的古籍》(Lost Books in Medieval China)。杜教授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善于运用校勘学、目录学和版本学过滤方法,讲座吸引了近百位英国汉学家、研究人员和海外华人。

最近二十几年,中、英两国研究所、教育界、图书馆和出版部门有过多次愉快的合作。1987年8月,中国社科院敦煌学研究所与不列颠博物馆东方与写本部开始合作拍摄、整理、研究、出版敦煌文献,1995年5月14卷本的《英藏敦煌文献》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沙知应邀前往东方部参与整理斯坦因从1913至1916年间第三次西域探险运走的敦煌文献。文献用汉文、梵文和藏文写成,内容涉

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语言，形式有诏敕、书信、户籍、田簿、医书、读物、符咒，年代横跨魏晋、西夏和至元代。沙知教授与东方部吴芳思主任共同选出其中非佛经部分汉文文书和1500幅图片，联合主编了《斯坦因第三次西域考察所获汉文文献》一书，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02年3月至2003年6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根据不列颠图书馆提供的全套缩微胶卷，对流失国外近百年的4000件黑水城文献进行了整理，完成了英藏、俄藏的初步数字化，并将其成果整理成22卷精装图册出版，为西夏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该馆近年来正在进行善本书的建档，打算与更多国家共同开发研究敦煌和西域文献，利用自己的专利技术对原始文物进行扫描或拍摄，以供国际学术界共享东方文明之成果。

附录三
从事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院校

汉语是外国人研究汉学的首要工具，高校开设汉学课程是英国汉学研究专业化和团队化的开端。如前所述，早在18世纪初英国新教传教士就开始编写汉语教材、汉语语法和汉英辞典等工具书，为的是布道宣教、翻译圣经帮助其他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那些教科书和工具书的内容选择、理论依据和编排体例虽然芜杂肤浅，但是极富原创性，有些即便今天看仍然有价值。例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包括根据《艺文备览》译出的第一部分，以《康熙字典》为蓝本编撰的第二部分，以及收录并对译了大量汉语词组和句型的第三部分，简直就是一本小百科全书。此后威妥玛、艾约瑟、禧在明、麦都思等人在这方面亦有不同的建树，为后人所称道和借鉴。艾约瑟的《汉语口语语法》全书265页，包括语音、词类和句法三大部分，以及有关参考文献、官话资料和南方官话的三则附录，十分完备。他的观点虽然有套用拉丁语法的痕迹，但是已经相当接近现代汉语语法著作，显然融入了作者几十年的心血，难能可贵。不少西方学者、外交人员和传教士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据1999年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简称为HEFCE)出版的《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目前英国共有大学111所，其中英格兰有87所、北爱尔兰有2所、苏格兰有13所、威尔士有9所，再加上学院60所，一共有高等院校171所。直接开设汉语课程的有影响的院校大约有10多所，教授中国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艺术和宗教等相关课程的院校大约有20多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创建于12世纪和13世纪。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

四个全国拨款委员会以及各大学1998年提供的数字，从教学、科研、新生A级率、毕业生优级率、就业率和师生比六项标准来排名，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名列英格兰高校榜首。这两所大学的汉语教学水平很高，但都是在19世纪下半叶才开设汉语专业课程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在教学质量方面排名第七，但是开设汉语课程的历史比牛津大学早50年，比剑桥大学早63年。杜伦大学教学质量排名第八，汉语教学独具特色。爱丁堡大学创建于1583年，历史悠久，虽然开设汉学课程较晚，但是无论汉语教学还是汉学研究方面实力都很雄厚。2003年英国《卫报》根据教育资源、经费来源、入学标准、师生比例、就业趋向、额外加分等六项因素对150所大学进行了10万项计算，在排行榜中的前十名英格兰院校为：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及其亚非学院、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1962年成立，社会学、艺术学、英语和计算机学科突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1907年由皇家科学院、皇家私立学校和城市及行会学院合并而成，机械、采矿、地质、医学和农业专业及科研部门出色）、诺丁汉大学、沃里克大学（Warrick University，1964年成立）、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据2004年《泰晤士报》报业集团对英国各大学进行的调查，前十名的大学为：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沃里克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约克大学、杜伦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卢普区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上述每年由不同机构公布的排行榜，出于不同商业目的或者指导学生入学的动机，调查的标准和方式各异，但是其结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大学的社会知名度和教学质量问题。

现将英国有关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各类学校的主要情况综述如下①：

一、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大学创建于1168年，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该大学包括36

① 本章各大学的情况介绍是根据英国汉学学会1998和2004年度英文系别报告《英国各大学的汉学研究简报》（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in UK Schools）和2005年度《英格兰高教基金会的汉学研究首创性评估》（An Evaluation of HEFCE's Chinese Studies Initiative）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校核编译而成。文中的部分人名为音译。

所学院，目前有学生 14000 多名，其中外国留学生 4300 名，与 80 多个国家建立了学术联系。每个学院都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对学院的本科生课程负责。学院承认、监督、检测所有毕业生相关科目的成绩，经总董事会批准可以聘任教职员，决定有关学术性事务。1997 至 1998 年度全校经费总支出为八亿五千四百万英镑。

牛津大学早期的汉学讲座基金，是由一些对华贸易的英国商人赞助的。1873 年理雅各退休返英后担任了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22 年，他翻译的儒家经典奠定了英国汉学研究的学术基础。1899 年曾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职 28 年的布勒克接任了理雅各的汉学教授职务。第三任汉学教授是苏慧廉，于 1920 年到牛津大学履职。他在中国传教并办学 25 年，曾任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上述三位有英国对华宗教和殖民扩张背景的汉学教授，治学严谨，各有专攻。该校坚持学术独立的传统，考试制度严格，学费昂贵，只有少数学生选修汉学课程，教师主要从事汉学研究工作，这就形成了早期牛津汉学纯学术研究的经院式特点。

1938 年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受聘接替已去世的苏慧廉的汉学教授职务，但是因战乱长期未能到职。1939 年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修中诚对牛津大学汉学教学和研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创办了汉学院（Chinese Honour School），确定四年本科学制，学生通过考试可以获得正式学位。从此牛津大学汉学从经院式研究转为开放式教学，但是惨淡经营十年中仅有五人学成毕业。

陈寅恪到任时已双目失明，不得不于 1947 年请辞回国。1947 至 1959 年间由美籍教授德效骞主持牛津大学汉学院工作。他曾于 1918 年以圣道会（Evangel Mission）传教士身份来华，译有《前汉书·本纪》三卷本，研究范围为中国语言、文学和哲学，热衷于推动中国古典文献的译介。在汉学院任职期间，他相信“读经比学习汉语口语重要”。因为没能维持与波德雷安图书馆的良好关系，便设法得到一笔 8000 镑的拨款自建图书馆，以解决教学和研究中的图书资料问题。

霍克斯于 1960 至 1971 年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他以翻译《楚辞·南方之歌》、《杜诗初阶》和《石头记》（前八十回）享誉翻译界。他任职期间还主编牛津东亚文学丛书，出版了《刘志远诸宫调》、《李贺诗集》、《中国汉魏晋南北朝诗集》、《战国策》、《陶潜诗集》等英文译本，是一位多产

作家。

1972～1988年龙彼得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戏曲和道教，个人收藏大量中国戏曲的珍本和孤本。曾被欧洲科学基金会任命为道藏研究计划指导委员会主席。他对包括南戏在内的中国古代戏曲有深厚的造诣。1988年退休后担任牛津大学名誉教授。

1961年牛津大学成立了东方学院（The Oriental Institute），开展汉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课程设置包括中国、印度、日本、犹太、伊斯兰和韩国等区域学科。汉语本科生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后还可以继续学习中国文学、历史的硕士和博士课程。从英国国内或国外聘任中国文学、历史、宗教学教师，重视吸收美国的汉学研究方法。

长期以来，牛津大学的汉学专业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与该校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中国研究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合作。教师的学术兴趣仍偏重于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忽视对中国政治和经济研究。为了顺应世界学术潮流，本科教学在强调传授传统中国知识的同时，也增加了现代中国知识的内容。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注重与社会史结合；中国史的教学和研究，除了侧重近现代史的内容外，还把学科范围扩大到社会经济史领域。为了突出多样化的学术风格还特别聘任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担任讲师。教学人员的素质较高，不少是西方汉学界的知名学者。

20世纪80年代后期，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成立了现代中国研究所，开展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经济研究。虽然该所尚未列入牛津大学的正式建制，但是已经争取到各项课题基金，与中国有关部委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为中国现代经济管理人才提供培训和进修的机会。这标志着牛津大学的汉学研究已从传统课题扩展到现代中国的内容。1994年，牛津大学决定把东方研究所的中国部分与圣安东尼学院的现代中国研究所合并为汉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腾出牛津大学出版社在沃尔顿街（Waltan Street）的一座小楼作该所办公、教学、科研之用。东方研究所所属的汉学科目全部转入了汉学研究所。

汉学研究所所长由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院士和牛津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院长杜德桥教授担任。他从1965年到牛津大学汉学院任教，1985至1989年出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1989年起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在原来的汉学讲座教师编制中优先安排了中国政治和中国

经济两个讲师教席。

牛津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课程，近现代的内容比重增加。晁时杰(Robert L Chard)博士专攻秦汉史和宗教。科大卫(David W Faure)博士专攻中国近代史，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史。劳拉·纽贝(Laura Newby)博士研究国际关系。刘陶陶博士专攻古代和近代诗歌及20世纪中国文学。

牛津大学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始于70年代初任中国历史讲师的伊懋可。他的代表作《高水准均衡陷阱说》(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一书，探讨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像英国一样在19世纪经济腾飞。1992年接替伊懋可教席的科大卫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对明清以来的华南特别是广东和香港地区的社会经济史有独到研究，搜集了大量族谱、契约、账簿等民间文献。

近年来，牛津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大大超出传统的欧洲汉学的范围。除了文学类和历史类选题仍保留一些原有内容外，如名作家、重大历史时事件、考古、音乐、宗教，现代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类的课题比过去充实，增加了许多与政治现实有关的内容，如：一国两制、香港的社会变动、个人收入与社会财富分配、企业效率、中印关系、朝鲜战争等。

牛津大学本科四年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古现代汉语、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诗歌、中国历史，还可选修中国对外关系、现代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宗教、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日语等。第二学年下学期的学生必须在一所中国大学进修四个月。一年级的预考和四年级的毕业考都是重要考试。每学年初都有一次非正式的考试。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每个学生都由一位导师指导安排学习计划，每周进行一次个人辅导。

20世纪50至80年代，牛津大学的汉学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的就业范围主要是高等教育、图书馆或博物馆的工作，部分任职于英国议会、香港政府、商务或传媒部门。

近年来牛津大学的汉学研究人员加强了和中国学者的联系和交流。教师来中国大陆参加学术会议的人数有所增加，还派博士生到厦门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等处撰写博士论文。从1993年开始，中国学者也被邀请到牛津作访问研究。1994年，由台湾原住民博物馆提供研究基金，牛津大学已将台湾高山族人才列入培养计划。

牛津最早的大学图书馆是13世纪放在圣玛丽教堂书柜里的一批手抄本藏书。1439年牛津大学收到了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捐赠的280册书，其中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等人的作品。1488年牛津大学把神学院加盖的第二层楼辟为新图书馆，并以汉弗莱名字命名。

牛津大学的汉学藏书分散在两处：一是在汉学院图书馆（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Library），规模并不很大，可是比较重要的西文期刊很齐全，它也是牛津大学波德雷安图书总馆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东方学院图书馆，那儿大部分书籍是闭架的，需要从网上办理借阅手续，然后才将读者所要的书送到指定的阅览室。

波德雷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是牛津大学的图书总馆。托马斯·波德雷安（Thomas Bodleian）出生于1545年，在牛津默顿学院担任研究员12年，游历过德、法、意等国。他退休前曾在荷兰担任了8年的英国特使。1598年2月23日，波德雷安写信给牛津大学副校长表示院愿意出资修复旧图书馆并为其配齐图书。牛津大学的评议会一致同意接受他的提案，整修工作于当年开始。1602年11月8日波德雷安图书馆开馆时已有299册手抄本和1700册印刷本。1605年藏书数量已达6000册。

1604年波德雷安图书馆开始收藏中国书籍。坎德伯里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兰德（William Land）曾先后于1635年、1636年、1639年和1640年向该馆捐赠中文抄本1151册。明初航海针路簿传抄本《顺风相送》便是其中之一。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台湾和东南沿海省份、马六甲、印尼等地将大批汉籍运至欧洲，波德雷安便有计划地进行收购。1858年伊文思（Edward Evans，1814～1923，英国传教士，1889年来华，曾在上海虹口开设图书公司）购买的中国古籍和1882年伟亚列力去世前的身边藏书，都转入了波德雷安图书馆，仅有关新教传教的书籍就达2500册。1913年至1922年巴克斯也将个人收藏的4700种、11700卷汉籍捐赠给波德雷安图书馆。1936年苏慧廉去世后牛津大学聘任中国学者向达（Hsiang Ta）帮助筹划扩大汉籍藏书，不久获得一笔600英镑的拨款，用于购买所需图书，弥补了空缺。

东方学院图书馆是在教师私人藏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拥有为汉学科课程所需要的中文图书15000多册，还收藏着3500种9500卷明清古籍，35000种60000多册近代和现代出版物，1100多种杂志，常年订阅500多种期刊。20世纪90年代牛津大学向社会募集资金，香港慈善家认购额超

过一亿镑，指定把其中1000万镑用作汉学研究基金，对于购买图书设备，改善汉学教学和研究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波德雷安图书馆也向该馆调拨了部分图书。

二、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2世纪，圣芳济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先后到剑桥定居。1209年一群学者因对牛津市当局不满逃到剑桥寻求庇护。当时剑桥已有伊里主教休·包沿创立的第一所学院彼得苑(Peter House)。剑桥大学便是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起来的。

剑桥大学共有31个学院，学院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和管理方式与牛津大学基本相同。建于1979年的鲁滨逊学院(Robinson College)是剑桥大学最年轻的"红砖"学院。克莱尔学院(Clare Hall)、达尔文学院(Darwin College)和沃尔夫逊学院(Wolfson College)为研究生院，后者的外国留学生人数几乎占全院学生总数的一半。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建于1352年，是剑桥历史最长规模最小的学院之一。除三个学院只招收女生外，其他都是男女同校、本科生与研究生同校的学院。小型的学院只有200多名学生，大型的学院大约1000人。每个学院都是独立的、自我管理的单元，有自己的收入和财产，自行负责本科生的招生。

剑桥大学的汉学教学和研究始于威妥玛被聘为该校首任无薪汉学教授的1888年。1897年翟理思继任了威氏在剑桥大学的教席，任期长达35年，但立志钻研汉学的学子寥寥，在威妥玛任期内仅有3名，在翟理斯任期的最初两年也只有7名。此后相继接任剑桥大学汉学教席的教授有：第三任慕阿德(任期从1933年至1938年)，第四任哈隆(任期从1938年至1951年)，第五任蒲立本(任期从1953年至1966年)，第六任杜希德(任期从1968年至1981年)，第七任杜德桥(任期从1985年至1988年)，第八任麦大维(任期从1989年起)。

剑桥大学开设汉学讲座的时间比牛津大学晚15年，担任教席的教授资历也不相同，但是对比两校的办学特点和前三任汉学教授的情况，却会发现许多共同之处。威妥玛、翟理斯、慕阿德与理雅各、布勒克、苏慧廉都是具有英国宗教和殖民扩张时代背景的人物。他们没有教学经验，但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修养高，善于思考和钻研问题，因此开课后书斋教授忙碌，

课堂学子冷清。前三任德高望重，或者著作等身，都享有“终生教授”的荣誉。在门槛高学费贵的牛津和剑桥，学子们视并不十分了解的汉学专业为畏途，这是预料之中的事。英国是一个规章制度严格的国家，剑桥大学董事会对于汉学讲座教授资格的规定并不宽松，当年除了威妥玛等学者，别人是很难前往应聘的。

哈隆与前三任汉学教授在学术上和思想上有很大不同。他的研究领域宽，知识面广。他专攻汉学、日本学、古代史和宗教史，对于先秦诸子百家、甲骨文、训诂学和音韵学都有深入研究。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图书资料建设和汉学人才的培养。

蒲立本长期致力于中国史学研究，后来也研究汉语历史语言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有影响的著作有《中国史和世界史》和《安禄山的叛乱背景》。杜希德专攻中国隋唐史和隋唐史学史，曾参与大型史书《剑桥中国史》的系列编写工作。杜德桥主攻中国古典文学、宗教和神话，力图把古典文学和神话与民俗、宗教、历史结合起来考察，通过文学看社会，也通过社会看文学。麦大维师承蒲立本，继承了剑桥汉学的唐代历史研究传统，为汉学数据研究服务中心编写《汉学文献索引》，受到了汉学界的欢迎。这几位汉学教授，除了在学科研究中有突出建树外，对于研究方法和学科建设也有许多新见解新思维。剑桥大学汉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他们任职期间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过去重视古文教学和古典文献的研究，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与阅读水平普遍差异较大，现代汉语、现代文学、现代历史以及相邻学科的教学和沟通滞后。教学方法偏重于经院式的讲解和导师制，研究方法侧重于微观汉学模式。近年来现代学科和相邻学科的内容相继进入新编教材和讲座，商业运作、经济管理、国际政治、人力资源、人文地理和大众传媒等涉科内容在教学、科研和研究生论文选题中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剑桥大学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正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

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是一个开放型的教学和研究单位，也是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共设近东、东亚、伊斯兰和印度四个系。东亚系由汉学专业和日本学专业所组成。汉学专业本科生学制为四年。一、二年级的学生要学习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文化史，一至二门与所选专业有关的外语。三年级的学生还必须选修法律和人类学课程，到北京、上海或者台北实习一个学期。四年级学生期末考试及格后须提交

一篇一万字左右的论文,通过后方可授予学位证书。研究生院只招收博士研究生。东方研究院组织并协调东方国家的语言、历史、资料文献、社会科学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鼓励在剑桥大学内部和其他大学之间就相关研究问题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和交流。

剑桥大学图书馆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目前藏书600余万册。十万种中文图书原来分藏三处:大学图书馆(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的东亚阅览室;东方研究院图书馆;李约瑟研究所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East Asia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但是上世纪末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已经独立建馆。

1632年,白金汉公爵向该馆赠送一批书籍,其中有明版的《丹溪心法》,为该馆收藏的第一册中文书。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曾向该馆捐赠了4304册中文书籍。威氏曾在中国居住长达40年之久,收藏的不仅有许多参考书,还有大量有关清朝政治、法律、外交和礼仪等方面的文献,其中不乏善本与孤本,如清初抄本《明实录》、清抄本满文《养正图解》、明刊孤本《异域图志》以及太平天国出版物等。后来巴克斯又捐赠了1300多册中文书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馆中文藏书迅速增加。其中有骆任廷、阿拉巴德、慕阿德和哈隆等人捐赠的书籍。该馆还藏有全套《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三千种,并有大英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中文文书的全套微型胶卷。金璋原是英国外交官,1874年来华,先后担任过英国驻沪领事馆副领事、烟台领事和天津总领事,公务之暇喜欢研究甲骨文和古钱币。1952年他将珍藏的甲骨800余片捐赠给剑桥大学。该馆还藏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5,000册,原为清皇帝德宗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赠给伦敦中国协会的礼物。此外还有《永乐大典》原稿二册。美国东方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幼年时在英国受过教育,1963年在利兹大学担任过汉学教授。据说他的部分蒙文藏书也存入了该馆。

哈隆教授主张通过认真阅读古籍进行汉学研究,1939年他为该馆制定了一个扩大汉学藏书的计划,目的是推动图书馆汉籍的收藏,使剑桥大学的汉学研究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的计划不得不推迟实施。1949年哈隆用英国政府特批款项在华购买了中文书籍10000余册。该馆还通过李约瑟博士收到中国大量赠书。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赠送该馆图书达4468册之多。1988年台湾国立故宫博

物院赠送该馆《景印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一套，共500册。

该馆专用的中文书籍分类法由哈隆和龙彼德两位教授所制定。按照他们的方针，该馆不断向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购进新书。在该馆的中文藏书中，有关中国文化、历史、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数量最多。近年来他们更注意搜集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资料。目前该馆还订有中文期刊约一千种。

过去该馆中文目录分书名卡和作者卡两种，按威妥玛－翟理思制定的汉语罗马字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馆内使用。用威妥玛－翟理斯拼法转写的中文书名和期刊名已分别输入馆内电脑总目和电脑期刊总目，为的是实现中文书目和汉字数据的全部数字化。

三、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

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简称SOAS）是东方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心，是英国最早设置汉语和中国文化讲座的一所学院。1817年小斯当东回国后非常关注与中国有关的事情。1828年马礼逊带着15000册中国书籍回国述职，1834年病逝于澳门，留下遗嘱要在伦敦创建一所汉语学院，并请小斯当东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大约在1837年小斯当东与非教派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达成协议，创办为期五年的汉学讲座，聘请从马六甲英华书院病退回国的传教士基德为首任教授，并将马氏的汉籍捐赠给该校图书馆，以表支持。1843年基德去世，讲座一度中断。小斯当东又向对华派遣传教士的新教教会和一些鸦片商募集资金，1846年汉学讲座在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重开，支持者多半为虔诚的教徒，希望加强新教在东亚的影响。第一任教授是费伦（J. Fearon），1904年后由禧在明继任。任职于不列颠博物馆的道格思也曾兼任国王学院汉学教授，作过题为《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系列讲座，出版了讲义。从1914年到1925年伦敦的汉学教授席位一直空缺，但当时总的形势是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英国人数与日俱增，开展汉语教学并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华文化的热潮已势在必行。鉴于中英关系的发展，要求大学学院恢复汉学讲座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1861年终于复课。然而好景不长，1862年再次中断，直到1873年才恢复，毕尔牧师从1877年至1889年在该院任教。经过若干年运作总结经验之后，伦敦的亚

非语言课程进行了调整:印度学的课程由大学学院承担,汉学、日本学和朝鲜学等课程由国王学院负责。1909 年雷伊委员会(The Reay Committee)[①]在向英国政府财政部的报告中提出了调整东方学研究建制的意见,1916 年东方研究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正式创立,1938 年改名为"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中文名称通常被简化为"亚非学院")。庄士敦 1932 ~ 1939 年被聘为伦敦大学汉语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规模和人员编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根据《斯卡伯勒报告》(Scarborough Report)[②]的建议,增设中国哲学、法律、艺术和考古学的讲师教席,为佛教经典和现代小说专业的创建创造了条件。

亚非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远东系(Department of the Far East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早在 1825 年就开始教授汉语,是一所最早开设汉学课程的英国学院。毕尔、庄士敦和西蒙(Ernst Julius Walter Simon, 1893 ~ 1981)先后应聘在该系担任汉学教授。1924 年至 1930 年老舍(1899 ~ 1966)应聘在该系教授现代汉语,曾编写过一本口语教材并制作过唱片。90 年代该系规模已经扩大,在英国乃至欧洲汉学界声誉日增。目前已有专职教学和研究人员 10 余人,包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卜立得(D. Pollard,后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巴雷特,研究现代汉语(普通话与粤语)和社会学的系主任兼专业主任贝克教授(H. Baker),研究语言学、哲学和汉字电脑输入的汤普森(P. Thompson)、研究现代汉语的佟秉正,研究古汉字和先秦文学的艾伦(S. Allan),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王次澄(Wang Tzi-cheng),研究 20 世纪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批评的赵亨利(Henry Zhao),研究中国古典语言和哲学的傅熊(Bernhard Fuehrer),研究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学的贺麦晓(Michel Hockx)。此外还有兼职教职员若干人。

---

① 雷伊委员会:20 世纪初伦敦的亚非语言教学不如在欧洲其他国家首都受到重视。1908 年雷伊委员会在一份报告(the Report of Lord Reay's Committee)中建议把英国的亚非语言教学集中到伦敦大学,把专业扩大到亚非历史、地理、文化、法律和文学范围,并创建一个图书总馆。于是 1913 年成立了管理委员会,1916 年亚非学院被授予特许状开始招生。

② 斯卡伯勒报告:1945 年由斯卡伯勒伯爵(Earl Scarborough)主持的一份关于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部门之间专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为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倡议英国人学习亚非和东欧语言,主张加强对亚非和东欧的研究。

亚非学院凭借其高质量的课程、教学与研究成果，在全球相关学术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声誉。目前该学院设置包括法律系、音乐系、政治系、宗教系、经济系、地理系、历史系、语言学系、发展研究系、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艺术与考古学系、非洲语言文化系、东亚语言文化系、近东与中东语言文化系、东南亚语言文化系等。系以下再按照专业划分。东亚系有中文、日文和韩文三个专业，其中中文为大专业，有可能将其中藏文分出，单独成立专业。20 世纪 40 年代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必须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进行选择，后来实行两者结合的单一课程，不学习汉语的学生也可以撰写中国历史的学位论文，近年来还实行汉语与其他专业结合的双科学位制度。

伦敦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The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英文简称 CCI）利用 1967 年福特基金会捐赠的 325000 美元于 1968 年正式建立，宗旨为推动对现代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出版有关研究著作，向国内外读者提供现代中国信息。目前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包括大陆和港澳台）问题并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利弗休姆托拉斯（Leverhulme Trust）曾资助该所一项 1992 ~ 1995 年《中国经济和法律辞典》的编写计划，主要撰稿人由中国的学者担任，辅助研究工作和后期编辑在英国完成。福建籍的外贸博士罗齐（Luo Qi）和中国法律律师罗布女士（Micke de Vries Robbe）担任该项目的专职研究助理，协调日常事务。这几年该所已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学者进行了多项学术交流。

《现代中国研究》（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现代中国研究所编辑的两个刊物之一，栏目包括“外交政策”、“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学习和研究札记》（Research Notes and Studies）是现代中国研究所的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主要刊登一些编余文稿。《亚非学院学报》（英文原文为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940 年后改名为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是发表学院教师论文的专门刊物，从 1917 年起由伦敦大学的阿斯隆出版社（Athlone Press）出版。

伦敦大学汉学研究中心（Centre of Chinese Studies）成立于 1992 年，宗旨为协调并促进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学术活动。该中心得益于包括现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编辑部、珀西瓦尔·戴维基金会（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中国古代史研讨班

(the Early China Seminar)在内的亚非学院汉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开展各项活动。该中心是一个跨学科单位,成员的研究广泛涉及中国的历史和当代领域,所吸纳的兼职研究员来自于伦敦大学其他部门、英国广播公司(BBC)、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不列颠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和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媒体单位和其他研究所。此外,该中心还跟英国外交部、各级政府部门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建立了广泛联系。经常性的活动有年度公开讲座、每周为本学院师生举办的跨学科研讨会、每月举办的三次例行研讨会、与外交部合办的年度工作室、为英国各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举办的年度周末阅读活动。该中心还开办以中国社会团体为课题的研究生班,并负责授予区域专业研究汉学硕士的学位。1996 年该中心的主任为伊丽莎白·克罗尔博士(Dr. Elisabeth J. Croll)。

亚非学院图书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有中文藏书 10 万多册,期刊 500 多种,缩微胶卷 3000 多个,是为该学院师生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一个机构。中文古籍和现代书刊的主要来源,一是马礼逊遗赠的 15000 册汉籍;二是原驻华公使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 ~ 1925)用安德森(F. Anderson)捐赠的 10000 两白银从中国购得的 12,500 册书籍(朱氏 1876 年来华,汉文通事出身,是任期最长的一位英国驻华公使,对于汉籍的选购颇具目光);三是溥仪的太傅庄士敦遗赠的 16000 册汉籍(包括胡适和徐志摩等人给庄氏的签名赠本);四是西蒙在 40 年代末用亚洲福特财团基金在北京、香港、东京等地购得的图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藏书还包括 1997 年香港政府赠送的 800 多册书刊和 228000 余页的剪报资料微缩胶卷、5000 多册日本汉学书籍、2000 多幅战前中国地图、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地方报纸的缩印本、西方传教士档案、商会文书、根据旧唱片和字典的随赠文本复制的珍稀语言资料和语法著作。1991 年不列颠博物馆曾与亚非学院联合举办中国敦煌藏经洞文物展,其中一些木简、壁图和经卷是斯坦因从敦煌千佛洞运走的,据说部分文献已纳入亚非学院图书馆收藏。

四、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

杜伦大学创建于 1832 年,由 12 个学院和 2 个社团合并而成,是英格兰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该大学现有 14 个校区,近几年约有本科生 7800 人,全日制研究生 1000 多名,在职研究生 1500 多名,留学生 900 多名。开

设模块单元式学位课程的专业有:应用心理学、微生物医学、商业金融和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技术、语言与社会科学和艺术等方面均有出色的科研成果。

1952年斯波尔丁托管基金创始人斯波尔丁博士(Dr. H. N. Spalding)赞助在杜伦大学人文系设立汉学研究专业,道森被聘任为汉语教师兼古尔本基考古艺术博物馆(后改名为"东方博物馆")馆长。后来进一步扩大,成为拥有一位教授、六名全职教师和数名兼职教师的专业。1970年后中国人也直接加盟了教师行列。该校其他系也为国际关系和音乐等学科提供汉学专业教育,具体表现在从1976年至1982年的东方音乐节的连续举办方面。1989年该校创建了东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打算从机构和实践上尽可能把汉学研究跟日本学研究结合起来。

该系本科生的课程设计力图展示中华文明的概貌,因此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教学都纳入其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现代汉语有所侧重,古汉语不再成为必修课。从1962年开始授予汉语学士学位,然后依次增加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授予。汉语与其他学科(如管理研究)结合的双科学位的授予始于1987年。东亚研究系与该校的商学院联系密切。20世纪80年代末在该系任教的有著名翻译家和汉语史专家巴恩斯(A. C. Barnes)、研究中国史和音乐的普拉特(K. Pratt)、研究晚清史和思想史的斯塔尔(J. Starr)等人。

1983年该校与中国人民大学开始学生和教师的交换,此后与日本数所大学也签署了交流协议。

多年来东方博物馆先后收藏了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和亨利·德拉兹罗(Henry de Lazlo)等人的书籍和物品。杜伦大学图书馆是英国六大世界图书馆之一,曾收购耶茨(W. P. Yetts)、克鲁克(A. N. Crook)和韦利的部分藏书。目前由查尔博士(Dr. S. V. R. Char)负责,藏书量多达100多万册,期刊2500多种,此外还有网上科研实验设备。由柯曾出版社出版的《杜伦东亚系列》辑录了东亚研究系的各类资料,《杜伦东亚论文集》则属于系内刊物。

2003年6月杜伦大学校方宣布打算取消东亚研究系建制,这意味着杜伦大学半个多世纪的东亚语言教学历史将要结束。东亚研究系曾经多

次跟大学行政当局进行磋商,表示坚决反对校方的决定。他们收到了世界各地个人和机构(包括知名学者、外交官、英国汉学学会和东亚研究单位)寄来的声援函电和抗议信700多件,但是校方仍坚持原来意见,只是把取消时间延至2007年6月。校方声称取消建制的理由是东亚语言研究人才在英国不很需要,但实际上申请到该系就读的人数从2000至2001年度的296人已经上升到2002至2003年度的345人。2002年10月东方语言专业招生48名(比前一年增加4名),其中学习汉语者23名,全系共有汉语学生80名。2003年10月学习汉语新生增至55名。2004年该系7名汉学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分别为:中国的穆斯林、当代中国文学、媒体和电视、国际关系、传统绘画、台湾在大陆的投资、第二代合资企业等。2004年该校的当代中国研究将并入政治系。2004年1月9日至10日英国汉学学会在杜伦大学召开了年会,与会者非常踊跃,表明该系在英国学术界的知名度很高。

五、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

爱丁堡大学创建于1583年,是与牛津、剑桥齐名的大学之一。大学分旧校区和新校区两部分。目前全校分设科学与工程学院、社会科学院、法学院、人文学院、音乐学院、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等八个学院,教学和究研人员约3000人,学生总数17000人,其中16%为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人文学院开设的课程有语言学、历史学、欧洲文化和哲学等。虽然该校课程专业设置齐全,但是仍鼓励有能力的学生跨学科学习,成绩合格者可被授予联合学位,外延式课程的学生可以在国外学习一年非学位课程。

1965年该校在人文学院内成立了中文系,院长为秦乃瑞博士。1988年中文系改名为东亚研究系,麦克杜格尔任教授,但是该教席于1990年才正式设置。1993年聘任了一位外语助理,从1992年到1995年利用蒋经国基金还设置了古汉语教席。本科四年专业设置了初级、中级和高级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课程,辅之以中国古代哲学、戏剧、小说和诗词。要求四年制本科生在东亚国家学习一年。研究生的课程有:一年制面授或研究型的理学硕士、两年制的研究文学硕士、三年或四年制的现代中国文学博士侧重于面授和研究(这也是二年制学位课程的特色):学习原文,

或者通过英文翻译帮助各专业学生学习入门课程，通过一年中级课程对学生进行研究训练。大部分研究生学习中国现代文学，也有部分学生学习台湾文学。东亚研究系与校内其他系，特别是美术系、经济系、社会人类学系和历史系，专业联系密切。一、二年级东亚文明（汉语和日语课程）面向各学院学生，就读人数每年近百人。目前该校已经加入苏格兰中国研究网络（SINO - CS）。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尔比博士（Dr. A. W. E. Dolby）负责中国戏剧、文学和汉语教学，斯科特（J. H. J. Scott）负责中国文学和汉语教学，刘博士（Dr. W. Liu）负责该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的管理工作。

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的规模堪称苏格兰之最，藏书总计将近达 250 万册。其中东亚藏书 30000 多册，部分来自中国教育部和台湾机构的捐赠，影印本《四部丛刊》等文集尤为珍贵，可以满足本科生在学习文言和现代汉语以及研究方面的需要。

六、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

利兹大学是正式开设汉学课程的第五所英国大学，欧文·拉铁摩尔自 1963 年起在该校任汉学教授。根据《海特报告》（the Hayter Report）[①]的建议，利兹大学在东亚研究学院艺术系内设立了汉学研究专业，一开始就把四年学士课程中的现代汉语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或历史学等）结合起来。20 世纪 80 年代又进一步扩展为与日语结合的双学科学位。由于欧文·拉铁摩尔和吾尔根奇·奥浓（Urgunge Onon）的努力，蒙古语和蒙学研究也被纳入了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的选修课范围。该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学校安排所有学生到北京、上海、天津或者台北学习一年。

专业创办时仅有四名教员，现在拥有九名正式汉语专业教师，包括三

① 海特报告：1961 年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庚款委员会）下属分会有关东方、斯拉夫、东欧和非洲研究的报告。该报告由威廉·海特爵士（Sir William Hayter）主持，发表后推动了英国各大学的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例如 1961 年开始出版《中国季刊》，1968 年在牛津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以及 1980 年在女王伊丽莎白大厦分别设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The Contemporary China Centre），增设与汉学研究有关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席等举措。

名中国人。其中一个教席是根据《帕克报告》(the Parker Report)[1]的建议设立的。该校汉学和东亚研究图书的收藏始于1963年,部分图书来自原皇家亚洲学会和欧文·拉铁摩尔的收藏。20世纪60年代福特基金会曾向该校图书馆捐赠50000美元用于购买中文图书。

根据《海特报告》的建议,汉学专家的教席设置于亚洲研究系,但同时兼顾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地理学系、历史学系和商贸学院,并与大学的开发研究中心、国际研究中心、性别研究中心保持密切联系。许多教师个人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昆明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一些中国省级社会科学院等教学和科研机构,经常进行交流合作。亚洲研究系曾经以《利兹大学东亚研究论文集》(Leeds East Asian Research Papers)和《汉学界》(Chinese World)为书名编辑发表许多论文,均由柯曾出版社出版。

20世纪80年代末在汉学系任教的有:专攻方言和语言学的唐纳教授(Professor G. Downer)、专攻现代史的胡克(B. G. Hook)和詹纳博士(Dr. W. J. F. Jenner)、专攻文学和戏剧的里明顿(D. Rimington)、专攻现代史和政治学的伯顿(C. Berton)、专攻汉语语法和中国文学的莱弗里(M. Lavery)等。

七、威斯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前身是中伦敦百科大学(The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正式成立于1970年,但是其摄政王大街309号的理工学院早在1838年就建立了。该校40%的学生学习理工、通讯和环保专业,60%的学生学习语言、法律、社会科学和商业管理专业。根据英国新的教育政策,该校1992年并入威斯敏斯特大学。

并入前的现代语言学院于1974年开始设立汉语专业,但是其夜校汉语班在此前已开办了10年。20世纪90年代初该学院有汉语专业本科学

---

① 帕克报告:1986年彼得·帕克爵士(Sir Peter Parker)在题为《为未来呐喊》(Speaking for the Future)的报告中,谈到了在此之前15年英国人越来越不重视学习亚洲和非洲等非西方语言,不对这些地区进行研究,因而"英国的国力大范围地快速地被削弱"。为制止这一倾向的发展,有必要采取特别措施,在大学继续开设非欧洲的语言和文化课程,加强区域研究,以确保外交和商贸的需要。

生四个年级五个班60多名，业余班学生40多名，夜校普通话班学生约180人，广东话班学生约70名。本科生第一学年开学前须参加为时3周每天6小时的强化课程学习，开学后每周学习现代汉语8学时（其中语音、语法、汉字、认读5学时，口语1学时），背景知识2学时以及其他基础课程。二年级本科生每周安排汉语必修课6学时（包括基础汉语2学时，听力、作文、口语和翻译各1学时），选修课（文学和语言学）2至3学时，另外还须学习一门与所修专业有关的第二外语。第三年到中国大学学习。第四年安排必修课（包括口语、英译汉、汉译英、作文和口译）每周7学时，选修课（包括文选、中国作家及作品、中国外交政策、翻译理论）每周5学时，专题讨论每周2学时。毕业考试成绩及格后学生必须提交一篇约8,000字左右的论文，答辩通过后授予学士学位证书。

该学院教学要求严格，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毕业生优等率高，因此在伦敦地区具有较强竞争力。汉语专业有专职教师2至5名，兼职教师7至8名。20世纪70年代该院院长为白以安（Derek Bryan），80年代由著名翻译理论家牛马克教授（Peter Newmark）和史密斯（John Smith）继任。在该院任教的高级讲师有廖鸿英、史爱理（Elizabeth Clare Scurfield）、吉廷斯（John Gittings，后在《卫报》任职）、爱华（Harriet Evans），此外还有中国教师和兼职教师8至10名。

八、设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

1993年汉学专业罗伯特·泰勒博士（Dr. Robert Taylor）受聘于设菲尔德大学，1996年为补充并扩大日语和韩语研究实力，加强东亚研究学院（School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教学和研究范围，决定在社科系（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建立汉学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目前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教师8名。自1996年以来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为该校提供一名现代汉语副研究员的薪金，1998年一位中国音乐专业教师加盟于该校音乐系。中心主要研究并教授历史和社会科学课程。1994年以后要求东亚专业本科生关注中国，但是不要求掌握汉语。汉学优等生学位课程自1996年起开始设置，授课内容包括汉语、历史（以现代史为主）、经济学和政治学，与此同时也设立汉学和商学学士课程。东亚商学硕士课程要求学生学习汉语或日语。从1994年起设立博士学位专业。

东亚研究院与东亚贸易服务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与设菲尔德大学管理学院的本科和面授研究生课程相互合作。

大学图书馆的汉语课程指定阅读图书得到了一些个人捐赠，大学中国委员会和我国教育部也予以支持。中国专家对于东亚研究学院和设菲尔德学术出版社与劳特利奇（伦敦）合办的两个系列出版物投稿踊跃。汉学研究中心与南京大学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主要任课教师有希拉里·钟（Hilary Chung）、马乔里·德赖伯格（Marjorie Dryburgh）、罗伯特·泰勒。2003～2004年度该校已招收汉语本科生（含两个年级）、双科本科生、汉语和商学专业生各6人。

九、纽斯卡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这几年纽斯卡尔大学的汉学研究不断得到发展，在该校现代语言学院（School of Modern Languages）任职的有五名教师和数名教学助理。历史研究学院（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在一位专家指导下开展有关中华帝国和东南亚研究，招生情况不错。2003年30多名本科生在现代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其中一些也学习汉学和文化学位课程，还有大约40名本科生攻读口笔译硕士研究生课程。研究生第一阶段可以选修综合博士课程，还有几名学生攻读普通汉英翻译博士研究生课程。冯东宁博士教的中国电影扩展了现代语言学院已有的电影研究课程的内容。该校的东亚研究系已并入了现代语言学院，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都选修东亚语言。

纽斯卡尔大学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新近建立了非正式的亚洲学者论坛（forum of Asianists），目的是团结从事亚洲（包括中东）各类学科研究或者关心亚洲的学者，建立与诺森布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umbria）和杜伦大学之间的联系，提升亚洲研究在东北亚整体研究中的形象，此外还计划举办亚洲系列研讨会。论坛的协调人为汉语讲师乔安妮·史密斯（Joanne N. Smith）。近年纽斯卡尔大学成立的通俗音乐研究组（Popular Music Research Group）将出版由乔安妮·史密斯编写的有关维吾尔通俗音乐的第一章《音乐、民族特征和地区政治：世界和区域之间》。该研究组把研究焦点定位于“传统通俗音乐”、“世界通俗音乐”、“西方流行歌曲及其实践性与学术性的结合”，因而广为人知。纽斯卡尔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马丁·路德大学的一些学者打算联合筹办以《在中国与中亚之间的维

吾尔族》为题的跨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

十、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诺丁汉大学创建于1881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一座多元文化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目前该校设有59个系,分属于工程学院、法律与社会学院、教育学院、科学院、农业与食品学院、医疗保健学院和艺术学院等七个学院。目前,在校研究生有4000人,本科生18000人,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有1800人。

进入21世纪后,英国和世界人民越来越看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重要作用。为适应这一形势发展,诺丁汉大学在校园主区的中华楼内设立了当代汉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以便就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的重要方面组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课题包括城市和区域的发展、中国贸易与国际化、国企改革、媒体、通俗文化与社会、农村地区性别状况的变化、中国的环境和环境管理等。当代汉学研究院被公认为英国开设汉学学位课程的领先学科研究机构。该院与中国高校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进行了广泛协作,还在宁波建立了分校。

除了汉语课程外,该院还开设了与中国和欧洲研究相结合的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和管理学学位课程,以及供本科生、研究生、跨校跨专业学生选修的汉学课程。在现代欧洲和中国研究中增加了四年制本科学位课程。现有90名本科生学习双科学位或者其他相关学位课程。第一批现代中国研究毕业生14名,报名学习汉学和各类其他课程的学生已经超过1000人。

诺丁汉大学还建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China Policy Institute),目的是为增加对中国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认识和了解。

诺丁汉大学拥有7个图书馆,各种专业藏书丰富。

十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ilitical Science)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文简称为LSE)创建于1895年,办学及研究思

想兼顾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派观点，中国一些学者式的官员和严肃的社会学家和学者，如费孝通、徐志摩、金岳霖、张奚若、陈源、萧乾等人，都曾经在那里深造过。该校的工商管理、人力资源、金融经济、人权研究、国际法律、劳工关系等专业都有较强实力。2000年以来前往该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多数攻读金融与财会专业。

该校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范畴和学术活动都是跨部门的，目的是鼓励和协调亚洲研究中不同社会学科研究之间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被纳入了教学和研究中的选题范围。该校开设的汉语课是其“现代外语证书课程计划”(Modern Foreign Language Certificate Courseprogramme)中的一部分。用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编选的网址可以找到有关中文报刊、多媒体和文化网站。学生通过英国广播公司链接也可以找到多家中文新闻网页或者有关网络汉语课程。

十二、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

格拉斯哥大学创建于1451年，目前有学生17000多名，其中12%的留学生来自于80多个国家。全校共设100多个系，分属于文学院、工学院、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医学院、法律与金融学院、兽医学院和神学院，是英国最大的研究教学基地之一。

格拉斯哥大学的汉学研究硕士学位课程(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由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联合开设。要求申请人已以优秀成绩获得学士学位或者在被承认的院校获得同等资格。研究生须完成24个月的全日制课程(其中第一年年底或第二年年初起在中国学习或做相关工作半年)。第一学年的主干课程为汉语、中国社会和文化、当代中国政治、中国国际经济、中国贸易环境。第二学年的选修课为大中国(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政治经济，变革中的中国贸易环境，中国企业管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艺术收藏和品味变化模式、中国宋代艺术。必修课为高级汉语。考核方式：参加汉语口语和书面语考试，第一学年的每门主干课须完成一篇3000字的书面作业，两门修选课各完成一篇4000字的书面作业。最后提交一篇15000字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方可授予汉学研究硕士学位。

十三、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Wales）

1997 年威尔士大学汉学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成立后开始了汉学教学和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化、历史、传媒、影视、哲学、宗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该中心还与中国有关高校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1998 年由副校长率领的威尔士大学代表团曾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云南民族学院签订了学术交流协议，先后接待了数批中国高校代表团，邀请了十几位中国资深学者前往该校开展专题研究。

从 1997 年至 2000 年欧中高教合作委员会资助该中心接待三位欧洲学者，并扩大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各大学的合作。目前威尔士大学从事汉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有正式讲师三人，兼职讲师四人，先后开办了数批汉学研究班，并将继续邀请知名学者就中国商业管理、影视、媒体、文化、文学、历史、宗教和哲学等专题开设系列讲座。

十四、兰卡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

兰卡斯特大学及其所属的管理学院（the Management School）和中国管理研究中心（The Lancaster Centre for Management in China），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在学术研究、项目开发和教学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该校与英国的文化委员会、外贸部和中国管理科学学会（the China Management Science Society）等机构也保持着密切的业务联系。

兰卡斯特中国管理中心创建于 2001 年，由退休教授阿拉斯代尔·麦克宾（Alasdair MacBean）担任指导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由管理学院和其他科系代表、有中国工作经验的学者及中英贸易协会总裁等人组成。中心的宗旨是为了协调管理学院的各项活动，加强中英双方的研究和合作，如：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国际学术会议的安排，以及管理人员的培训。

2003 年 4 月，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苏·考克斯（Sue Cox）教授被中国管理科学学会聘任为荣誉研究员，成为该学会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外国人。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的副主席陈志诚教授也被兰卡斯特大学的中国管理研究中心授予了“荣誉研究员”称号。双方的聘任表明兰卡斯特大学

的管理学院和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相互得到了对方权威部门的承认，为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十五、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Schools of Chinese)

目前英国开设汉语课程的学校有：约克郡的安普尔福斯学院(Ampleforth College)、布赖顿学院(Brighton College)、汉普郡的巴顿·佩弗里尔学院(Barton Peveril College)、伯克郡的东汉斯特德园区学校(Easthampstead Park School)、萨里郡的查特豪斯学校(Charterhouse School)、肯特郡的查塔姆语法女校(Chatham Grammar School for Girls)、牛津的黑丁顿学校(Headington School)、牛津郡的约翰·梅森学校(John Mason School)、萨塞克斯的小汉普敦学校(The Littlehampton School)、莱斯特的上拉特沃斯学校(Lutterworth Upper School)等。

以上列举的仅是英格兰地区部分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的学校，多数为普通证书水平("O" level)，也有一些达到了甲级证书水平("A" level)，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资料不详。这些学校是造就英国未来新型汉学家的摇篮，但是目前主要靠地方教育部门的财政支持，教学上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规划。

参考文献

1. 杨真:《基督教史纲》(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3. 王绳祖编:《中英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5. 于语和、廋良辰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6. 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7. 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8.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9. 马祖毅:《中国翻译史》(上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1. 王之春著,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2. 爱尼斯·安德逊著,费振东译:《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年。

13. 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刘林海译:《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14. M. G. 马森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

15. 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6. 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年。

17. 潘玉田、陈水刚:《中西文献交流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

18. 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

19.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

20.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21. 王戎生主编:《清代全史》第二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2. 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五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3. 喻青松、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第六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4. 杨国伦著,刘存宽、张俊义译:《英国对华政策》(1895 ~ 190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25. 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年。

26. 魏千志:《明清史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27. 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28. 哈克尼著,朱杰勤译:《西洋美术所受中国之影响》,载《中外关系译丛》,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年。

29. 赫得森著,朱杰勤译:《罗柯柯作风》,载《中外关系译丛》,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年。

30. 邓嗣禹著,李明欢译:《中国科举制在西方的影响》,载《中外关系译丛》,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年。

31. 熊文华:《英国的汉学研究》,载《汉学研究》第五辑,阎纯德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

32. 熊文华:《伟烈亚力及其〈中国之研究〉》,载《汉学研究》第六辑,阎纯德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33. 熊文华:《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载《汉学研究》第七辑,阎纯德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

34. 熊文华:《英国科技翻译家傅兰雅》,载《汉学研究》第八辑,阎纯德

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5. 熊文华:《理雅各的世俗之路》,载《汉学研究》第九辑,阎纯德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36. 近藤一成著,王瑞来译:《英国的中国学》(上、下),载《汉学研究通讯》总 47 ~ 48 期,1993 年。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年。

38. 费赖之著,冯承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39. 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

40. S Well Williams, 1913. *The Middle Kingdom*, Vol I & I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41. D. C. Browning, 1969. *Everyman's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London: Pan Books LTD.

42. A. C. Ward, 1975. *Longman Companion to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Second Edition,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43. T. H. Barret, 1985. *Singular Listlessness—Som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打印稿).

44. James H. Y. Chu (朱浤源), 1986. *Chinese Studies in Britain: A Survey Report on Behavioural and Academic Preferences*, 载《社会科学论丛》,第 229 ~ 255 页. 中文译稿题为《英国的中国通:量的观察》,分载 1986 ~ 1987《近代中国史研究》.

45. W. C. Costin, 1937.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833 ~ 18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6. S. Adshead, 1988. *China in World Histor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47. Colin Mackerras, 1989.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48. Alexander Wylie, 1897. *Chinese Researches*, Shanghai.

汉英人名对照表

中文名	英文名及生卒年份
阿贝,简	Jane Abbay
阿尔更斯	Marquis d'Argens, 1704 ~ 1771
阿尔瓦雷斯	Jrge Alvares
阿方萨斯,米歇尔	Michael Alphonsus (沈福宗教名)
阿礼国	Rutherford Alcock, 1809 ~ 1897
阿美士德	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 ~ 1857
阿姆斯特朗,伊丽莎白	Elizabeth Armstrong
埃德	M. Hedde
埃丁顿	Eddington, 1882 ~ 1944
埃尔芬斯通	Elphinstone
埃利奥特,托马斯·斯特恩斯	T. Stearns Eliot, 1888 ~ 1965
爱德华八世	Edward VIII, 1894 ~ 1972
爱德华六世	Edward VI, 1537 ~ 1553
艾德	Ernest John Eitel, 1838 ~ 1908
艾儒略	Giulios Aleni, 1582 ~ 1649
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 ~ 1905
安德拉德,佩雷兹·德	Pires d'Andrade
安德森	F. Anderson
安德逊,爱尼斯	Aeneas Anderson
安东尼奥	Antonio
安敦尼,马可·奥利略	M. Aurelius Anonius, B. C. 83 ~ B. C. 30

安国宾	An Kukpin
安妮	Queen Anne, 1665 ~ 1714
安松,乔治	Commodore George Anson
安田朴	Rene Etiemble, 1909 ~
奥尔德伯格	H. Oldenberg, 1618 ~ 1677
奥尔森,托马斯	Thomas T. Allsen
奥浓,吾尔根奇	Urgunge Onon
奥斯汀,格雷格	Greg Austin
艾登,安东尼	Robert Antony Eden, 1897 ~ 1977

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5 ~ 174
巴恩斯	A. C. Barnes
巴尔福	Frederic Henry Balfour, 1846 ~ 1909
巴克礼	Thomas Barclay, 1849 ~ 1935
巴克斯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1873 ~ 1944
巴雷特	Timothy Hugh Barrett
巴雷特,大卫	David P. Barrett
巴林	F. Barin
巴罗斯	Joao de Barros, 1496 ~ 1570
巴设	J. Basset
巴托利,丹尼尔罗	Daniello Bartoli, 1608 ~ 1685
巴夏礼	Harry Smith Parkes, 1828 ~ 1885
白之	Cyril Birth, 1925
白挨底	G. MacDonald Home Playfair, 1850 ~ 1917
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白汉理	Henry Blodget, 1825 ~ 1903
柏仓白	Plumb
柏尔	Charles Alfred Bell, 1870 ~ 1945
柏应理	Philippe Couplet, 1623 ~ 1692
拜尔豪斯,赫尔	Herr Beyerhaus
班克斯,约瑟夫	Joseph Banks

包令	John Bowring, 1792 ~ 1872
包约翰(包尔腾)	John Shaw Burdon, 1826 ~ 1907
保灵	Stephen Livingstone Balwin, 1835 ~ 1902
鲍康宁	Federick William Baller, 1853 ~ 1922
杯突高哂	Pieter de Goyer
贝尔,蒙塔古	H. T. Montague Bell
贝尔,约翰	John Bell, 1691 ~ 1780
贝思朗	John Berthrong
贝克	H. Baker
比尼恩	Bobert Laurence Binyon, 1869 ~ ?
比兹利	C. R. Beazley
彼里兹,汤姆斯	Thomas Pires
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eidgman, 1801 ~ 1861
俾斯麦,查尔斯	Charles Bismark
毕尔	Samuel Beal, 1825 ~ 1889
宾威廉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 ~ 1868
伯吉斯	J. Smith Burges
伯吉斯,亨利	Henry Burgess
伯内特,吉尔伯特	Gilbert Burnet
伯奇	Birch
伯驾	Peter Parker, 1804 ~ 1889
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 ~ 1945
伯顿	C. Berton
伯顿,罗伯特	Robert Burton, 1577 ~ 1640
博伊尔,罗伯特	Robert Boyle, 1627 ~ 1691
卜德	Derk Bodde, 1909 ~
卜力	Henry Arthur Blake, 1898 ~ 1903
卜立得	D. Pollard
卜鲁	Gregory Blue
卜鲁斯	F. William Adolphus Bruce, 1814 ~ 1867
卜弥格	Bonn Michel, 1612 ~ 1659
卜士礼	Stephen Wootton Bushell, 1844 ~ 1908

卜正民	Timothy Brook
布霍斯,皮埃尔·约瑟夫	Pierre Joseph Buchoz
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1810 ~ 1880
布朗特,查尔斯	Charles Blout,1654 ~ 1693
布莱提叶	Gabriel Bretier
布勒克	Thomas Lowndes Bullock, 1845 ~ 1915
布鲁尔,大卫	David Brewer
布鲁克斯,芭芭拉	Barbara J. Brooks
布鲁克斯,理查德	Richard Brookes
波德雷安,托马斯	Thomas Bodleian
波乃耶	James Dyer Ball, 1847 ~ 1919
波丽安	Anne Boleyn,1507 ~ 1536
查尔斯二世	Charles II,1630 ~ 1685
查顿	William Jardine, 1784 ~ 1843
查尔	S. V. R. Char
蔡高(蔡阿国)	Tsai A-ko
蔡宗奇	Zong-Qi Cai
晁时杰	Robert L Chard
达德利,罗伯特	Robert Dudley
大普利尼	Pliny the Elder, 23 ~ 79
打马字	John Van Nest Talmage,1819 ~ 1892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 190
戴尔	Samuel Dye
戴密微	Paul Henri Demieville, 1849 ~ 1979
戴维斯,里斯	Rhys Davis
丹皮尔,威廉	William Dampier, 1651 ~ 1715
丹尼尔斯	C. A. Daniels
道格思(道格拉斯)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 ~ 1913

道森	Christopher Dawson, 1889 ~ 1970
德庇时	John Francis Davis, 1795 ~ 1890
德杜利尔斯,法蒂奥	Fatio de Duilliers
德拉兹罗,亨利	Henry de Lazlo
德赖伯格,马乔里	Marjorie Dryburgh
德梅拉	De Maila
德慕登	Charles Newton Dubs, 1862 ~ 1936
德尼克	Nicholas Belfield Dennys, 1840 ~ 1900
德萨洛,德尼斯	Denys de Sall
德效骞	Homer Hasenflug Dubs, 1892 ~ 1969
德佐特,贝里尔	Beryl de Zoete
邓玉函	Joannes Terens, 1576 ~ 1630
迪安	Albert Dien
迪尔力克	Arif Dirlik
迪金森	G. L. Dickinson
迪特斯,安德列亚	Andrea Dittis
颠地	Lancelot Dent
丁韪良	W. A. Parsons Martin, 1827 ~ 1916
窦纳乐	C. Maxwell MacDonald, 1852 ~ 1915
杜德桥	Glen Dudbridge, 1938 ~
杜赫德	Jean Baptiste du Halde, 1674 ~ 1743
杜嘉德	Carstairs Douglas, 1830 ~ 1877
杜希德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1925 ~
狄奥多西	Theodosius, 346 ~ 395
狄考文	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 ~ 1908
笛福,丹尼尔	Daniel Defoe, 1660 ~ 1731
多尔比	A. W. E. Dolby
额尔金	Elgin and Kincardine, 1811 ~ 1863
鄂多立克	Odoric of Pordenone, 1274 ~ 1331

范德帕特,塞缪尔	Samuel Van de Putte, 1690 ~ 1745
范约翰	John M. W. Farnham,1830 ~ 1917
菲利普斯,约翰	John Philips
费里斯,比尔	Beer Ferri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 ~ 1991
费耶拉宾德	Feyerabend
费赖之	Louis Pfister, 1833 ~ 1891
费伦	J. Fearon
芬德,布赖恩	Brian Fender
冯贺安	Fum Hoam
弗赖伊,罗杰	Roger Fry
弗兰克	Gauting Herbert Franke
弗罗比舍,马丁	Martin Frobisher, 1535 ~ 1594
弗洛伊德	Frank E. Washburn Freud
弗伦奇,阿瑟	Arthur French
伏尔泰	Voltaire, 1694 ~ 1778
福格尔,侨舒亚	Joshua A. Fogel
福开森	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 ~ 1945
福克斯,亨利	Henry Fox
富兰克林	Ursula Franklin
傅熊	Bernhard Fuehrer
傅兰雅	John Fryer, 1839 ~ 1928
傅步兰	G. Fryer
富尔蒙	Etienne Foutmont

盖德润	Richard Simpson Gundry, 1838 ~ 1924
盖士利	William Wharton Cassels, 1859 ~ 1925
甘为霖	William Campbell,1841 ~ 1921
高葆真	William Arthur Cornaby, 1860 ~ 1921
高第	Henri Cordier, 1849 ~ 1925

哥尔斯密,奥利维尔	Oliver Goldsmith, 1728 ~ 1774
高戴维	David Collie, ? ~ 1828
高罗佩	R. H. vanGulik, 1910 ~ 1967
高升	John Robert Cozen, ? ~ 1794
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nbus, 1446 ~ 1506
歌德	J. W. von Goethe, 1749 ~ 1832
戈登	Charles George Gorden, 1833 ~ 1885
戈登(军医)	A. C. Gordon
戈登,彼得	Peter Gordon
戈拉斯,彼得	Peter J. Golas
戈斯	Edmund W. Gosse
格雷	John Henry Gray
格雷厄姆	Charles Harold Graham
葛立克	L. H. Gulick
葛瑞汉	Angus Charles Graham, 1919 ~ 1991
根兹巴络	Gainsborug
敦达斯	Henry Dundas
郭纳爵	Ignatius da Costa, 1599 ~ 1666
郭实腊	Karl Frfiedrich Gützlaff, 1803 ~ 1851
谷登堡	J. Gutemberg, 1398 ~ 1468
古克礼	Christopher Cullen
顾立雅	Herrlee Glessner Creel, 1905 ~
顾赛芬	Seraphin Couvreur, 1835 ~ 1919

哈布斯米尔	C. Harbsmeir
哈丁,查尔斯	Charles Harding
哈夫彭尼,威廉	William Halfpenny
哈克尼	Louise Wallace Hackney
哈克卢特,理查德	Richard Hakluy
哈里斯,斯图尔特	Stuart Harris
哈隆,古斯塔夫	Gustav Haloun, 1898 ~ 1951

哈切特,威廉	William Hatchett, 1701 ~ 1749
海德,托马斯	Thomas Hyde, 1636 ~ 1703
海特,威廉	William Hayter
汉璧礼	Thomas Hanbury, 1832 ~ 1907
汉密尔顿,伊丽莎白	Elizabeth Hamilton
韩南	Patrick D. Hanan, 1927 ~
韩山文	Theodore Hamberg,1819 ~ 1854
豪沃思,亨利	Henry Howorth
合信	Benjamin Hobson, 1816 ~ 1873
何丙郁	Peng-Yoke Ho
何启	Ho Fuk-Kai, 1859 ~ 1914
何斯德	Dixon Edward Hoste, 1861 ~ 1946
赫伯特,爱德华	Edward Herbert,1581 ~ 1648
赫德	Robert Hart, 1835 ~ 1911
赫脱南	Huntner
赫士	Watson McMillen Hayes, 1857 ~
赫塞尔廷,迈克尔	Michael Heseltine
黑格尔	G. W. Friedrich Hegel ,1770 ~ 1831
亨德	William C. Hunter, 1812 ~ 1891
亨利八世	Henry VIII,1491 ~ 1547
贺麦晓	Michel Hockx
洪仁玕	Hong Rengan
洪任辉	James Flint, 1720 ~
胡克	B. G. Hook
胡克,罗伯特	Robert Hooke, 1635 ~ 1703
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 ~ 1899
华滋华斯,威廉	William Wordsworth, 1770 ~ 1850
华莱士,威廉	William Wallace
怀恩光	John S. Whitewright, 1858 ~ 1926
怀特,约翰	John C White
霍,苏珊娜	Susanna Hoe
霍德 - 威廉斯,理查德	Richard Hodder-Williams

霍普金斯	Frederic G. Hopkins,1861 ~ 1947
黄宽	Wong Foon,1829 ~ 1878
黄胜	Wong Shing, 1826 ~ ?
霍茨波	Hotspur
霍克斯	David Hawkes,1923 ~
霍克斯,米歇尔	Michel Hockx
霍布恩	Brian Holton

季理斐	Donald MacGillivray,1862 ~ 1931
吉尔伯特	Humphrey Gilbert, 1539 ~ 1583
吉廷斯	John Gittings
基德,塞缪尔	Samuel Kidd, 1799 ~ 1843
纪里备	W. Hewitt Gillespie, 1868 ~ 1920
嘉约翰	John Glasgow Kerr, 1824 ~ 1901
加尔文,约翰	John Calvin,1509 ~ 1564
蒋彝	Chiang Yee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 ~ 1628
金楷理	Carl T. Kreyer
金璋	L. Charles Hopkins, 1854 ~ 1952
君士坦丁大帝	F. Valerius Constantinus, 280 ~ 337

卡尔平尼,普兰诺	G. de plano Carpini, 1180 ~ 1250
卡勒里	Callery
卡斯加	Charles Cathcart
卡特勒特	Carteret
卡文迪什,托马斯	Thomas Cavendish, 1560 ~ 1592
恺撒大帝	Gaius Julius Caesar, 100 BC ~ 44 BC
凯恩斯,理查德	Richard Cairns
凯恩斯,乔治·布雷特	George Brett Keynes
凯夫,爱德华	Edward Cave

凯瑟琳	Catherine
康白尔	Campbel
康普顿,查尔斯·斯潘塞	Charles Spencer Compton
康斯塔布尔	Constable
考克斯,苏	Sue Cox
克陛存	M. Simpson Culbertson, 1819 ~ 1862
克拉普洛特	Julius Heinrch Klaproth, 1873 ~ 1835
克莱格,詹尼	Jenny Clegg
克劳福德,约翰	John Crawford
克兰默	Thomas Cranmer
克理,威廉	William Carey,1761 ~ 1834
克利奥帕特拉	Cleopatra, B. C. 69 ~ B. C. 30
克里斯多尔	Joshua Christall,? ~ 1794
克鲁克	A. N. Crook
克罗尔,伊丽莎白	Elisabeth J. Croll
克罗迪斯	Claudiu,B. C. 10 ~ A. D. 54
克罗斯,约翰	John Cross
科大卫	David W Faure
科拉姆	J. Coraham
科尔	R. Cole
科尔布鲁克,亨利·托马斯	Henry Thomas Colebrook
科尔里奇,塞缪尔·泰勒	S. Taylor Coleridge, 1772 ~ 1834
柯大卫	David Collie, ? ~ 1828
柯林斯,安东尼	Anthony Collins, 1676 ~ 1729
柯克	George W. Cooke,1814 ~ 1865
孔拉迪	Auguust Conrady,1864 ~ 1925
库恩,狄特	Dieter Kuhn
库普斯	Koops
库寿龄	Samuel Couling,1859 ~ 1922
魁奈	Francois Quesnay, 1694 ~ 1774
奎日波,汉斯	Hans Kuijper

拉姆,查尔斯	Charles Lamb,1775 ~ 1834
拉姆奇,安德鲁·迈克尔	Andrew Michael Ramsay,1686 ~ 1743
拉铁摩尔,欧文	Owen Lattimore, 1900 ~ ?
莱布尼兹	G. Wilhelm Leibniz, 1646 ~ 1716
莱弗里	M. Lavery
莱福士,斯坦福	Stamford Raffles
莱维,安德烈	André Lévy
赖德烈	K. Scott Latourette, 1884 ~ —1968
赖克怀恩	Adolf Reichwein
兰德,威廉	William Land
朗世宁	Joseph Castiglione, 1688 ~ 1766
劳埃德,杰弗里	Geoffrey Lloyd
乐灵生	Frank Joseph Rawlinson, 1871 ~ 1937
勒格朗	Le Grand
雷伊勋爵	Lord Reay
里德,查尔斯	Charles Reed
理雅各	Jemes Legge, 1814 ~ 1897
里明顿	D. Rimington
李大斐	Dorothy Moyle,1896 ~ 1987
李埠昔治	Henry Liversidge, ? ~ 1832
李华达	Walter Thurlow Lay, 1840 ~ 1917
李佳白	Gilbert Reid, 1857 ~ 1927
李金麟	Lee Kim-leen
李明	Louis Daniel Le Comte 1655 ~ 1723
李启	Ritchie
李太郭	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 ~ 1845
李泰国	Horation Nelson Lay, 1832 ~ 1898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 ~ 1919
李修善	David Hill, 1840 ~ —1896
李约瑟	N. J. T. M. Needham, 1900 ~ 1995
李蔚海	William Hyde Lay, 1836 ~ 1876

礼士	Rees
利玛窦	Matteo Ricci , 1552 ~ 1610
利德尔	Liddell
丽萍	Lyping
林德赛	H. Hamilton Lindsay
林恩,托马斯	Thomas Lynn
林格罗斯,巴兹尔	Basil Ringrose
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 1836 ~ 1907
林邵阳	Lin Shao-yang
列班扫马	Rabban Cauma
龙彼得	Piet Vander Loon, 1920 ~ 2002
龙华民	Nicolaus Longobardi, 1559 ~ 1654
刘刚	Liu Gang
刘亚骈	Liu Ya-pien
吕布吕基	Guillaume de Rubruquis
律劳卑	William John Napier
罗,迈克尔	Micheal Lok
罗宾逊,肯尼斯	Kenneth Robinson
罗伯聃	Robert Thom,1807 ~ 1846
罗伯茨	S. C. Robarts
罗伯茨,约	J. A. G. Roberts
罗布	Micke de Vries Robb
罗啻	Elihu Doty
罗森诺,约翰	John S. Rohsenow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 ~ 1970
罗中番	Lo Chung-fan,? ~ 1850
罗雅各	Jacobus Rho, 1593 ~ 1638
罗齐	Luo Qi
罗耶仲,科有里斯	Kornelis Rayerszoon
罗兹,爱德华	Edward J. Rhoads
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 1811 ~ 1896
骆任廷	J. H. Stewart Lokhart, 1858 ~ 1937

洛克,约翰	John Locke,1632 ~ 1704
卢哥比安	LeGobien
卢德维卡	Ludovika
卢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
鲁滨逊	F. C. R. Robinson
鲁德昭	Alvare de Samedo, 1585 ~ 1658
鲁桂珍	Lu Gwei Djen,1904 ~ 1991
鲁惟一	Michael Loewe,1922 ~
路德,马丁	Martin Luther,1483 ~ 1546
路若汉	Father Rodriguez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 ~ 1774
麻克类	Robert Macleay
玛高温	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 ~ 1893
玛丽二世	Mary II, 1662 ~ 1694
玛丽一世	Mary I, 1516 ~ 1558
马儿忽思	Rabban Marcos
马国贤	Mattheo Rippa,1862 ~ 1745
马戛尔尼	Earl of Macartney
马继业	G. Halliday MaCartney, 1867 ~ 1945
马可·波罗	Marco Polo , 1254 ~ 1324
马勒,弗勒德里希·马克斯	Friedrich Max Muller
马林	W. E. Maclin
马黎诺里	Giovannni da Marignolli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 ~ 1834
马礼逊,玛丽·丽贝卡	Mary Rebecca Morrison
马礼逊,玛丽·伊莎贝尔	Mary Isabella Morrison, 1816 ~ 1852
马理生	Marin C. Morrison, 1826 ~ 1870
马利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884 ~ 1942
马若瑟	J. H. Marie de Premare, 1666 ~ 1735
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n, 1814 ~ 1843

马森	Mary Gertrude Mason
马什曼,侨舒亚	Joshua Marshman, 1768 ~ 1837
马士	Hosea Ballou Morse, 1885 ~ 1934
马诗门	Samuel Mossman
马他伦	Maitland
马雅各	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7 ~ 1951
曼宁,托马斯	Thomas Manning, 1774 ~ 1840
麦大维	David L. McMullen,1939 ~
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 ~ 1857
麦华陀爵士	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 ~ 1885
麦嘉温	John Macgowan, ? ~ 1922
麦康奈尔,杰克	Jack McConnell
麦克宾,阿拉斯代尔	Alasdair MacBean
麦克开拉启	Thomas McClatchie, 1813 ~ 1885
麦克唐纳,刘易斯	Lewis Macdonald
麦克唐纳,马尔科姆	Malcolm MacDonald
麦克尤恩	E. McEwen
芒迪,彼得	Peter Mundy,1608 ~ 1667
梅辉立	William Frederic Mayers, 1831 ~ 1878
梅里亚斯基,雅诺什	Yarnosch Meliasky
梅益盛	Isaac Mason, 1870 ~ 1939
门多萨	Juan G. de Mendoza, 1540 ~ 1620
闵福德,约翰	John Minford
孟德斯鸠	C. L. de S. Montesquieu, 1689 ~ 1755
孟高未诺	F. J. of Monte Corvino , 1247 ~ 1328
孟席斯	N. K. Menzies
孟席斯,加文	Gavin Menzies
蒙图西	Montucci
弥尔顿	Milton, 1608 ~ 1674
米怜	William Milne, 1785 ~ 1822
米勒	Andreas Muler
密迪乐	T. Taylor Meadows, 1815 ~ 1868

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Milne, 1815 ~ 1863
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1845 ~ 1932
墨尔	Mor
墨菲,阿瑟	Arthur Murphy, 1727 ~ 1805
莫安仁	Evan Morgan, 1860 ~ 1941
莫顿,玛丽	Mary Morton
莫蒂默,克伦威尔	Cromwell Mortimer
莫非特,约翰	John Moffett
莫格,威廉·里斯	William Rees Mogg
莫特	Frederick W. Mote
默里,休	Hugh Murray
穆尔	G. E. Moor
慕阿德	A. Christopher Moule, 1873 ~ 1957
慕稼谷	George Evans Moule, 1828 ~ 1912
慕维廉	William Muirhead, 1822 ~ 1900

纳尔逊	Horatio Nelson, 1758 ~ 1805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 ~ 1688
尼达姆	Needham
尼古拉四世	Nicolas IV
尼卡姆,亚历山大	Alexander Neckam
尼乌霍夫,约翰	Johan Nieuhoff
聂斯脱里	Nestorius
牛顿	Isaac Newton, 1642 ~ 1727
牛马克	Peter Newmark
纽贝,劳拉	Laura Newby
纽伯里,约翰	John Newbery, 1713 ~ 1767
纽霍夫,约翰	Johan Nieuhof, 1618 ~ 1672

欧几里得	Euclid, 约 330BC ~ 275 BC

帕克,彼得	Peter Parker
潘特索夫,亚历山大	Alexander Pantsov
潘慎文	Alvin Pierson Parker, 1850 ~ 1924
庞德,埃兹拉·卢米斯	Ezra Loomis Pound, 1885 ~
培根,弗兰西斯	Francis Bacon, 1561 ~ 1626
培根, 罗吉	Roger Bacon, 1214 ~ 1294
佩雷斯特罗,拉佛尔	Rafael Perestrello
庞迪我	Jacque de Pantoja, 1571 ~ 1618
皮尔逊,乔治	George Pearson
皮克沃德,埃德温	Edwin Pickwoad
普拉特	K. Pratt
普雷斯特	Prester John
普洛希尔 - 特纳,阿·特	Arthur Twistleton Polhill-Turner, 1863 ~ ?
普洛希尔 - 特纳,塞·亨	Cecil Henry Plohill-Turner, 1860 ~ ?
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 1820 ~ 1870
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1789 ~ 1856
浦尔特尼	Pulteney
濮兰德	John O. Percy Bland, 1863 ~ 1945
蒲立本	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1922 ~
蒲赖尔	W. B. Pryer
珀洽斯	Purchas
珀切斯,塞缪尔	Samuel Purchas, 1577 ~ 1626
珀西,托马斯	Thomas Percy, 1729 ~ 1881

奇彭代尔,托马斯	Thomas Chippendale
钱存训	Tsien Tsuen-Hsuin
钱伯斯,威廉	William Chambers, 1723 ~ 1796
乔治六世	George VI, 1895 ~ 1952
乔治一世	George I, 1660 ~ 1727
切斯特菲尔德	Chesterfield

琼斯,威廉	William Jones, 1746 ~ 1794
秦乃瑞	John Chinnery

惹诺皆色	Jacob de Keyzer
任修本	Gilbert G. Warren, 1861 ~ 1927
荣振华	J. Dehergne, S. J. , 1903 ~ 1990
柔克义	William W. Rockhill, 1854 ~ 1914
芮沃寿	Arthur F. Wright, 1913 ~ 1976
瑞思义	William Hopkyn Rees, 1859 ~ 1924
儒莲	Stanislas Julien, 1797 ~ 1873

萨拉	Sarah Ann Page
萨尔维塔	M. Salvetat
萨依德,爱德华	Edward Said
塞尔扣克,亚历山大	Alexander Selkirk
塞林纳斯,古斯塔夫	Gustavus Selenus, 1579 ~ 1666
赛诺,丹尼斯	Denis Sinor
瑟克尔,约翰	John G. Thirkell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
沈福宗	Tchin Fo-tsung
施敦力(亚历山大)	Alexander Stronach, 1801 ~ 1878
施敦力(约翰)	John Stronach, 1810 ~ 1888
施博尔	Kristofer M. Schipper
施洛斯,大卫·弗雷德里克	David Frederick Schloss
施洛斯,西吉斯蒙德·大卫	Sigismund David Schloss
石施道	K. Gawlikowski
史爱理	Elizabeth Clare Scurfield
史丹赖	Rev Vincent Stanton
史景迁	Jonath Spence, 1936 ~
史密斯	John Smith

史密斯,乔安妮	Joanne N. Smith
史钊活	Frederick Stewart
斯巴肖特,伊丽莎白	Elizabeth Sparshott
斯波尔丁	H. N. Spalding
斯当东	George L. Staunton,1737 ~ 1801
斯当东,多马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 ~ 1858
斯卡伯勒	Earl Scarborough
斯卡思	J. R. Scarth
斯科特	J. H. J. Scott
斯隆,汉斯	Hans Sloan
斯潘塞,乔纳森	Jonathan Spence
斯塔尔	J. Starr
斯塔德	Charles Thomas Studd, 1860 ~ ?
斯坦因	Mark Aurel Stein, 1862 ~ 1943
斯威屯,艾伦·理查德	Alan Richard Sweeten
司米德	Stanley Peregrine Smith, 1861 ~ ?
宋佛俭	Song Hoot-kiam
宋君荣	Antoine Gaubil, 1689 ~ 1759
孙罗伯	Robert Nelson,1818 ~ 1886
苏道味	Arthur Sowerby, 1857 ~ 1934
苏格拉底	Sokrates, B. C. 469 ~ B. C. 399
苏慧廉	W. Edward Soothill, 1861 ~ 1935
苏柯仁	A. de Carle Sowerby, 1885 ~ 1954
苏谋事	James Summers
索尔	John Shore
泰勒	W. C. Taylor
泰勒,罗伯特	Robert Taylor
汤姆斯	P. P. Thoms
汤普森	P. Thompson
汤若望	J. A. Schall von Bell, 1591 ~ 1666

唐纳	G. B. Downer
坦布尔,威廉	William Temple,1628 ~ 1699
坦南特,埃默森	Emerson Tennent
特德库姆	J. H. Titcomb
忒纳	Turner
廷德尔,马修	Mathew Tindal,1657 ~ 1733
佟秉正	P. C. T'ung
托马斯,帕斯科	Pascoe Thomas
托马斯	James Thomas,1862 ~ 1940

瓦丁	L. Wadding, 1588 ~ 1657
瓦格纳	Donald Wagner
瓦基洛	J. Wackillop
瓦特斯	Thomas Watters, 1840 ~ 1901
王,斯蒂芬·福伊希特	Stephan Feucht Wang
王次澄	Wang Tzi-cheng
王铃	Wang Ling, 1917 ~ 1994
王致诚	Jean Denis Attiret,1702 ~ 1768
文翰	Samuel George Bonham,1803 ~ 1863
文林士	Charles Alfred Speed Williams, 1884 ~ ?
威尔金斯,查尔斯	Charles Wilkins
威尔金森,詹姆斯	James Wilkinson
威克利夫,约翰	John Wickliffe
威利茨,汉娜	Hannah Willetts
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1650 ~ 1702
威托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 ~ 1895
韦布	Clement C. J. Webb, 1865 ~ 1954
韦利	Arthur David Waley, 1889 ~ 1966
韦利,雅各布	Jacob Waley
韦弗,莱昂内尔	Lionel Wafer
韦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 ~ 1890

韦麻郎	Wijblard Van Waerwijek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1815 ~ 1887
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1873 ~ 1930
卫廉士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 ~ 1884
沃波尔,罗伯特	Robert Walpole, 1676 ~ 1745
沃波尔,霍勒斯	Horace Walpole, 1717 ~ 1797
沃尔特,理查德	Richard Walter
沃德,威廉	William Ward, 1769 ~ 1823
倭讷	E. T. Chalmers Werner, 1864 ~ 1954
吴文秀	Ng Mun-sow
伍德,本杰明	Benjamin Woods

肖德鲁特	A. Shortrede
向达	Hsiang Ta
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 1572 ~ 1620
小德金	C. L. Joseph De Guignes, 1759 ~ 1845
西蒙	Ernst Julius Walter Simon, 1893 ~ 1981
奚安门	Henry Shearman, ? ~ 1856
奚礼尔	Charles Batten Hillier, ~ 1856
禧在明	Walter Caine Hillier, 1849 ~ 1927
希尔顿,詹姆斯	James Hilton, 1900 ~ 1954
席文	Nanthan Sivin
偕叡理	George Leslie Mackay
修,拉里	Larry N. Shyu
修中诚	Ernest Richard Hughes, 1883 ~ 1956
休谟	David Hume, 1711 ~ 1776
徐懋德	Andre Pereira
徐日升	Thomas Pereira, 1645 ~ 1708

阳玛诺	Emmanuel Jeune Diaz, 1574 ~ 1659
杨格非	John Griffith, 1831 ~ 1912
杨若乐	Jeronimo Sa
耶茨	W. P. Yetts
耶茨,威廉·巴特勒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 ~ 1939
叶女士	Evangeline Edwards Dora, 1888 ~ 1957
叶山	Robin Yates
伊丽莎白二世	Elizabeth II, 1926 ~
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33 ~ 1603
伊懋可	Mark Elvin
依里斯	Sir Henry Ellis, 1777 ~ 1855
义律	Captain Charles Elliot, 1801 ~ 1875
殷铎泽	Prospepro Intorcetta, 1625 ~ 1696
约翰逊,塞缪尔	Samuel Johnson, 1709 ~ 1784
裕尔,亨利	Henry Yule, 1820 ~ 1889

湛约翰	John Chalmers, 1825 ~ 1899
詹美生	Alexander R. Jamieson
詹姆斯一世	James I, 1566 ~ 1625
詹纳	W. J. F. Jenner
张仲澜	Joland Chang
章必成	M. H. Proctor Beauchamp, 1860 ~ 1939
赵亨利	Henry Zhao
曾德昭	Alvare de Samedo, 1585 ~ 1658
郑和	Zheng He
钟阿三	Tchong Ah-sam
钟,希拉里	Hilary Chung
种德(者)	David Collie
翟兰思	Lancelot Giles, 1878 ~ 1934
翟理斯	Herbert Allen Giles, 1845 ~ 1935

翟林奈	Lionel Giles, 1875 ~ 1958
朱迩典	John Newell Jordan, 1852 ~ 1925
庄士敦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 ~ 1938
庄延龄	Edward Harper Park, 1858 ~ 1927
泽克,埃里克	Erik Zurcher

汉英术语对照表

中文	英文
边沿课型	marginal subject
朝贡国	tributary state
产业革命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传教时期	Missionary Period
传教士心态	missionary mentality
代表译本	delegates' version
道家	Daoist School
道家观念	Daoism
档案解密	banning lift of records
戴维斯汉学奖学金	Davis Chinese Scholarship
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东方情调	Oriental sentiment
东印度公司	East Indian Company
多元文化	multi-cultures
二十一所大学协会	21 Universitas
非暴力文化	culture of non-violence
佛教文化	Buddhist culture
感情时代	Age of Feeling
光荣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 of 1688
海禁	ban on maritime foreign trade
海特报告	the Hayter Report
汉学	Sinology
汉学家	Sinologist

汉学研究	Sinological research
汉学研究生网络教学	The China Postgraduate Network(CPN)
汉语学位课程	degree Chinese courses
汉学证书课程	certificate Chinese course
汉学资源	resources for Chinese studies
恒河外方传教计划	The Ultra-Ganges Mission Plan
宏观研究	macro-studies
后斯卡伯勒发展	post-Scarbrough development
后传教时期	Post-Missionary Period
华夏文化	Chinese culture
皇家学会	The Royal Society
基督教化	Christianize
经院哲学	scholastic philosophy
甲级证书水平	"A" level
剑桥七杰	Seven Missionaries from Cambridge
教廷	the Vatican
教席	professorship
教族一体	ethics and religion in one
凯尔特人	Celts
科举制度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科技经理	science manager
跨学科研究	cross disciplinary research
兰加斯特家族	House of Lancaster
雷伊委员会	The Reay Committee
礼仪之争	argument over formalities
理性化	rationalize
李约瑟问题	Needham's Question
炼丹术	alchemy
量化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
墨家观念	Mohist Conception
南洋学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内省型	introspective

欧洲殖民者	European colonialists
帕克报告	the Parker Report
排他性镜像	exclusive mirror image
普世意义	oecumenical significance
普通证书水平	"O" level
普通证书中学教育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启蒙	enlightenment
契丹冒险计划	Cathay Venture
前现代	premodern
前汉学时期	Pre-Sinological Period
区域研究	Area Studies
区域研究监测小组	The Area Studies Monitoring Group
圈地运动	Farmland Enclosure
人文主义	humanism
儒家学说	Ruist ideology, Confucianism
软进入	soft entry
撒克逊人	Saxons
三角法原则	Principle of Triangulation
实证主义	Positivism
实用主义	pragmatism
时代错误	anachronism
史学倾向	bias (or inclination) in history writing
世俗化	secularize
圣·马丁证书	St. Martins Certificate
圣经	the Bible
数据库建设	data bank construction
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
斯卡伯勒报告	the Scarborough Report
条顿人征英	Teutonic Conquest
他者化	othering
特优学位	honours degree
条约港口(口岸)	treaty ports

田野调查	field investigation
威托玛－翟理斯系统	Wade-Giles System
唯理语法	speculative grammar
唯物主义史观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微观研究	micro-studies
微观汉学传统	trandition of micro-sinology
伪汉学家	unqualified Sinologist
文化解读者	cultural interpreters
文员制度	civival service
问卷调查	questionaire
西方列强	Western Powers
先锋人物	pioneer
先孕后婚的方式	as a shotgun wedding
新教传教士	Protestant missionary
无神论者	atheist
鸦片战争	the Opium War
耶稣会士	the Jesuits
易学	Yimutology
伊比利亚人	Iberians
语言培训	language training
约克家族	House of York
英中花园	Anglo-Chinese Garden
原罪	original sin
伊斯兰学	Islamic Studies
异教徒	pagan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FRS
英国学术院院士	FBA
亚洲学者论坛	forum of Asianists
妖魔化	demonizing
印刷术	art of printing
印度学	Indology
园林艺术	art of gardening

造纸术	art of paper making
折扇	folding fan
生丝	raw silk
中华归主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中华文明	Chinese Civilization
中国热	Chinoiserie
中国人事件	L' Affaire des Chinois
中庸之道	doctrine of the mean
重农经济	agriculturist economy
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自然神论者	Deists
殖民地史模式	pattern of colonial history
指南针	compass
朱特人	Jutes
宗藩观念	mentality of suzerainty
宗教改革	religious reform
租界	concession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英国汉学史
作者=熊文华著
页数=294
出版社=北京市：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8
SS号=11857010
DX号=000006277485
简介=本书主要介绍自17世纪至今的英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2774855&d=412AAFF9DE84E50AAEAB87E7EF1F63AC&fenlei=1103010601&sw=%D3%A2%B9%FA%BA%BA%D1%A7%CA%B7#ctop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前汉学时期的英国汉学
一、跨世纪的英国汉学历程
二、安东尼·科林斯和马修·廷德尔
三、哈切特和墨菲与《赵氏孤儿》
四、珀西与《好逑传》
五、哥尔斯密与《中国人信札》
六、罗伯特·博伊尔、托马斯·海德和威廉·琼斯
第二章　传教时期的英国汉学
一、早期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代表人物
二、传教士家庭出身的汉学人才
三、外交人员出身的汉学研究代表
四、筚路蓝缕的汉学研究者
五、悬壶济世的传教士
第三章　后传教时期的英国汉学
一、汉籍翻译大师理雅各
二、汉语拼读方案设计者威妥玛
三、伦敦大学汉学教授道格思
四、科技翻译家和教育家傅兰雅
五、剑桥大学汉文教授翟理斯
六、西法西学的倡导者李提摩太
七、职业外交家兼汉学家庄延龄
八、多次前往新疆和甘肃探险考古的斯坦因
九、紫禁城中的洋太傅庄士敦
十、潜心研究中国民俗和方言的麦嘉温
十一、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汉学家慕阿德
第四章　国际化、专业化和团队化的现代英国汉学
一、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现代英国汉学界
二、韦利：出类拔萃的翻译家和汉学家
三、李约瑟和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四、葛瑞汉与中国程朱理学
五、中国隋唐史专家杜希德
六、英国学术院中国组主席杜德桥
七、一流学府栽培出来的英国汉学大家
八、国际精英会聚的汉学大舞台
第五章　从史论和实践角度看英国汉学
一、世俗化与英国汉学的发展

二、史学倾向与汉学家的责任
三、微观汉学、实证主义与区域研究
四、汉学大国面对的现实
五、瀚海阑干百丈冰
六、昔日的荣光与来日的辉煌
附录一　专业与非专业的汉学刊物
附录二　汉学书局和机构
附录三　从事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研究的院校
参考文献
汉英人名对照表
汉英术语对照表